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列维-斯特劳斯的传

我们都是野蛮人



上 卷

Lévi-Strauss
Emmanuelle Loyer

[法] 伊曼纽埃尔·卢瓦耶 著

俞俊 马莎 译

列维 - 斯特劳斯传

我们都是野蛮人（上卷）

〔法〕伊曼纽艾尔·卢瓦耶（Emmanuelle Loyer） 著

俞 俊 马 莎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献给我的女儿们，她们的父亲和继父

目 录

TABLE

缩写表 / III

致 谢 / V

引 言 / XI

第 1 部分 缘起（1935 年以前）

1 姓氏的传承 / 3

2 启示（1908—1924） / 34

3 革命（1924—1931）：政治与哲学的对决 / 60

4 救赎：民族学（1931—1935） / 95

5 世界的迷雾 / 132

第 2 部分 新大陆（1935—1947）

6 圣保罗的法国印记 / 147

7 深入巴西 / 184

8 “马斯默·列维”与南比克瓦拉人 / 216

9 危机（1939—1941） / 268

10 纽约市的法国人：流亡生活中的伟大创造（1941—
1944） / 302

11 结构主义在美国 / 353

第 3 部分 旧世界 (1947—1971)

- 12 马塞尔·莫斯的幽魂们 / 397
- 13 成熟时期 / 452
- 14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的忏悔录 / 495
- 15 结构主义的结晶 (1958—1962) / 538
- 16 科学工厂 / 592
- 17 学术生活 / 659
- 18 审慎之心 / 733

第 4 部分 新世界 (1971—2009)

- 19 不朽之人 / 769
- 20 变形 / 832
- 21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我们的同代人 / 902

列维 - 斯特劳斯法语作品列表 / 967

档案资料 / 971

缩写表¹
ABRÉVIATIONS

<i>AS</i>	《结构人类学》
<i>CC</i>	《神话学（第一卷）：生食与熟食》
<i>DPDL</i>	《亦近，亦远》
<i>EP</i>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i>FdL</i>	《月亮的另一面》
<i>HdL</i>	《猗猗的故事》
<i>HN</i>	《神话学（第四卷）：裸人》
<i>PJ</i>	《嫉妒的制陶女》
<i>Pléiade</i>	《列维－斯特劳斯集》
<i>PS</i>	《野性的思维》
<i>RE</i>	《遥远的目光》
<i>REL</i>	《看、听、读》
<i>RH</i>	《种族与历史》
<i>TT</i>	《忧郁的热带》
<i>VdM</i>	《面具之道》

1 以下作品的版本信息，请参见本书“列维－斯特劳斯法语作品列表”。——编者注

致谢
REMERCIEMENTS

现在，我把过去几年看作一次漫长的对话，一次没有被打断的对话。我必须感谢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Monique Lévi-Strauss）。用客套话说，没有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这本书就不会面世。我在她身上发现了完全属于人类学家的品质。她能够让自己的轨迹独立于丈夫的轨迹，把这些轨迹当成知识对象（objet de savoir）。她不仅用亲切的态度（和美食）迎接我，还给了我自由提问和自由解释的空间。只有她知道我欠下了多少恩情。

马修·列维-斯特劳斯（Matthieu Lévi-Strauss）一开始带着困惑观察我的研究，后来，他产生了兴致。他还向我传授了一些摄影技巧和有关勃艮第动物的知识，我很感激他的教导。洛朗·列维-斯特劳斯（Laurent Lévi-Strauss）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友善地向我表示，他对我有信心。至于卡特琳娜·列维-斯特劳斯（Catherine Lévi-Strauss），我慢慢发现，她不仅是一个可以说话的对象，还是一位细心的读者。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常常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收藏部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收藏部保管着列维-斯特劳斯的档案，而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保存着这家机构自己的档案和一些研究人员的档案。卡特琳娜·法伊福尔·达尔西尔

（Catherine Faivre d'Arcier）教我如何使用由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收藏部保管的档案，玛丽昂·阿贝莱（Marion Abelès）和索菲·阿萨尔（Sophie Assal）先后教我如何查阅由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保管的档案。我要由衷地向三人表示感谢。我还要感谢雅克·杜塞图书馆（Jacques Doucet）的格里高利·辛加尔（Grégory Cingal）和“社会主义学术研究办事处”（Office inter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 socialiste）的弗雷德里克·西派德（Frédéric Cépède）。

我查阅了保管于巴黎的档案，但这还不够。我又沿着列维－斯特劳斯特地理轨迹中的几条路线，寻找文献、信息以及见证人。我必须向巴西的许多人致谢。他们友善地帮助我，快速地回应我的需求（他们通常用无可挑剔的法语与我对话……）。他们是费尔南达·佩肖托（Fernanda Peixoto）、阿夫拉尼奥－罗尔·加西亚（Afranio-Raul Garcia）、赫洛伊莎（Heloïsa）……玛丽亚·贝托尔·多明格斯（Maria Bertol Domingues）、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Luis Donisete Benzi Grupioni）、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安东尼奥·坎迪多·梅罗埃苏扎（Antonio Candido Mello e Souza）、玛丽扎·克雷亚（Mariza Corrêa）、海伦娜·蒙泰罗·威尔佩（Helena Monteiro Welper）和安东尼奥·卡洛斯·德·苏扎·利马（Antonio Carlos da Souza Lima）。我要特别感谢路易莎·瓦伦蒂尼（Luisa Valentini）和伊曼纽埃尔·迪亚特金（Emmanuel Diatkine），他们为我“翻译”了圣保罗市，让我爱上了它。我的法国朋友们虽然人在巴黎，但积极地为我牵线搭桥，因此，谈论巴西的那些章节有他们很大的功劳。他们是奥利维耶·贡巴尼翁（Olivier Compagnon）、阿纳伊斯·弗雷歇（Anaïs Fléchet）、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Benoît de l'Estoile）。

至于纽约的那些章节，我要再次向皮埃尔－伊夫·索尼尔

（Pierre-Yves Saunier）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的档案管理员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档案管理员米歇尔·希尔兹克（Michele Hiltzik），她的效率高极了。

位于日本的米凯尔·费立叶（Michaël Ferrier）和索伊兹克·莫贝克（Soizic Maubec）收留了迷失于翻译之中的我这位法国女人。Yasu Watanabe、川田顺造（Jinzo Kawada）、吉田敦彦（Atsuhico Yoshida）¹则向我描述了日本人眼里的列维－斯特劳斯。

虽然这个探索记忆的游戏偶尔让人有一些伤感，但在巴黎，有许多人都想要参与到游戏中来。列维－斯特劳斯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或者别处的旧同事回忆起了他们熟悉的列维－斯特劳斯。这些人包括乔治·巴朗迪耶（Georges Balandier）、妮可·贝尔蒙（Nicole Belmont）、卡门·贝尔南（Carmen Bernand）、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莫里斯·戈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弗朗索瓦丝·埃里捷（Françoise Héritier）、让·雅曼（Jean Jamin）、玛丽·莫泽（Marie Mauzé）、让·莫诺（Jean Monod）、米歇尔·佩林（Michel Perrin）、安娜－克利斯提那·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伊曼纽埃尔·特瑞（Emmanuel Terray）、纳唐·华德（Nathan Wachtel）、弗朗索瓦兹·佐纳邦（Françoise Zonabend）。还有一些是我的同辈、朋友或熟人，他们通过某个机构或在某个场合下出现在列维－斯特劳斯身边，然后与他相识：阿尼塔·阿尔贝斯（Anita Albus）、卡特琳娜·克莱蒙（Catherine Clément）、西尔维·德雷福斯－阿瑟欧（Sylvie Dreyfus-Asséo）、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热尔曼·维亚特（Germain Viatte）、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有关迪娜·德雷福斯

¹ 日语里，对于罗马拼音无法与汉字一一对应的人名，译者仅保留了罗马拼音；对于能够对应的人名，译者做了翻译处理。另外，此处川田顺造的罗马拼音疑为“Junzō Kawada”。——译者注

的事）和伊内斯·德·拉·法桑琪（Inès de La Fressange）。我与阿兰·巴迪欧、伊内斯·德·拉·法桑琪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的。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同意把他在纽约拍摄的一张照片借给我看，弗雷德里克·朱德（Frédéric Jude）则将他拍摄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蒙太奇照片”借给了我，这张“蒙太奇照片”上有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全体成员的脸。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很少参与学术讨论。许多同事和朋友向我传达了他们的学术观点，我受益良多，心中十分感激。他们是让－弗朗索瓦·贝尔（Jean-François Bert）、安妮·克利诺（Anne Collinot）、爱丽丝·康克林（Alice Conklin）、让－马尔·德雷福斯（Jean-Marc Dreyfus）、克利斯提那·罗利埃尔（Christine Laurière）、帕特里斯·马尼格里耶（Patrice Maniglier）、让－克洛德·莫诺（Jean-Claude Monod）、维克多·斯托维斯基（Wiktor Stoczkowski）、让－克洛德·永（Jean-Claude Yon）。虽然手稿逐渐变厚，但仍有人愿意阅读。有时，他们读完完整的书稿；有时，他们只读书稿的一个部分。我与这些人之间的友谊也变得更加深厚：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文森·德巴恩（Vincent Debaene）、丹尼尔·法布尔（Daniel Fabre）、托马·赫尔斯（Thomas Hirsch）、莫里斯·欧朗德尔（Maurice Olender）、杨·伯丁（Yann Potin）、保罗－安德烈·罗森塔尔（Paul-André Rosental）、让－路易·迪西尔（Jean-Louis Tissier）。他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应该得到我最诚挚的感谢。同样，我要感谢我的母亲丹尼斯·卢瓦耶（Denise Loyer）和我的父亲让－克洛德·卢瓦耶（Jean-Claude Loyer）。除此之外，我要向巴黎政治学院历史研究中心（Centre d'histoire）的几位后勤人员、向历史研究中心举办的讨论会致谢。当然，我也要向巴黎政治学院致敬。2013年秋，我迫切需要时间，巴黎政治学院准许我休一个学期的科研工休假，让我有机会完

成本书的写作。最后，我将感谢的话送到意大利巴勒莫，因为朱丽叶·布拉蒙特(Juliette Blamont)与克里斯蒂娜·法塔·德尔博斯科(Cristina Fatta del Bosco)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校对，并且进行了思考。但列维－斯特劳斯从未去过西西里岛。

人的作用很重要，地方的贡献也很重要。我冒昧地希望，在对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空旷的期刊室表达谢意之际，结束我的致谢。那间期刊室又被称为“椭圆阅览室”。在那里，我远离了外界的喧嚣，一心写作，度过了愉快的日子。圆形大厅的马赛克地面上刻有城市的名字，让我幻想起伦敦、巴比伦、维也纳、底比斯、罗马、迦太基、耶路撒冷、巴黎、拜占庭、华盛顿、佛罗伦萨、雅典、尼尼微、柏林和亚历山大的光辉历史。我在图书馆付出了时间，用时间来交换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加宏大的故事。但是，日夜的交替让我心醉神迷，我甚至没有发现时间流逝……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旅程

我多么希望能够好好地与动物说说话，一次就好。当然，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几近痛苦地认识到，我永远也找不到构成宇宙的物质，看不透宇宙的结构。我指的是，“能与鸟类对话”。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摆在我的面前。如果能够跨越这条鸿沟，我一定高兴极了。如果您能为我找来一位心地善良的仙子，让她满足我一个心愿，那么我希望她能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弗里茨·拉达茨的对话¹

环游世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他的书房度过午后时光。书房位于巴黎十六区栗树街2号五楼的家中。这间小巧且秩序井然的工作室凭其百科全书式的海量藏书、精选的摆件、种类丰富的矿石、“奇妙”的古玩以及精心收藏的艺术品重塑了世界。

让我们怀着敬意走进这座神殿：房间四四方方，倒也宽敞；有弧度的墙面上开了一扇窗。墙上，书籍、装订整齐的期刊、百科全书和字典摆满了搁物架。书桌被安放在房间尽头，它置办于

1 《在马克思与卢梭之间》（« Entre Marx et Rousseau »），《时代周报》（Die Zeit）1983年9月2日。

纽约，是由深色木头制造而成的西班牙家具。列维 - 斯特劳斯在这儿写作，或者稳坐于安有滑轮的扶手椅之上，静静地阅读，并一读再读。这把扶手椅让他得以转向塞满文具的圆弧形活动面盖写字台，或者“镇守”于钢铸独脚小圆桌上的打字机（德语键盘）。打开收音机，欣赏古典音乐的旋律，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列维 - 斯特劳斯在书房中坐定后，有时会将双脚往桌上一搁，身体往后倾斜，这样一来，他就面朝一幅偌大的多罗菩萨画像。画像采购自 1950 年代的德鲁奥¹。这位绿色皮肤的神祇源自尼泊尔，没有性别之分，它的画像寄寓着庄严与安详。一条泰国鳄鱼、一尊庞大的中国树根雕塑、一些日本木版画和日本刀镡增添了几丝远东气息。几件稀有的民族志物件，比如，海达人用来“打”鱼的雪松木狼牙棒，把异乡的风景带回了他的寓所。狼牙棒还影响了作者创作《野性的思维》时美学思考的方向。书桌上摆着几颗石子，其中有青金石一块，匕首一把。不见植物的踪影。这间书房介于古玩陈列室与艺术工作坊之间，其视听环境是对美的赞歌。当我们沉浸于美的事物时，所有东西都能在下午沉闷的寂静中产生回响，所有事物都能参与到对图书馆这个渺小、封闭处所的乌托邦想象中来。事实上，列维 - 斯特劳斯不迈出书房一步便可以环游世界：左面墙上是非洲、大洋洲、亚洲；正面是期刊与文献索引卡；右面是南美洲；背面的角落是北美洲；余下的墙面留给了各种百科全书和辞典，因此，有了滑轮扶手椅的帮助，这些工具书触手可及。萨米耶·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在其《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一书中也展开了想象，他认为，这座纸张堆砌而成的庙宇就该是这样的。“我的收藏书堪比景观。”²他后来这样回忆道。事实上，

1 Drouot，音译为德鲁奥，位于巴黎九区的拍卖中心。——译者注

2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著，多米尼克 - 安托万·格里索尼（Dominique-Antoine Grisoni）收集整理：《列维 - 斯特劳斯的 33 个关键词》（« Lévi-Strauss en 33 mots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第 233 期，1985 年 10 月，第 26 页。

全世界都呈现在墙上，而每本书按其涉及的民族，像分布于地图上一般整齐地占据相应的位置。列维－斯特劳斯按地理分布整理书籍（按大陆板块），细致至极，造成了地图与书房藏书之间比例上的失真。但这两种表达方式十分相似，它们都展示了世界的完整性和丰富性。

尽管这个森罗万象的“图书馆”得到了精心整理，但是它的重要特点并未消失：除了 1.2 万册书籍，它还收录了一些国际期刊的完整期号，比如《人》（*Man*）和《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以及数千本论文的单行本。这些收藏给学院式的研究提供了必需的素材。一旦失去传递这些“数据”的管道，就没有知识可言。列维－斯特劳斯像他的同辈人一样，大量分析这些定期从“数据”归档的文献索引卡。要知道，这样的文献索引卡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已经成为所有比较研究的必需工具。他有一件存放档案的办公家具，其中收录了战争年代里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写下的读书笔记，数量多达几千份。“在某个时期，大约是 1940—1950 年，我几乎通读了民族学领域的所有出版物。”¹ 列维－斯特劳斯的图书馆环游世界，拥抱知识海洋，是求知的档案馆。它对知识无止境的追求精神至今仍未过时。1960 年代初，几只鸚鵡自由翱翔在这片学识的“洞穴”里，那时，它们不过刚从亚马孙流域来到这儿。多亏了法兰西公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副主任伊萨克·希瓦（Isac Chiva）多次建言献策，它们才勉强避开了法律的阻碍。希瓦知道他的同事兼好友热爱动物，知道他曾与几只从巴西运来的猴子相伴生活，更知道如果他坚持把猫猫狗狗带在身边，那么所有动物都会在他的书房安家，继而把这间工作室变成动物园。哎呀，可这些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鸚鵡们常常偷走他的眼镜，弄脏这里或那里。列维－斯特劳斯必须从这样的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我有时是画家，有时是修补匠》（« Il y a en moi un peintre et un bricoleur qui se relaient »），《世界报》（*Le Monde*）1974 年 6 月 21 日。

生活中解脱出来，同样他必须得从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但那些美洲印第安人神话再次创造了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当陷入这个容许幻想的世界后，他又燃起了追梦的情怀。

列维－斯特劳斯之谜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书房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工作室”¹，它不仅发蒙启滞，也让人目瞪口呆：它与结构主义开创者前卫的形象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常常将达到了相当高度的结构主义理论与1950—1960年的现代主义思潮联系到一起。因为它借用比较这一新方法，致力于重新建立实践符号思维（*la pensée symbolique*）的条件。事实上，他并不希望追寻和研究社会的各种变体，这是人们对他的误解，他希望依靠不同社会间传递差异的联系来探索被我们理解为变体的社会差异。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发迹并逐渐扩散到人类学以及其他不同的知识领域（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历史等）。科学的成功和人类学的成功似乎都有它的功劳。20世纪后半叶，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推广人类学，最后将它带入了社会科学的神殿。这就是结构主义的经典冒险故事。要知道，在这个概括为结构主义的故事里，有许多重要桥段都在这间书房里相继展开，而它的主人是“文艺复兴”的推动者……

所以，谁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是世纪之子，生于1908年的布鲁塞尔，殁于百年后的2009年的巴黎。他成长在一个犹太人家族，这个家族从阿尔萨斯迁至巴黎，在法国的社会地位一路攀升，书写着犹太人家庭的老故事。在这个深深扎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克洛德以独子的身份茁壮成长。家族渐渐没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令他备受宠爱。他的父亲是

¹ 意大利工作坊（*Studiolo italien*）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多为收藏、出售古董的商店。——译者注

一名画家，叔伯中也有两名画家。当一人不醉心艺术时便另谋出路：他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热闹、团结的大家庭，家族成员们褪去犹太教外衣，戴上了爱国主义的桂冠。年轻的他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童年。他学习优秀，入读了孔多塞高中的文科预科班，却拒绝准备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于是成就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他从未揭露转折背后的故事，让自己成了一个谜。此后，他自学法律和哲学两门学科，最后参加了1931年的教师资格会考。在此期间，他还是积极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在马克思思想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领导下，他渴望改变世界。但列维-斯特劳斯与许多同道朋友（譬如，他表亲的丈夫保罗·尼赞）都不同，他始终未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既然不能改变世界，他于1935年离开了他的“世界”。一个去巴西教书的机会得以让他到那儿研究印第安人，因为当时巴黎人认为印第安人聚居在圣保罗近郊……他抛弃了哲学这门传统学科，投入年轻的民族学的怀抱。显而易见，这是他生活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岔路口，它决定性地开启了他在新大陆的第二个人生阶段：首先是去巴西，然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远赴美国。

这样的生平使列维-斯特劳斯在20世纪的人生轨迹独树一帜。我们怎样评价他前半生的双重割裂？第一层割裂指的是，他与具有家族渊源的犹太教信仰保持了距离。在社会科学史上，列维-斯特劳斯绝非第一位与犹太教断绝往来的知识分子。然而，他是怎样把重建犹太人出身而非犹太人的身份与他阐述的那些崭新的问题、理论衔接起来的呢？¹第二层割裂是，他远

1 参见维克多·卡拉第（Viktor Karady）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犹太裔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一个问题的简单阐述》（« Les intellectuels juifs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 Esquisse d'une problématique »），载约昂·海布布朗（Johan Heilbron）、雷米·勒诺瓦（Remi Lenoir）、吉塞勒·萨皮罗（Gisèle Sapiro）主编：《社会科学史：向皮埃尔·布迪厄致敬》（*Pour une histoire des sciences sociales. Hommage à Pierre Bourdieu*），巴黎：法亚尔出版社（Fayard），2004年，第166页；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希望的地理学：流亡、启示和去同化》（*Géographie de l'espoir. L'Exil, les Lumières, la désassimilation*），巴黎：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新法兰西评论》（NRF）2004年。

离了欧洲这块“旧大陆”，将“新大陆”旗帜下的巴西和北美对应“旧大陆”而划入欧洲—南美—北美的三角关系中。这个三角关系是他结构主义思想诞生的真正契机。当这位法国范十足的知识分子离世时，人们祭奠他，敬他为国家英雄；而在伟大的知识分子诞生前，他长期在海外漂泊：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列维 - 斯特劳斯特在 1935—1947 年几乎从未踏足故土；1935—1939 年，他的足迹遍布塞尔陶（Sertão）的荆棘丛；此后，在 1941—1947 年，他流亡纽约，先是作为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开展活动，之后成为二战胜利后法国第一任驻美文化参赞。这般程度的社会化不曾见于法国其他学者。与他同期的学者被传统的世界中心论束缚而自困于国门之内。毋庸置疑的是，新旧世界、法国传统哲学教育、巴西民族学经验与受到德国传统渗透的美国人类学的融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创造了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伟大人物。¹

1947 年他重返“旧大陆”，着手专著创作。正是他跨越大西洋的人生经历成就了这些作品。之后的十几年内，列维 - 斯特劳斯特潜心于密集的工作，然而，直至 1959 年就职法兰西公学院前仍屡屡受挫。在就职法兰西公学院的前几年，也就是 1955 年，他凭着满腔的写作热情，在几周内奋力创作了 400 多页，他眼中的巴西版《奥德赛》跃然纸上。这本《忧郁的热带》成为 20 世纪思想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更使作者一跃成名于世。正是在 1960 年代，已经成为法国知识界公众人物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将结构人类学推入学术与政治舆论的中心，把它定位成修订马克思主义与去殖民化之外的第三方案。在神秘与沉寂的个性光环下，这位严肃的学者养成了绅士的气质，将他结构主义思想

1 参见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Benoit de l'Estoile）：《一位“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Genèse d'un "intellectuel français" »），载 <https://www.slate.fr/story/12687/genese-dun-intellectuel-francais>，2009 年 11 月 6 日。

的结晶传承给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让他们能够在他的思想中找到各自的美洲大陆。与列维－斯特劳斯为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以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集结于一场“结构主义的盛宴”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名声因此登上顶峰。在《野性的思维》结尾几页精辟的论断中，列维－斯特劳斯还试图将哲学带往结构主义之路，不过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为代名词的哲学并没有对这些试图改变它发展方向的新知识唯命是从。他具有论战的热情，这与他渐渐被人们接受的学者形象形成落差：作为学者，他深沉、优雅，唾弃政治对各个领域的过多干涉，醉心于培养各种“批判”情绪。虽然他的政治立场难以归类，1968年后他仍被左派的学生们视作不可救药的反动派。1973年，列维－斯特劳斯当选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他们才重拾理性。

65岁高龄的他还将迎接35年多的生活，但长寿带来了变数：人们对他作品的接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间，结构主义陷入了灭顶之灾，好在列维－斯特劳斯躲过了这场“人才陨落”的危机。1980年代，他成为法国学界的某种“禅宗”僧侣，哀悼这些纷纷离场的伟大角色：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罗兰·巴特、让－保罗·萨特、米歇尔·福柯相继于1980—1985年辞世。一步步地，这位老人，他们当中最年长的老人，成为法国举国的骄傲。他出生于有些遥远的时代，却一步步地远离了他的20世纪。然而奇怪的是，他与20世纪保持的距离反而让他能以一种最锐利、最颠覆的眼神反观我们即将褪去的“现代性”（modernité）。他的年纪长了，他离当下近了。

1 这是莫里斯·亨利（Maurice Henry）的一幅讽刺画的说明文字。参见1967年6月1日出版的《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画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化身为“野蛮人”。

项链上的珍珠

显然，这本传记的写作计划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个人档案的开放密不可分。国家图书馆手稿收藏部里 261 大箱手稿是一大笔财富，也是本书核心的参考资料。尽管如此，我也参考了许多其他档案：法兰西公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资料、收藏于巴西的资料——他在圣保罗大学的大量痕迹与他在马托格罗索州的民族志考察报告——以及收藏于纽约和华盛顿的全部资料，这些是他留下的二战中美国法裔移民的研究资料。这些新资料多数是首次开放查阅。以如此分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传记写作的重任以《忧郁的热带》中的自传为线索起航，并把它融入我们的故事中。这个新故事会改变自传叙事脉络的定位、含义与影响。长久以来，传记体裁在诸多方面需要获得人们的谅解。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直接地针对“传记的理性”（raison biographique）进行了批评：传记理性追求虚幻的“一致性”，试图理性地书写人生经历、追忆“人生志向”和构思人生意义，它将把任何一本书都变成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¹ 这些“暗礁”真实存在。然而，如果我们从新兴的自我材料（ego-document），例如书函、记事本、文档、日程本、备课本、手稿、画册、摄影作品等这些能够塑造人物生活方方面面的材料出发，传记文学仍是广义思想史中一种有效的知识形式，甚至以这种方式被人们广泛接受。

我们没法想象年轻时的列维－斯特劳斯：人们说大师少年老成，因他年长、沉稳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很早开始，他就以一位老者的形象出现。如今，只有在他与父母的书信中，我们才能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名在蒙德马桑（Mont-de-Marsan）女校里教授哲学、初涉职场的年轻老师的形象。这是因为，见证了列维－斯

1 皮埃尔·布迪厄：《传记的幻想》（« L'illusion biographique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集》（*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第 62 卷，第 62—63 期，1986 年，第 69—72 页。

特劳罗斯前半生的人们都已离我们而去，唯独巴西的安东尼奥·坎迪多·德·梅罗埃苏扎（Antonio Candido de Mello e Souza）先生依然在世。这位当今巴西知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仍能回忆起1935年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蓄着胡子，与妻子来到圣保罗教授社会学的情景。21世纪头十年初，我因当时的研究需要访问了列维-斯特劳斯，向他了解流亡纽约时期的经历。那时他对我说，他见证了战争年代法国人流亡美国的惊人场面，但他可能是这件大事的最后一名目击者了。¹就像他遇到的那些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的最后见证者，他珍藏着这个世界全部的记忆，列维-斯特劳斯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1940年前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人。所幸，与他一同参与了1960年起法国人类学发展的许多人物仍旧健在。我尽可能多地与他们会晤。我不是人类学家，所以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我卸下了我的职业意识。作为回应，民族学家们以友好的姿态接受了我的来访，他们亲切和蔼的态度与教堂里的那种气氛有着云泥之别！借着这些会晤，我领略到建立在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名字之上的浓郁的学术气息，但这还不足以印证他知识分子的盛名。经过抽丝剥茧，我的对话者们顺着记忆走向曾经的奇人，走向他洒落在整个人类学学科上那片让人窒息的影子。

可是，这本传记的主角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很少谈及他的“个人身份”，更少谈及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个体”（Individu）的见解。这位人类学家和一部分同代人，比如米歇尔·福柯，都认为，个体虽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和期望之所在，但最终将化为尘土并退出历史舞台。“走开，没什么好看的！”此刻，每个个体不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以微历史

1 伊曼纽埃尔·卢瓦耶：《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美国流亡经历（1940—1947）》（*Paris à New York. Intellectuels et artistes français en exil aux États-Unis, 1940-1947*），巴黎：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2005年。

(microhistorique)的视角观察事物的场所,也不再是既定的基础,而是观察的标尺。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里,摄影师在放大一系列底片时发现了另一个故事的开端;同样地,放大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聚焦范围,我想从另一种角度进行探索,来观察20世纪时人类学家在学术界和艺术领域的另一种面貌。¹在这方面,我希望尊重历史。所以我想写成的是一种“日本式传记”,我要参考的是这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源自日本的“向心”哲学(philosophie centripète):“……好像日本人是从外部开始建立自我(moi)。因此,日本这个‘我’(moi)不是作为原始的数据,而是作为那个我们不知是否能够抵达的结果。”²这本传记摸索着列维－斯特劳斯家族与人类学学科的来龙去脉,唯独不愿止步于为学科宗师建造一座庙宇。总而言之,他有一部作品受到大众认可。列维－斯特劳斯是书中的主角,他活跃地穿梭于20世纪的历史洪流之中,在不同的背景下成长,最后,累积了无数旅行历练与阅读经验。要知道,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证实这位大人物在多大程度上被历史事件所践踏,又如何从政治使命中“脱离”出来,这样的过程并不会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特别是二战期间反犹太主义的维希政府执掌法国时,他也像其他人一样被迫走上了流亡之路。

为维护和鼓励人类学领域的传记写作,列维－斯特劳斯从别处带来了他的那块奠基石。1940年代起,美洲大陆出版了大量土著人的传记,多数是由民族学家与其精心挑选的情报提供者(常

1 如果调整视角,从微观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新发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丰富,我们可以主要参考雅克·勒韦(Jacques Revel)的两篇文章:《序》,载雅克·勒韦主编:《视觉游戏:微分析的实践经验》(*Jeux d'échelle. La microanalyse à l'expérienc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瑟伊出版社,1996年;与雅克·勒韦的访谈,《如何迷失方向:“放大”》(« Un exercice de désorientation: Blow up »),载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克里斯蒂安·德拉热(Christian Delage)主编:《从历史到电影》(*De l'histoire au cinéma*),巴黎:孔普莱克斯出版社(Complexe),1998年,从第103页起。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与现代社会中的问题》(*L'Anthropologie face aux problèmes du monde moderne*),“21世纪文库”,巴黎:瑟伊出版社(Seuil),2011年,第38页。

常是一位被部分同化的印第安人)共同书写的。其中,民族学家利奥·西蒙斯(Leo Simmons)在研究了印第安霍皮人堂·塔拉耶丝瓦(Don Talayesva)后撰写了他的生平事迹:他的生活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被撕得粉碎;随后一场精神危机更是颠覆了他的生活:在这场危机的驱使下,他回到出生的村落,“以挑剔的眼光守护那里的各种古代习俗和仪式”。¹列维-斯特劳斯同意为本书作序,他带着几分兴奋的情绪庆祝“标尺”发生的改变:

“一夜之间,塔拉耶丝瓦的故事凭天赐的福气便顺利地达成了民族学家一生梦寐以求却从未完全实现的事:根据‘内心生活’重塑文化,这种孩童与成人都会经历的文化。这种探索有些类似于我们以‘当下’(présent)的考古学家姿态找寻一条项链所散落的珍珠,霎然间,我们注意到珍珠以它们原始的方式串成项链,温驯地环绕在年轻人的脖子上,点缀它们命中注定的主人。”²珍珠项链的隐喻表达了列维-斯特劳斯这位学究对“学术梦想”的承诺而引发的几乎情色的冲动³:协调对一个社会体系的描述与这个社会体系反映在每个成员内心的方式,并以不偏袒任何一方为前提,吸收采纳知识分子的客观角度,将之融入土著人的主观表达里。因此,传记应当以纤细的纹理见证约束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社会条件与重要角色定位之间的联结,“天才”思想的诞生与它所处的公共环境之间的因果。这样紧密的纹理好似来自列维-斯特劳斯钟意的印第安篮子。他在探险记录册里随手勾画了篮子的图案。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序》,载董·C.塔拉耶丝瓦(Don. C. Talayesva)著,雷欧·W.西蒙(Leo W. Simmons)编撰:《阳光霍皮族:一位霍皮族印第安人的自传》(*Soleil hopi. L'Autobiographie d'un Indien Hopi*),“人类观察丛书”,巴黎:普隆出版社(Plon),1959年,第9页。

2 同上书,第10页。

3 参见《传记中的游戏与民族志问题》(«Jeu et enjeu ethnographiques de la biographie»),载《人类学期刊》(*L'Homme*)第195—196期,2010年7—12月,第7—8页。

民族志知识与民族学学科：以“他者”为对象

列维－斯特劳斯的传记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门野心勃勃的科学学科的历史，因为这部传记尝试囊括这位人物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国家传统中，这个学科的名字五花八门：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推广“人类学”这个名字，但“民族学”仍被沿用至今。

20 世纪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不同地域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志传统：它涉及对异国他乡的空间探索，一国内“他国”元素的社会探索，或者基督教教旨下为转化异教徒而进行的宗教活动。这些探险旅行成为可能后，各式各样民族志写作的冲动敦促人们投身到以“他者”为目标的求知事业中去。我们笼统地认为 19 世纪后半叶亨利·摩根（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的研究引领了英国民族学的建设，涂尔干（Durkheim）和莫斯（Mauss）引领了法国民族学的建设，民族学在很长时间内正是与受好奇心驱使而诞生的知识体系相濡以沫的。这样的知识体系非常规且激进，动摇了固有认知，对后者提出了疑问。¹ 正因为这样，那些著名的古玩商店才能在古典时代激起整个欧洲大陆的求知欲。

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书房比喻成一间古玩店，其实是因为我意识到，在他心中或以他为代表人物的民族学中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时间制式：除了好奇心之外，还有对“准确度”的要求，尺度的等级，以民族志形式对“事件”的收集，

1 参见克里斯蒂安·利科普（Christian Licoppe）：《科研工作的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验之谈（1630—1820）》（*La Formation de la pratique scientifique. Le discours de l'expérience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1630-1820]*），巴黎：探索出版社（La Découverte），1996 年。近些年的文献则包括：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现代科学的温室》（*La Fabrique des sciences modernes*），巴黎：瑟伊出版社，2014 年；斯特芳·凡·达姆（Stéphane Van Damme）对笛卡尔的研究：《论 17—20 世纪的文化史：伟大的哲学传统》（*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 d'une grandeur philosophique, XVII-XXe siècle*），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Presses de Sciences Po），2002 年；《揭开真实的面纱：重新审视启蒙时代哲学》（*À toutes voiles vers la vérité. Une autr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au temps des Lumières*），巴黎：瑟伊出版社，2014 年。

地区性民族学概述，以及作为最终阶段的归纳：归纳为亲属关系（parenté）的规则或者神话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与牛顿物理法则颇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借用英语术语命名为“人类学”的学科。¹

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列维－斯特劳斯理解为多重拉锯战，甚而是多种科学实践之间矛盾关系的载体，并从他这位人类学最典型代表人物的传记中发掘出这门学科里的一种露天“考古学”分支。因为，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深得希罗多德发明的调查法的精髓，从外部远距离观察其他一切事物，他还展示了结构人类学是如何以对比性描述与区别性差异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他的人类学承载了情感、梦想与噩梦因素，他被带往另一个求知领域。丹尼尔·法布尔（Daniel Fabre）把后者称为“幸存者的范式”²。这个他游历巴西时常常出现的想法（幻想？）指的是，民族学家面对的是最后一代印第安人，他们是他们世界潜在的情报提供者，也是一个世界末日故事里的终极产物。《忧郁的热带》表达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也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这个悲剧的责任。

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主持的研究室——他于1960年在法兰西公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是民族学领域科学研究的新地标。另一方面，在他的工作室，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洞

1 参见2014—2015学年，达尼埃尔·法布尔（Daniel Fabre）、克里斯提娜·罗里埃尔（Christine Laurière）和安德烈·玛利（André Mary）开设的研讨课“民族志：考察、探险和殖民帝国”（« Entreprises ethnographiques: missions, explorations et empires coloniaux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特别是达尼埃尔·法布尔主持的第一堂课，其主题为“民族学调查的形式和民族志研究的范式”（« Formes de l'enquête et paradigmes de la curiosité ethnographique »）。

2 达尼埃尔·法布尔：《论浪漫主义民族学》（« D'une ethnologie romantique »），载达尼埃尔·法布尔、让－玛丽·普里瓦（Jean-Marie Privat）主编：《浪漫的学问：民族学的诞生》（*Savoirs romantiques. Une naissance de l'ethnologie*），“民族学批评丛书”，南锡：南锡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2010年。2008—2011年，达尼埃尔·法布尔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了一门相关主题的研讨课：“幸存者作为一种范式”（« Le Paradigme des derniers »）。

穴”中，人类学家跨越时代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与启蒙时代的人类学对话，甚至继续往回退，与探险者让·德·雷瑞（Jean de Léry）对话，实现了跨越两个世纪的探索。让·德·雷瑞作为巴西海岸最初的发现者之一，目光之犀利唯独伴列维－斯特劳斯余生数十载的蒙田能及。我们曾过分着眼于列维－斯特劳斯学者生涯中实在的“现代性”，以至于忽略了他对“旧大陆”的传承。而他是新与旧的综合体，在他身上西方传统与现代社会不同层面的知识相互碰撞、相互摩擦。

一个人物的结构和一部作品的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与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建立了一生的友谊。1982年10月，人类学家在语言学家去世的第二天写下了这段话：“我们口中的‘伟人’到底指的是什么？他不仅仅是一位史无前例、魅力无限的人物，这当然是对的，更多的是一部著作的作者：一部无法与创作者再联系起来的作品。但让熟悉雅各布森的人首先惊讶不已的是他与他的作品间看似突兀的‘血缘’关系。”¹列维－斯特劳斯继续指出，“在语言学家和他的作品中闪耀着熊熊的生命力、源源不绝的豪迈之情、强大的说服力以及才华横溢的创造力”。人与作品间“看似突兀的‘血缘’关系”也表现在列维－斯特劳斯身上。这层血缘关系追溯到作品本身的对象，回到作为他民族学研究基础的美洲印第安人身上，因此衍生出双重血缘关系。作为源头的美洲印第安人戴着唇饰品（labret），以和气、穷困的形象被民族学家写入20世纪的传说之中：他们是时代的叹息、最后的希望。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书尾将他研究的神秘性物质（*matière mythique*）的源头以及他一生重要的线索描述为一种“二元论”。

¹ 罗曼·雅各布森去世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写下了这一篇悼念文。

而这场“二元论”实为一场无休止的平衡游戏，两方各居一端。印第安人输了游戏，世界已被倾覆。

这种不平衡的“两党制”也是他求知的动力和他内心的渴望：他关注细节，认真体验生活，爱好观察植物，但也热爱理论研究，沉醉于归纳总结，会提出大胆的假设；他不仅吸收佛教智慧，超脱于世，顿悟自然并且解放自我，也踏遍世界，并早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完成了成立研究室的理想，履行着各种工作职务；他渴望“同类相聚”（entre-soi），也拒绝“同类相聚”；他坚决地开展抽象活动，也拥有极其敏感的触觉；他渴望寻找意义的规则，但又从直觉上认同“无意义”（non-sens）之说；他追求普遍性，也认可差异的合理性；他追求科学，也拥抱艺术。人们常常非议最后一组对立关系，当列维-斯特劳斯凭借学术著作入选法兰西学院时，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他的文学天赋，然而，这是好是坏还没有公论。帕特里克·威肯（Patrick Wilcken）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将列维-斯特劳斯看作一名“被耽误的艺术家”（原文中以法语 *artiste manqué* 表示），认为他会给学术圈寻回一丝艺术感性。他拥有的艺术感性来自他青少年时期接受的艺术教育，尽管他因天资不足而被迫中断学习。¹ 这就是说，我们无须理会这失衡的二元关系里蠢蠢欲动的力量，也别把列维-斯特劳斯狭隘地理解为是有意继承美文（*belles-lettres*）传统才希望将知识优越性与艺术美学合二为一。难道布封（Buffon）不是因为“风格论”而入选法兰西学院的吗？²

1 参见帕特里克·威肯（Patrick Wilcke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Claude Lévi-Strauss. Poet in the Laboratory*），伦敦/纽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2010年。

2 参见伍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三种文化：科学、文学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学》（*Les Trois Cultures. Entre science et littérature, l'avènement de la sociologie*），巴黎：人文科学研究院出版社，1990年，第1—3页。

与鸟类对话

个人情感与家族血脉扎根 19 世纪，他却沉迷于 16 世纪的旅行日志，显得与 20 世纪格格不入。最让人称赞的是，这股“文艺复兴”的清风愿意接受原始社会的洗礼；同时，他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为科学进步贡献力量，热情洋溢地与之一同前行。尽管如此，他并不耻于展示他的“复古”之旅，并偷偷地宣扬“重返新石器时代”！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科学实践的方式、他曲折离奇的一生、他的“历史哲学”（如果这种哲学存在），以及他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使他用一种类似朋友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眼中“超现实”的“超现代性”与一种否定在多个方面与现代断裂（断裂常常表现为理性反对蒙昧主义，科学反对神话思维，进化论反对循环的时间，进步反对一成不变等）的“古风”建立了绝无仅有的研究领域。他的人生经历随着这本传记叙事的时间在一段时间内向前推进，但以一种螺旋的方式不停地拾起过去的碎片。为此，他说，“我们的生活几乎不是线性的”¹，因为非常遥远的过去却看似比上一个瞬间更加真切。他的作品也是如此，它“一边回顾了以作品本身为代名词的人类学的历程，一边迈向他设想的未来”。²

这位人类学的改革家似乎想让我们在这个疯狂、聒噪的 21 世纪继续反思这些他未能掌握的科技进步。他是世界之子（homme-monde），他的前半生忙于流浪；他是时间之子（homme-temps），他漫长的一生在被他戏称为“堂吉珂德主义”的强烈欲望下——也就是“寻找隐藏在‘当下’里‘往日’痕迹的欲望”下³——特征鲜明。他身上的丰富的时间经验与他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引用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话。参见《看、听、读》，第 1495 页。

2 爱德华多·维末洛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食人族的形而上学：迈向后结构人类学》（*Métaphysiques cannibales. Lignes d'anthropologie post-structurale*），“形而上学丛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 页。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亦近，亦远》（*De près et de loin*），第 134 页。

踏足的广袤土地一样，代表了他独特的哲学去中心化和存在去中心化。他是史上深刻“重温历史”的第一人。他并不向我们传授任何方法，不制订任何计划，他只是激励我们关注并保存文化、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把后者作为一种代表了世界偶然性的珍贵价值。1976年后，他施展了非凡的政治想象力，以接受非人类（non-humain）的异域社会为参照，试图提出用“生物权利”来定义和代替此前的“人权”¹：人作为“活的”生物而不是“道德”生物，不与动物、植物、矿石、物体区分开来。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展现了一种根据“人类纪”修订的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与鸟类谈话吧：我们常常狭隘地意识到这位思想家将自然与文化严格对立，忽略了他的观点在“探险”过程中不断发展。最后，他还在美洲印第安人神话里学会了对他个人生活和他写作都至关重要的一课。容我提醒大家，对这位民族学家和印第安人本身而言，这些神话描述的是一个人与动物相互理解的时代。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自由的思考》（« Réflexions sur la liberté »），载《遥远的目光》（*Le Regard éloigné*），第371—382页。

第 1 部分

缘起（1935 年以前）

1 姓氏的传承

但是，高贵的姓氏只要还未没落，拥有之人便能沐浴它的光辉。毫无疑问，就某方面而言，这正是这些家族声名显赫带来的好处：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顺着这些家族的足迹，追溯以往，甚至回到 14 世纪以前，我们还能拜读德·夏吕斯、阿格里让特亲王或帕尔马公主的子孙们的回忆录和书简。它们也许曾是平民家庭，它们的过去被一帘黑幕隐藏了起来，任谁也看不清，如果在姓氏的光辉下追根溯源，我们就能发现盖尔芒特家族的人之所以神经兮兮、品行不端和放浪形骸，这是有顽固的历史根源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盖尔芒特家那边》¹

他的“往事”（*arrière-monde*），包括了所有经历、回忆、图像、气味、幻想、厌恶、不安、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以及从呱呱坠地那刻起伴随名字延续下来的存在方式与思考方式。这是一个昏暗又光明的世界、一片丰饶又沉重的土地。它们诞生于家族传说，可家族传说穿梭于社会记忆与国家历史，变得斑斑驳驳。我们可以依附于这些传说，因为社会记忆、国家历史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一部分，但这是后话了。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生于 1908 年 11 月 28 日的布鲁塞尔，但这不是他人生故事的起点。他坦承自己怀念那些未知的过往，因为他与我们所有人一样，背负着一段触不可及的历史。他的故事从一个由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缘共同构成的复合姓氏开始：一个扎根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家族因一位家族成员的成功而声名大噪。他是伊萨克·斯特劳斯（Isaac Strauss），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外曾祖父。而克洛德的父亲选择将“斯特劳斯”加入

¹ “七星文库”，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第 542 页。（译按：译者以许渊冲先生的译本为基础进行了重译。）

姓氏，添于“列维”之后，创造了这个披着神秘面纱的姓氏。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姓氏，确切地说，以色列人的姓氏，它本身便是对一个家族艺术使命的肯定；同时，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姓氏，很晚才得以“呱呱坠地”。而这种姓氏意义上的“漂泊”恰好说明了近代法国犹太教的沉浮。不管从字面还是从修辞意义来说，这个姓氏“列维 - 斯特劳斯特”必须“重新收复”。几次历史的曲折（生活的跌宕起伏、文字作品的成功与失败）可以反复证明这个姓氏所代表的牢不可破的必然性。

姓氏的光环

“凭您这样的姓！”

让我们回到 1940 年 9 月：法国战败，他在蒙彼利埃复员。已经退居法国南部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来到维希。1940 学年开始，他被任命为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哲学教师，他希望能够获得许可，返回首都任职。“教育部设在一所市立小学内，其中一间教室用作中学教育处的办公室。负责的官员错愕地看着我：‘凭您这样的姓，去巴黎？’他对我说，‘您就没思量过？’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¹ 理解事物的一瞬间经常突然发生在列维 - 斯特劳斯特身上。这是意识停滞、天翻地覆的一刻：人生经历中天翻地覆的一刻（这对成千上万犹太裔法国人而言均是如此），也是对事物认识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刻。而后者源于一种对历史的无知：他对自己的姓氏已经背负上的历史烙印缺乏认识。在法国土地被侵占的新环境下，这是一个危险的姓氏，一个与其他所有姓氏一样能够分类、存储信息，同时能在警察排查身份时出卖主人的姓氏。讽刺的是，通过公职人员的惊恐反应，

1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著，卡特琳娜·克莱蒙、多米尼克 - 安托万·格里索尼收集整理：《自画像》（« Autoportrait »），《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第 223 期，1985 年 10 月，第 20 页。

列维－斯特劳斯在维希这个城市对他的姓氏有了全新的认识。维希，对家族而言，是昔日的荣耀之城：1861年，他的外曾祖父伊萨克·斯特劳斯曾在斯特劳斯别墅亲自接待了拿破仑三世；后来，别墅被改造成政府机关分支，一个维希市政府拿来堆放文件的地方。

距此不满一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自我流放。他离开了法国，来到了美国。纽约一所学校接收了他，此后数年他在这里担任教职。可被迫之下，他却不得不以克洛德·L. 斯特劳斯（Claude L. Strauss）¹之名示人。这是什么缘故？“学生们可能会觉得逗”²，他这样回答。原来那些蓝色牛仔裤才是罪魁祸首！³于是，姓氏招来的不幸继续上演，它们是历史长河与个人人生历练留下的视觉痕迹，一些脆弱的视觉痕迹。这些冒险事件或惨绝人寰，或令人捧腹，但一定会告诉我们：你的姓氏、姓氏的谐音以及可能的同音异义词或许会将你推向集中营，带你回到战时的欧洲，或者稍稍走运一些，让一个未来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遭受某些缘于误解的残酷拷问：“列维－斯特劳斯，裤子还是书？”这是他在二战后的美国生活时反复遭受的质疑。⁴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等同于耻辱的经历以及人们对他们姓氏施加的“暴力”使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某个问题特别敏感。确切地说，一个他姓氏上的难题。在《野性的思维》第四章，他研究了赋予专有名词这个行为带来的最后一个层次的个体差异（individuation）。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专有名词是无意义的，是人们的认知活动留下来的微不足道的痕迹（résidu d'intelligibilité）。而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理论则不以为然，

1 他将姓氏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中的Lévi缩写为L，主动避免了误会的发生。——译者注

2 参见《亦近，亦远》，第47页。

3 列维－斯特劳斯的拼写与牛仔裤品牌Levi Strauss几乎无异。——译者注

4 参见《亦近，亦远》，第48页。

他认为专有名词是有意义的。姓氏带有能够清楚辨识身份的标识，使人们足以确立个人与某个社会团体、某个氏族、某个种姓的归属关系，姓氏也可以由命名者自由创造。不论哪一种情况，命名都意味着分类（他人或者自己）和表达意义。¹ 他以为自己的狗择名为例：“我认为我可以按我的喜好随性地为我的狗选名字。但如果我选择了梅多尔（Médor）²，那么我会把它归类为平平庸庸；如果我选择了先生（Monsieur）或者吕西安（Lucien），我会认为这个名字别出心裁或者独树一帜；如果我选择了佩利亚斯（Pelleas），那么我是为了追求审美情趣。”³ 在当今的民族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构筑的理论把分类活动的应用延伸至最基础的层面：每个个体作为最底层，其名字专属其所有。

“被称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克洛德·列维”

名字的人类学意义不外乎在分类生物时分配席次。它的这种用处使人可以拥有另一个名字，比如通过修改名字。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国民政府提供了这种可能，但只是最低程度地保障了这种可能性。在法国，“正式改名对一个法国国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⁴ 它的前提是耐心等待、理由充分。1803年4月1日颁布的法案（loi du 11 germinal an XI）撼动了姓名的终身制，为更名改姓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这个成果只是一种“法律层面的‘恩赐’，掌权者仍然可以自由拒绝更改的请求”⁵。改名所需的程序历时漫长，因为一个成年人申请改名首先必须向《政府公报》（*Journal officiel*）提供一份改名申请的通知书（自费），

1 关于这一点，请参考“七星文库”第1790—1791页的说明。针对这个问题，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为《野性的思维》部分添加了清晰的注解。

2 在法国，梅多尔是狗的常用名。——译者注

3 参见《野性的思维》，第751页。

4 妮科尔·拉皮埃尔（Nicole Lapierre）：《改名换姓》（*Changer de nom*），巴黎：斯托克出版社（Stock），1995年，第95页。

5 妮科尔·拉皮埃尔在《改名换姓》中引用了热内·沃尔姆斯（René Worms）的话。

然后向司法部部长提交申请书，其中必须详细记载舍弃原名的原因和另择他名的原因，最后进行公证——长辈们的出生公证、身份证明和国籍证明文件复印件的公证。他的个人档案向我们证实，列维－斯特劳斯选择向这个冗长的过程屈服。

事情的发展百折千回，可了解这段历史的寥寥无几。¹ 在 1960 年代，法国政府部门拒绝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正名”，尽管这个经他父亲雷蒙之手由“列维”和“斯特劳斯”组合而成的“非官方”姓氏已经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姓氏的“散漫之风”不再合乎规矩，即使是所谓的“笔名”也不再被接受。这便是他在行政程序的问题上遭遇诸多非难的原因。而让这种困境雪上加霜的是，1957 年，他的次子降生。因此，在妻子莫尼克（Monique）的要求下，在律师苏珊·布鲁姆（Suzanne Blum）的帮助下，被称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他——古斯塔夫·克洛德·列维（Gustave Claude Lévi）——于 1960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向司法部请求将斯特劳斯（Strauss）加入姓氏。这个请求将会影响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们：1947 年 3 月 16 日出生于纽约的洛朗·雅克明（Laurent Jacquemin）（他在领事馆登记的姓氏为列维－斯特劳斯）、1957 年 8 月 25 日出生于巴黎的马修·雷蒙（Matthieu Raymond）（登记为列维）。

他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父亲雷蒙（出生于 1881 年的巴黎）常常以“列维－斯特劳斯”作为身份的记号。雷蒙在为特里斯坦·贝尔纳（Tristan Bernard）、维克多·玛格丽特（Victor Marguerite）、路易·茹韦（Louis Jouvet）等人完成的肖像画上留下了亲手签署的大名“列维－斯特劳斯”。不仅如此，他加入一些专业社会团体（比如艺术家联盟）时留下的正式的人会文件也都成了证据。其次，“我的父亲之所以改姓氏为列维－斯特

1 《改名换姓》：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0。

劳斯，是为了将他外祖父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姓氏永远刻入家族历史之中——我的外曾祖父于1806年6月2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他除了是一位小提琴家，也是乐队指挥，还是著名的圆舞曲作曲家。最后，身为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他解释道，他所有的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都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之名完成的。他强调，这些事实也能说理：“我所有的文学作品以及学术专著，也就是5本书——其中包括被译成9种语言的《忧郁的热带》一书——和150篇文章都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之名发表的，所以我想我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在法兰西科学和思想界的国际名声上留下污点，这恐怕没有太多悬念……最后一点，因为我的研究成果借某个姓氏之壳面世，某些理论、某些发现便从此烙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当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思想界的厚遇，这个人名也得以脱离它的主人变为一个独立的、公共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名从此化身为人类学这个我奉献了一生的学科紧密的一部分，甚至我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它，后一种说法当然是危言耸听。”他了解中央行政法院的法律立场，知道其不会同意复合姓氏的存在，也接受不了听上去具有异国风情的姓氏，因为预见了中央行政法院对后者的否定，他用一小段话为他的信件收尾：“斯特劳斯所带的‘异国味’可能会成为否定我的请求的第二个理由。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一点，斯特劳斯是自我的外高祖父罗布·伊斯拉埃尔（Leob Israël）传承下来的姓氏。他出生于1754年1月22日的斯特拉斯堡，在18世纪末之前更名为雷昂·斯特劳斯（Léon Strauss），随后将斯特劳斯之姓传承于1801年出生的莫里斯（Maurice）和1806年出生的伊萨克（Isaac）。我想，一个正统的阿尔萨斯家庭使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姓氏应该属于国家承认的专有名词，属于国家遗产。”¹事件在1960年有了进展，中央行政法院的裁决同意了他的申请，这一结果写入了1961年8

¹ 这几段引用的话出自1960年10月24日写给司法部部长（garde des Sceaux）的书信。

月 24 日的《政府公报》。此后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得到了修正。

行政单位的欺凌行径原本可看作一出笑话，可它偏偏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少不了与法国境内犹太人家庭的历史因素扯上关系。此后 10 年间，借助有利的法律环境，一些人便行使了这项法律赋予的改姓的权利。而需要注意的是，变更了姓名的大部分犹太人原本居住于中欧与东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在法国生根，他们格格不入的外族人姓名以及对摆脱战争阴影的渴望让他们迈出了这一步——他们不过是想远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唯恐战争卷土重来罢了。却鲜有以色列犹太人家庭尝试改名。而列维－斯特劳斯，他并没有援引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微不足道的动机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官僚体系对他们无处不在、没完没了的羞辱）。而他的例子见证了官方如何禁止其使用一个与他辅牙相倚的姓氏，如何让他因此历经重重阻挠。进一步说，他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家族背景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提醒我们不能忽视伊萨克·斯特劳斯在克洛德·列维——我们口中的“列维－斯特劳斯”——身份塑造过程中留下的历史身影。显然，列维－斯特劳斯既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犹太血统，也不是为了凸显自己的犹太血统，而是选择把自己归入犹太裔法国人一脉享有盛名的身份血统之中。别忘了，时任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他已年过半百。他在最后几行展现出坚决的神情、潇洒的姿态以及对完成这部作品的骄傲，这些更加能够说明，申请程序更像是一种对国籍的否定程序（他还被要求提供国籍证明）。

在这场耐人寻味的改名风波中，由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已经“确定了姓名”，一个映射出外曾祖父伊萨克·斯特劳斯拉耀眼光环的姓名，个人身份和亲子关系反倒不能顺利得到确认。他称斯特劳斯这个姓氏不再属于他，然而这个姓氏却将他载入阿尔萨斯犹太人的百年历史之中——19 世纪，他们获得了解放，又经过文化同化，成为法国公民的典范。

血脉相承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保存的家族档案——出生证明、婚姻缔结书、来往信函、家谱、继承证明、护照、文书——建立起一个 18 世纪末阿尔萨斯的繁荣世界。犹太人被排挤于城市之外，于是，选择在下莱茵省（Bas-Rhin）的布吕马特（Brumath）、安格维莱（Ingwiller）、比谢姆（Bischoffheim）或者上莱茵省（Haut-Rhin）的里克塞姆（Rixheim）、迪默纳克（Dürmenach）定居。我们能看到拉比、各种各样的批发商、流动商贩、二手服装商贩的身影，以及几乎全为犹太人的谷物与家畜商人。伊萨克·斯特劳斯的母亲闺名朱迪斯·赫希曼（Judith Hirschman），是“拉比”拉毕·拉法埃尔（Rabbi Raphaël）的女儿，拉毕·拉法埃尔的大名曾响彻 18 世纪的整个阿尔萨斯地区。这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小天地（1784 年时约有两万人口）按照犹太历生活起居，通用意第绪语，他们一直遵循拉比犹太教教义的训诫，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理论上，他们被禁止拥有田产，但他们有时也能因为还款未兑现的土地抵押贷款而获得抵债的田产。所以艾丽·莫西（Élie Moch），母亲一脉的祖辈（或者也可以称为父亲一脉的祖辈）——也就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母亲的外曾祖父——才会在一本账簿中留下田地租佃的收租记录。对犹太人而言具有解放性质的变革发生于 1791 年。从此以后，这个族群进入了加速转变期。在这个转变期内，此地犹太人的角色“从德裔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最西方的一支转变为现代犹太人并且成为遵循国家模式的犹太人”¹。

经过一代或者两代之后，大量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先是在斯特拉斯堡落脚，最后迁往了巴黎。在斯特拉斯堡，他们以资产阶级市民的生活模式融入城市生活，却也保留了一部分代表民族根

1 宝拉·E·海曼（Paula E. Hyman）：《阿尔萨斯犹太人的解放：19 世纪的文化涵化和传统的延续》（*The Emancipation of the Jews of Alsace. Accultur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7 页。我要特别感谢让－马尔·德雷福斯（Jean-Marc Dreyfus）就阿尔萨斯犹太人的问题带给我的启发。

性的生活样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家族也沿着这条变化之中的社会轨迹北上。这条路线意味着生活水平天翻地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列维-斯特劳斯家族的家谱树展示了法国以色列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发生了迁移（从阿尔萨斯到巴约讷，最后到巴黎）、经历了历史事件（犹太解放运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古犹太法庭的成立、1870年普法战争）、取得了经济成果和社会成就、实现了各种不可能的突破以及提升了在这个因“解放运动”而受犹太人热爱的国家里犹太人身份的梯度等级。与莫西（Moch）、雷维（Levy）、列维（Levi）、豪瑟（Hauser）这些名字相比，外曾祖父伊萨克·斯特劳斯的的名字在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所有家庭成员的记忆中具有特殊的光环。尽管今日，他的光环被人遗忘，他的名字却因子孙列维-斯特劳斯之名再度鲜活地被人怀念。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在1980年代的访谈中回忆伊萨克·斯特劳斯，他回忆起的是外曾祖父闪闪发光的整个童年时光，一个完全符合19世纪资产阶级风格的音乐和消遣的乐园。年岁长了之后，他把这些往事当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童年回忆，尽管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外曾祖父。

伊萨克·斯特劳斯：“巴黎的斯特劳斯”

谁是那位被称作“舞曲界贝朗热”¹的人？伊萨克·斯特劳斯（Issac Strauss）出生于1806年的斯特拉斯堡。他的父亲罗布·伊斯拉埃尔（Loeb Israël）将自己的名字音译为“雷昂”（Léon），将儿子的名字分别定为莫里斯（Maurice，源于Moshe）和伊萨克（Isaac，源于Isaïe）。这是在1808年7月20日帝国法令执行前夕，法令要求犹太人向自己所在市政民事登记部门报告正式的姓和名。法令禁止犹太人沿用旧约姓氏，也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所以，

1 这一段是基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原始档案“家谱资料：伊萨克·斯特劳斯”整理而来的。该文献位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07。

伊萨耶（Isaïe）成了伊萨克（Isaac），罗布（Loeb）成了雷昂（Léon），拉萨尔（Lazare）成了古斯塔夫（Gustave），莫西（Moshe）成了莫里斯（Maurice），诸如此类。伊萨克的部分童年生活在比斯谢姆（Bissheim）度过，而在1828年，他幼年时便展现的小提琴演奏才华将他带到了巴黎就读皇家音乐学院，让他进入了皮埃尔·巴约（Pierre Baillot）的班级。后来，他通过了选拔，被由罗西尼（Rossini）指挥的意大利戏剧院管弦乐团（orchestre du Théâtre-Italien）聘为首席小提琴家。“我的祖母（伊萨克·斯特劳斯特之女）喜欢讲述她在7岁的时候——我记得是这样——罗西尼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她发誓不进行洗漱，因为她想把神圣之唇的唇印保留下来。”¹此后，伊萨克·斯特劳斯的晋升之路蒸蒸日上，势不可当，其中两个因素为他奠定了基础：一是因为舞曲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华尔兹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因为1830年代开始，上流社会和艺术界人士向依水而建的城市蜂拥并且聚居，形成了风潮。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那段动荡的时期之后，源于法国旧君主专制制度的舞蹈已经过时。在路易十八世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下，几乎无人跳舞。是路易·菲利普一世这位资产阶级国王恢复了王室宴会的传统。伊萨克·斯特劳斯顺应天时，参与了华尔兹的发明。除了华尔兹之外，波尔卡舞曲、玛祖卡舞曲、沙蒂希、进行曲、四对舞、雷多瓦、加洛普，这些舞蹈不仅席卷了欧洲皇室，也风靡于巴黎的资产阶级沙龙。还有那些依水而建的城市里的贵族客人，假意表示遵从医嘱，却是为了在社交生活中寻找放浪形骸的娱乐消遣。伊萨克·斯特劳斯因此得以取悦在普隆比埃尔（Plombières）和亚琛（Aix-la-Chapelle）疗养的颓靡的病人们。而成为他事业跳板的城市是维希（Vichy）。当他于1843年抵达

¹ 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话，后被亨利埃特·尼赞引用。参见亨利埃特·尼赞：《纵情回忆录》（*Libres Mémoires*），巴黎：罗贝尔·拉封出版社（Robert Laffont），1989年，第8页。

维希火车站时，这座温泉小镇显露出些许荒废之气。几年过后，它又成了一片乐土（place to be）。这不仅是音乐的奇迹，也是有序经营的成果，负责管理的伊萨克·斯特劳斯敢于实践又热情满满。1847年12月，应路易·菲利普本人的请求，他从有名的菲利普·穆萨尔（Philippe Musard, 1792—1859）手中接过指挥宫廷舞会乐团的大任，但“他不得让皇室成员跳舞。乐团的回响曾在革命的咆哮声中消失殆尽”¹。政权的相继更替没有改变路易·菲利普做出的决定。而共和国的总统，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可能会因为这个肯定的决定而欢欣鼓舞。此后的20年间，伊萨克·斯特劳斯让首都的少男少女、帝国和欧洲上流社会的旧贵族和新贵族们在华尔兹舞曲中悠然起舞。

当时的他几乎是帝国舞会之神。尽管跻身喧闹的巴黎人之中，身处热烈的节日氛围之中，他却是温文尔雅的象征。他为众人所



伊萨克·斯特劳斯的讽刺画，歌剧院舞会指挥：
保罗·阿多（Paul Hadol，
1835—1875）的石版画，
发表于贝尔陶茨（Bertautes）
出版社（约1854年？）

1 在《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先贤祠》（« Panthé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 »）一文中（详见第7页），阿梅蒂·布丹（Amédée Boudin）表达了对伊萨克·斯特劳斯的赞美。这一文献属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中“伊萨克·斯特劳斯”相关资料的一部分，档案盒编号207。

知，为众人所敬，受众人奉承，他是一位体面的人物，德鲁奥的忠诚客户，一位同辈人口中完美的城里人，不与任何人为敌。“他个子矮小，但灵动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光芒越过夹鼻眼镜，塌塌的鼻子下面长着一张幽默的嘴”¹，但阿尔萨斯的口音一直追随着他。伊萨克·斯特劳斯深得本地小报记者的青睐，也受讽刺画家比如加瓦尔尼（Gavarni）、卡姆（Cham）“追捧”。他的白色领带被专栏记者描述为时代的符号，就像“伏尔泰的手杖、巴尔扎克的夹鼻眼镜、吉拉尔丹的发绺、梯也尔的眼镜。此外，人们用《比若爸爸的鸭舌帽》（*Casquette au père Bugeaud*）耳熟能详的曲调唱起了祖父领带之歌：你看到了吗？/ 那条领带 / 那条领带 / 你看到了吗？/ 爸爸斯特劳斯的领带”²。

伊萨克·斯特劳斯被敬为创作了 400 多首曲子的作曲家，其中包括奥芬巴赫那首有名的四对舞曲《地狱中的奥菲欧》（*Orphée aux Enfers*），柏辽兹（Berlioz）在他的《回忆录》里怀念他创造的“不少变幻莫测、动人心弦的华尔兹舞曲，称赞他的创作不仅旋律新颖，而且独具一格又不拘一格”³。然而，他也是一名改编者，他将流行的主旋律根据时下的审美重新处理。他的名声将他引上乐团指挥的“造星”之路，助他完成了“造星”的过程。他，或者路易·安托万·朱利安（Louis Antoine Jullien），或者穆萨尔，他们的演出可以说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他们激烈地挥舞指挥棒（斯特劳斯在每场音乐会至少折断两根），这种疯狂的指挥方式就像是酒神节的狂欢，而在封斋期，歌剧院舞会有时也会营造这样的热烈氛围；遮住女士脸庞的半截面具考验着人们的勇气……延续至第三共和国的歌剧院舞会是法国旧君主专制制度下

1 《伊萨克·斯特劳斯，指挥家和作曲家》（« Isaac Strauss, chef d'orchestre et compositeur »），载于《维希报》（*Journal de Vichy*），1952 年 6 月 19 日。

2 参见《纵情回忆录》，第 8 页；悼念文《时间》（*Le Temps*），1888 年 8 月 16 日。

3 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回忆录》（*Mémoires*），巴黎：西美特丽出版社（éd. Symétrie），2014 年，第 313 页。

成立的机构，作为它的一把手，伊萨克·斯特劳斯拥有极大的权力，有能力使流行曲目让人耳熟能详。而1866年相关法律的出台使作者权利能够延续至其死后50年，所以由休格尔（Heugel）出版的许多钢琴乐谱为斯特劳斯和他的子孙们提供了重要的权利保障。伊萨克·斯特劳斯摆脱了家庭成员走上大艺术家之路的家庭传奇，在音乐界取得了傲人的成绩。音乐界为他提供的经济保障和“时效权利”远远地把艺术家道路的必要性甩在后头。¹

他收入颇丰，这要感谢他的音乐才华、洞察力、经营头脑以及他与皇室的联结。而后者要归功于他为皇室创作的一些曲子：《欧也妮波尔卡舞曲》（*Eugénie Polka*）（献给皇后）、《皇家进行曲》（*Marche imperial*）等。似乎他的整个人生与皇室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外曾孙女亨丽埃特·尼赞（Henriette Nizan）却告诉我们，他是共济会成员，引路人正是他的老师巴约。他宣扬人权以及忍耐、友好、平等的哲学理念，并借助帝国政策的荫蔽，在创作的曲目中表达自己的主要信仰。亨丽埃特·尼赞保存了他作为共济会成员的“工作罩衫”，罩衫与“他留下的华丽的舞会礼服相邻”²显得有些奇怪，却像是组成了一部昭示斯特劳斯命运的神秘二部曲，与轻歌剧一样具有双重意义的二部曲。研究轻歌剧的民族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表示，轻歌剧既是局外人（outsider）对正统歌剧形式的社会性复仇，也是掩盖了帝国独裁统治下死寂氛围的喧哗之声。轻量级的轻歌剧让人们摘下面具，它“混合了乐趣与讽刺之意，想要破坏颠覆的念头与对过去的缅怀”³。最后，伊萨克·斯特劳斯于1870年1月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此时，他却辞去了宫廷舞会的领导职位。

1 参见让-克洛德·永（Jean-Claude Yon）：《奥芬巴赫》（*Offenbach*），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0年；以及2011年3月21日让-克洛德·永的访谈。

2 《纵情回忆录》，第9页。

3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雅克·奥芬巴赫，第二帝国的神秘往事》（*Jacques Offenbach ou le Secret du Second Empire*），巴黎：散步者出版社（Le Promeneur），1994年，第367页。此书首次出版于1937年。

沐浴在“音乐王权”的荣光下，他主动退出了舞台，那时距离帝国土崩瓦解还有6个月。他的人生已经圆满了，退出恰逢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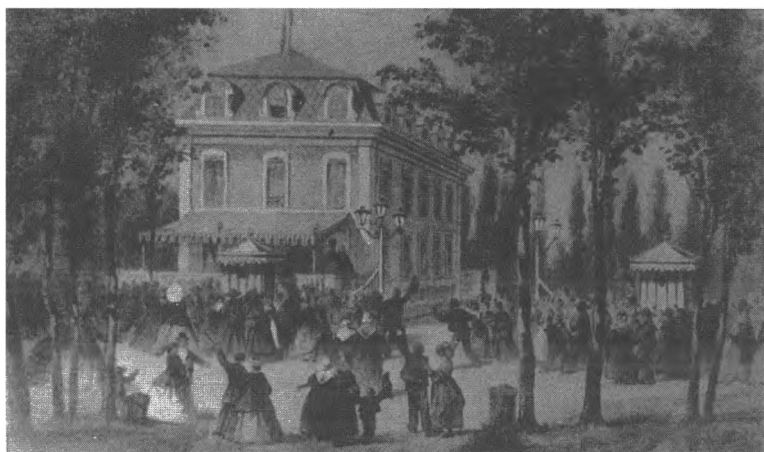
1888年8月他离世之时，上流社会的报纸专栏里刊登了20多篇文章，它们只以短评的形式纪念他：我们无法对一位大艺术家的辞世表示致敬。在殡仪馆里，拉比“向我们的慈善家致敬——他是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社区的奠基人，也是好几个慈善组织的奠基人”¹。他的个人经历以及艺术生涯中与帝国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也随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不青睐醉意浓浓的舞蹈，也不接受轻歌剧那种街头式的尖刻讽刺，反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以艺术收藏家的身份开启了人生的后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用“钟爱小玩意”来概括他的收藏品）。他退休后子孙满堂，在他所拥有的绍塞 - 昂坦路（rue de la Chaussée-d'Antin）44号的家宅里，五个女儿和众多家庭成员绕膝承欢。1895年，这幢建筑物因打通列奥米尔路（rue Réaumur）的需求而被拆除了。

他被众人遗忘，主要的原因是他与维也纳的“斯特劳斯”同名，后者在欧洲的声名吞没了他的成就，所以他只能在家庭范围内受人怀念。而家族的纪念传统源于他长寿的几个女儿，主要是蕾雅（Léa），列维 - 斯特劳斯的祖母。蕾雅死于1933年²，她收拾出一个过道来展示家族遗产，而这份遗产的光芒，包括物质形式的光芒和象征意义的光芒，只有在以“片段”“碎片”及纪念物这样的形式出现时才能更加耀眼夺目。“我收藏了零星一些东西，还有拿破仑三世为了感谢曾祖母在维希市斯特劳斯别墅的热情款待而赠予她的手镯。这座拿破仑三世下榻过的斯特劳斯别墅一直保留了下来。它变成了一个酒馆还是一家餐厅，我不清楚，但它保留了原来的名字。”³拿破仑三世在维希市斯特劳斯家曾经

1 《时间》，1888年8月16日。

2 后文称蕾雅死于1932年。此处可能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3 《亦近，亦远》，第10页。



明信片：庆祝拿破仑三世在维希市斯特劳斯别墅逗留的日子（1861年）

居住过的故事便载入了家史。这是家族与皇室亲密关系的顶峰，而手镯正是其见证。手镯配有松紧带和一枚钻石胸针，“特别引人注目”，斯特劳斯卡女主人在1861年7月30日的信件中如此描述。保存下来的物件寥寥无几，另一件东西也消失了踪影，它是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送给伊萨克·斯特劳斯的一枚戒指，是1846年马德里女王结婚典礼上华尔兹舞曲《双重婚礼》（*Double marriage*）的谢礼。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外曾孙女亨丽埃特·尼赞回忆道：“这是一枚镶有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这枚戒指的故事完全就是一个符号：百年之后，我，家族里第二个亨丽埃特（伊萨克的妻子也叫亨丽埃特），可能失手把它丢进了旅馆的火炉而把它熔化了，当时我正在躲避德国人的追捕。”¹

家族回忆录

让我们接着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家族谱树，把目光停留在祖辈、外祖辈那一行²。母亲这一边，萨拉·莫西（Sarah

¹ 《纵情回忆录》，第10页。

² 此段是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中的家庭档案整理而来的，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08。

Moch）与雷维（Lévy）结为夫妻。埃米尔·雷维（Émile Lévy）是一位拉比，1871年，他与众多同教教友一样选择来到法国生活。他们在凡尔登（Verdun）居住，在那里孕育了5个女儿——伊莲娜（Hélène）、艾琳（Aline）、露西（Lucie）、路易斯（Louise）以及后来成为克洛德母亲的爱玛（Emma）。1870年的那场战争对热爱国家的犹太人而言是一个危急关头。这在萨拉的《朋友手册》（*Album Amicorum*）中可见端倪，这里面还记载着诗歌和所见所闻。这种非常符合德国传统的个人书写方式以萨拉的一首诗作为结束的标志。诗里回忆了1870年战败的情形以及她的个人世界：“四面八方的炮声传入耳朵 / 太阳升起来干活的时刻 / 跑动的军队映入眼帘 / 只有血、烟和火 / 向居民叫喊，可能拯救他们 / 彻底的战败。”

从父亲这一支看，显赫的斯特劳斯家族从女儿蕾雅（1842—1932）——克洛德的祖母——与古斯塔夫·列维（Gustave Lévi，1836—1890）的结合开始登上舞台。古斯塔夫·列维是弗洛尔·莫西（Flore Moch）与伊萨克·列维（Isaac Lévi）结合所生的五子之中的一人。而弗洛尔·莫西和伊萨克·列维从安格维莱的阿尔萨斯（他们的儿子古斯塔夫仍出生于阿尔萨斯）出发一路奋斗，社会地位的提升可以从克洛德曾祖母弗洛尔1892年死后的财产清单中得到印证。这份财产清单证实家中采用经典资产阶级的装饰风格，但受19世纪最后30年间流行的日本风潮影响而留下了几个小瑕疵：胡桃木的写字台、白玉摆钟、蓝白相间的日本瓷器、桃花心木工作台、拉杆灯、铜铸枝形烛台、软垫扶手椅、床顶华盖、银餐具。他们成为资产阶级这一点也在古斯塔夫持有的塞纳河国民自卫军（Garde national de la Seine）的卡片上表现了出来（古斯塔夫是克洛德的祖父）。卡片没有注明日期，只是指出地址和职业：胜利路10号（rue de la Victoire），证券交易经纪人。护照上注明了国外旅行的经历。他们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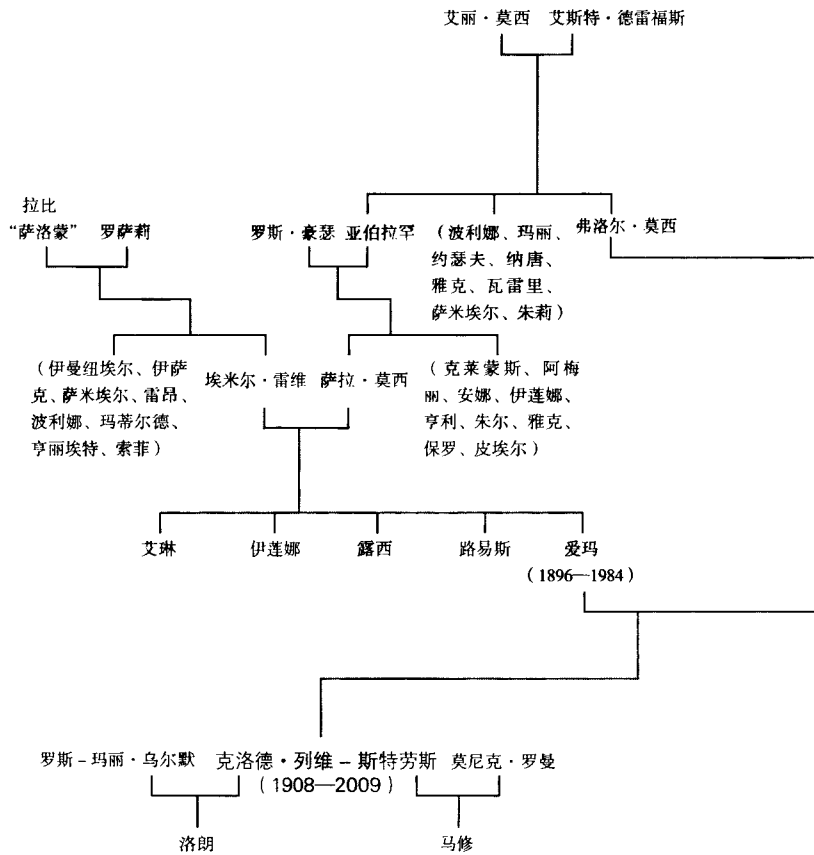
活，而证券交易所为祖父母带来了崭新的巴黎生活：这是一个由雇员、经纪人、成衣批发商人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对寻找工作、借钱、社会应酬而言至关重要。同族通婚也是一项经济上的决定。古斯塔夫·列维在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萧条，而他的早早离世也导致蕾雅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走下坡路。变为寡妇的她需要抚养5个孩子——安德烈（André, 1866—1928）、皮埃尔（Pierre, 1873—1912）、让（Jean, 1877—1933）、伊莲娜（Hélène, 1867—?），以及被称作本雅明、日后成为克洛德父亲的雷蒙（Raymond, 1881—1953）。

事实上，“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家庭而非两个”¹。首先，克洛德的父母是两代以内的表亲，他们有几个共同的长辈，也就是艾丽·莫西（Élie Moch）与艾斯特·德雷福斯（Esther Dreyfus）。但更主要的是，从阿尔萨斯迁入巴黎，并聚居在有限地理范围的犹太人家庭组成了一个小圈子，而它内部的凝聚力是非常强大的。除去巴黎二区（主要是工作、休闲的地点，因为这里有剧院和咖啡馆），他们集中安家于巴黎十六区。因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的外祖母萨拉·莫西-雷维（Sarah Moche-Lévy）与她女儿爱玛的住所不过相隔几百米：前者家住纳尔西斯-迪亚路（rue Narcisse-Diaz），后者（克洛德的母亲）婚后（1907年）定居于普桑路（rue Poussin），一个相邻的街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近亲里，父母辈的长辈人数众多。他有数不清的叔伯姑姨，数不清的堂兄弟、表姐妹，还有姑婆姨婆（她们活得更久，所以比舅公叔公多一些）。家庭成员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因宗教仪式和生活习惯而凝聚成一个互助的集体，这个集体里偶尔也有代理父母的现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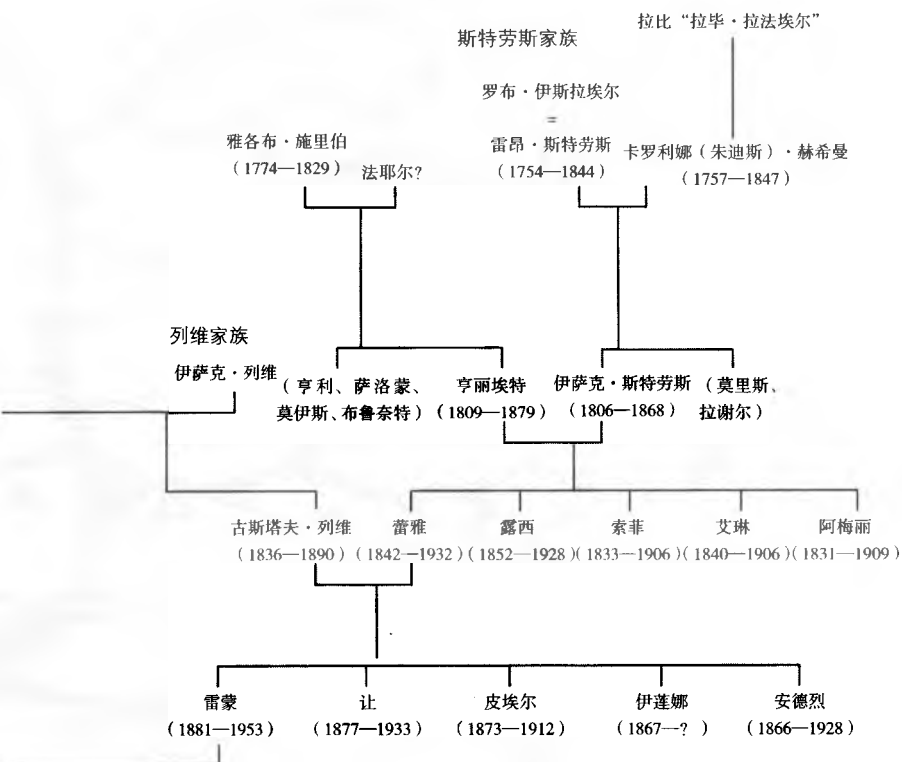
1 让-约瑟·马尔尚（Jean-José Marchand）的访谈，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1973年；后收录于艾米丽·朱莉亚（Émilie Joulia）：《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L'Homme derrière l'œuvre*），巴黎：拉特苏出版社（J.-Cl. Lattès），2008年，第167页。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家族谱树

莫西与雷维家族



家谱树：“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家庭而非两个。”
母亲一支与父亲一支的亲戚之中有共同的长辈，他们是18世纪末阿尔萨斯的犹太人。



我们应当要读亨丽埃特·尼赞的《纵情回忆录》（*Libres Mémoires*）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家族的档案。我们需要尝试了解这个家族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将会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中发现它所造成的回响。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阿尔弗雷德·列维（Alfred Lévi）在与帕尔米尔（Palmyre）（两人分别是古斯塔夫的兄弟姐妹）于书信中谈论帕尔米尔独生子热内·卡恩（René Kahn）（一个三心二意、“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时，展示出舅舅的姿态。一个世纪后，戴安娜王妃去世，身为弟弟的斯宾塞伯爵发表演说。列维－斯特劳斯在《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上发文，将斯宾塞伯爵一模一样的态度刻画了下来。¹他从中发现一个旧机制重新浮出水面，一个在父母与子女发生冲突时起调停作用的机制：这是一种代理父权，以一种不彰显威权、“以母代父”的方式展现的父权。这正是阿尔弗雷德的观点。由于父亲的缺失，他建议自己代理这个角色，但他认为应该推行“温和的谏言”，坚持“劝说的力量”，而不是运用“激烈的方式”²。同样，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如何组织亲缘关系这个疑难问题的思考，他把家族记忆作为思考的部分材料。他通过家族记忆，深刻了解了这种相当成熟的模式：他的祖先（他父母两方的祖辈均为18世纪末阿尔萨斯郊区的犹太人）在“远房兄弟姐妹”之间实行通婚，而这种结合模式能够让每个个体顺利融入圈子的社交生活。首先他的双亲是表兄妹，他后来发现他的第三任妻子莫尼克·罗曼（Monique Roman）（母亲来自古根海姆的一脉）的双亲也遵循这种模式而结合，但并不感到吃惊。³我们这才知道，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舅父返乡》（« Le retour de l'oncle maternel »），《共和国报》（*La Repubblica*）1997年12月24日。该文后被收录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埃尔纳手册丛书”，巴黎：埃尔纳出版社（L'Herne），2004年，第32—35页。

2 这封信没有明确标注时间，但推测写于1890年左右。它被保存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属于“家书”（Correspondance familiale），是“弗洛尔·列维书信集”（*Lettres de Flore Lévi*）主题档案的一部分。档案盒编号206。

3 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2011年2月25日。

人们研究的异域原始社会的组织方式在 19 世纪的欧洲乡村社会中也留下了痕迹，并以它独有的方式繁衍生息。我们有理由这样判断：他们传承血统的方式烙印于家族记忆之中，在无意中为他们繁衍子孙的过程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家族记忆的延续主要依靠女士们，她们的寿命很长，使记忆代代相传而不中断。父母留在了斯特拉斯堡，而儿子们搬去了巴黎，家里的女性维持书信往来，建立起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曾祖母弗洛尔·列维给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Alfred）无数建议和恳求，不停地给予他精神生活的指导，并提出其他琐碎的要求（填得满满的一封信！）。家书里寄予的各种款款深情，也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其父母的通信中展现无遗。克洛德的祖母和外祖母去世时接近百岁——蕾雅·斯特劳斯死于 1932 年，萨拉·莫西死于 1955 年；他的母亲爱玛死于 1984 年，几乎迈入期颐之年。唯一能够胜过她的是她的儿子，列维-斯特劳斯活了将近 101 岁，是这个男性常常比女性短命 30 多年的家族里唯一一个长寿的男子。蕾雅·斯特劳斯作为家族历史的捍卫者，收集了悼念家庭成员的文章，把它们用皮革封面装订成册。册子里有各种信息（包括对出生日期、死亡日期的详细记录，记录人生经历的各种文章），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又将信息补充得更加完整，他用精美的文笔补充了家谱树的信息，将自己和孩子们（洛朗和马修）的信息加入其中。他们好像是登山运动员。这种多人加工的资料在纪念祖先和整理家谱时是很常见的，身为研究家族血统的人类学家，我们的主人公运用这种方式自然得心应手。小册子真实地收藏了家族回忆，19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很多这样的回忆录。它们超越了死亡，将人们对死者的回忆收集并永恒地保留了下来，这样构成的家族回忆保存了前人的痕迹，与毁灭和遗忘作战。¹

1 参见杨·伯丁（Yann Potin）编：《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私密档案》（*Françoise Dolto. Archives de l'intim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8 年。

法国犹太教的“狂热分子”

列维－斯特劳斯家族以“过来人的角度”描绘了法兰西土地上的解放进程，这个并不成熟的解放运动形成了一种促成融合的普遍主义，把犹太人流放至基于对本土宗教虔诚信仰而诞生的私密领域之中。在第三共和国中，犹太人变身为犹太教信徒以及共和国公民，好像他们注定要融入这个新生的非宗教社会。最后，共和国和犹太教教务会议对犹太人日后应当具有的形态达成一致意见：文化上和经济上同化，宗教生活保持低调，并且秉持爱国之心¹。但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指出这样的发展过于重视目的，他的见解不无道理。这般形成的法国犹太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实存在，它常常被拿来当作讽刺画的攻击对象，但总而言之，它是一个被简单化处理的问题。“犹太文化并不会从那些历经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的社会中彻底根除，这与我们对法国犹太教或者对教育（Bildung）的一般分析结果不同。”²在这样多元的身份中，我们会发现千千万万隐秘的符号，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比如家庭结构、组织网络。

在多个访谈中，列维－斯特劳斯只提到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宗教信仰，正如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但教外生活可以很好地满足维持双重身份的艰难任务。这种双重身份在1860年代弗洛尔·列维写给儿子们的一封封信件中得到了生动展现。³这些信件前几页几乎都是母亲用法语书写的内容，后一部分则由父亲接棒，他用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文字进行书写。两种话语、两种语言、两种书写方式的区分恰好说明了他们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节日、死

1 宝拉·E.海曼：《阿尔萨斯犹太人的解放：19世纪的文化涵化和传统的延续》，第138页。

2 皮埃尔·伯恩鲍姆：《走在钢丝上：犹太人的流亡生活和公民身份》（*Sur la corde raide, parcours juifs entre exil et citoyenneté*），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Flammarion），2002年，第51页；皮埃尔·伯恩鲍姆编：《法国犹太人的政治史：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Histoire politique des Juifs de France. Entre universalisme et particularisme*），巴黎：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1990年。

3 “家书”：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06。

亡和出生纪念日，所有常规家庭活动均按照基督教历法上记录的日子进行组织，但他们也会庆祝希伯来历中相应的日子：这是他们与时间的双重关系。此外，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虽不是宗教徒，却在犹太教堂举行了宗教婚礼，之后又按照民事程序进行了注册。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这些犹太人家庭虽然很大程度地被同化，他们仍然举行犹太教婚礼。爱玛的父亲身为拉比，宗教婚礼更是势在必行。此外，伊萨克·斯特劳斯身上展现了犹太人的行善之心，这是那些被严重同化的犹太人保存民族身份的一种经典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列维－斯特劳斯的外祖父埃米尔·雷维（Émile Lévy，1848—1933）作为一名拉比，对共和国体制下诞生的崭新的犹太教表示困惑。而德雷福斯事件则更加凸显和激化了他的反犹太教情绪。他是萨洛蒙·雷维（Salomon Lévy）之子，父亲是布吕马特（Brumath）的拉比，因此，他也曾在下莱茵省这个所谓“拉比乐园”的地方生活过。结束了斯特拉斯堡的中学学业后，1866年，他进入巴黎的犹太教书院，最后以一篇研究古代犹太人君主制的论文毕业。1871年，他入了法国国籍。1876年，他在凡尔登获得了拉比身份，成为一名受犹太人圈子尊敬和喜爱的人物。直到1892年，他一直居住在凡尔登。经过几次失败的申请经历后，1892年，他终于被任命为巴约讷（Bayonne）的拉比。巴约讷是法国另一个犹太教中心。1908年，他从凡尔赛文化协会的拉比一职上退了下来，结束了拉比的职业生涯，而得益于政教分离法律的颁布，他获得了1500法郎的抚恤金。1930年，他成为法国拉比犹太教协会的副会长，并且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另外，他是犹太童子军的发起人之一，还参与了法国拉比犹太教版

《圣经》的改写，但他希望删去一些不适合孩子的内容。¹ 外祖父的履历说明他是一位地方犹太教教务会议的“显贵”。与他的同事一样，他也陷入犹太人身份认同的窘境，因为他身处一个非宗教的社会，一个赋予犹太人公民平等地位的社会。担任巴约讷圣职的他在布道时常常抨击两大困境——宗教活动的消亡以及法国的世俗化。两者使身份认同变得模模糊糊、岌岌可危。“一方面，漠视宗教使我们在安逸中沉睡！我们慷慨的祖国赐予我们的自由使我们遗忘了我们祖先受过的苦难，遗忘了他们为何经受苦难。另一方面，我们的敌人用一种得意的眼神扫视这种冷漠，我认为，这种冷漠不完全停留在表面，我们日日能够听闻我们的血统被打压、我们的权利被忽视、我们布道的行为被抗议。” 19 世纪末，反犹太主义反而激起了法国犹太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加强了他们对共和国的认同，就像这种认同是命运的安排。这是一种维系犹太人身份的可行方案，救世主信仰转变为对共和国的爱，这也意味着面对反犹太主义的非议，他们应当把这种身份主张表现为公民国家广为接受的信仰。这条“登山道”也可以平息法国犹太人政治正统主义的强烈主张。

然而，两种身份的艰难结合使平衡总是难以维持完美的状态。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被问及如何协调脱离宗教的家庭生活与保留下来的犹太人传统时，他说这种情况下不会“没有风浪”²。他回忆起自己在父亲一方的亲戚身上目睹了“戏剧般的疯狂”。他“有时表现得像悲剧人物，有时表现得像喜剧人物。我父亲的这一位兄弟着迷于《圣经》的解经，但他意志不够坚定，最后自杀身亡。那时我三岁。在我出生以前，我父亲的另一位兄弟被授

1 参见让－菲利普·修蒙（Jean-Philippe Chaumont）、莫尼克·雷维（Monique Lévy）编：《拉比与犹太教其他神职人员词典》（*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rabbins et autres ministres du culte israélite*），巴黎：伯格国际出版社（Berg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58—459 页。其出版说明给出了这几点信息。

2 《亦近，亦远》，第 13 页。

予天主教神父之职，目的只是向他的父母复仇，而起因是一场争执。在某段时间里，家里人说他心里住着一位列维神父……”¹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档案保留着这位决定自尽的长辈悲剧人生的生活痕迹：1912年潦草写下的糊涂话里，他向上帝祈求、向家人喊话（主要是他的母亲，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并且希望清醒地死去。²当年他便了结了生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并未继续探索在“戏剧般的疯狂”前方还会发生什么故事，但通过这两个例子（《圣经》解经和天主教教士之职），显而易见的是，生存的矛盾来源于“国家归属感与虔诚的宗教信仰之间的拉扯”³，而矛盾带来太多苦难，唯有死亡才能结束苦难。用小写字母表达的“戏剧般的疯狂”告诉我们，在历史洪流中，法国犹太人理想的融合之路为什么会发生偏差：首先是因为德雷福斯事件，其次是因为维希。

艺术遗产

伊萨克的爱好：从宗教到收藏

阅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档案之后，我们发现他似乎高估了犹太人身份在家族中消亡的程度，也低估了所谓同化的法国犹太人在混合身份下心理与信仰承受的压力。可能这便是他没有深入了解伊萨克·斯特劳斯人生中一大特点——爱好收藏——的原因之一。他把伊萨克介绍成“爱好古董、做古董生意的邦斯舅舅”⁴，还指出他有很多重要的犹太教古董藏品。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犹太教古董指的是犹太人宗教仪式的

1 《亦近，亦远》，第13页。

2 “家谱”（Généalogie familial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08。

3 德尼·贝多莱（Denis Bertholet）已经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参见德尼·贝多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 《亦近，亦远》，第10页。

物品，它们在 1878 年的世博会上得以展出，被陈列在崭新的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的展厅里。巧合的是，这里也是举办新建的民族志博物馆落成仪式的地方。伊萨克去世后，由于经济拮据，它收藏的古董被拿去拍卖。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买下了这些藏品，后来把它们出让给克吕尼博物馆。我们可以听到爱德华·德鲁蒙（Édouard Drumont）为此发出的尖叫。¹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特记得小时候被带到外曾祖父的收藏室，这个收藏室门贴着他的姓氏。所谓“斯特劳斯特－罗特希尔德”藏品系列里的物品都与宗教、宗教节日（安息日、光明节、普珥节等）、割礼和婚姻仪式有关：祈祷书、托书架、银制香料盒、吉都什酒杯、蜡烛碟、铜制的三角灯、光明节需要的灯、结婚戒指、18 世纪的婚书（Ketubah）。²从稀有的 16 世纪收藏品中，我们发现了 18 世纪的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

伊萨克·斯特劳斯的收藏癖在其他条件优越的犹太人家庭中甚是常见，像罗特希尔德家族和埃夫勒西（Éphrussi）更是不必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收藏之风？埃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解释到，他们要填满奢华府邸的空间，这些府邸一部分坐落在巴黎蒙索公园（parc Monceau）附近，另一部分在维也纳的环城大道（Ringstrasse）。他是埃夫勒西家族的远房亲戚和后人，也是一位家谱学者，他对祖先夏尔·埃夫勒西（Charles Éphrussi）名为“netsuke”的收藏品系列兴趣满满。收藏之风是附庸风雅的结果，而收藏品变为艺术资本之后也带来了经济硕果：这种财富上的巨大变化就像是出身贫寒的暴发户的发迹。³1870 年代，当退休后的伊萨克·斯特劳斯特开始收藏并完成他的收藏品

1 《言论自由报》（*La Libre Parole*）的大老板作为反犹太主义的狂热分子，摆出一贯的强硬态度，反对法国国家级别的博物馆收藏犹太人的物件。

2 1980 年 2 月出版的《艺术知识》期刊上有一篇文章对这些收藏品进行了一番描述。

3 参见埃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重现的记忆》（*La Mémoire retrouvée*），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2011 年。《重现的记忆》翻译自 2010 年出版的《琥珀眼睛的兔子》（*The Hare with Amber Eyes*）。

系列时，犹太人中的精英分子们或将兴趣转移至意大利文艺复兴——由银行家和商人带领的运动——的重要作品上，或将眼光投向明治时期异常受人追捧的日本艺术。虽然伊萨克·斯特劳尔斯也收藏了一些符合时代口味的艺术作品，例如，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凡卢（Van Loo）以及布歇（Boucher）的画作，他藏品的核心或者精髓毫无疑问就是犹太教的物件。这使他的收藏独一无二。

达尼埃尔·法布尔（Daniel Fabre）完整并清晰地说明了伊萨克·斯特劳尔斯收藏爱好的意义和影响：“简而言之，他发明了犹太艺术。因为犹太教教条拒绝在图像中呈现出雅威创造的个体，犹太人的迁徙又加深了犹太人对这一禁忌的认识，所以人们偏执地认为犹太人没有艺术。而他打破了这一偏见。同时，他也向犹太人祖先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从未想要掌握一门艺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艺术。”¹ 他将他的收藏取名为“希伯来宗教艺术物品”——这也是它们在1878年世博会展品目录上的名字，之后他“决定将它们变为艺术品，而他用来重命名的字眼打破了原来的秩序，为它们进行了重新归类”，因此也“彻底改变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²：做礼拜用的宗教物品成为艺术品。而对天主教物品形象的颠覆也在探索的脚步中实现。回顾历史，20世纪的所有“战场”都推广了这样的做法。³ 但与他人相比，伊萨克·斯特劳尔斯是历史第一人：他将对神的膜拜转变为对“美”和艺术的欣赏，并利用这一转变来重新塑造犹太人的身份。达尼埃尔·法布尔指出，他的创举无疑说明了他既“忧虑传统宗

1 达尼埃尔·法布尔：《从伊萨克·斯特劳尔斯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尔斯：犹太教这种文化》（« D'Isaac Strauss à Claude Lévi-Strauss : le judaïsme comme culture »），载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编：《列维-斯特劳尔斯：世纪之旅》（*Lévi-Strauss, un parcours dans le siècle*），巴黎：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Odile Jacob），2012年，第271页。

2 同上书，第272页。

3 参见纳塔莉·海因里希（Nathalie Heinich）、罗贝尔塔·夏皮罗（Roberta Schapiro）编：《论艺术的诞生》（*De l'artification*），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2010年。

教生活将会瓦解而试图减慢瓦解的速度”，也担心保留一种独特的身份形式非常困难，因为宗教生活或者表面上继续存在的宗教仪式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1984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与维克多·马尔卡（Victor Malka）造成轰动的对话中正是这样表示的。采访人以一种挑衅的口吻向他转述了高中同窗的话——“列维－斯特劳斯清楚他应感谢自己身为犹太人”，列维－斯特劳斯如此回应：“对，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父母完全脱离宗教生活，他们反而需要面对我认为所有犹太人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选择信仰宗教或者选择信仰文化。人们把犹太民族当作热爱读书的民族，确实，我成长在一个书香门第。我在年纪特别小的时候就被要求读书，被要求提高修养，因此培养了我对很多领域的兴趣。非常笃定地说，文化的价值在我的世界里是非常重要的。它才是神圣的。”¹

其实，转而信仰“美”也是19世纪末维也纳一段重要的历史，是维也纳拥有神秘而强大的创造力的原因。在犹太人身份被不同的归属选择撕裂之时，大批犹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支持这个新的理念。他们来自奥匈帝国（这一族也生活于奥匈帝国之外的德国）；说德语的犹太裔维也纳人被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统治，他们是奥匈帝国之中的少数民族；他们还受到维也纳卡尔·鲁格（Karl Lügner）市长以及基督运动分子狂热的反犹太主义的为难。他们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奥地利人，更不是什泰特勒（shtetl）的犹太人。他们同化得并不完全，所以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仍有矛盾。迈可·波拉克（Michaël Pollak）认为，选择追求艺术成就、支持对艺术事业的投资使他们能为自己拼凑出一种更加轻松的生存方式，一种“卡卡尼帝国”艺术家的爱国情怀，而这种情怀光

1 因《今天，身为犹太人》（*Aujourd'hui être juif*）一书的出版，1984年，维克托·马尔卡（Victor Malka）接受了访谈。《今天，身为犹太人》，巴黎：赛尔福出版社（Éditions du Cerf）。书中的部分内容后被引用于《犹太人资讯报，犹太人之报》（*Information juive, le journal des communautés*）第281期，2008年7—8月，第15页。作者注。

芒万丈，影响了 1900 年代。¹

在巴黎，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尝试引领了变换身份的浪潮。而我们最早是在他的子孙中发现了这一行为的后果。

姓氏是一种证据

不仅伊萨克·斯特劳斯的收藏品在他死后流落四方，斯特劳斯的姓氏也可能走入坟墓，因为他的 5 个孩子都是女孩：阿梅丽（Amélie）（亨丽埃特·尼赞的祖母）、索菲（Sophie）、艾琳、蕾雅（列维-斯特劳斯的祖母）以及露西。她们分别与卡昂（Cahen）、里昂（Lyon）、史莱辛格（Schlesinger）、列维以及哈昂堡（Hachenbourg）家族联姻。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亨丽埃特·尼赞敏锐地发觉：子孙辈里两个男性成员决定在自己原来的姓氏上加上先辈的姓氏斯特劳斯（Strauss），他们认为这样的姓氏在直观上可以给人高雅的印象。² 贵族姓氏已经无人使用，联合两个姓氏在法兰西共和国是一种常见的做法，目的在于凸显身份。但他们绝不是出于这种考量。将这种姓氏的拼接付诸实践的分别是斯特劳斯家两个女儿的女婿和儿子：身为亨丽埃特·尼赞父亲的罗贝尔·阿尔芬-斯特劳斯（Robert Alphen-Strauss）（阿梅丽的女婿）以及雷蒙·列维-斯特劳斯（蕾雅的儿子），他们两人都是家里的艺术家。一位是音乐家，一位是画家。根据列维-斯特劳斯为申请改姓而提交的材料，两人添加姓氏不仅是为了纪念先辈，也是为了致敬外祖父并走上与他一样的艺术之路：“伊萨克在这个家族成员从事各行各业的大家族里是第一位艺术家，他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 迈可·波拉克（Michaël Pollak）：《维也纳 1900》（*Vienne 1900*），巴黎：伽利玛出版社 / 朱莉亚出版社，1984 年。

2 参见《纵情回忆录》，第 56 页。

具有深远的影响。”¹对罗贝尔·阿尔芬-斯特劳斯而言，新姓氏只是一个“艺名”，而雷蒙·列维-斯特劳斯则将把这个复合姓氏传给妻子和独生子克洛德。

几个不起眼的注释使我们确定，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晚年，他认可了这种新的归属方式，还有序地在家庭档案中添加了一些手写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除了一些闲言碎语——阿梅丽应当是鲁埃（Rouher）国务大臣的情人，

“有人认为家族里的艾琳是鲁埃的女儿”，这些信息将陷入这片家族疑云的艺术家人推入大众视野：艾琳·斯特劳斯嫁给了莫里斯·史莱辛格（Maurice Schlesinger），一个法兰克福的音乐出版商。她的外甥孙疑惑地问道：“就像福楼拜的情人爱丽莎·史莱辛格（Élisa Schlesinger）（《情感教育》里的阿尔努太太）一样吗？”

此外，下面这些话也被仔细地记录了下来：“1974年9月，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亨利·卡罗-德尔维耶（Henry Caro-Delvaile）（克洛德的舅舅，他是一位画家）是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情人。”他还往复杂的家谱树上，在莫西这边添加了几笔：他给两个没有署名的子孙添加了“歌剧院舞者”“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团队里的演员，死于美国巡演”这样的标注，以及“爱德华·乔纳斯（Édouard Jonas），索菲·斯特劳斯（Sophie Strauss）的孙子，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大古董商”²。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萨克·斯特劳斯的的光芒被维也纳另一个斯特劳斯家族更加持久的光芒、被前任宫廷舞会指挥穆萨尔的光芒、被歌剧集体共同创作的性质（这使音乐著作权的取得变得有

1 达尼埃尔·法布尔：《从伊萨克·斯特劳斯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犹太教这种文化》，第276页。同一时间，雷蒙·列维-斯特劳斯的姐夫（爱玛姐姐艾琳的丈夫）也在追求艺术事业。他叫亨利·卡罗-德尔维耶，原名亨利·德拉维耶，是一名画家。

2 这是“家书”中摘录的一部分。“家书”位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06。

些微妙：奥芬巴赫几首轻歌剧的曲子其实是伊萨克的创作）所掩盖。伊萨克·斯特劳斯的才华能够守护子孙，它的重要性在五十年后有所体现：克洛德的父亲雷蒙对其外祖父的追忆之情被一个以帝国舞会为主题的电台节目侵犯。在写给节目创作人的信中，他在客套话之后这样写道：“我在你们之前某期节目中听到了《伦敦加洛普舞曲》（*London Galop*）、《歌剧院大加洛普舞曲》（*Grand Galop de l'opéra*）和《新版仙女》（*Nouvelle Sylphide*），除了斯特劳斯的子嗣，谁还能辨识出这些没有署名的加洛普舞曲和波尔卡—玛祖卡舞曲呢？当从《蓝胡子》（*Barbe Bleue*）和《福蒂尼奥》（*Fortunio*）中截取的四对舞曲被当作穆萨尔的作品时，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1953年7月2日，他给另一期以斯特劳斯和维希为主题的节目写了一封感谢信，这封信带着一种溢于言表的感动以及感动之后冷静的情绪，驱散了第一封信里的不快：“感谢您，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能在维希唤醒人们对我的外祖父斯特劳斯的回忆，如今，梦想成真了。”¹

直到20世纪，这位“外祖父”斯特劳斯一直是家族图腾般的人物。此后，他的外曾孙克洛德清理了第二帝国的波尔卡舞曲，为家族姓氏冠上了新的荣耀，但两者的类型十分不同。

1 “家书”：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06。

2 启示 (1908—1924)

您早早地就被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征服。

罗杰·凯卢瓦 (Roger Caillois)

法兰西学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就任仪式上的演讲¹

寻回童年的点点滴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一篇文字记叙已经摆在我们眼前，而故事大部分是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组织起来的。他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访谈之后整理出一些隐秘、不为人知的私事²；另外，远房表姐亨利埃特·尼赞的《纵情回忆录》、几幅画以及几个附有档案介绍的物品能帮助我们填补这段童年往事的空白。童年时，他着迷于艺术，满心欢喜地探索世界。

对孩子而言，他的世界就是公寓、街区以及城市——巴黎。每走一圈，他都收拾好自己发现的新鲜玩意，等夜幕降临，再把这些别人塞进他口袋的宝贝掏出来，当作白天的战利品尽情显摆。多么美好的一天。各种各样的探索成果，包括绘画、音乐、文学、稀有物品、城市风景、自然景观，它们转变为对孩子的启蒙。宗教词汇的用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项由伊萨克·斯特劳斯掀起的改变：这才是神圣的！

面对家族文化的光芒，学校文化反而显得苍白无力：既没有优秀的老师，也缺少精神导师，总之，在高考结束前，他还未遇到。一个年轻的灵魂和一具年轻的身体浸润在独立的精神中，一直渴望进行自主学习。在童年和青少年阶段至关重要的时光里，

1 巴黎，法兰西学会 (Institut de France)，1974年6月27日。

2 达尼埃尔·法布尔：《从伊萨克·斯特劳斯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犹太教这种文化》，第268页。

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一种相当随意的教育，而社会地位的下跌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困境给了这位少年初尝社会滋味的绝妙机会。他的长脸颊显得严肃，但又常常绽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上流社会的童年景象

奥芬巴赫、马泽尔·库格尔、绘画

故事要从他的出生讲起：1908年11月28日，身为巴黎人的他出生在布鲁塞尔凡·坎彭豪特路（rue Campenhout）。一张有他笔迹的明信片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三楼转角处，“画室、柠檬树、厨房、卧室”¹。马路上，一家啤酒酒店、一个卡宾龙骑兵营。它们位于布鲁塞尔东北方的街区，与玛格丽特广场相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斯还保存着他父亲的一幅素描画，画里描绘了他从出生的房间窗户望出去的城市风景。这样的图像被他称作“纪念物”（objet-mémoire）²。列维-斯特劳斯拉斯是比利时人吗？并非如此。作为画家的父亲因布鲁塞尔好友们的订单而来到此处，所以他出生在比利时是一个意外。在几个月中，这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在返回巴黎之前一直待在布鲁塞尔。他在比利时这段异地出生的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某种“比利时情怀”（canal belge）。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怀对列维-斯特劳斯拉斯人生所留下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他政治道路造成的巨大影响。他的第三任妻子莫尼克虽出生在巴黎，却是一名比利时人。这种对比利时的倾心用讽刺、调侃的口吻回应骄傲且自视过高的巴黎人。这是文化归属上的一个小瑕疵，第一次叛逆之举。

“古斯塔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斯”，这正是他出生通知书上写的名字。他不久后便回到了法国首都并在那里接触人与

1 “童年”（Enfanc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0。

2 《自画像》，第18页。

事。依照习惯，他保留了祖父古斯塔夫·列维（Gustave Lévi）的名字，祖父去世于 1890 年，在克洛德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居住在十六区普桑路 26 号，靠近奥特伊门（porte d'auteuil）。这个街区西邻布洛涅森林，右接塞纳河，风景优美。这里有艺术家的画室、小型旧货店，还有田园气氛。列维-斯特劳斯记得在普桑路和拉封丹路的路口有一家农场！¹在城市的轮廓尚不清晰的那个年代，这几条马路贯穿了小男孩的童年时光，为他提供了无数素材，让他可以尽情完成城市幻想并且体验自然风光，人们也在这里发现新事物。此外，这个街区大胆地融合了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包容地穿梭于两者之间。

列维-斯特劳斯的童年一直与那套公寓房为伴,直到1931年,他才回到巴黎的宅子居住。这套公寓房位于一栋新建筑的五楼。房子建于19世纪末,所以样子还算说得过去。它有新哥特式的



明信片：布鲁塞尔，凡·坎彭蒙特路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亲笔标注了他出生的那套公寓房。

1 《亦近，亦远》，第9页。

风格，楼下还有一扇玻璃铁门。但如果我们走进这套公寓房，氛围完全变了样：我们要把它想象成一套用作画室的房子，这里到处可见他父亲工作的痕迹，比如颜料、画布、画架；四室的房子里塞满了书本和年代久远的家具，还装进了一间摄影冲洗室，这些几乎把房子撑坏了，而雷蒙在冲洗室里尝试冲洗底片。他是一名肖像画家，而摄影术慢慢地变成了他的强劲对手。父子之间许多尝试、讨论（有时也会进行激烈的讨论）和实验都是围绕摄影展开的。两人都深深着迷于这项对他们而言的“新”技术。突然有一天，年幼的克洛德接触到与艺术有关的事物和工具。“我成长于画室之中……完全没有受到学术熏陶。当我开始学习读书和写字的时候，我的手里握着画笔和颜料。”¹我们可以把他的童年描绘成一段传奇的经历，这段经历围绕艺术家父亲的各种工具²和母亲的手艺而展开。至于母亲的手艺，保留下来的一些菜谱让我们发现了端倪：“姜汁布丁、南瓜番茄汤、蘑菇塔、梨肉库格尔（Birnen Kugel）、蛋糕布丁、阿尔萨斯风味库格尔（Kugel alsacien）、犹太传统风味甜鲤鱼、萝卜排骨、阿尔萨斯辣根菜酱汁、无酵库格尔（Matze Kugel）、萨夫鸡肉（poulet scharff）、苹果奶油布丁、牛舌、蘑菇嫩牛肉片。”³

他的母亲爱玛出生于1886年，身材娇小。她很漂亮，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成为母亲时，她年纪尚轻（她诞下克洛德时才22岁），充满活力。她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庆幸能用自己所有的厨艺来养育这个孩子。作为五个姐妹中的老幺，她没有读书，而姐姐艾琳是塞夫勒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并且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但她拥有绝对音感，能唱所有曲子，特别是那些家里人都

1 皮埃尔-安德烈·布当（Pierre-André Boutang）、阿妮·舍瓦莱（Annie Chevallay）：《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par lui-même »），DVD 光盘（一张），法德公共电视出品（Arte Editions），2008年。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23页。

3 “家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08。

熟记于心的奥芬巴赫的曲子。¹ 家里人有阿尔萨斯的生活背景，而爱玛·列维 - 斯特劳斯长于巴约讷，因此，她与两座美食之城渊源深厚。爱玛·列维 - 斯特劳斯将她的故事融入她制作的菜肴之中，而她的烹饪方式带着犹太与阿尔萨斯混合的强烈风格。这位出色的厨师并没有遵循传统资产阶级的烹饪方式，她早早地就让她的儿子了解这个奢侈的宫廷之乐，她用尽浑身解数指导儿子，用美食家的严谨态度教导他。

父亲为年轻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画了很多画，画里的克洛德或是准备爬上摇马，或是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小男孩的样子——他一头卷发，面容清秀，显出些许女孩子气，因为那个时代的小男孩都留着一头长发。透过另一幅画，也就是另一幅“纪念物”，一幅由姨父亨利·卡罗 - 德尔维耶（Henry Caro-Delvaile, 1876—1926）创作的题为“我的妻子和她的姐妹”的画（1904年国家买下了这幅画并将它保存在卢森堡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雷维家的五个姐妹。画家笔下的她们身处资产阶级装潢风格的室内，其中一位正给孩子喂奶，其他人正下着国际象棋。亨利·卡罗 - 德尔维耶是巴约讷人，他娶了姐妹中的老大艾琳。爱玛正是在两人的家中遇到了卡罗 - 德尔维耶圈内好友雷蒙·列维 - 斯特劳斯。² 而另一位画家加布里尔·罗比（Gabriel Roby）与老三结为连理。两位姨夫中自然是亨利·卡罗 - 德尔维耶名声更胜一筹，他“灵活的画笔下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为他夺得了不菲的名声”³。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他前往美国追求事业，可是事与愿违。有关加布里尔·罗比的回忆甚少。他健康不佳，以致英年早逝，“他的生活比我父亲更加艰难”⁴，他

1 《亦近，亦远》，第10页。

2 2015年3月9日，马修·列维 - 斯特劳斯接受了作者的访谈。据说，当雷蒙求婚时，他这样问爱玛：“您愿意将您的字母y改成我的字母i吗？”

3 让 - 保罗·莫瑞尔（Jean-Paul Morel）：《普桑路26号》（«26, rue Poussin»），《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第311期，1993年6月，第33页。

4 《亦近，亦远》，第11页。

的外甥回忆道。至于克洛德的父亲雷蒙·列维-斯特劳斯，我们从其他记录中知道，他在1905—1921年带着“风俗画和肖像画”¹参与了巴黎沙龙展。如同他自己常常提到的那样，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在画家的环境中长大。这些画家既不是“颓废落寞”的画家，也不是先锋派画家，既非名声显赫也非默默无闻。夏洛-德尔维耶是莱昂·博纳（Léon Bonnat）的徒弟，他的师傅是服务于第三共和国的肖像画家。夏洛-德尔维耶与他的连襟致力于学院艺术，而他的成就稍胜一筹。尽管在没有政府订单的状态下他们不得不参与买卖——当时的市场不再以沙龙为中心而是以画廊的形式展开，但这三个男人仍然坚持学院派的价值标准：创作的责任心、漂亮的工作成果、技术、熟练、努力以及时间。而先锋派的伦理观追求一时的灵感，主张对某一个时刻、一个瞬间或者对一时灵感的自由捕捉。他们的才能开始在市场上受到新艺术的冲击，由于现代艺术占了上风，他们艰难地记录下即将消失的浪花（还需要几年），这些浪花属于上个世代的艺术。即便列维-斯特劳斯的父亲与丹尼尔·卡恩韦勒（Daniel Kahnweiler）交好，这位未来的现代艺术品商人、毕加索好友、抽象画推崇者、曾经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他仍然偏爱莫里斯·昆汀·德·拉图尔（Maurice Quentin de La Tour）。克洛德说：“父亲与时代脱轨。”²

如果还是孩子的克洛德不在普桑路的家中，也不在附近探索或者没有被带到某一个画家朋友的画室去，他便被频繁的家庭活动所扰：定期走访和散步、每周去祖母蕾雅·列维（闺名蕾雅·斯特劳斯）在维尼翁路（rue Vignon）的家中聚餐。这种礼仪活动说明伊萨克留下来的资产雄厚，能够维持资产阶级的生活。蕾雅的烹饪手法比爱玛更加传统，此外还有专人在周日家人一同进餐

1 《亦近，亦远》，第11页。

2 让-克洛德·布林吉尔（Jean-Claude Bringuier）的访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Une approche de Claude Lévi-Strauss》），载《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纪》（*Le Siècle de Lévi-Strauss*），巴黎：蒙帕纳斯出版社（Éditions Montparnasse），1974年，DVD光盘（两张）。

时提供服务。年少的克洛德对此感到厌烦。他拿起一册拉比什（Labiche）的作品，躲在角落“一个人笑出声”¹。在这个众多领域建树颇丰的家族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好苗子，与别人相比显得独一无二。作为独生子（因为他母亲身体羸弱，没有办法冒险孕育第二个孩子），一个被人疼爱的孩子，一个孤僻却又同时被众人包围的孩子，他培养了适合自己的优点：勤于阅读。他尤其喜爱阅读《堂吉珂德》的一个缩减本，并熟谙于心。他能很自然地将它背诵出来，让画廊里的人吃惊不已。²这个“神童”（Wunderkind）也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他喜欢讲故事，更喜欢将它们写在纸上。因此，在8岁半的时候，他创作了《煤与火柴》。故事描述了一袋煤与火柴的对话，对话中，被丢在厨房中的它们分别讲述自己是如何被带入厨房的。矿工们把木炭从“比利时富饶的土地”采了出来，木柴棍是由上好的杉树制成的，它们随后被浸入硫黄和磷之中。煤与火柴安乐地死去，煤死后化为灰烬，与拿破仑一世一样；而火柴被丢进垃圾盒中。反面写着：“如果你想要更多故事，你只需要问我就行。”³除了表达对比利时的钟爱，他用词准确，形成了有点类似蓬热风格的诗歌；他为喜爱的物品和植物赋予生命，展示了“对物质的想象”；最后，悲剧性的结尾干脆利落。这些风格或内容都让人着迷。

列维－斯特劳斯童年的资产阶级生活里，礼节性的互访、折了角的名片仍很常见。可当克洛德晚年回忆童年往事时却几乎想不起这些事物：这段埋藏在19世纪的经历并没有躲过一战的战火，所以人们有时为这些过往的幽灵披上美好的外衣，把悠长人生的起点装扮得炫目耀眼。

1 《亦近，亦远》，第133页。

2 《亦近，亦远》，第134页：“为了取悦来客，他们要求每一位访客随机打开一页，然后，读一句话；我毫不犹豫地上前，因为我对缩减版的内容了若指掌。我还能回忆起它略带光泽的玫红色封面。”

3 文献收藏于“童年”这一主题档案之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0。

凡尔赛战争：爱国精神和犹太人身份

战争的爆发突然结束了他童年安稳的日子。父亲身体不济，当了急救车司机。害怕巴黎被攻陷，爱玛带着儿子，与雷维家的四个姐妹以及她们的孩子在凡尔赛同雷维家那位拉比会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外祖父家度过了战乱的四年，从六岁长成十岁的少年，几乎只与一屋子女性亲人为伴。其间，他在欧希高中（lycée Hoche）就读。战争期间，家庭分离，尤其是与父亲长期分居两地，这样的经历十分常见。

战争靠爱国情绪才得以维持下去，而犹太裔法国人的爱国情绪强烈得多。他们把爱国当作一种救赎的方式，一种犹太人解放运动的“血债”。他们对人、对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执着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证明忠诚的方式，而几年以前的德雷福斯事件就曾让人们重新检视他们的忠诚。这种投入确保他们想要的融合能够实现，也能保证他们的目标完满达成。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家族中发现了这种毫无破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痕迹，除此之外，这一家族还心怀阿尔萨斯犹太人的高昂情绪，因为他们来自“被占领的省份”（provinces perdues）。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916年，克洛德的祖母蕾雅·列维为了保卫国家而签署了第二份借据，转出了2000法郎。1915年12月16日，她已经给了1500法郎。¹

4万犹太裔法国人集结于国旗之下（1914年犹太人总数约为19万），而7500人死于战场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全国战场上的贡献不小。²列维-斯特劳斯家族并没有失去太多亲人，尤其是近亲之中并没有损失，除了“一位比我年长许多并且血缘上非常亲近的表兄弟，一位非常出色的师范生”。带着一丝

1 “家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08。

2 菲利普·兰斗（Philippe Landau）：《陷入困境的祖国：战火连连》（« La patrie en danger. D'une guerre à l'autre »），载皮埃尔·伯恩鲍姆编：《法国犹太人的政治史：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第77页。

自豪之情，列维－斯特劳斯特这样说，“在《法国的精神家族们》（*Les Diverses Familles spirituelles de la France*）中，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 Barrès）引述并评论了他战时的书信”¹。对于这类事件，人们的感受是一致的，它并不是无关痛痒的：痛失兄弟姐妹中以及一个家庭中杰出的长子或长女，成功的期望和担子落到了弟妹们身上，空缺的出现让他们肩负上更加沉重的负担。

因为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忙忙碌碌并度过战争时期。研究战争文化的历史学家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向我们普及这些知识。² 学校、家庭、分离、丧礼、爱国情绪都向他们传达了战争的信息。他们可以说是这场正在进行的文明之争的对象和赌注，因为这是他们未来将要承担的重任。他们为此做好准备，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么悠闲度假，要么情绪焦虑，在两者之间变来变去，以这种方式度过了没有父亲陪伴的童年生活，“在乡下，大胖子贝尔塔（Bertha）的大嗓门振聋发聩，督促着我们”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是1914年那场战争背景下的孩子：“我自己也被这种热情引领，因此我献出了我自己所有的小金币——一个八岁孩子的储蓄成果——来维持法国军队的军费。无数海报号召我们团结互助，而与我们家庭的情况一样，大家都非常爱国……因为我们是阿尔萨斯人。之后，停战协议被签署，人们欢庆停战，终于松了一口气。激动的心情延续了几个日夜。”⁴ 列维－斯特劳斯特还记得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那时，他从巴黎歌剧院大街的某幢建筑物内观看游行，把它当作“年轻时代的

1 《亦近，亦远》，第15页。

2 参见斯特芳·欧都安－鲁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战火中的孩子（1914—1918）》（*La Guerre des enfants, 1914-1818*），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in），1993年；马农·皮尼奥（Manon Pignot）：《祖国的“热血青年”：战争时期的一代》（*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Génération Grande Guerre*），巴黎：瑟伊出版社，2012年。

3 《自画像》，第18页。

4 同上。

重大事件”¹。他留下来的几首诗说明了这一代人的情感归属，其中一首献给祖母的诗的下方画着一位戴着帽子的士兵，帽子上写着“荣耀和国家”²。

暂居凡尔赛的那几年唤醒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身体里的犹太人血液，这在他身上是非常少见的，而这个时间节点距离1980年代的访谈还早得很。他对童年的回忆被记录在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书中对这段回忆的呈现让人觉得出乎意料。克洛德分析了博罗罗印第安人（Indien Bororo）对生与死的关系的理解。而博罗罗印第安人心里生与死的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宗教信仰之中，使所有的社交生活都以一种混合了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的奇怪模式展开，而这让克洛德联想到“佛寺里的善行”³。童年，他之所以意识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只是因为他对它有所抗拒：“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放纵让我感到不解，尤其当我与宗教只有一次接触时——小时候为了躲避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住在外祖父家中，而他是凡尔赛的拉比。外祖父家与犹太教堂离得很近，教堂与家之间由一条长长的内部过道相连，一条让人胆战心惊的过道。而对克洛德而言，这条过道是俗世与那个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个世界缺少人的温度，而他认为人的温度才是事物神圣的原因。宗教活动的时间之外，教堂空无一人，他短暂、冷静地占有这座教堂，可他能占有它的时间非常有限。他在这里理所当然地独自待着，直到祭礼的程序粗鲁地打扰了他的清静。而家里的宗教仪式也遭到同样的冷漠对待。除了外祖父在餐前的默声祷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他们的生存必须感谢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当然还有一张挂在餐厅墙上的

1 1983年11月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斯特芳·克鲁埃（Stéphane Clouet）写信。参见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Révolution constructive”，un groupe d'intellectuels socialistes des années 1930»），当代史博士论文，南锡第二大学，1989年2月3日，第21页。

2 “童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0。

3 《忧郁的热带》，第222页。

横幅标语，打印的字迹告诉我们：‘细嚼食物才能消化得好’。”¹

与博罗印第安人对宗教的热情相比，犹太教受到了冷漠和无情的对待。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称，所有的一神教都遭遇了相同的境况。宗教皈依的普遍发生让一些平和的宗教遭遇了困境。神圣的事物是超验的，也让人心生恐惧，这与神灵亲切、能够抚慰人心的形象完全不同。² 克洛德的所有描述，包括对细嚼慢咽这一细节的交代，向我们展示了家里人与宗教维持的肤浅关系，而宗教被简化成没有意义的活动、仪式，举行这些活动和仪式不过是碍于犹太人的身份。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也经历了割礼和犹太人的成人礼（bar-mitsvah）。然而，他仍喜欢回想这段时光：“当我们为了躲避战乱而暂居凡尔赛时，妈妈们为我们制作火腿三明治，我们跑去公园狼吞虎咽。怕惹外公生气，我们只好躲在公园的雕塑后面。”³ 所以我们也很难把这些描述总结为“空洞的归属”⁴。因为，即便缺少宗教实质，他们的身份形象也在校园暴力下丰满了起来：“在市镇小学，同学们把我们当作肮脏的犹太人。到了高中也是这样。——那么你怎么回应呢？——拳头。”⁵ 此外，一种雏形阶段的“犹太人复国情绪”为这个并不完全“干瘦”的犹太人身份提供护盾：“高中的时候，我与一些犹太裔同学觉得我们有责任出钱在以色列种一棵树，一棵属于我们的树。”⁶

那时，德雷福斯事件还没有过去太久。从法律上说，它到1906年才彻底结束，最后无罪者沉冤昭雪。在孩子的想象中，德雷福斯事件有不同的发展，而有教育意义、剧情美好并且结局圆

1 《忧郁的热带》，第222—223页。

2 参见安德烈·玛利（André Mary）：《纪念列维 - 斯特劳斯特（1908—2009）》（« In Memoriam Lévi-Strauss [1908-2009] »），载《宗教社会科学档案》（*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2009年10—12月，从第5页起，<http://assr.revues.org/index21483.html>。

3 《自画像》，第19页。

4 德尼·贝多莱：《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第13页。

5 《自画像》，第19页。

6 同上。

满的故事最受欢迎。战时共同度过的某个漫长的夏天，比克洛德大两岁的表姐亨丽埃特·尼赞在诺曼底的海边展开了一场戏剧冒险：“我分配角色，当导演，我也制作配饰。这个帅气军人的故事，我们不知厌倦地表演了一遍又一遍……像童话故事里那样，最后一个画面是圆满的：在一个授奖仪式上，被一群毕恭毕敬的士兵围住的德雷福斯咧着嘴笑，共和国为他戴上了一顶法国军帽。”¹ 战争时期的童年里，亨丽埃特热情满满地带着他玩耍，她的一切事物都成为戏剧材料。她与克洛德相对亲近，她夸他“可爱”。“他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像“小猫咪一样”。他们骑着棍子，嘴里唱着：“我们是波兰枪骑兵！我们是波兰枪骑兵！我们是……”，这样持续几个小时。除了历史故事，爱情故事也有一席之地。他们演起了《卡门》。“克洛德是埃斯卡米罗，我扮演卡门。至于服装，我们去掉了母亲们女式衬衫的饰带。所以克洛德穿成‘斗牛士’的样子，而这套服装仅仅是由十几条红色小带子缠起来的，至少我们把它当成斗牛士的服装。”²

世界的丰腴

“在我童年的所有经历中，没有任何事件比我与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第一次相遇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1918年秋，我是詹森·德萨伊高中（lycée Janson-de-Sailly）六年级的学生。在拜访班主任（professeur principal）时（这是当时的传统），由于担心我过于孤僻，我的父母与他推心置腹。某天课后，一位我仅能凭外貌辨识的同学向我走近。他一头棕色的头发，身材瘦弱，个子较为矮小。他对我说了句话，让我惊讶不已：‘老师让我跟你玩。’我似乎有一些生气：竟然有人敢侵犯我的独立性……然而，从这天起的十几年间，皮埃尔

1 《纵情回忆录》，第51页。

2 同上书，第55—56页。

和我形影不离。”¹

10岁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孤僻的男孩，外表傲慢又自大，为自己的独立而感到自豪。他择友甚严，既有固定的爱好又兴趣广泛，他的广袤世界位于高中大门之外。与阴暗的高中生活不同，家庭教育自由又有乐趣。尽管家里要求他去上学，去接受好的教育，作为交换，家里仍做出了其他承诺。他的父亲基于兴趣和职业原因成为他的启蒙者。

艺术教育

外曾祖父是作曲家和乐团指挥，父亲和两个姨夫是画家，这使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历常常与他对艺术的兴趣联系在一起：“我整个幼年和青少年时期与音乐和绘画亲密接触，一直被它们的热情包围。”²

绘画是父亲的职业。“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修养高、充满好奇心，而他的兴趣也不只是绘画。他还醉心于音乐和文学。”³雷蒙·列维－斯特劳斯个性温和，他不是一位专横的父亲，虽然克洛德记得有几次他犯错（在学校作弊）惹怒了父亲，为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慷慨地教导克洛德，对自己的教导信心满满，而且他品德高尚。总之，他生活于第三共和国，每个周末，如果克洛德的成绩不错，他就会奖励儿子，带他到卢浮宫去。我们可以想象父亲和儿子漫步于这个西方绘画的博物馆时，父亲磨砺儿子欣赏美的眼睛，让这双眼睛看透绘画中的真实，并让他观察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绘画技术是父亲的看家本领，是他学习艺术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回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adolescence》），载《皮埃尔·德雷福斯：1907—1994》（*Pierre Dreyfus, 1907-1994*），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95年，第83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Le “regard éloigné” de Claude Lévi-Strauss》），《解放报》（*Libération*）1983年6月2日。这是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与列维－斯特劳斯访谈的内容。

3 《自画像》，第18页。

的成果。这些对克洛德的艺术教育并非只是让他学习艺术史，相反，这是让他切身接触艺术创作。每一次认真接触新领域的同时，年少的列维－斯特劳斯尝试着手创作。他先学习复制物体、身体的形状，希望创造出忠于原物的作品，此后，他爱上了毕加索，因此创作出一些受立体派影响的素描作品。这个孩子似乎觉醒了过来，他摸了摸鼻子，摇了摇头倔强的脑袋。其中一幅素描作品保留了下来，它就像是传统画室学艺的历史记录。他对动物运动的解剖精准又鲜活，惊讶了众人。人们实在不知道是否该认为这位穿着短裤的画家是拥有才能的。“他进行了一些训练”¹，罗杰·凯卢瓦这样说。后来，旅行记录册、速写图、卡杜维奥人（Caduveo）面部和身体的图纹、唇饰（labret）、阳具套、石棒、刀以及《忧郁的热带》里标志性的羽毛王冠，都证实了他的绘画才能是不容否认的。这些图画都出自列维－斯特劳斯之手。民族学家需要什么都会。

而音乐可以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生活以及作品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每个星期，他的父亲都会带他去听帕德鲁（Pasdeloup）的音乐会。这是一个社团性质的乐团，也是货真价实的音乐机构，它让并不阔绰的人们能够欣赏音乐，因而听众数量庞大。他们也常常去夏特勒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听克隆尼（Colonne）乐团的表演。列维－斯特劳斯记得他去剧院的时候年纪还很小。“我们坐在第五回廊，现在已经找不到踪影了。当时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所幸我们能够听见音乐！我在这里接触了瓦格纳所有的曲子。”²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位父亲的心思：虽然收入有限，他还是决定让孩子欣赏美妙的音乐以及歌剧，特别是歌剧。瓦格纳是除了奥芬巴赫之外这个家族的另一个“情人”，

1 罗杰·凯卢瓦：《法兰西学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就任仪式上的演讲》（« Discours prononcé pour la réception de Claude Lévi-Strauss à l'Académie française »），巴黎：法兰西学院，1974年。

2 《自画像》，第18页。

他们对瓦格纳的热情丝毫不输给奥芬巴赫。忽略一些“不忠”的行为，克洛德热爱音乐，几乎一生都与之相伴。“在我接受教育、对神话产生兴趣的过程中，瓦格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我在童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几十年内我与瓦格纳相知相伴。”¹很快，他的心里诞生了取得成就的欲望，年轻的男孩梦想成为作曲家。他模仿乐团指挥灵活又霸气的动作，他还向歌剧院一位中提琴手学习小提琴。他特别喜爱歌剧，因为歌剧包容了所有艺术。歌剧是整体艺术（art total）的范本，在这个热血奔涌、跃跃欲试的孩子自由的想象里，瓦格纳是坚定主张整体艺术，是一位代表人物。

其实，音乐和绘画在他青少年阶段的生活中并不是唯一选择，他接触了众多事物：他写剧本、创作歌剧剧本的初稿、拍摄照片。年轻的摄影师发现这种新媒体能够记录往日浮影，他拍摄的一张照片恰能说明他的艺术倾向：照片里呈现了一个舞台场景，而纸糊的面具、圆顶硬礼帽和灯架让人联想到一种后象征派风格的死神舞。²

“珍奇古玩”³

童年之后，所有学习和艺术活动都让这个想在各个领域跃跃欲试的男孩可以大展拳脚：写作、作曲、绘画、摄影以及重返他视野的戏剧。“一位同学的父母住在谢弗别墅（Villa Scheffer）。这座房子的几间接客室被我们当作一个小剧院。我们在那里演了几出剧，父母们以及朋友们是我们的观众。[……]我们演了拉比什（Labiche）、库特林（Courteline）、缪塞（Musset）的剧目。

1 《亦近，亦远》，第242—243页。

2 照片被收藏于“童年”这一主题档案之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0。

3 罗杰·凯卢瓦：《法兰西学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就任仪式上的演讲》，巴黎：法兰西学院，1974年。

我们胆子很大，还排练了维克多·雨果的《他们会吃饭吗？》（*Mangeront-ils ?*），但那时候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我的伙伴让·贝尔纳（Jean Bernard）是我们成员的一分子，他还记得这些细节。丧事结束了我们的排练。我们也完全不再碰喜剧。”¹

传统资产阶级教育便围绕这些活动展开，而使他的童年与传统资产阶级教育不同的应当是他的热情、他广泛的兴趣和密集的活动。兴趣引导着他这个狂热分子，让他既严肃以待又热情满怀。他也对珍奇物品、“异域古玩”着迷：“我与它们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我从十分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收藏这些玩意。我收到的第一件是父亲给我的，这也是我后来一直保存着的一件收藏品：一幅日本木版画。我记得将它放入了一个盒子里，拿它装饰盒子底。在我七、八和九岁的时候，每次得到奖赏，我便到小场路（*rue des Petits-Champs*）上一家名为‘宝塔’（*la Pagode*）的商店里去，置办一些家具模型，日式的或者其他风格的，用它们在盒子里建一幢日式房子。我从未放弃过这个收藏的习惯。”²他有收藏的爱好，有对物的追求，体会捡拾的乐趣——海滩上的鹅卵石、散步路上的小石子、一枚旧钱币：“偶然”在他对世界的探索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世界各个角落等着他。

首都巴黎见证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生的起步阶段。它像是一个珠宝匣，恰好能够满足这个聪敏又好奇的孩子。年幼的他走遍了巴黎每寸土地。他与好友皮埃尔·德雷福斯一起在河边读书或者四处奔走，徒步或者借助公共汽车穿越这座城市。这就好像用长镜头的方式把他看见的事物装入一只万花筒：“高中时期，因为那时的公共汽车车尾都有一个露天的平台，我喜欢在墙角，先是右前方的墙角，然后是左前方的墙角，我观察马路的一侧以及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见证与回忆》（« *Témoignages et souvenirs* »），载《皮埃尔·德雷福斯：1904—1994》，第85页。

2 《列维-斯特劳斯的33个关键词》，第27页。

它反射在玻璃窗上的样子。当公共汽车靠近斑马线的时候，一条正常的马路变成了小巷，它的两侧似乎要撞到一起，让人害怕。当两侧再次分开，虽然马路仍是同一条马路，但它似乎变成了一条林荫大道，宽阔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像这样，我展开对城市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编织想象，将它变成真实的事物。”¹与此同时，在1920年代初，另一个少年，一个敏感的灵魂，他用尽自己所有的能量——他的敏感和智慧——探索这座城市的美丽风景，同时进行着与克洛德一样的视觉实验。年轻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到柏林避难，雨水在柏油马路上留下的变幻的彩虹颜色让他欣喜不已，他与列维 - 斯特劳斯特都产生了对城市文化的喜爱之情。正是城市文化赋予了城市独一无二的美景，让城市成为一座可以探险的宝库、一个需要揭开的谜团，而城市文化带给我们的这些幻象，它们在掩盖现实的同时也最能深刻地反映现实。²

经历的增长让他把眼睛扫向其他领域。自然的鬼斧神工让少年迫不及待地想要展开“探险”，能进行这样的探险是今天的孩子们羡慕不已的。他并不需要去往很远的地方，郊区与城里并不相同，巴黎近郊已经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我与两个同学决定一同做伴。利用几天的假期，我们决定顺着塞纳河从鲁昂流向阿弗尔的方向前行，身上背着用作帐篷的沉重的遮雨布。我们转的第一个弯几乎把我们带回了起点，这是我们第一次醒悟。我们感到气馁，所以放弃了探险。我们还进行了其他旅行，但都选择以脚踏车的方式出行，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卢瓦尔城堡、比利时阿登山地（les Ardennes belges）、卢森堡、从诺曼底海岸经过布赖

1 《〈快报〉带你走近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L'Express va plus loin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快报》1971年3月，第139—140页。

2 参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落日详情》（《Détails d'un coucher de soleil》，1924），载《短篇小说全集》（Nouvelles complètes），“四开本丛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0年，第175—182页。

地区（pays de Bray）到弗约穆兰（Vieux-Moulin）（接近贡比涅）。”¹ 初次体验风景、考察地理（绕弯的教训）之后，他进行了更多的体验和考察，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幸的遭遇。而这些遭遇也暴露了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在这些大胆的探险中“懒惰”的一面。“差不多 14 岁的时候，我发现了科尔梅耶－昂帕里西斯（Cormeille-en-Parisis）的采石场。我掉进一个石膏水洞中，人们发现我的时候，脖子以下已经动弹不得了。”²

没有财产的继承人

我们可以夸张地将这段美好童年描述成伊甸园。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从未掩饰那些物质生活中遭遇的困难以及经济危机，这些问题使普森路上空常常阴云密布。

家道中落但学业出众

1918 年之后，一切似乎与往常一样，然而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还住在同一幢楼、同一套公寓房里，只不过门房那里安上了一部电话（飞一般地跑下五楼，接完电话后回到家中，一副若有所思或者兴高采烈的神情：这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³ 这个现代科技带来的装备闯入了旧世界，是时代交替的象征。而另一个象征则更加沉重：一战后通货膨胀严重。战争遗留的公共债务造成了货币的“堆积”，使在整个欧洲，尤其在法国（但法国比德国情况好一些），一战前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地位被完全颠覆。富人们一夜间变得清清白白，而年轻人一夜暴富。正如斯蒂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见证与回忆》，载《皮埃尔·德雷福斯：1904—1994》，第 84 页。

2 《失败者？我们都是》（« Des ratés ? Nous le sommes tous plus ou moins »），《巴黎日报》（Le Quotidien de Paris）1984 年 5 月 6 日。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丁·佩尔蒂耶（Martin Peltier）的访谈。

3 参见德尼·贝多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 15 页。

芬·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¹里描述的那样，稳定的世界被一朝吞没，不变的社会现实和19世纪漫长的历史也随之而去。而“贬值”也同样发生在审美层面。“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来临，在现代潮流下，雷蒙·列维 - 斯特劳斯的艺术品位过时，他的作品也被贬为旧东西。

对这一家人而言，家庭境遇的恶化才发生不久，物质生活却已经发生了问题。雷蒙·列维 - 斯特劳斯坚持自己的职业道路，放弃了证券交易所的工作。这几乎等同于一场政变，足以在家族史上留下一笔记录。这一决定也使他的经济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18年之后的变化加深了他们在经济层面对他人的依赖，而这种依赖由来已久：列维 - 斯特劳斯夫妇依靠伊萨克的著作权获得收入，他们也同时获得雷蒙一位富有的兄弟——担任证券交易经纪人的让伯伯（oncle Jean）——的资助。直到自己在1929年的危机中破产之前，让为家里人提供经济上的帮助。²一战后，雷蒙肖像画的订单大量减少，几乎消失为零。所以，克洛德的童年环境是复杂的：给予他的文化背景属于资产阶级，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家庭会计划去巴黎之外的地方度假），而过去惬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空剩下对它们的幻想；月末的经济问题成为需要常常经历的生死之关。就是因为列维 - 斯特劳斯一家人经济状况糟糕，我们才更要计较他们的收入。能否付得起租金，这种底层百姓常常遇到的焦虑情绪也笼罩在这个十六区的孩子心头。是否有“家政工”是界定社会地位的另一种方式。普森路从未有过家政工。克洛德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总把她描述成“一位忙于家务的女性，在很长的时间里，她用勇气和无私忘我的精神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³，原因就在于此。1920年代初，

1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Le Monde d'hier. Souvenirs d'un Européen*），巴黎：贝尔丰出版社（Belfond），1982年。

2 2011年1月14日，与莫尼克·列维 - 斯特劳斯（Monique Lévi-Strauss）的访谈。

3 《自画像》，第18页。

在买下塞文山脉（les Cévennes）的一家养蚕场之前，克洛德一家人在让伯伯的资助下与比利时的朋友们以及卡昂（Cahen）一家人一同度假，持续了很多年。而度假的别墅是由比利时的朋友们和卡昂一家人租下的。相应地，爱玛·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三餐和照料家事。¹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它的剧情十分典型：客观条件（负责安排三餐）与资产阶级主观意识（做东）格格不入，形成了一种源于历史环境、价值观和友情的紧张关系。

父亲事业上的失败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因为这是他选择的结果。德尼·贝多莱（Denis Bertholet）说雷蒙是一个“伊萨克·斯特劳斯的反抗者、没落的代表”²，他的说法却也中肯。我们注意到，家族里另一位艺术家——小提琴家和乐团指挥——罗贝尔·阿尔芬-斯特劳斯（Robert Alphen-Strauss）（即亨利埃特·尼赞的父亲）从战场归来，他的几根手指被手榴弹夺走，因此，无法继续他的音乐生涯。他接着从商，这是他的老本行。他中规中矩地经营业务，直至退休。他的姓氏给了他一段艺术人生，而战争结束了这段艺术人生。

诞生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孩子是否容易出类拔萃、更能发现新一代的才能？想要摆脱父亲颓废印象的欲望能否让他全身心投入并取得不俗的成果？事实上，我们在20世纪两大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同学，一人与他没有什么交集，另一人则与他有更多交往。其中一人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列维-斯特劳斯自己也表示“两人之间存在很多相同经历：凡尔赛、欧希高中（lycée Hoche）、孔多塞高中（Condorcet）以及‘那些家庭不幸’”³。他们的家

1 2011年2月25日，与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

2 德尼·贝多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16页。

3 1983年9月11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雷蒙·阿隆写的信，现属于阿隆文献资料库的一部分。特此感谢多米尼克·施纳佩尔（Dominique Schnapper）同意我参阅这份文献。

族之间没有交情，但他们都是被同化的犹太人，非常爱国，此外他们经济都相对宽裕。在这两个家庭里，父亲们都不愿意从商，他们分别选择了一条知识分子的道路（阿隆的父亲成了法学家，在大学任职）、一条艺术家的道路（雷蒙·列维－斯特劳斯特）：这是犹太人传统价值观的反映。在两个家庭中，这个选择都以失败告终。阿隆的儿子立誓恢复往日的社会地位，一雪父亲的耻辱，他写道：“我要用我的成功来抵消他带来的失意。”¹1929年，家族财产在证券交易所一朝散尽，在凡尔赛以磨石粗砂岩（*pierre meulière*）建造的房子也卖了出去。这种背景下，儿子才被允许进入工薪阶层的就业市场，因为积淀下来的家族财产已经不复存在，儿子要学会依靠自己生存下去。阿隆童年是惬意的，他并不那么看重钱财；列维－斯特劳斯特因情势所迫，从未漠视钱财。波伏瓦家族的社会变迁发生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1914—1918年的战火以及1929年的危机使他们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经济状况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尽管失势给父亲带来的心理冲击和痛苦情绪在孩子们——两个女孩——的陪伴下日渐消散。“他喜欢有思想的女子，但他不能接受女才子。当他对女儿们说，‘我的女儿啊，你们不要嫁人，你们要工作’，他的声音里透露着无奈。我原以为他是同情我们，然而并不是；后来我们成为劳动力，他也发觉了自己心里的失落。他抱怨命运不公，女儿们也要面对这样的落魄现实。”²最后，不管家庭状况如何（不管经济状况和社会背景如何），社会正义在三段励志故事中都得到了实现：在一代人手上（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中是两代人）蒸发的财富转变为精神财富（其中有一部分来自家庭传承），而精神财富主要表现为学业上的成绩。

1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Mémoires. Cinquante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巴黎：口袋书出版社（Presses Pocket），1990年（初版时间为1983年），第16页。

2 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平静的少女时代》（*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Folio文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1年（初版时间为1958年），第231—232页。

事实上，在列维－斯特劳斯家里，分数不能拿来开玩笑：“为了我的成绩，一种悲剧气氛蔓延在家里，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¹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犹太人家庭对学业的重视（这是犹太人迁徙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列维－斯特劳斯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经济上的窘迫也使他们在精英教育上特别投入。²这些没有财产的下一代——或者说“虽然没有继承财产但至少继承了血脉”³的下一代——非常轻松地成了好学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花费太多力气便成了一名好学生，但他并不喜欢这所1920年代传统高中里军事化的氛围。它恢复了犹太初中的传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回想起凡尔赛的霍希高中时，雷蒙·阿隆这样说：“风格上保留了拿破仑时代的痕迹。放学时，学生们有序地向操场走去。课堂上，学生们必须几个小时连续听讲并且一动不动。我记得一位德国老师在某一天给了全班所有同学好分数，因为在他走进教室的一刻我们所有人表现得无可挑剔——双臂交叉放在桌面上。”⁴詹森·德萨伊高中的氛围也是一模一样的。1918年，列维－斯特劳斯进入詹森·德萨伊高中读六年级，他在这所学校一直待到1925年。他通过高考后才离开这所学校，当时16岁半。他的好奇心翻越了学校围墙：他总是对校园之外的事物兴致勃勃，直到哲学课激起了他对哲学这门学科浓浓的兴趣。他学习优秀，而学习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所以这也成为他重新取得社会地位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还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其他更能发挥他们父子才华、符合他们兴趣或者能够调动他们灵活的双手的方式。修修补补的手工活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特殊的礼遇，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这样的家庭手工活更具诱惑力，它一直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1 《自画像》，第18页。

2 维克多·卡拉第：《犹太裔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一个问题的简单阐述》，第167页。

3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18页。

4 同上书，第38页。

家庭手工活：一种世界观

他认为，手工活也是一种社会经验。1988年，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Éribon）访问了80岁的老人，询问他的童年是否与其他巴黎资本主义家庭的孩子相同。列维－斯特劳斯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回答：精神生活非常丰富，但经济危机令人焦虑。而手工活恰好成为疏导家人焦虑的发泄点和阀门，手工活的加入也使他的童年不能被简单地归类到传统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去。“我记得，没有订单的时候，焦虑的情绪会时不时地冒上心头。之后，父亲创办了各种各样的家庭职业，因为他很擅长这样的手工活。有时，我们在家里做起了染布的活。我们在亚麻油毡的布料裁片上刻下图案，然后在绒面上撒满不同颜色的金属粉末，并用胶水将它们固定起来。[……]有时，父亲用人造漆制造中国式样的小桌子。他也用便宜的日本木版画来制作灯具，将木版画贴在玻璃之上。这些东西能够宽解月末的紧张情绪。”¹

虽然手工活是一种生存策略，而克洛德则从中发现了创造的乐趣：他制作了自己的模型，如果手工活与布料有关，他就扮演大裁缝，他还帮助父亲给桌子上漆。整个屋子里都塞满了这些奇特的潮流玩意，而我们期望能用它们换得一些现款。这便是他童年的生活环境：因生活所需（而非因为兴趣），原本属于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多了一丝不拘。

做手工活以及手工活中完成的小玩意儿很早就进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生活。它们就像是一个图腾，陪伴了列维－斯特劳斯一生，也与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最后成为一个指代当代思想诸多领域的隐喻。但我们先别想入非非。不如回到人造漆和绒布中来，谈论手工活的有趣之处和制作手段，或者聊聊材料、质地、工具、技术这些专业知识。年轻的克洛德在家里学会了手

¹ 《亦近，亦远》，第12页。

工活，他一方面感到高兴（他可以用零散的材料制作新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被不安的情绪所扰（生活拮据）。对他而言，这种混合的情绪可能正为思想提供了存在的空间：“父亲很擅长手工活，我也是。[……]喜欢做手工活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与安格尔（Ingres）的小提琴或者其他事物不一样，通过手工制作，我意识到，我可以碰触到创造活动中最根本的东西。做手工意味着着手解决一个问题，意味着活用这些偶然的、与问题无关的元素。然后，我试图进行思考：我怎样才能用这些从他处获得的元素来解决摆在我面前的具体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在人类的思考机制中是至关重要的。”¹

克洛德的现代爱好

伴随着高中生活和家庭生活，男孩一边为明日担忧，一边体验创造的奇妙之处，这样慢慢长大。1920年代，当他结束学业的时候，全球的先锋派艺术家集结于法国首都，他们带来了现代艺术的热浪，令克洛德着迷。1923年6月，他正值15岁。去欢乐剧院（théâtre de la Gaité）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婚礼》（*Les Noces*）的首演后，他被深深震撼，第二天又去听了一次。据他回忆，这个晚上颠覆了他对音乐的所有信仰。²他还看了德彪西（Debussy）的代表性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这是另一出新鲜的音乐表演。这部1902年的歌剧是一种新的内心戏剧，有着谜一般的散文体，而乐团的运用相当简单。“当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互相坦承爱恋之情[……]完全没有伴奏，乐团用一连串轻快的逐步升高的属七和弦来营造一种附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法国思想界的又一位伟人》（« Claude Lévi-Strauss, le dernier géant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费加罗报》（*Le Figaro*）1993年7月26日，第9页。

2 《忧郁的热带》，第404页：“我是在瓦格纳的音乐文化中长大的，直到近期才发现德彪西的存在，时间上甚至晚于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第二次或第三次演出中，我的耳朵发现，斯特拉文斯基向我展示了一个比巴西中部草原更真实、更确定的世界，我以前的音乐观被彻底颠覆。”

和观众的情绪，从德彪西神奇的管弦乐法来看，这项学校教授的技术就像是艺术创作的黎明。”¹童年，他将瓦格纳当作偶像，当少年迈入成熟时期时，德彪西和斯特拉文斯基是他的追逐目标，他像“崇拜神一样崇拜他们”²。列维-斯特劳斯特记得他曾受热血驱使，“为一位同学布置房间，而那些装饰物完全受到了斯特拉文斯基《婚礼》一曲的启发”³。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但他也用家庭留声机听黑人音乐。1931年，他读了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男高音歌手克洛德·麦凯（Claude McKay）出版的一本书，提到“黑人的声音”，称“这些灵魂乐者最早发行的唱片在十年前为我们带来了启发”⁴。至于绘画方面，他每周都去看毕加索的画：“我16岁或者17岁的时候，毕加索就是我的神，我像喜爱斯特拉文斯基一样喜爱他。每个礼拜我都要去大型画廊为他的画捧场。当我在玻璃窗看到毕加索的新作品时，我就像受到了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启发。”⁵就在那个时代，艺术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Louis Vauxcelles）——父亲的好友——受邀撰写了有关立体派的文章。这是讨论立体派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立体主义的影响力渗透到日常生活”，人们都忽略了资助者们是多么喜爱它。

年轻人坦言对这些事物非常喜爱，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宗教隐喻。这个隐喻自发、直接地传递着美学情感的力量：被高中制服裹挟、表情严肃的少年渴望颠覆，也渴望放肆地展现智慧与表达情感。从这个角度而言，他赶上了时代：瓦尔特·本

1 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余下只有噪音：20世纪音乐的现代性》（*The Rest is Noise. À l'écoute du XXe siècle. La Modernité en musique*），阿尔勒：南方文献出版社（Actes Sud），2010年（初版时间为2007年），第76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遥远的目光”》：这是迪迪埃·埃里蓬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接受了让-约瑟·马尔尚（Jean-José Marchand）的访问，法国广播电视台局，1972年。文字稿参见艾米丽·朱莉亚，《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第175页。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评克洛德·麦凯〈班卓琴〉》，《社会主义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第2期，1931年11月，第14—15页。

5 同上书，第29页。

雅明所指的“新艺术”是现代文化的“地震仪”，它追求感官刺激，告别了脉脉温情。¹然而，让儿子激动不已的当代艺术风潮也让父亲濒于破产。在1920年代，1914年之前兴起的先锋派运动被人们接受，父亲的绘画生涯随之完全落幕。从战场归来的父亲去一些画廊转了一圈，他感到慌张和空虚。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热衷于此），这些人和事物已经超出了雷蒙的想象。所以，虽然年纪不大（他才40岁），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艺术职业宣告死亡了。

儿子把艺术和书本奉上神坛，所以他与父亲的分歧年复一年地扩大。他远离了父亲的圈子，但反抗得并不激烈。²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为探索世界而奉献了自己，尽管这个满目疮痍、早已四分五裂的世界早让列维-斯特劳斯这一代人伤痕累累。

1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L'Œuvre d'art à l'heure de sa reproductibilité technique*），由弗雷德里克·约利（Frédéric Joly）翻译，由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作序，“袖珍丛书”，巴黎：帕约出版社（Payot），2013年（初版时间为1935年）。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让-约瑟·马尔尚的访问，法国广播电视局，1972年。文稿参见艾米丽·朱莉亚，《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173页：“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生长在一个所谓的艺术世家，但这个艺术世家的氛围与我接触到的新鲜事物相比，简直过于保守。青少年时期，我探索外面的世界，以此作为反抗。虽然我从未采取过激烈的反抗，但发现新鲜事物是我排斥艺术世家传统的方式。”

3 革命（1924—1931）：政治与哲学的对决

革命者热切地倚靠船头，突然，他在每条河流的弯道处发现了全新的视角，而每一个独特的视角又与上一个视角完全不同。他的发现以新鲜事物的姿态完整地呈现在他的眼前，新鲜、完整得就像是神秘的事物或者教条。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主义大学生》（1930）¹

之前，他只痴迷于美的享受，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政治意识在他身上觉醒。经历了“不落俗套”的幼年，列维-斯特劳斯与同龄人一样进入反叛的青年时期，而他与他的同龄人是躲过1914年血腥杀戮的一代，是经历过耻辱与动乱的一代。

1924—1931年，他仍是一名学生。但他怀抱着政治活动分子的热忱，与他身边的保守主义者分道扬镳。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类学家以社会主义运动者的身份向聚集在巴黎小餐馆的学生们发表演讲……尽管他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也记录在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总是刻意低调，他索性隐藏这个身份或者干脆隐瞒得密不透风。他活跃在社会运动与知识探索两个领域，前者被认为是一种“年轻人犯的过错”。然而，种种迹象显示，革命给他带来了许多启示。

一份文件总结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一张白纸的正面留下了年轻的哲学系学生的笔记，而我们从反面观察到白纸的抬头写着法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列维-斯特劳斯曾担任过众议员乔治·莫奈（Georges Monnet）的助手²。17—23岁，他的

1 《社会主义大学生》第2期，1930年11月，第14页。

2 “上学时期，哲学课笔记”（Notes de philosophie, années de formatio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1。

生活似乎被哲学系的课程和政治活动一分为二：哲学系的课程密集又不够深入，而哲学系的书生气与政治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像政治活动的气氛与大学恰好相反。一方面，政治和哲学交积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学生涯，它们督促列维－斯特劳斯进行阅读；另一方面，两者的区别也十分明显：政治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而哲学课让人从情绪中冷却下来。如何让两者和解？思考政治。年轻的他取得了高中哲学教师资格，他受到了马克思和康德的熏陶，回想这些伟人走过的路……我们有理由这样幻想：多年之后，他说不定能成为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执政下教育部部长的办公室主任，当然，他也可以担任其他职位。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他却成了社会主义左翼思想家。

“皈依”左翼、接触哲学

1924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进入哲学班，这是高中的最后一年。而哲学班是为文学方向的学生准备的，好让他们之中最优秀的学生可以在高考之后进入预科班。根据雷蒙·阿隆的回忆，哲学班里批评氛围浓厚，不论老师的政治倾向如何，“通常都有左派氛围”，据他所说，哲学班会“让人皈依左派”¹。而这个词语之所以适用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原因是它常常被人使用，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它表达的是宗教意义上的皈依。

马克思、比利时、哲学班（1924—1925）

列维－斯特劳斯经常谈到他与阿瑟·沃特斯（Arthur Wauters, 1890—1960）的相遇。阿瑟·沃特斯是卡昂家的朋友，卡昂一家人是比利时人，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常常与卡昂一家

¹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27页。

人共度夏休。在 1924—1925 年的夏天，面对一些事件时，列维 - 斯特劳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列维 - 斯特劳斯与昨日的生活诀别，态度的变化突然、快速又完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阿瑟·沃特斯是政治运动人士，他比列维 - 斯特劳斯年长一些。他成为克洛德的“兄长”，将比利时正在流行的社会主义风潮介绍给克洛德。他们相识时，阿瑟·沃特斯已经是比利时工人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他成为比利时自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实现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是哥哥约瑟夫·沃特斯（Joseph Wauters）——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的部长办公室主任；他也在 1929—1937 年担任了《人民报》这份社会主义报纸的政治部主任，而在这个阶段，他自己成了以保罗·范泽兰（Paul van Zeeland）为首的社会党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部长。1940 年，尽管他仍在职，但他并不了解社会民主派其他代表人物的作为，这是因为他加入了伦敦的流亡政府，他的政治生涯最终以比利时驻莫斯科大使的职位结束。我们可以轻松地想象出这个场景：在慵懒的夏日，一段激情洋溢的对话在两人之间展开，一位是活力充沛、急于理解这个世界的男孩，另一位则是“崇拜理论家”的年轻人；而在年轻人面前的听众与他的水平相符。“我 16 岁或者 17 岁，我记得这是我就读哲学班的那年 [……]。我请这位政治运动人士向我解释他从事的活动 [……]，他立马就投入了对我的教育之中，向我进行了无数次授课，他特别要求我读一读马克思、饶勒斯（Jaurès）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作品。”¹很快，意识形态的教育在实践教育的加持下加速展开：他“请我以比利时工人党（POB）受邀人的身份来到比利时，在两个礼拜内，一位十分年长的活动分子领着我在‘人民之家合作社’（Maison du peuple en

¹ 《自画像》，第 18—19 页。

coopératives) 观摩学习”¹。在别处，列维－斯特劳称自己成了“比利时工人党收养的孤儿”²。而这个称呼更加深了克洛德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模型的联系：在这里，无数经济和工会组织加入了工人党，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

事实上，融入一个新的家庭后他才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他自己的家庭几乎远离政治。他回忆道，他家是“一个优秀的、曾经辉煌过的资产阶级家庭，它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可能唯一的例外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上做出的反应。他们说，他们去参加过一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的示威活动，饶勒斯还在活动中发表演说。他们在演说结束时向饶勒斯走去，向他表示感谢，而饶勒斯给了他们一个暧昧不清的回应：‘我希望，他说，你们会记得。’他想说的是，‘你们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你们也会很快离我们而去。’这便是真相”³。一改父辈被动的态度和正统主义的主张，克洛德充满热情。这种热情与知识分子的求知欲结合之后产生了更大的能量。

1924年10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进入了这个特别设置的哲学班：这个哲学班被认为是高中学业的加冕仪式，能赋予学生批评精神，而学生家长以及共和国的教学理念都认为批评精神是极有必要的。作为法国教育的特色，在高中阶段教授哲学既满足了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也满足了现实的强烈需求。它既是荣耀，也是启示，还包括与老师惺惺相惜的情感……尽管他们的哲学班的授课老师并没有特别的才能，吸引着年轻阿隆的是，“思考”这项工作（甚至是苦工）带来的广袤的空间。这就是说，要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找到问题的答案。让人意外的是，列维－斯特劳完全不是这样。从学业上看，尽

1 1983年11月8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给斯特劳·克鲁埃写信。原文参见斯特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39页。

2 《亦近，亦远》，第16页。

3 同上书，第17页。

管他名列荣誉榜，他的成绩不错却也不是万里挑一：“进步明显、思想严谨、方向正确。”¹ 他的哲学老师古斯塔夫·罗德里格（Gustave Rodrigues）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运动分子（以及后来的人权联盟的主席），具有哲学与政治双重性格，让人憧憬。学生列维 - 斯特劳斯在 30 年后对他的描述却十分残酷：“在哲学方面，他信仰柏格森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这让我非常失望。他追求呆板的教条，他的热情表现为课堂上活泼的动作。我从未见过谁拥有这般单纯的信仰与贫瘠的思想。”他又突然补充道：“他在 1940 年德国进攻巴黎时自杀了。”² 我们看到了一位陷入绝望深渊的列维 - 斯特劳斯，此时，轻蔑的语气完全消失不见。

如果政治与哲学从此以后密不可分，那是因为，哲学老师向他传授了并不成熟的柏格森式社会主义，而后者正是受到政治活动与理论文章的指引而产生的。因为在向社会主义靠拢的过程中，列维 - 斯特劳斯阅读了很多理论文章，它们让他回归哲学思考。在他所有访谈中，他都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影响，但他指出他也读了“很多其他”哲学家的书。当阿瑟·沃特斯遇到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的时候，他刚刚发表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进化史》（1924）。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列维 - 斯特劳斯学习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的作品与这些作品的评论文或者马克思理论的修订本相比，是否充当了更加重要的媒介角色。与法国的社会主义相比，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更多地受到了后者的熏陶，也不那么呆板。总之，我们认为列维 - 斯特劳斯读马克思而不是读柏格森。读马克思的时候，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整个哲学传统。就像马克思与这么伟大的作品同时出现，而这些伟大作品有它们自己的内容，也保留了它们之前的所有传统的痕迹：“阅读马克思之

1 “童年”：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0。

2 《忧郁的热带》，第 38—39 页。

后，我被带去了更远的地方，尤其当我把马克思当作敲门砖之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整个世界向我敞开。”¹

预备班学生、非师范生（1925—1926）

1925 年秋天，马克思 - 康德主义的追随者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进入了孔多塞高级中学的文科预备班。作为一所塞纳河右岸规模较大的高中，孔多塞高级中学挑战了路易大帝高级中学（Louis-le-Grand）和亨利四世高级中学（Henri-IV）师范生“制造机”的地位。巴黎左岸的预备班已经有了一年级和二年级之分，而在孔多塞高中只有一个班级，里面既有预备班一年级（hypokhâgne），也有预备班二年级（khâgne）的学生。二年级学生让人印象深刻。阿隆承认刚进入这个班级时有着“来巴黎求学的外省人的腼腆和野心”²。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也曾是预备班二年级学生，他认为预备班二年级“为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成长的环境，尤其提供了哲学的氛围”³。身处这个为了乌尔姆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一个超级精英主义的入学考试——而创造的学习环境中，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感受如何呢？

沉着、严肃、幽默以及不寻常的才华让他预备班的同窗对他印象深刻，其中包括让·莫格（Jean Maugué）。后来与列维 - 斯特劳斯在巴西重逢的让·莫格称，“他瘦长的身影好像是从埃及浅浮雕里走出来的，让我们觉得非常无趣，但他严肃、睿智的面容之下有时也会突然展露出孩童般的微笑。他常常在黑板上用粉笔画图，这为他在预备班树立了威望，而在他的画中，我们看到了德国电影里的奇怪城市，譬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1 《忧郁的热带》，第 46 页。

2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 34 页。

3 皮埃尔·布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巴黎：行动理由出版社（Raisons d’agir），2004 年，第 17 页。

(*Le Cabinet du Docteur Caligari*) 里的城市”¹。斯特芳·克鲁埃(Stéphane Clouet)找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成绩单，上面记载了克洛德漂亮的成绩以及一些不影响大局的小瑕疵。²老师安德雷·克勒松(André Cresson)对他哲学科目的评语是“敏锐的眼光”，而特拉弗斯(M. Travers)说他的英语成绩“不断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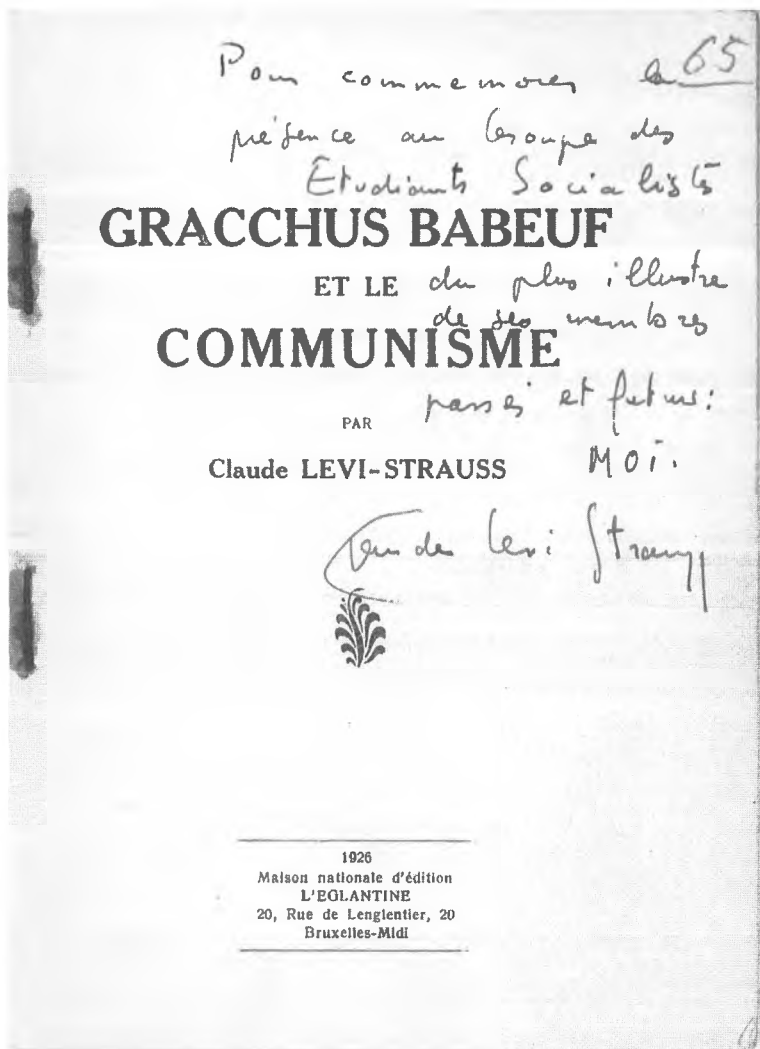
“尽管他的成绩优秀，我们也发现法语老师帕里戈(M. Parigot)和拉丁语老师佩圣(M. Pécher)的评语分别为‘不够努力’‘还需要努力以及有点粗心’。”历史老师卡昂(M. Cahen)的评语让人眼前一亮，他似乎用神修导师的洞察力发现了少年列维－斯特劳斯的才气：“才华逐渐展露；懂很多；机灵又聪慧。但这些品质常常被几乎接近宗教信徒的严肃态度、坚定且不容置喙的主张所掩盖。而有时他的思想细节不足、缺乏重点，所以趋于平庸。”这位历史教师对克洛德——未来《忧郁的热带》的作者——的严厉评价是针对列维－斯特劳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篇关于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论文在1926年由爱格朗出版社(L'Églantine)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爱格朗出版社是一家由他新结交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创办的比利时出版社。文章围绕共产主义历史中先锋人物和英雄事件的主题，研究了巴贝夫丰富的作品：“无疑，标志着社会主义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巴贝夫的作品。”³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写道。巴贝夫曾经保守地追随罗伯斯庇尔主义之后，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则充满热情地研究巴贝夫，他指出土地法和完整的共产主义(communisme intégral)只是追捧教条，是不符合现实的乌托邦幻想。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已经把心思放在政治活动上，

1 让·莫格：《牙齿不适》，巴黎：布歇－夏斯特尔出版社(Buchet-Chastel)，1982年，第81页。

2 关于这一段中的内容，请参见斯特芳·克鲁埃的博士论文：《“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38—39页。

3 特此感谢莫里斯·厄伦德(Maurice Olender)替我买了《格拉古·巴贝夫与共产主义》(«Gracchus Babeuf et le communisme»)，《玫瑰花》(L'Églantine)第6期，1926年，第23页。

他所受的教育也很少能让他感到快乐，但他作为预备班二年级学生，从整体上来说，表现优异。



这是书的封面，出版社是爱格朗提出版社。

封面上，列维-斯特劳斯用当时预备班学生中流行的讽刺语气给莫里斯·戴克松（Maurice Deixonne）题词。（莫里斯·戴克松是社会主义学生组织的一位好友）

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参加入学考试这条康庄大道呢？他甚至未曾尝试过一次。他放弃考试的决定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克洛德父亲的经济状况理应督促他考入师范学校：师范生能获得公务员的薪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师范生并非来自法国的大资产阶级¹。在这些校园里的精英分子中，也有部分人是在物质条件的激励下而成为师范生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称自己的数学成绩糟糕（他说自己完全不懂数学），也不擅长古希腊语。他似乎对预备班这个法国特色并不感冒，也拒绝以哲学为尊。他涉猎甚广，并且几乎远离了书本知识，这使他并不认同准师范生的世界观。他的哲学老师意识到这一点，他给克洛德提了建议：“他跟我说时我刚决定放弃预备班一年级的学习：‘你不是为哲学而生的，你应该为别的事物而活。’他建议我读法律。事实上，我是为民族学而生的，但他已经很有眼光了。”²如果用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话来解释³，这个决定意味着“变节”（defection）：我们放弃并离开，我们不再回去了。当然，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因素也是造成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突然感到受骗的情绪与“能力不足”⁴的情绪混合在一起；贬低自己（表面上的骄傲并不能排除它的发生）；拒绝参与这场游戏；面对竞赛感到不适。如果竞赛激励了年轻的阿隆，它也可能让列维 - 斯特劳斯特望而却步。这个背叛的决定对他而言

1 让 - 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一代知识分子：和平年代的文科预备班学生和师范生》（*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克里斯蒂安·保德罗（Christian Baudelot）和弗雷德里克·马通蒂（Frédérique Matonti）：《师范生的社会求职之路（1914—1992）》（« Le recrutement social des normaliens, 1914-1992 »），载让 - 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编：《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建校百年》（*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Le Livre du centenair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

2 《亦近，亦远》，第18页。

3 阿尔伯特·奥图·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退出、呼吁与忠诚》（*Défection et prise de parole*），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5年（初版时间为1970年）。作者认为“退出”是一家企业或一个组织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之一，他还将这个方案上升到理论高度。由他建立的这套理论还被应用到其他诸多领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工具。

4 《亦近，亦远》，第19页。当被问及与尼赞的关系，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这样回答：“我感觉，不论与他还是与其他人，我都没有建立真正密切的关系。”

并不陌生，一生中，他还有过同样的经历。背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种逃避困难、逃避选择的方式。

然而，这个决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年轻的克洛德下个学年注册成为巴黎大学的学生，他选择哲学与法律双修。此时的他也有时间参与不被预备班允许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失去了拥有师范生薪水的机会，所以不得不打一些零工。打工增长了他的社会经验，也帮助他缓解了经济困境造成的、一直伴随他的焦虑情绪。列维－斯特劳斯远离了乌尔姆路，也远离了法国知识界的“神童们”——萨特、阿隆、尼赞、梅洛－庞蒂等。在他们那一代，师范学校的经历是人生的必修课。属于他们后辈的皮埃尔·布迪厄临近人生尾声之时，回忆了在师范学校就读的那些年。他模糊地描述了法国的教学模式为法国知识界带来的成就与造成的问题：以隐修模式进行学术“禁闭”（乌尔姆路上的“隐修院”）、无条件地相信知识的力量、认为它绝对权威、推崇团队精神、完全忽略社交活动（而这种忽略容易造成思想上轻率的激进主义）。这些都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完全沾不上边。他与师范生之间的不同观念便是未来双方发生争吵的原因。其中，他与萨特的争执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萨特非常乐意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投入政治活动，而异常敏感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无法认同。然而，他们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虽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是师范生，但他将获得高中哲学教师资格。此外，他也不是完全隔绝于师范学校之外：他担任了一个社会主义学生组织的秘书，而这个组织里的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师范学校。他成了“隐形的师范生”！

哲学学徒、社会主义活动分子

幽灵学生¹

在《忧郁的热带》中，克洛德毅然发出了与哲学对抗的重要一击，如今我们仍旧记忆犹新：他把修辞学写作分解成命题（*thèse*）、反命题（*antithèse*）、合题（*synthèse*），而分解本身是这本书论证的基础，也是克洛德哲学思考的支柱，他批评把“论证”简化为“文字游戏的艺术”“思辨的戏剧活动”的做法。这场思想的体操表演被认为是虚假、肤浅、刻板、无用、无意义，甚至危险的，因为它篡改了思考的意义：“我立志要在十分钟内完成理应持续一个小时的讲座，我要建立牢固的哲学框架，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速度完成这个任务。”²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嘲笑言语的伎俩，也批评一门学科像“密闭的罐子”一样“干涸”或者以“出汗”的方式“枯竭”，他还记得自己身为哲学系学生的时候感到与之格格不入，他对这门学科感到陌生，因而拘束得喘不过气。这种激烈的抨击是他切身经历造成的结果还是作为人类学“第一公民”的他在1950—1960年代向法国教育的“帝王学科”“桂冠学科”³发起进攻的武器？自然，两者都有。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是不是他口中声称的“幽灵学生”？1926—1930年，他轻松地结束了几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获得了相关的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但他学业上没有瑕疵并不代表他用好学生的外皮、以欺诈的形式来使自己符合大学里获得好成绩的条件，也并不代表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承认他曾经也是一名热血的斯宾诺莎学说的

1 《亦近，亦远》，第19页：“我有点像僵尸一样结束了索邦的学习。”

2 《忧郁的热带》，第39页。这一段的其余内容是根据这一页整理而来。

3 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共和国的哲学家们》（*Les Philosophes de la République*），巴黎：午夜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8年。

追随者，并且“坚持认为哲学是必要和重要的”¹。列维-斯特劳斯在改变口味之前曾经非常投入地研究一个哲学项目，而他的一生都与这项研究维持了暧昧的关系。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学生都认为学院派哲学有些空洞，感到其中缺少了些什么东西。最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总结出一些经验，但各有侧重。阿隆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哲学课就像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思想机器，纯洁得像是害怕政治世界、社交活动的处女。是保罗·尼赞在《看门狗》（*Les Chiens de garde*, 1932）中正式提出控诉。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赞同尼赞对问题的诊断与分析——这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大学哲学教育的批评，但他对这种抨击的狂热情绪不以为然。他知道他不该错过这个表达的机会：“我尊重他集中火力攻击的这些大师。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时间上差了几年。我尊重布伦什维格（Brunschvicg）、拉波特（Laporte）、罗斑（Robin）……”²

那时的索邦有几位学术大家：希腊哲学方面，最出名的是布伦什维格以及阿尔贝·里沃（Albert Rivaud）、让·拉波特（Jean Laporte）、路易·布雷伊耶（Louis Bréhier）、莱昂·罗斑（Léon Robin）；社会学方面，身为涂尔干弟子的保罗·弗高内（Paul Fauconnet）和谢列斯泰·布格雷（Célestin Bouglé）位列其中；科技史则有阿贝尔·雷伊（Abel Rey）。所有这些学者都曾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老师：布伦什维格在1929年秋天开设了一门课讲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里沃教授笛卡尔的《哲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促进思考》（« Le problème ultime des sciences de l'homme consistera un jour à ramener la pensée à la vie »），《文学杂志》第58期，1971年11月，第23页。

2 《亦近，亦远》，第28页。

学原理》，他还介绍了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¹。在大师们的指导下，学生们为了获得逻辑学、心理学（这门学科非常重要，但并不强调经验研究）、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常常教授哲学史，但哲学史不是哲学发展史）的文凭而努力。社会学家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解释称，哲学曾经是也仍然是一门列入“学校课程”²的标志性学科：高中最后一年开设哲学课，中学与大学之间在哲学课程上联系紧密。这也是法国高考中常常涉及哲学问题的原因。然而，高考政策受到了保守主义的影响：1880—1914年，高考几乎没有变动，“它的稳定性使同一种形式的考试不断重复，而人文科学的传播也被迫推迟”³。在当时的哲学界，哲学的研究方向只有三个，列维－斯特劳斯特准确地总结如下：“研究抽象概念的哲学、研究“我”以及内在经验的哲学、企图思考人类经验但最终失败的第三类哲学。”⁴换言之，一种基于唯灵论传统——比如布伦什维格的新康德主义——的形而上学；柏格森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风行一时的柏格森主义（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跨越了几个学术领域，针对这一点，未来，列维－斯特劳斯特将会向他致敬）；由涂尔干的弟子们讲授的涂尔干社会学（但列维－斯特劳斯特认为涂尔干社会学过分受限于宗教教条与范畴本身以至于与现实世界脱节）。所以克洛德对此感到不满。在某个场合，人们寻得了一种方法，它能带人逃离新康德主义稀薄的空气。这指的是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每周在圣安妮病院开设的精神病理学课程。许多哲学系的学生去听这门课，就像是去观察疯狂的行为。尼赞、萨特和阿隆经常去听课。

1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课堂笔记中，他特别标记出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话：“不努力就没有知识！”参见“上学时期，哲学课笔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1。

2 让－路易·法比亚尼：《共和国的哲学家们》，第 15 页。

3 同上。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哲学家的视角》（« Le regard du philosophe »），《文学杂志》1985 年 10 月，第 59 页。

几年之后，列维－斯特劳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尽管克洛德嘴上讽刺着医生故弄玄虚的样子和异常听话的病人，但病人与他们之间的反差仍然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弦：“与野蛮的印第安人的接触也没有像这个上午那样让我觉得害怕，一位穿着羊毛衫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就像是一堆冰块中间腐烂的鲑鱼，它的表面完美无瑕，但只要保护罩融化之后就会分崩离析。”¹ 疯狂是哲学之外的领域，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外部空间：一种“异国现象”。精神层面的异国现象对上了文明的相异性（*altérité*）。

至于列维－斯特劳斯在大学里同步学习的另一门学科——法律，它的问题也不少。法律的教学并不强制要求学生到课堂里听课，老手们只要机械地借助备忘录在一年的两个星期内不眠不休，就能轻松地通过考试。这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也是浪费才华的方式，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这甚至是有些狼狈的应对办法。他在《忧郁的热带》中写道，三年间（1926—1929），他对法律与哲学的双专业课程进行了“精神分析”，结果显示，他几乎呈现出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病状。法律号召他成为继承者，作为一个聒噪、告别童年的年轻人，他准备在社会中谋求一个工作机会；文科和理科吸引了那些最内向、准备在学习中避世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些的学生没有与童年彻底告别，反而对童年恋恋不舍。”从事文学工作和学术事业“要不就是为了避世，要不就是受使命感驱使”²。

1929年，克洛德最终选择了哲学。在此之前，为了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加入了第三个选择：政治。身处一座无法遁世的城市里，政治是一种拥抱社会的方式，他在学习与阅读哲学作品的过程中累积的知识和思想成为了解政治的工具。

1 《忧郁的热带》，第6页。

2 《忧郁的热带》，第42页。

政治：即时教育

18—22岁，哲学学徒克洛德的生活常常被短暂而忙碌的备考期打断，而备考是他对大学的敬意。剩余的时间他都留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宣传、组织和实践。这才是真的生活！生活将因此天翻地覆。

法国共产党（严格来讲，共产国际法国分支）创建于1920年12月的图尔代表大会。事实上，它的诞生吸引了许多热血的青年革命分子来到这个有些历史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也是马塞尔·戴亚（Marcel Déat）在不久后成为社会文献中心秘书的原因。马塞尔·戴亚是乌尔姆路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也是师范生。社会文献中心的负责人是谢列斯泰·布格雷，为了鼓励学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在1924年创建了这个文献中心。创立过程中，他还得到了乔治·勒弗朗（Georges Lefranc）与让·勒·百伊（Jean Le Bail）的帮助，两人都是师范生，但比布格雷年轻。一个由多所高中的文科预备班二年级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在一年后成为联合五所高等师范学校的社会主义学生运动团体。那时，还在预备班的列维－斯特劳斯刚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员，他受到了勒弗朗的征召，也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做了哪些事？讲座、讨论、总结。这些都是学生参与政治运动常用的工具。他们一方面积极响应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热烈地对抗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僵化的教条。他们发表非正统的言论，为了使一战后动荡的社会重建理性，努力探索新模式。他们期待在新模式下能够发出更大的光芒，盖过苏联的曙光。他们是革命者，不是布尔什维克人。所有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都坚持这一立场。很快，列维－斯特劳斯融入了这个团体并活跃于其中。他向团体成员介绍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他自己就是在比利时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的。1926年4月22日，他开设了一个介绍比利时工人

党的讲座。比利时工人党是一个经济政党，它包括了合作社、工会、完全融入社会主义的互助会，这与《亚眠宪章》（*charte d'Amiens*）确定下来的法国模式完全不同。¹

除了社会主义学生运动团体（GES），这个社会主义青年的第二轮攻势是刊物上的文章。1926年，期刊《社会主义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成立，他也是刊物的成员之一。这份得到亨利·德·曼（Henri de Man，1885—1953）和比利时工人党支持的比利时的学生期刊反而接收了很多法国的来稿，它们来自社会主义学生运动团体、乔治·勒弗朗、艾米丽·勒弗朗（Émilie Lefranc）、让·勒·百伊、莫里斯·戴克松（Maurice Deixonne）、皮埃尔·布万瓦（Pierre Boivin）与克洛德·雷维（Claude Lévy）。需要注意的是，克洛德·雷维不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28—1933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17篇署名评论。这些出生于1905—1910年的青年“正直、严肃，但在他们的年纪可能有些过分严肃了”²。青年们的第三轮出击是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运动联盟（FNES）。创建于1927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联合了外省的学生运动团体，让这个社会党里始终存在知识分子的身影，使这个社会党与法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工人阶级至上”的坏印象区别开来。1927年，联盟在巴黎有八十位成员，同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成为社会主义学生运动团体的秘书。1928年，他成为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总秘书。1928年夏天，他家的地址——普森路26号成为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官方地址。他的政治活动全面展开。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感染了政治病毒的他，坐在巴黎左岸小

1 参见亚历山大·帕勇（Alexandre Pajon）：《政治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Lévi-Strauss politique. De la SFIO à l'Unesco*），巴黎：普利瓦出版社（Privat），2011年，第32页。列维-斯特劳斯的演讲由乔治·勒弗朗（Georges Lefranc）整理成简短的文字。

2 斯特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当代史博士论文，第84页。

酒馆的烟雾腾腾的后厅。他们常常在克洛德 - 贝尔纳路（rue Claude-Bernard）上的“正常酒吧”（Normal Bar）或者圣马塞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arcel）上的“模范酒馆”（brasserie Modèle）聚会。聚会上，他们热烈地聊天，话题不仅包括当时的政治策略（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负责人们或者与共产主义者维持的关系），也包括一些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必要的修正）、左翼联盟（Cartel des Gauches，旧译左翼卡特尔）之后的政治问题（参与政治权力斗争还是反对参与斗争）、对一战后世界秩序的激烈反抗（这些反抗表现为一种狂热的和平主义以及对救世主之说的依赖）。聚会的气氛常常在“右派式的沉默”“左派式的叫嚣”和“数量众多的师范生的长篇大论”¹之间变来变去。“脏话”也满天飞：“米勒兰主义的改革者”“染指政治权力的野心者”等。在某个角落，一些人认为应该在下一次联盟的代表大会上达成战略上的意见一致，而其他人正准备在拉丁区分发政治传单和报纸，拉丁区再次成为右派学生（法律系学生）的必争之地。1920年代，斗争的氛围又回来了，那时保皇派运动分子（Camelots du Roi）在圣米歇尔大道上发号施令。从阿加通（Agathon）到1968年的学生运动，在政治上，能否掌控拉丁区关乎学生运动的成败。而这正是列维 - 斯特劳斯特谈到的“例行暴力”（violences rituelles）的原因：在不同团体的挑衅和共产主义分子人墙的面前，肉体的力量成为运动分子信仰的试金石，因此，打斗不断。

与运动分子的日常任务和签署请愿书相比，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更喜欢用拳头说话。1927年2月，他加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塞纳河联盟十六区的成员。这是根据家庭住址安排

1 《社会主义大学生》第5期，1934年2月，第12页。亚历山大·帕勇引用了相关内容，参见亚历山大·帕勇：《政治人物列维 - 斯特劳斯特：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页。

的。缴纳会费的收据证明，他一直在这个组织中待到1935年。¹他还记得，在1927年，他被要求在支持萨科（Sacco）和万泽迪（Vanzetti）的声明中签字，他认为这两人是“新版德雷福斯事件”的受害者。1927年3月7日，应对战争的武装动员法出台，他对此感到不满，在1927年8月的抗议书上加上了他的名字。他懂得灵活运用他的组织与领导才能，也懂得调动干劲。1929年，在巴黎举办的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运动联盟（FNES）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他的才能表现得十分突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的眼光敏锐，他明智的判断让他在代表中脱颖而出，不知不觉中便征服了全场与会代表。”²这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他居然在短短几年内累积这么多社会运动的才干。列维-斯特劳斯是个政治好手，21岁的年纪，就已经熟练了解社会风俗与习惯并且能说会道，他明白物质条件的重要性而政治经验也丰富了他的个人履历。他是一个早熟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早熟的活动分子。

在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里，维克多·斯托维斯基（Wiktor Stoczkowski）用批评的视角检视了列维-斯特劳斯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一再推崇的理由，他向我们解释这个社会主义圈子——这个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伙伴们一同成长的圈子——如何被亨利·德·曼的思想和计划经济运动深深影响。而《社会主义大学生》正是向法国介绍亨利·德·曼和计划经济运动的窗口。亨利·德·曼是一名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今天被人遗忘，但他曾是完善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比利时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一个理性思考经济、理性规划的计划，其中也初步设想了联邦制。欧洲意识、培养新一代精英的想法、对西方文化的精神危机的重视、对阶级斗争信条的质疑都让他成为

1 “政治活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0。

2 皮埃尔·阿农（Pierre Hanon）：《社会主义大学生》（*L'Étudiant socialiste*），1929年5月。
亚历山大·帕勇：《政治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页。

当时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最严厉的批评家，让共产主义倾向的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在1928年2月5日给了他实至名归的“荣耀”：“德·曼，杀死卡尔·马克思的刽子手！”¹一些社会主义党派在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成立起来，它们主张马克思主义，而年轻的活动分子拥护以德·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很明显，这是一条代际的分水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是那些年轻活动分子中的一员，他抨击“老掉牙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不需要那些谈论战后斗争的理论原则。所以，当德·曼于1928年1月来到巴黎时，作为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运动联盟总书记的列维-斯特劳斯邀请他向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生们介绍他的观点。在1月23日他的讲座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拥护者们全部缺席，布鲁姆还为此辩解圆场。针对法国社会主义内部的较劲，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向他的前辈写了一封信表达感谢和赞赏：“多亏有您，社会主义的教条才终于从沉睡中觉醒过来。”当克洛德谈到他1927年发表的作品《超越马克思主义》（*Au-delà du marxisme*）对自己的意义时，他说它给自己带来了真正的启示，这时他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个人的娓娓道来。他还补充道，此书“帮助他从死胡同里走了出来，他一直以为这条死胡同不存在出路”²。

从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渐渐遗忘了这段政治运动的往事，他常常低估遗忘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从亨利·德·曼在二战期间的痛苦经历看出端倪。与沃特斯不同，德·曼没有经历过流亡。他萌生了合作的想法，一种接近贝当主张的合作

1 维克多·斯托维斯基（Wiktor Stoczkowski）：《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Anthropologies rédemptrices. Le monde selon Lévi-Strauss*），巴黎：赫尔曼出版社（Hermann），2008年，第123页。

2 10月17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致亨利·德·曼（Henri De Man）的信。现在，这封信被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VSG）收藏，是亨利·德·曼文献的一部分，文件夹编号253。维克多·斯托维斯基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参见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第127页。

主义。他没有等到战争结束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41年11月至1944年，他离开了比利时而隐居于萨瓦，落脚在拉克吕萨山里的小木屋中。后来，他自我流放至瑞士，直到1953年死神带走了他的生命，他一直留在了瑞士。二战后，他缺席审判，比利时的军事法庭判他入狱20年。罪人的记忆慢慢吞噬了他年轻时候的记忆：1920—1930年代，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导师，在理论领域颇有建树。我们知道，列维-斯特劳斯很难再从这个暴躁分子身上获得启发。¹更糟糕的是，1983年，以色列历史学家兹弗·斯坦海尔（Zeev Sternhell）把德·曼的计划经济论看成合作主义中的一部分并把它看法兰西土地上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制造工厂。²另外，斯坦海尔还认为，1940年亨利·德·曼的政治态度与他接受的政治文化一脉相承。这一观点非常值得研究，也确实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热烈讨论。但这个观点动摇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友人马塞尔·戴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进一步坚定了列维-斯特劳斯“叛变”的决心。但我们必须重申一点：在斯坦海尔的著作发表后的20多年，我们承认，它让一些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我们记忆中获得重生，它还揭露了法国反启蒙运动企图制造法国法西斯主义，但一些历史学家对它做出的错误解释不以为然：他从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的结局出发建立了以目的论为基础的历史。按照他的说法，所有1930年代的非正统社会主义分子都是1940年的附敌分子。他对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扩大以及对思想史的高估也是遭到别人批评的原因，而这些遭到批评的观点与斯坦海尔想要表达的本意也有些出入。1980年代，当时的怀旧气氛围绕着黑人展开，人们很难再与德·曼为伍。而关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保

1 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从第129页起。

2 这是兹弗·斯坦海尔（Zeev Sternhell）主张的观点之一。参见《既非右派也非左派：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Ni droite ni gauche. L'idéologie fasciste en France*），巴黎：瑟伊出版社，1983年。

持谨慎，而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原因是什么：“我完全弄错了……”¹ 这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

与这种后知后觉的醒悟不同，在这些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年轻学生看来，尤其在列维－斯特劳斯特看来，政治运动在他们求学期间（1930年代）就像是一所“平行大学”²，这所大学令人振奋但要求颇严，它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紧密相关。他们在其中深吸一口气，便能发现扎根于社会现实的观点。经过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反对华丽的修辞，他们学会了辛辣、简练、“不空洞”³的语言。总之，这是一所生活大学，里面充满了世俗的养分，而学术知识与世俗的教育有着遥远的距离。

勤工俭学的学生

对政治活动的热衷并没有成就一个真正的活动分子。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因为一些经济原因而被迫打些零工，尽管他的双重生活已经让他不堪重负。这些经历扩展了他的实践和社交领域，提升了他的能力，并且证明了年轻人拥有不容置疑的社交才华。

得益于对政治活动的了解，他曾负责通过埃菲尔铁塔电台（Radio Tour Eiffel）播报国际劳工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的每日公报，办公地点位于大皇宫的地下。这项工作持续了几个月。这是他第一次（但不是他最后一次）担任播音员的工作，而童年时期的他就对无线电广播技术兴趣浓厚。1931年，和平主义倾向的《人道国家》（*La Patrie humaine*）一书出版，他不得不向100多位巴黎的大人物送上新书，并且为他们写上献词，借此机会，他成为维克多·玛格丽特（Victor Margueritte）的新

1 2011年2月25日，与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

2 斯特劳斯特·克鲁埃引用了乔治·勒弗朗的话。参见斯特劳斯特·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97页。

3 同上。

闻专员。《忧郁的热带》里有一段文字就是受到玛格丽特等文学贵族的影响，事实上，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左拉、雨果等文学巨匠留下来的文学传统都让列维-斯特劳斯痴迷不已，让他自如地走向19世纪，感到一切都十分熟悉。¹

虽然沉迷于19世纪，克洛德仍亲身参与了20世纪正在发生的政治活动：这位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在1928—1930年担任了乔治·莫奈议员的助手。乔治·莫奈出生于1898年，1928年，他成为苏瓦松的社会党议员。乔治·莫奈是农业开发商，也是农业问题领域的记者，他捍卫农民的权利。所以，他是社会主义的“门外汉”。他的经历独特：他是借着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旗帜进入国会殿堂的，所以他的主张也独树一帜。列维-斯特劳斯当时还是年轻的政治活动分子，他被安排到乔治·莫奈身边一个“暧昧”的岗位上，是“党的眼睛”（他之后这么称呼自己）。这是因为莫奈像他一样远离了教条的束缚。也许是这个原因让年纪相差10岁的两人惺惺相惜。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还参与了几次乔治·莫奈的家庭节庆聚会。我们可以发现，乔治·莫奈的侄子是1927年出生的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此后，列维-斯特劳斯短暂地离开了烟雾缭绕的小酒馆而加入了众议院。他很快掌握了众议院的礼仪、规矩、厅室布局以及所需的话术。克洛德在议会大厦的一间办公室办公，这位年轻的助手与自己崇拜的小说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²相邻，小说家是激进派的秘书；克洛德还与马塞尔·戴亚熟络了起来，马塞尔·戴亚是社会主义团体的秘书，他成为克洛德的好友与导师。莫奈关心农村问题，维护人权原则，也关心文化政策，他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他准备几乎所有的文件。在这项工作上，克洛德也

1 《忧郁的热带》，第38页。

2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对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小说《遗产》（*Héritages*）的书评，载《社会主义大学生》第9期，1932年6—7月。在书评里，他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十分高效：“设立小麦署（Office du blé）提案的理由陈述完全都是我写的，而提案是以莫奈的名义提交的。虽然这样说会显得我不够谦虚，但我记得雷蒙·庞加莱（Poincaré）表扬了莫奈，夸他理由陈述做得非常好。”¹ 提案将小麦署设计为一个负责小麦买卖，并能奠定国家垄断地位的机关，设立小麦署是饶勒斯在1894年提出的设想。克洛德是德·曼的追随者，这个根据计划经济模式的项目应该深获克洛德的喜爱，因此才能激发出他法学家那般严谨、明晰的做事风格。最后，虽然这个项目在众议院被驳回，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重新检视了这个计划，并在1936年8月15日成功创立了一个新机构。

除了“政客”以及政治活动分子的经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用哲学理性进行政治思考。他一边担任国会助手一边完成哲学系本科学生的学习任务，他选择用一个研究马克思的课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² 而获得高等教育文凭。这是一种调和两种不同经历的方式。这个研究课题在学术哲学领域是一个非正统的选择，几乎不被德国哲学接受。谢列斯泰·布格雷接受了这个课题，但他在口试的时候向克洛德提出了一个有关圣西蒙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符合他和同事们的口味。谢列斯泰·布格雷是涂尔干的学生，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知识普及者，而不是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那样的创新者。与莫斯一样，布格雷也有社会主义倾向，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他主编了蒲鲁东（Proudhon）的《全集》，也是《圣西蒙文选》的编者。1933年，他还出版了一本短篇概论《法国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工业民主》（*Socialismes*

1 1985年12月11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斯特芳·克鲁埃的访谈。参见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138页；亚历山大·帕勇：《政治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9页。

2 该论文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个人档案的一部分，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

français. Du « socialisme utopique » à la Démocratie industrielle)¹。布格雷作为社会文献中心的主任，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后来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是所有社会学系年轻学生和师范生的庇护伞。尽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不是社会学系的学生，也不是师范生，但这位年轻的哲学系学生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也有丰富的校外实践经验，所以，布格雷仍然接受指导他的论文。他“不走寻常路”²，因为他不是通过哲学，而是通过社会运动才走向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历足以吸引和蔼可亲的谢列斯泰·布格雷的注意，几年后，布格雷向乔治·杜马推荐了克洛德。当时，乔治·杜马正在召集愿意远赴巴西的年轻大学生。

社会党的思想家

教师资格考试：一场格斗赛

那些年的激情与动荡结束了，1930—1931年是忙碌的高中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备考期。最后，哲学将他领向了法律，而法律“扼杀了哲学”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冷落了政治并走进了“修道院”，可以这么说，这场考试理应耗尽人的所有精力才能应对。当列维-斯特劳斯谈及他备考的感受时，他所用的并不是宗教的隐喻，而是一个运动隐喻。对他与其他所有成功的考生而言，这段经历都成为美好的回忆——“马拉松式的备考过程让我们体验了一项浩瀚的工程”。相比于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这场考试对

1 参见克洛德·拉弗莱（Claude Ravelet）编：《涂尔干学派的三位大师：谢列斯泰·布格雷、乔治·戴维、保罗·弗高内》（*Trois Figures de l'école durkheimienne. Célestin Bouglé, Georges Davy, Paul Fauconnet*），《既往史》（*Anamnèse*）第3期，巴黎：阿尔玛丹出版社/法国当代出版纪念馆（L'Harmattan/Imec）。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致斯特芳·克鲁埃的信。参见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73页。

3 《亦近，亦远》，第18页。

他而言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像一场大型的体育表演。一开始，我出于兴趣而参与其中，完全不认为这项活动超越了人类极限。这是一项大型的运动项目，但它的氛围让人感到愉悦，它也对健康有益。”¹这几乎是一种精神健康，而他还有持久的体力、结实的身體，因此，轻松地将两者合二为一。他令人咋舌的体能也表现在了其他领域（主要是民族志研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身材瘦长，成年之后，身高已有 1.79 米，此外，他知性的面孔和知识分子的气质让他朝气蓬勃。曾经，政治这所学校也让他神经紧绷。

当时，考生们需要在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之前完成一次实操。因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庞蒂²才能在古斯塔夫·罗德里格的课上重逢，而去詹森·德萨伊高中之前，克洛德连续几年常常去古斯塔夫·罗德里格的课堂学习。每个人都要轮流讲课。克洛德是波伏瓦真正的同一代人（两人都生于 1908 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个片段，并留下了一段有关克洛德的描写：“他的沉着冷静让我害怕，他机灵地应对，但我觉得，他用没有表情的声音调和了无生气的表情向听众介绍自己的爱好时非常好笑……”列维－斯特劳斯“仍记得西蒙娜·德·波伏瓦当年的样子：她很年轻，精神饱满，一脸农民的肤色。她有些像是红皮小苹果”³。在未来的唇枪舌剑之前，这是动听的序曲。

重要的一天来临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档案里留下了他的人生轨迹，它像草稿一样模糊地描绘出克洛德的精神状态，让我们看不清主角的样子。⁴不论怎样，论文的提纲具有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载艾米丽·朱莉亚：《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 177 页。

2 后两人都通过了 1930 年的高中教师资格考试。

3 这两条引文出自《亦近，亦远》，第 21 页。

4 “上学时期，哲学课笔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1。

很强的说服力：尽管这位年轻的学生对哲学思考中肤浅的“话术”持批评态度，而事实上，他完美地掌握了这种“话术”。导言的写作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删改。论文的结构非常严谨：它延续了康德的传统，被分为行为、意图、特征三个部分。他也用上了辩证法：“从外部出发，我们到达了内部，而我们在内部发现了他律”，因为性格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基于这个严谨的思考以及对形式的抛弃，克洛德是一个创新者。为了获得学位，他在论文中加入了其他学科的材料，其中主要是法律资料，但也有历史资料（基督教与宗教改革），还有社会学的材料。他非常冒险地将观点搬上了他教师资格考试的卷子上。这是他在一篇向阿尔芒·库维利埃（Armand Cuvillier）《哲学手册》（*Manuel de philosophie*）致敬的文章里倡导过的观点：“展示这些新学科，把它们当作一切思考过程的起点、一切解决办法的基本思路，在这些新学科里，经验与思想协作，让意识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解放。我指的是心理学与社会学。”¹考卷上，文章的结尾是鲜明且符合克洛德个人特色的，它也体现了克洛德很高的精神要求：“有道德指的是不满于自我。要改变自己，而改变的目的不仅是证明理想的可行性，更是在自己身上实现理想。我们需要怀抱一颗殉道的心。”

他在口头上提到了一个应用心理学的课题。他虽然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仍没有将它作为最终选择。他像一位失去活力的运动员和瘾君子：“一位家里人熟识的医生送了我一个安瓿的咖啡或者可卡因，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让我在课前调整状态。为了要准备这场终极考试，我们需要在索邦图书馆里被关上七个小时。我急忙用一杯水吞下安瓿里的东西，然而此后我觉得浑身难受，不得不在备考的这几个小时里躺在两张椅子上休息。我受了七个小时的罪！[……]我虽然当时在场，可实质上没能准备任何

¹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主义大学生》第9期，1931年6—7月，第19页。

东西。我临时起意准备复习一点东西，别人夸我做得不错，而我记得我只谈到了斯宾诺莎。最后，药物终于发挥了作用……”结果，他以第三名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当时他 22 岁，是所有通过考试的学生里最年轻的一位，而这场考试的桂冠被费迪南·阿尔基耶（Ferdinand Alquié）夺得。克洛德用体育隐喻和调侃的语气描述了这段考试的经历，让它变得不那么严肃。在成绩公布的那天，他买了本讲述占星术的书，摆出一副傲视一切的表情，坚决地将哲学理性抛之脑后。现实在别处等着他，这些等待着他的惊喜远远超过了文章里的三段式结构。当刚刚获得教师资格的毕业生克洛德向他的父母宣布这个好消息时，他见到了家族的支柱让伯伯。让伯伯向他们传递了一个坏消息：他破产了。那是 1931 年，世界危机让法国的经济和财政结构开始经历持续两年的滑铁卢。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教师资格获得者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我有了工作；另一方面，父母的经济状况开始让我无法放心。我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两件事的。”¹

建设性革命：“改变人类，让人类值得获得解放”

在某次莫里斯·戴克松与伙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讨论中，“戴克松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解放人类’，列维－斯特劳斯特如此回应：‘它的目的也在于改变人类，让人类值得获得解放’。”²这是年轻哲学教师的激昂之语？没错。但这些话也是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改变自我。

因为修正后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包括了这个精神层次的内容——这种源于马克思传统之外的精神上的特异性。德·曼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中提到，追求平等是基督教理想的变形。而列维－

1 《亦近，亦远》，第 22 页。

2 乔治·勒弗朗：《回顾》，第 17 页。斯特芳·克鲁埃引用了乔治·勒弗朗的话，参见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 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 176 页。

斯特劳斯作为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也注意到基督教改革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延续关系，他还在信仰新教的伙伴——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的作品里发现了同一个结论。他从中发现，“经济利益的动机越来越不能让无产阶级信仰社会主义”¹，人们需要更加深层次的理由。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会那么严肃地讨论“社会主义末世论”²。而这种末世论者将希望寄予千禧年，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西方文化的没落，因此，这些热血的年轻人转而求助于宗教性质的言论。曾经的基督教已经走入了墓穴，新世界需要新的瓦砾、新的人文主义、新人类。此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总是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谈到一份友刊《世界的希望》（*L'Espoir du monde*），这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喉舌。尽管他自己完全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是不可知论者，但他这样说：“今天的任务是预言者和殉道者的任务，即在自己身上实现一种新的秩序，所谓实现，指的是在生命中实现而非停留于思想。”³

在社会主义学生运动团体（GES）和法国社会主义学生运动联盟（FNES）之后，作为政治运动分子的主力，学生们（后来，他们常常成为老师）决定成立一个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内部团体，而这个团体将参照英国工党内的费边社。发起者勒弗朗夫妇计划出版一本书，并把这本书作为“警笛声、对紧迫的政治问题的陈情”⁴。书本的写作将由众人共同完成。1931年3月1日，“建设性革命”团体正式成立，它模糊了代际之别，既有左派也有右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的讲座《社会主义和基督教》（« Socialisme et christianisme »）进行了总结，参见《社会主义大学生》第2期，1930年11月，第14页。

2 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第7章。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让·格诺（Jean Guéhenno）的手册《谈文化和革命：致一位工人同胞》（« Lettre à un ouvrier sur la culture et la révolution »）进行了总结，参见《社会主义大学生》第6期，1931年3月，第15页。维克多·斯托维斯基引用了相关内容，参见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第167页。

4 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162页。

派参与其中。这个文明社会腐朽、价值观缺失，这些年轻的政治运动分子看到了混乱、竞争、剥削、危机和道德败坏……所以，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展开一场道德革命。而一位历史学家将这些年轻人称为“1930 年代拒绝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们与年轻的列维 - 斯特劳斯一样，都坚持要进行一场内心的革新。¹在这个新计划中，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扮演的角色既是重要的，也是趋于边缘化的。这是因为，虽然他在知识界已经树立了威望而这对革命是有益的，但他开始慢慢远离这些政治活动。当成员们分配任务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地在书的创作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他负责“论为革命服务的形而上学”一章²，内容只多不少。我们可以想象，以此为题的那一章虽然从未付诸写作，但它希望讲述主张变革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因此，它综合地反映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抱负以及“对革命事业的美好设想”³。可惜的是，这位设计师半途而废。

“其他革命者……”

1931 年，22 岁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刚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是当时年轻的革命分子和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的并非完整的革命信念（doxa），而是不同的东西。

首先，他虽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不接受党内的模糊空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调与国会改革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落差。他和建设性革命（建制派）的伙伴们都是经历了 1914 年那场战争的孩子，他们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拒绝搅动历史洪流的暴力行为。他们非常在意实践以及“重建”，期待一场没有“伤

1 让 - 路易·路贝·戴尔·巴耶尔（Jean-Louis Loubet del Bayle）：《1930 年代的非传统主义者》（*Les Non-Conformistes des années 1930*），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 年。

2 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 - 斯特劳斯的 worldview》，第 165 页。

3 同上书，第 166 页。

痛”“没有眼泪的革命”¹。这场革命将建立于合作社之上，而这些合作社成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如果一日复一日，我们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它们将凭借自己的优越性逐渐壮大，就像资本主义里的蛹慢慢成长，而资本主义作为茧，最终不过是一个没有用处的壳子。”²这个借助自然史的隐喻在那时已被用来表达他们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决心。他们更亲近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

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关心道德问题，他们认为这是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道德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与其他变革派的社会主义运动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高高在上、轻描淡写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轻浮态度也是不符合信仰和伦理要求的。1930—1931年，一场有关妓院合法性的重要辩论荡起了波澜。那是一场在莫里斯·戴克松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之间展开的辩论，莫里斯刚刚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发表了名为《妓院》（«Bordels»）的文章，他主张只要能够制定管理政策确保妓女的卫生条件以及保护她们的人生安全，妓院就可以持续经营下去。而克洛德对他这位同志实用主义的倾向感到震惊：“让我感到尤其不解的是，你对风尘业管理上的立场不太明确，所以，你对得到良好管理之后的风尘业又是持什么态度？我还有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对国防的态度，它也不清不楚：抽象的解决办法与具体、现实的条件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而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能调解的对立关系，束手无策的我们只能完全排斥、否定次要的那一方。难道你不认为，对社会主义运动分子和投入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生而言，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吗？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认为卖淫是一种显而易见的

1 1986年2月5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斯特芳·克鲁埃写信。参见斯特芳·克鲁埃：《“建设性革命”，1930年代的一群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第528页。

2 《亦近，亦远》，第254页。

恶，而在于我们每个人是否愿意接受它。然而，这就是一个实际的道德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我确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根本性质拥有相同的认识。”¹ 这是一个基于康德思想框架的答案，它遵守了严格的逻辑，还表达出列维 - 斯特劳斯特心中的愤慨。他的愤慨因绝不妥协的态度而显露无遗。在一篇评论文里，列维 - 斯特劳斯特如此总结道：“我们中的另一些革命分子缺乏一个道德价值体系。”² 在他看来，这是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大憾事。无疑，这是他能够有所发挥的众多思想领域的其中之一，他在这里建造了新事物。作为一名彻底的非宗教人士，宗教救人于水火的价值却激励着他前行。列维 - 斯特劳斯特立独行的作风和个人主张在其他领域更加突出。例如，自然的美学与对自然的感悟。

他毫不犹豫地 in 社会主义倾向的媒体中发声维护发表于 1933 年的《茫茫黑夜漫游》，称它表达了“无政府主义与革命的思想”³。作者路易 - 费迪南·塞利纳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已经受到了政治对手雷昂·都德（Léon Daudet）的致敬。克洛德已有喜爱的作家，他们是康拉德（Conrad）和皮埃尔·麦克·奥兰（Pierre Mac Orlan），尽管如此，他仍果断地给出了评价，夸它是“十年内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年轻的批评家列维 - 斯特劳斯特并不愿意顺应历史的潮流。他坚持法国传统美学，反对教条式、没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尽管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后来也对传统艺术产生了热爱之情，当时，他并不欣赏传统艺术，反而全面地投入先锋派的怀抱，钟意他们的价值观，并且毫不掩饰他的喜

1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致莫里斯·戴克松（Maurice Deixonne）的信（未写明日期），现在在“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办公室”（Office 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 socialiste）收藏的文献资料，属于戴克松档案库的一部分。

2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针对雅克·维奥（Jacques Viot）的《白色的瓦解》（*Déposition de blanc*）写了一篇书评。参见《社会主义大学生》第 7 期，1933 年 4 月，第 14—15 页。

3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社会主义大学生》第 4 期，1933 年 1 月，第 13 页。

爱：他喜爱“几个世纪以来的最让人惊讶的戏剧天才”¹梅耶荷德（Meyerhold），他读“俄国革命的颂扬者”²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ïakovski），也看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后者主要是阿拉贡的《巴黎农民》。在塞利纳、尼赞、保罗·莫朗、D. H. 劳伦斯的作品中，他特别关注新的创作形式，关注文学的现状。这便是为什么他拥有革命胸怀，但仍禁不住喜爱先锋派，能够将两者兼容并蓄。相反，他总结了20世纪的乌托邦幻想——政治革命与艺术革命的亲密关系，他还提到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社会革命以及艺术革命都是革命，仅此而已。”³可以想象，在同一时间，共产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者发起的“现实主义运动”面前目瞪口呆。这场运动是由日丹诺夫（Jdanov）发起的，它的审美标准对后续艺术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即便社会党内部也有一些出名的文人雅士，比如，雷昂·布鲁姆（Léon Blum），他曾是一名批评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由衷地接受这一艺术形式带来的精神上的新鲜空气。列维-斯特劳斯则是这种艺术运动的推崇者：“完整的社会主义既要在人的精神层面有所影响，也要在政治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一种崭新、丰富的艺术形式也应该充满工会诉求那样革命性的内容。”⁴在俄国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具有革命者的特性，进行着社会主义抗争。因此，他认为必须尽快看清艺术的地位、意义、功能，让它成为展开革命的另一种方式。我们在一些文字材料里发现，他试图绘制一幅社会主义美学的宏伟蓝图，尽管文字材料显示，他的设想仅仅停留在初步阶段。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内心，“对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主义大学生》第2期，1930年11月，第13页。

2 同上。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无产阶级文学”（*littérature prolétarienne*）一说发表了意见。文章发表于《社会主义大学生》，1928年7—8月。这是他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4 《社会主义大学生》，1928年11月，第31—32页。

自然的情感与革命精神”之间建立了联系。我们在多处找到了蛛丝马迹，但保罗·尼赞最清晰地阐述了两者的联系。他在《阿拉伯亚丁》（*Aden Arabie*）里批判地研究了这片被社会主义理论抛弃的土地。他用学究、幻想的方式探索一个比人类更加宏观的宇宙，获得了一种与美的感受、与为了美好世界而奋斗的精神等价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可以让人解脱，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补充。《阿拉伯亚丁》发表于1931年，它立即对文学界造成了冲击，成为这代人表明态度的发言。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是尼赞的家庭成员之一，但因为远房表姐亨利埃特·阿尔芬（Henriette Alphen）与尼赞结为夫妻，所以他也与尼赞相识。他理解尼赞为什么会对这个没有风骨的社会感到不满，他与尼赞一样都对这个社会感到灰心丧气，但他仍对这个有名的文本提出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点，他讽刺了尼赞“大费周章地绕弯子”，他称这是一种非常“师范生”范的作风，最后才发现“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然而，很多人，其中包括那些被尼赞挖苦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也“更加轻松地发现了这个事实。当他带着厌世病穿梭于异国城市某些特定街区的时候，社会主义活动分子们为实现革命而利用晚上的时间从事着卑微的任务：扩充成员、一捆捆报纸、无数为了集合边缘人士的信件……”¹ 尼赞被他人甩在了身后，他若要为自己辩护则必须放低自己师范生的身段。而第二点则与他对自然的感受相关。尼赞非常严厉地批判“寄情山水”，此后萨特也加入他的行列。对萨特而言，只有人类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景观。而克洛德早已将“人类的哲学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的哲学”² 这一观点了然于心，因此与他们所持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他还补充道，“要想被拯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尼赞〈阿拉伯亚丁〉评论》，《社会主义大学生》第8期，1931年5月，第9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评马塞尔·戴亚对奥布省小学老师们的讲话》，《社会主义大学生》第2期，1930年11月，第14页。

救”¹“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还远远不够”²：“人与自然的接触是人类唯一永恒的经历，是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真实存在的经历。它也是目前我们手上唯一的绝对价值，但它可以让我们获得通向未来的钥匙，确保未来的那些绝对价值能够存在。”³这是一种非常“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发言，而我们在年轻的哲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分子身上已经看到了他未来的样子。

1931年秋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还没完全从备考的压力中缓过来，他在哲学、法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他无精打采地制订了几个方案，好让他能融入法学院的学生团体之中。他向好友莫里斯·戴克松（克洛德在建设性革命团体里的伙伴，同时也是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表示，他想对罗杰·皮卡尔（Roger Picard）的建议做出回应。罗杰·皮卡尔希望他加入一个“没有政治色彩”的右翼期刊的团队。“撰稿人和审稿人都是一些专家：法律系教授、经济学家等。有些‘枯燥’。因为我日后可能会选择法律哲学，与他们打些许交道并不会让我感到恼火，但我也只想维持最低程度的往来。”⁴法律哲学或许可以让他很快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一名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学老师。而这样的身份在校园里并不少见，它有激进的一面，也有社会主义者的一面。

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并不希望在大学里担任闲职。建设性革命的成员们不仅希望参与政治，更希望思考政治。列维－斯特劳斯的亲戚皮埃尔·布万瓦（Pierre Boivin）于1936年进入教育部部长让·扎伊（Jean Zay）的办公室（并于1937年突然去世）：皮埃尔是师范生、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他有着清醒的头脑以及厉害的一张嘴。此外，他在谢列斯泰·布格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尼赞〈阿拉伯亚丁〉评论》，第9页。

2 同上。

3 同上。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致莫里斯·戴克松的信（1931年9月3日），现在是“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办公室”收藏的文献资料，属于戴克松档案库的一部分。

雷的指导下获得了大学毕业证书，他主张社会主义价值，自己也是一名社会主义活动分子。他的经历无疑代表了列维－斯特劳斯特期待走上的某一条道路。而这条路则更代表着一条理论之路。我们提到过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他曾积极地参与，目标在于“论为革命服务的形而上学”。他毫不吝啬地绘制了一幅宏伟蓝图，在这蓝图里对“自我”提出了要求，所以，他向莫里斯·戴克松写信表示，这本书的目的是创建“一种方法，一种能够让我们日后充实新文明的实质内容的方法”¹。这种创造的趋势给了克洛德两种可选的模式：德·曼代表的比利时工人党的模式，或者马塞尔·戴亚代表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模式。那时，克洛德被看作“社会党的哲学家”。日后，他与这条道路越来越远，但年老的克洛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能感受到血液中的紧张之力：“那时，社会党非常活跃，我们参与其中，因此，能够亲身体会那种热烈的氛围。将哲学传统——我指的是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与马克思代表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这样的想法让很多人无法抗拒。直至今日，我觉得，有过那样的梦想是一件幸事。”²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者，这意味着将两种不同面貌、互相矛盾的期望结合在一起。而不同的期望来自两个不同的模式：他善于思考且重视行动；他不惧思想革命且摒弃了无用的幻想；他踏足意识形态的广泛领域且主张从实践中汲取经验；他对革命路线拥有大局观但又能每个弯道发现全新的视角。³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致莫里斯·戴克松的信（1931年9月3日），现在是“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办公室”收藏的文献资料，属于戴克松档案库的一部分。

2 《亦近，亦远》，第26页。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评马塞尔·戴亚对奥布省小学老师们的讲话》，《社会主义大学生》，第14页；《马塞尔·戴亚〈社会主义视野〉评论》（«Compte rendu du livre de Marcel Déat, Perspectives socialistes»），《社会主义大学生》，1931年2—3月。

4 救赎：民族学（1931—1935）

谁或什么摧毁了我正常的生活轨迹？一个诡计还是一段弯路？可它们的目的是让我的技能有所成长，好让我重返职业生涯。或是因为，我的决定与我所处的社会群体产生了根本矛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注定要越来越孤立地生活于其中？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¹

1931—1935年初，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迅速成长。他是军人，是年轻的老师，也是丈夫。这些年，他迅速地迈入成年，这个过程就像一部成长小说。他经历了各种生活：部队、小城市、年轻夫妇的家。像巴尔扎克小说里一般的不同地点描绘了一个相当法兰西风格的童年以及一段迅速并成功迈入社会与职场的成长经历。

突然，谢列斯泰·布格雷的一通电话为他开启了新的生活。这是1934年秋，一个人生的分岔路口。谢列斯泰·布格雷向这位年轻的哲学老师提供了一个去巴西参加民族志研究的课程，并给他提供了在圣保罗一所刚刚成立的大学里任教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在数学上，分岔理论建立了一个模型：一个物理参数的小变动都将为整个系统带来剧变。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向“民族学”跨越的举动便让他踏上了这样的“分岔路”，或者是发生了一次“人生中的意外”，比如，生病或者皈依某个宗教。这样的变动是社会科学无法解决的，我们最好顺其自然，因为它也改变了20世纪知识分子成长的格局。他的出行是突然、不可预料的，而前方还有更多未知的事物在等待着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定义这次

¹ 《忧郁的热带》，第403页。

远行呢？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 - 斯特劳斯使用了两个意象来形容 1935 年这个突然的决定：他将民族学看作“出口大门”和“漂浮木”。民族学既是变节也是救赎，不论它是克洛德期望的结果还是天命所归，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克洛德将与过往的人生一刀两断。民族学超越了克洛德这一代杰出青年们所经历的一切破裂的关系、一切倾注了心血的行为。民族学是一种调和生命与写作、学术成果与冒险、情感世界与理性世界的另一个选项。它也是一种自我放逐：放逐到一个让我们能够很快头顶荣光归来的希望之城。本地的青少年们离开他们的部落去接受考验，而如果他们通过了考验，他们将能光耀门楣。

成 长

1931 年，年轻的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加入了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兵营。1932 年，他成了家，并在蒙德马桑（Mont-de-Marsan）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后一年，他被任命为拉昂高中的老师，而他的妻子也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在亚眠教书。征兵、结婚、迈入职场以及获得经济独立：克洛德的这三步让他跨出了迟迟没有结束的青少年时期，带他走入了社会，让他开始经历成年人的生活。而这三步只发生在短短几个月。但是，突然进入成年阶段并不意味着要切断克洛德与父母兄弟的联系。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表现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书信使我们今日可以鲜活地看到身为士兵、年轻老师和模范丈夫的克洛德。¹

1 这一段和接下来的几段主要参考了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与父母的家书。莫尼克·列维 - 斯特劳斯完成书信的分类整理后，允许我上门阅览，在此，向她表示感谢。这些书信的副本则被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档案库，档案盒编号 178。它们横跨 1931—1933 年，数量超过 200 封，但很少记录具体日期。一般情况下，这些家书只以“星期”进行时间记录。所有引文都来自这些家书，参见已经出版的书信集：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Chers tous deux*》，*Lettres à ses parents [1931-1942]*），“21 世纪文库”，巴黎：瑟伊出版社，2015 年。书信集根据家书寄出的城市对它们进行了分类：S 代表“斯特拉斯堡，部队服役期间”，M 代表“蒙德马桑”，P 代表“巴黎”。括号中的数字是对字母的排序。

军队生活的场景：“大兵列维，158号步兵团，装备与通信，斯蒂恩兵营，斯特拉斯堡”

将在未来对原始社会仪式和神话展开探索的列维-斯特劳斯体验了欧洲民主社会的一项重要仪式：服兵役。这也是一个足以奠定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基础的神话：一年内，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地域出生的法国人一同接受公民教育和军事训练。服兵役就像是国家的蒸馏器。1931年10月，年轻的士兵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兵营报到。他是158号步兵团里负责装备与通信（无线电、电报、电话、光信号）的一员。经历了几个月兵营生活之后，在他政治圈朋友的帮助下，他成功地得到了一个“好差事”，这个差事让他在1932年春天回到了巴黎。他成为战争部新闻处的工作人员。

身处兵营的这段时间，他带着十足的干劲和好奇心履行他的工作义务。军队生活里的丑陋与不便给他造成了影响，但他总是洒脱地一笑置之。这种洒脱的态度让他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向父母亲描述其中的点点滴滴。刚抵达兵营，他就被要求进行一次听写或者说一次写作（“描述你的生活，等等”），以及四个行动。这些活动“非常困难，我勉强才能过关”。因为厕所是大家共用的，所以拥挤混乱，而他依着地图和指示标志找到了唯一稍显空闲的厕所。他非常在乎食物，他注意到三餐的质量不高，所幸他与几位阿尔萨斯的亲戚久别重逢，这让他勉强能够忍受毫无变化的午餐，只求维持体力。队长为我们讲授性病（用上了投影！），可他“偷偷摸摸的语气让我什么也听不到”。除此之外，我们还看了表演和下午的电影（有关坦克的纪录片），进行了摩斯电码的学习。在不知不觉间，时间飞快过去。不久后，他有了注册号9835。在他身边，“没有十六区的居民，也没有与我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但也都是

一些好相处的家伙：三个神学院学生、一个从俄国过来的犹太人、派拉蒙的声音工程师（克洛德常常与他就技术问题大谈特谈），还有另一位犹太人，“他对政治有着正确但天真的想法，所以我便开始教育他！”（S12）列维 - 斯特劳斯在这些好伙伴的陪伴下进步，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他用策略和口才向队长传达他们的声音，来为所有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所以克洛德很受大家欢迎，而他也欣然接受，同时保持谦虚谨慎。事实上，他在城里的夏尔 - 阿佩尔路（rue Charles-Appell）买下了一个房间，所以，如果周日能够获得几个小时的休假，他便在房间里享受一人世界，但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非常勤奋地读报。布鲁姆（Blum）的《通俗》（*Le Populaire*）“对他而言就像是上帝”（S36）。他也读侦探小说。他还去电影院看了德国版的《三文钱的歌剧》（*L'Opéra de quat'sous*），这部电影比法国版内容更加丰富，让他热血沸腾。他温习了热内·克莱尔（René Clair）的《百万法郎》（*Le Million*），也认识了《马里乌斯》（*Marius*）里的演员雷姆（Raimu）和弗雷奈（Fresnay）。他在舒适的派拉蒙厅里如痴如醉。这个斯特拉斯堡的派拉蒙电影厅让他回到了巴黎的林荫大道。除了经典的美国电影，他也喜欢看苏联的影片，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社会主义者，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法国人所能接受的审美标准，因为“我们必须自己认识到，当我们欣赏那些电影里好看的图像、美妙的拍摄方式时，我们的做法事实上完全不合逻辑。这些电影绝不是艺术电影，而是一些用来感化和吸收不识字的农民的教学片”（S51）。如果电影对列维大兵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消遣，而在多年之前，以克洛德与父亲的谈话为契机，摄影成为他研究技术问题与进行理论思考的一片园地。摄影是传递时间的介质，也显示着现代的进步，它还代表了父亲的没落，以及艺术复兴的可能性。但前提是我们听懂这段话：“真正让人厌恶的是，所有镜头都准备就

绪。在德国的摄影作品里，美妙的是只有一个镜头准备就绪，最多四分之一毫米。是这种方式给了作品焦点，让拍摄对象的其他部位不被过分处理。这与绘画是一个道理。准备得过于充分只能拍出一部糟糕的纪录片。”（S27）“我觉得，照片应当表现人眼无法捕捉的那些细节。曼·雷（Man Ray）的摄影作品的秘密就在于此。”（S32）克洛德也进行了创作。他的父亲给他寄了一些花朵摄影作品的底片，而儿子有时不留情面地批评这些相片。他们谈到摄影技术时滔滔不绝，他们会比较型号“Korette f/4.5”与“SOM Berthiot f/4.5”各有什么优点。列维-斯特劳斯想要一台相机甚至一台摄影机，因为“军队生活非常适合进行拍摄，尤其是行军的时候”。

尽管装备、军帽和短枪沉重，在阿尔萨斯田野上行军并没有给他造成困扰。在体力遭受挑战的时候，行军中的士兵们还能在田野风景中捕捉到让人心动的一个个瞬间：“我们绕了一圈，风景非常动人。我们从东边出发，经过了森林，然后回到了莱茵河，莱茵河在逆光的天空下显得特别漂亮。最后，我们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桥，桥下五颜六色的大驳船就像是大型客轮，让我们精神一振。”（S18）但行军并不是军队生活的全部。时间被分配给各种不同的事务，例如，接受检查、安装天线，以及“高中教育一般的日常：电话是否运作正常、不同模型的示意图、通信惯用的记号，等等。是的，就像是高中。但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经历过那么闹腾的日子”（S36）。训练如何辨声、如何操作无线电、如何与飞机保持联络：“飞行器通过无线电与我们联系，而我们用几米长的庞大的信号牌向他们做出回应，解读我们模糊不清的信号需要经过学习。我们的日常工作就与这样一种语言为伴。”（S36）显然，解密与加密，这些语言上的技术活是有实际意义的。而随着时间流逝，克洛德感到这一切不过是徒劳，便表露出讽刺的态度。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失去耐心，并对“缝纽扣”的工作感到

厌烦。军队生活中有趣的经历一旦日复一日地重复进行，也变得索然无味。事实上，他更难忍受的是这种无所事事又忙碌不堪的生活：“我们几乎希望能爆发一场战争来证明我们的存在！”虽然他们的军队生活也有游戏，战场上的练习就如同游戏一般，但克洛德已经失去了刚开始的新鲜感。他觉得这些练习非常儿戏，因为他对作战行动的效率感到怀疑。在一场为了军官授勋而进行的地面与空军的联合演习中，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与他的同伴们负责解密飞行员传递过来的信息。作战顺利完成，竟然有些感人。所有这些活动都像是“孩子的打打闹闹”。下级军官的话开门见山：“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好笑又幼稚的家伙可以在真正的战场上调兵遣将！”（S50）筹备战争的名义反而玷污了克洛德的兵营生活，他是反凡尔赛军队、主张和平主义的政治运动分子。一段时间后，他厌烦了这种小打小闹的戏码，尤其因为他完全脱离了知识分子的环境，这种厌烦的情绪便更加浓烈。他不想再参与其中，也不想再见到这些：“这是法国和平主义的嘴脸：克隆恩堡（Cronenbourg）的练习场距离斯特拉斯堡 2 千米，那里布满了铁皮和木头建造的临时营房，我们把它们用作工具收容所。今天，其中一座营房的门敞开着，我们惊讶地发现里面放着一门上了弹的 155 大炮，水泥弹药桶，还有轨道之类的东西，这些全新的装备马上可以投入使用。”（S27）这门大炮让他大吃一惊，对克洛德而言，它既可以把他拖回现实，也可以暗示未来。

服兵役这段经历是放大镜，它让我们看到了怎样一个年轻人呢？少年修长的身影背后，我们看到了经过锻炼的结实身体，一个聪明的头脑。他用烟斗，不吸卷烟。他说，“烟斗的斗特别大”，所以要“和我的鼻子打架”。他是一个习惯孤独、喜爱孤独，同时也热爱户外生活的领导人，他却谦虚地接受了士兵的身份，并且从未尝试主动退役。他非常渴望体验军队生活，把服兵役看作另一种社会经历，把军队当成一个类似阿尔萨斯乡下的社区。然

而，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觉得无趣，这种感受非常强烈。“无趣”是列维－斯特劳斯生活中很重要的动力，但无趣不利于培养好奇心。军中的无趣带给他不可思议的遭遇，而丰富的精神生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年轻的士兵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他与父母维持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而这种情感上的关系颠覆了传统：我们发现他给父亲提了一些业余活动的建议，他建议父亲定期去电影院，这种父亲式的关怀也常常让他的父母感到安慰。当然，他也不时反对家里人过于频繁的信件（和关心）。然而，他只要几天没有写信，焦虑的情绪就爬上心头。他几乎每天都向父母推荐书本、电影，向他们聊一聊自己的思考所得和文字作品。他与父母保持了持续不断的沟通，而这个沟通管道也是他表达意见和关心的方式。他是这个过程的主导者，但整个过程缺不了双方的默契。

迪娜，1932 年夏，《婚姻的生理学》

1932 年夏天，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他在与家人的信件中对此事只字未提。列维－斯特劳斯突然就成了家，他先斩后奏，当克洛德告知父母时，他们才后知后觉。迪娜·德雷福斯以一种“不正当”的方式进入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命：“显圣”。克洛德在她周围布置了一道道迷障，我们对她了解甚少。他在哪里与迪娜相遇的呢？列维－斯特劳斯并未公布他那些心动的瞬间。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他们可能是在索邦相遇的，当时女孩坐在长椅上学习哲学；或者他们是在政治运动中相识的；他们可能相识于 1932 年春天，那时年轻的士兵已经回到了巴黎，他们也可能相识于这之后。他们对社会主义有着相同的热忱。迪娜·德雷福斯出身于一个犹太裔意大利家庭，她在罗马见证了法西斯力量的诞生。1922 年，她居住在庇亚门（Porta Pia）附近，楼下有一个共产党值班室。还是孩子的她目睹了一个“黑衬衫”组织洗劫这个社会

主义基地的过程。这个发生在罗马、她目睹的事件给还是孩子的她留下了创伤，继而成为她从事政治运动的起点，她后来这样说道。¹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她的父母是流亡到意大利，最后到巴黎避难的犹太人，他们有着左翼的倾向。

我们认识她是靠巴西拍摄的黑白相片。她身处营地，像是一位头发卷曲的牧羊人和冒险者，年轻人嘴角总是上扬，看起来有些男孩子的样子。事实上，他的妻子，不论年少或是成熟，都散发着令人疯狂的魅力，而她雅致的穿衣风格、一头威尼斯人的金发和迷人的香水味增加了她的魅力。她清澈的眼睛，带着意大利口音的声音，符合斯塔尔夫人口中“白璧无瑕”（*le tact des circonstances*）²的最高标准。她似乎给所有她接触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的学生。她是法国哲学教育的一位大人物，她的学生见证了她在1950—1960年的生活状态³，是唯一的见证人。尽管她闭口不提，她曾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妻子，他们正式注册于1932年9月中旬，那时她才20岁。注册后的隔天，他们就出发去往蒙德马桑，那里有克洛德的第一份工作，而这次旅途也是两人的蜜月。

事实上，1932年夏天并不只是被结婚的筹备工作占据，因为结婚再简单不过了。夏天，他们忙着出谋划策：“蒙德马桑可以接受，但我们需要一辆车[……]，如果有职位空缺的话，我可以去阿莱斯（Alès）。盖雷（Guéret）太偏僻了，与外界往来不便。但还能接受。圣奥梅尔（Saint-Omer）在加来（Calais）附近，但

1 贝特朗·圣舍宁（Bertrand Saint-Sernin）：《迪娜·德雷福斯：教书育人》（« Dina Dreyfus ou la Raison enseignante »），《现代》（*Les Temps modernes*）第516期，1989年，第152页。

2 同上书，第148页。

3 这些是弗朗索瓦丝·埃里捷（Françoise Héritier）、卡特琳娜·克莱蒙、西尔维·德雷福斯－阿瑟欧（Sylvie Dreyfus-Asséo）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观察。列维－斯特劳斯就读芬乃伦高中文科预科班期间，他们担任哲学老师或总督学。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也是见证人之一。巴迪欧与迪娜·德雷福斯十分亲近，1960年代，迪娜·德雷福斯是教育频道教学节目的主持人，而巴迪欧常常担任节日嘉宾。

天气不好。”他们还列出了其他选项：富瓦（Foix）、罗什福尔（Rochefort）、欧里亚克（Aurillac）……还有拉昂（Laon），但这里的两个职位空缺由他的伙伴卡昂（Kaan）和他的夫人顶上了。他们感到坐立不安，虽然与朋友们作比较（布万瓦被任命到贝济耶），但也互相知会。他们试着在招聘活动没有结束前与总督学取得联系。最后的结果是蒙德马桑：“我开始接受蒙德马桑的岗位，因为，除了从头干起我别无选择。”（P10）

朗德省的成果：外省的生活点滴

克洛德去了外省的高中任教。玫瑰色的砖块和石料构成的维克多－杜瑞伊高中（lycée Victor-Duruy）在克洛德眼中是这样的：

“我的教室面朝公园，它的面积不大，我在木制的小讲台上坐着，讲台与讲台上的黑色桌子大小一致，所以我在那里显得有些好笑。”（M3）这是高中教师资格证获得者的必经之路（完成了兵役之后，他马上进入这一步）。那些年的学习任务异常耗费精力，课程内容十分讲究，结束了之后，新晋的年轻教师们在各个省会、各大城市养精蓄锐，他们在这里培养哲学的灵魂。这段时光就像是他们人生里的“题外话”。一些人能利用自己对世界的好奇将这段时光过得美满，西蒙娜·德·波伏瓦在马赛时便是这样，她在摩尔（Maures）山地的密林里进行马拉松式的郊游。把这些优秀的灵魂派到外省，这样做将会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

蒙德马桑是朗德省的省会城市，一座漂亮的小城市，米杜兹河穿流而过。克洛德夫妇一抵达蒙德马桑就对它的美景赞叹不已：松树林将它与村镇相隔（还有杨树、栗树、月桂树），牛肝菌散发着香味，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集会吸引了无数货摊和人流，鸭鹅成列行走，马路上的人们对阿尔卡雄（Arcachon）的贝壳和牡蛎

发出尖叫声。在寻找住所的过程中，年轻的新婚夫妻在旅馆暂时落脚，克洛德为迪娜买了“无法描述的棕色的小腿套”，让迪娜看上去像“一位波斯公主”（M20）。终于寻觅到一套公寓房之后，克洛德给父母寄了一封明信片，上面也交代了房子的事情。年轻的夫妇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而克洛德这位新晋丈夫常常将两人的消息通过信件传递给父母，“新的女儿”迪娜也会在其中写上几笔。这些信件传递了浓浓的爱意。

在蒙德马桑的这一年对克洛德而言是学习各种事物的一年：上第一节课、管理收入分配、做饭、适应外省的生活与适应二人生活。愉悦的气氛感染了这一年内的所有信件，它们似乎暗示了两人在朗德的生活非常融洽，两人一同发现的新鲜事物也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他们欣赏朗德的天空（它“美丽又个性十足，我很少在其他地方遇到这样精致、柔美又气势磅礴的天空”），或者骑着自行车闲逛（迪娜学着掌握这个工具），或者参与这片乐土为他们提供的美食节。另外，他们为当地的政治感到恼火。

食物常常出现在来往的家书中，几乎“纠缠不休”：每周菜单详细的内容、价格和购物开支，他们都一一告知；他们还与母亲交换菜谱，征求建议（比如询问甜点“椰枣梅子鲜奶油”、巧克力松露、犹太风味肉丸怎么样）（M7），并向他们描述他们的美食探险。比如，他们到马尔桑新城（Villeneuve-de-Marsan）去品尝“奶油蘑菇与法国百合、内里鲜嫩的半脂鹅肝，它们简直是人间美味”。列维－斯特劳斯去巴约讷拜访了马修一家人，父母的好友，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觉得马修一家人有些拘束，但他的疑虑很快被餐桌上的热情好客打散（菜式与斯特拉斯堡一样）：“它们美味得让我惊讶不已：橄榄鳀鱼、壁炉烤苹果配猪血香肠、烤斑尾林鸽，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它们的味道。沙拉、蛋糕、水果、咖啡、阿马尼亚克烧酒、核桃水、黑加仑酒，还有一种呛

喉咙的西班牙红酒。”迪娜这样评价道：“克洛德‘喜形于色’，他的面色和表情让人看了觉得非常愉悦。他在泰瑞斯（Thérèse）面前表现得非常不错，泰瑞斯从没有看过这样的克洛德，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严肃、认真的一个人。而我现在知道莫斯卡托葡萄酒的魅力了。”（M19）就在这时，列维-斯特劳斯从走私贩那里买了一瓶莫斯卡托葡萄酒，把它小心翼翼地藏在他雨衣的袖子里。

另一个他常常在通信中谈到的内容偏属男人的话题：汽车。在那个时代，汽车这项新技术仍然具有很大的魅力，吸引着人的眼球。除此之外，想要追求速度的人们自然也对它非常渴望。别忘了，他们被派到了一座偏僻的城市，汽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而他们也早已表达了对汽车的渴望。当克洛德投入当地政治活动之中后，他买车的行为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父亲传递的一些有关汽车的信息出现在儿子的信里：他们讨论汽化器、发动机、制动器、汽缸、车身。“皮埃尔的表兄非常厌恶雷诺的莫诺西车型（monosix），它的发动机太脆弱了。标致 5 CV 车型不错。”（M45）皮埃尔·德雷福斯在他们买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 1955 年成为雷诺管理公司的老板……“非常漂亮的 5 CV 敞篷汽车”，新出的福特 6 CV 也好得很，可是价格超过他的预算。他的预算只能买一辆更加普通的、被称作三叶草的雪铁龙 5 CV。1933 年 1 月，迪娜和克洛德开车从巴黎一路返回。开车的是其他人，可这也挡不住车主克洛德的激动情绪：“看来压低的汽缸盖效果不错，车子可以开到 75 码！”（M60）这是汽车的青铜时代，买车仍有些冒险……克洛德常常提起这段买车的趣事，而他对汽车的热情也与那一年朗德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有着联系：他参与了当地社会党的活动。决定参与区里的选举之后，他才买了车，因为他要参与十几场会议。然而，第一天，在皮埃尔·德雷福斯和迪娜的陪伴下，没有驾照的克洛德就把车开进了沟里。他一个小

时之内什么也回想不起来，额头留着血，左膝盖关节滑液渗出；皮埃尔·德雷福斯呕出了血，脸部一半没有知觉；迪娜没有受伤。当地的新闻称他们受伤严重，而图卢兹电台称他们徘徊于死亡边缘。这些消息让克洛德在朗德省社会党的朋友们非常着急（M70）。汽车没有投保，汽车偏离马路多半是轮胎充气过足造成的。这场事故意义重大，因为从克洛德后来的文字记载中看，它完全结束了他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涯。¹然而，这样的变节并没有让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解除武装，他已经开始了冒险：“我的参选人资格让我觉得有些好笑，因为我既没有满25岁，也没有在朗德省居住满6个月，所以两个标准没有满足。[……]我的对手是米利耶斯·拉克鲁瓦（Milhès Lacroix），他是达克斯（Dax）的议员和市长。55岁的他是个反动派。这倒是让人高兴。”（M40）既没有参选资格也不是民选代表，既没有驾驶证也没有汽车！这场事故倒为他赢得了一篇讽刺文章。他将这篇文章收藏了起来，并为它取了名字——《圣马丁的演讲》：“您开着车，您，开着国家的车／而您不会控制您的车／哎呀！您把它弄得惨兮兮／您将要发表长篇大论，谈论未来的城市。／您毁了自己的形象／而我们对这场糟糕的事故表示惋惜／但我们怀疑您和您的才能／亲爱的老师，我们必须跟您说／在教导我们之前，学会开车。”²其中可见诸如此类的内容。开车事故既没有抹去他对汽车的喜爱，更没有熄灭他从政的热情。几个星期之后，他参加了驾驶资格的考试，然而在3月13日，以没有通过的结果告一段落（在他之后，迪娜也没有成功。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懂得辩证法却不会操作离合器）。这让他很生气：“考官仗着有贵族的姓氏，冷漠得不行。他让我在迷宫一般的小马路之间穿梭，马路之间的拐角弯度很大，而且

1 《亦近，亦远》，第24页。

2 《圣马丁的讲话》属于“政治活动”主题档案的一部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0。

还有很多斜坡。我自认为我非常小心谨慎，一直挂着二挡。这并未让他满意。”（M63）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它让克洛德的政治活动步履维艰，然而，克洛德从未放弃。

正是当地的政治生活培养了那时克洛德对汽车和美食的喜爱。受来自蒙福尔－昂沙洛斯（Montfort-en-Chalosse）的朋友布罗卡（Broca）的邀请，克洛德决定全身心地投入朗德的政界，准备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建立一个新的分部：“能够开始从事一些政治活动，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朗德的联盟死气沉沉！而且，有的同志会准备鹅肝！”（M30）列维－斯特劳斯来势汹汹，他要征服这个由佃农和田产组成的国度，让这个国度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分子提出阶级斗争的话题。阶级斗争是激进党小心掩饰的话题。克洛德不与浑水摸鱼的激进派妥协，他的态度十分坚定；几年之后，在朗德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人民阵线的活跃更加增强了社会党的存在感。克洛德在20多人面前为新分部的成立发表演讲：“我做了1小时15分钟或者1.5小时的讲话，我谈了社会主义。[……]有一些城市已经20年没有出现从事政治宣传的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身影了。”布罗卡带他参观了自己的一家小厂，工厂加工鹅和瓶塞；列维－斯特劳斯感到迷惑，他以为他回到了还存在手工业等行会的那个时代。他心情愉快地在政治和美食领域展开探险，他越是厌倦“蒙德马桑死气沉沉的政治环境”（政治活动分子“被市政府一个要求他们与激进派合作的政策捆绑住手脚，因为他们在这里也只有激进派一位对手……”），他便越能在探险中找到乐趣（M26）。

有妻子做伴的克洛德年纪尚轻，他感到急不可耐。他穿梭于省内，使尽了浑身解数。他对人群（至少是政治活动分子）发表讲话，展开政治宣传活动，还在放学后赶去印刷厂：“我现在代表了联盟，因为我是所有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要发生大事了！”

（M59）这种与政治活动之间既严肃又轻松的关系当然不仅仅发生在列维－斯特劳斯特身上。在布尔格－昂布雷斯（Bourg-en-Bresse）的保罗·尼赞以及所有获得哲学教师资格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他们常常成为在外省传播左翼思想的“传教士”，他们各有各的烦恼，反而乐意投身于这项向学生们传播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哲学老师积极投入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特身上再次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活力——克洛德总是积极又热情，用尽一切力量“改变”世界。1933年的危机让公务员薪水面临下调的压力。老师们向维克多－杜瑞伊高中的校长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它是用一种柔和得可怜的语气写的，我参与了起草的过程，我们与公务员工会组织共同发表的互助声明也在我的帮助下获得了一致同意。当时，我支持了一场持续半个小时的罢工，但我并不是发起人，后来，我便没有继续了。”（M60）

他的巧辩与他服过兵役、参加过政治活动的背景让他快速成为朗德省的重要人物。1933年2月，他受邀代表联盟在一所位于圣马丹－德塞尼昂（Saint-Martin-de-Seignanx）的非宗教高中的落成仪式上发表讲话。台下有省长、学区督学、行政区议员（激进派）。“这个场合不能开玩笑。”这是一个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所描述的“教师共和国”，而列维－斯特劳斯特曾不留情面地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发表文字批评“教师共和国”¹。本地媒体谈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关于非宗教学校的公开讲座”，他指出：“这些免费的学校是必要的。”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的演讲中完全没有插入玩笑话，整个过程，他都在谈论共和国体制下对学校的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这使他的讲话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阿尔贝·蒂博代〈法国的政治思想〉评论》（« Compte rendu d'Albert Thibaudet, *Les Idé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社会主义大学生》第4期，1933年1月，第14页。

建立在政教彻底分离带来的空壳之上。按照他的演讲，政教分离造成的后果更像是一种“劳工的人文主义”¹。有人猜测这位年轻的社会党成员会激烈反抗，所以请他在之后的宴会上讲话。列维-斯特劳斯以“民族志的讲述方式”谈论了法式的左翼政治文化：“漂亮的学校，漂亮的玻璃房子，我们可以从空中、从广场上欣赏它的美。市长的发言、小学督学的发言、老师的发言、激进派议员拉萨勒（Lassalle）的发言以及区长的发言，还有孩子们唱的第九交响曲。我为自己没有打扰这个全国联合一致的盛事而感到万分庆幸。在落成仪式之后，我们在市政厅喝了开胃酒，随后，我们入席一个90人的宴会。宴会成员包括各种无产阶级（农民、小公务员、工人）。而宴会厅是一个木头房间，地上铺满了杉树枝。多么美妙的宴会！我们下午1点40分开始，直到6点宴会还没结束！但我从未见过这般能够让人大快朵颐的餐点和酒水。首先，肉汤、各种肉品、一整条1.5米长的冷藏的鲑鱼（我没有夸张）以及装点鲑鱼四周的蛋黄酱、香菇牛里脊配阿马尼亚克烧酒、法国百合包奶酪、被各种食材填满的火鸡、沙拉、被带子环绕的节庆蛋糕、水果、起泡的葡萄酒、咖啡、阿马尼亚克烧酒。整个宴会厅被圣埃米利永（Saint-Émilion）红色和白色的新鲜花朵装点起来。这一切的安排比大餐厅还要精细和讲究，简直让人无法想象。此外，当我被要求在有些醉意的人们面前讲话时，我有些措手不及。我侃侃而谈，我谈到了社会主义和政教分离，我的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虽然这些内容让区长感到不快。看起来，我表现得不错。我讲了大约3刻钟，之后拉萨勒接过了话筒。他说他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可他当时醉醺醺的，甚至不能走出宴会厅。随后，区长也拿起了话筒，他‘偷偷地’向我祝贺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主义和政教分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朗德省圣马丁德塞尼昂一所非教会学校成立仪式上的讲话》（《Socialisme et laïcité. Discours d'inauguration prononcé à Saint-Martin-de-Seignanx [Landes] à l'occasion de l'inauguration d'une école laïque》），《社会主义大学生》第7期，1933年4月，第4—5页。

并对迪娜说了一些话。最后，《法国报》（*La France*）和《快信》（*Dépêche*）的记者也发表了讲话。人们都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拉萨勒使出浑身解数，他想要征服这个让人感到危险的政治活动新星；一位身材健硕、穿着燕尾服和灰色裤子的老先生向我走来，他带着感情对我说，他在很久以前听过一位和我年纪相仿、与我同一党派的演说家的讲话，老先生认为只有这位名为皮埃尔·拉瓦勒（Pierre Laval）的人物能与我相提并论，老先生还说我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他还不忘提醒我，七八年后就能验证他的话。”（M54）

这些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经历虽然只是乡里的谈资，克洛德却有意为其添油加醋，好让父母听了高兴，但不管怎样，这段经历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克洛德的一个印记。此后，他向乔治·沙博尼耶（Georges Charbonnier）解释道：“市议会与国会的管理之道不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本质上的不同。”¹ 决策的制定基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互相了解（*interconnaissance*）。列维 - 斯特劳斯特认为真正的政治应该基于互相了解，因为基于互相了解，人们才可以清楚地认识问题。换言之，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真实，也存在着没有人能实现的空洞的决策。“真实程度”的概念在地方政治的实践中显露无遗，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地方政治活动对列维 - 斯特劳斯特而言有什么意义，只需要知道他常常参与其中，所以对它非常熟悉。他放任自己在虚无的政治活动中玩耍，直到 1961 年，他卸下了对政治的执着，换上了一套学究的行装：如果这位人类学家是改革者，“他应当主张权力全面下放，以求社会、经济活动能通过这些不同程度的真实而得到实现，而在这种真实环境中，人与人

¹ 乔治·沙博尼耶（Georges Charbonnier）：《真实的程度》（« Le niveau d'authenticité »），载《与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对话》（*Entretiens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1961]），巴黎：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2010 年，第 53 页。

之间相知相识”¹。

让我们回到 1932—1933 年的蒙德马桑。他在那些活动之外如何维持教学活动？学生们喜欢他吗？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看到了一位幸福美满的老师形象：他开心地备课和授课。他要为高中的男生们上课，五位男生的哲学课，十位男生的基础数学课；他还要为中学的女生上课。他“从教室的这头走到那头，从不停歇，所以到了晚上就精疲力竭”（M7）；他怀疑他的学生并未理解这门重要学科的价值，但他们“听课的时候兴致盎然。我即时起意讲到波德莱尔，这些天马行空的联系让他们措手不及”。这位年轻的老师不仅要准备哲学也要准备文学课的材料，他在设计课程内容的时候便从自己喜爱的名单中选择一二：波德莱尔与易卜生。他对自己设计的挪威戏剧的授课内容感到自豪，他是这样开场的：“1830—1910 年欧洲文化运动的概论：绘画有印象派，音乐有瓦格纳，诗歌有象征主义，文学有左拉 [……] 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知识分子运动的总结。”在哲学课上，他声称设计了“有趣的内容来讲授归纳法与习惯”。他认为，学生们应当通过学习掌握正确的文化知识。后来，他希望借助理科这块跳板来提升社会科学的地位，但当下，他并没有拿出办法，他幽默、故作轻松地承认了自己力不能及，这在他的信中可见端倪：“我不止一次试图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我要在课上向学生们解释。我希望他们比我更满意我讲课的效果。说实话，我不过是虚张声势……”（M31）

克洛德的学生们还记得这位老师，在 1984 年他们对克洛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乐观向上的老师形象。当时的克洛德比学生们大了不过几岁：“他喜欢在课堂上不停歇地踱步，他以

1 乔治·沙博尼耶：《真实的程度》，载《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话》，巴黎：美文出版社，2010 年，第 54 页。

这种方式追求灵感，而他的灵感总是源源不绝。他灵动、黑得发亮的眼睛只需要通过一个眼神就能吞下我们所有人，而自然摇摆的步伐让他能够轻松地原地旋转，矫捷的动作让我们措手不及。他这个大动作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在他的思绪之前抢占先机，好让他寻觅到那个最恰当的词汇。因为他从不愿意轻易屈服于一个晦涩难懂的术语对他的蛊惑。他的职业意识令人赞叹，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他在备课、认真又充满感情地批改作业时从未遭遇绝境。我记得，他未曾向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施以任何形式的惩罚，甚至未曾训斥过我们。相反，他喜欢鼓励我们，有时也会表扬我们。”¹ 他设计课程内容时未曾碰壁，他也没有将社会主义信仰带入课堂中，他在授课过程中保持意识形态完全中立。但蒙德马桑当地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了解老师所从事的那些政治运动，这些活动反而提升了克洛德的威望，给他添加了一丝与众不同的气质……²

检查是例行程序，同时，对新任老师意义重大。列维－斯特劳斯特等待督学卢斯坦（Roustan）先生来检查，而他准备的“惊喜连连的授课内容”并没有派上用场。最后，卢斯坦先生来了，年轻的克洛德上了一节“非常形而上学”（M82）的课。半个小时之后，年长的督学让克洛德停下来，他在学生们面前表扬了克洛德。之后，克洛德与校长在校长办公室相约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下一年度的教职空缺。与兵役的情况一样，克洛德对外省的“异域风情”已经兴趣索然。迪娜·列维－斯特劳斯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备考期间，丈夫克洛德忙完所有事情之后还会提供帮手。21岁那年的7月，迪娜获得了教师资格。几次推诿之后，克洛德被“提拔”到拉昂（Laon），而他的妻子将去亚眠（Amiens）任教。

1 罗贝尔·罗兰（Robert Lorans），蒙德马桑维克多－杜慧高中往届毕业生特刊《资讯》，1984年圣诞，社会人类学研究所（LAS）档案室，“媒体摘要”。

2 同上。

拉昂的日子与返程

另一段人生开始了，这是一种往返于两地的生活。今天，异地通勤的老师们靠的是现代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昨日的双城记依靠蒸汽机车也能实现。克洛德和迪娜分居两座城市，分别在两所高中授课。每周的前几日，他们一同住在饭店，整理授课内容；周末他们相逢于巴黎，并且回到父母膝前，父母住在普森路的公寓里。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圣诞，克洛德被教育部派到拉昂任教，他在这儿待了一年半。对他而言，这段时光非常重要，因为它见证了自己转向民族学的过程。

他没有抛下政治活动，但他更常在巴黎活动。对于拉昂，“尽管那里的条件艰苦，但这座城市也不是完全没有魅力的。它的大教堂好像稳稳地蹲在地上，显得非常结实，让人印象深刻”¹。从克洛德的前辈和后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昂是新任教师们苦苦寻找的地方，它就像是一座驻扎的城市，能够满足他们急于往来于巴黎的心情。路易·法里古勒（Louis Farrigoule），别名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他在1911—1914年在拉昂教课。他点出了拉昂的优势：“人人觊觎拉昂的职缺，因为它离巴黎非常近——搭乘快车只需要1小时44分钟，而拉昂的教学任务也非常轻松（主要负责一个五六人组成的班级，也没有预备班，此外，课时很少又集中），所以我可以住在巴黎，每周只需要来拉昂住两个晚上。”²1936年，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一年半之后，让·保罗-萨特接棒在拉昂任教。他也是每周前几天才来拉昂：他周日晚上到，然后乘坐周三下午5点的火车离开。在他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通信中，他曾几

1 《亦近，亦远》，第25页。

2 克里斯蒂安·卡雷特（Christian Carette）引用了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的话，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拉昂高中（1933—1934）》（« Claude Lévi-Strauss et le lycée de Laon, 1933-1934 »），《拉昂人之友》（*L'Ami du Laonnais*）第46期，2010年9月。

次提到“他对拉昂的看法”：“那里的生活节奏很慢，有业余活动（过去的外省生活就是这样）；必须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以及感受时间慢慢流淌的过程。”¹ 萨特的同事们暗地里策划让他必须在高中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正式的讲话：“布万瓦，曾经在拉昂任教过，他是让·扎伊的办公室主任。他安排部长到拉昂访问，我想他一定计划让我们措手不及”，萨特用嘲讽的口吻这样向卡斯特（Castor）² 解释道。拉昂、布万瓦、萨特、人民阵线：列维 - 斯特劳斯特紧密地与这些圈子（高中哲学老师的圈子、社会党的圈子）打交道，他们很可能构成他未来生活的一部分。而最终，他却缺席了，因为他已经改投他派。

1935 年 1 月，瓦伦丁·费尔德曼（Valentin Ferldman）接替了克洛德的教职。他原是犹太裔的俄国人，后来移民到法国，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可惜命运待他不公。他参加了二战期间法国的抵抗运动，后来被捕，1942 年 7 月 27 日，在瓦莱利山上被枪决。他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手足一般，这与列维 - 斯特劳斯的风格迥然不同。克洛德严肃、和蔼又亲切，可他时刻保持理性和中立，一旦走出教室后便不再干预学生的生活。克洛德既不与学生为友，也不是学生的心灵导师；他既不像费尔德曼，也不同于萨特。在哲学老师的教学实践中，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从 20 世纪初开始广为传播。它要求老师不再成为他人思想的传播者，而是成为思想的创造者：老师的教学就是他的作品，这个作品需要一个具有威信、常常带有颠覆色彩的声音主持大局，所以，它的主人不仅仅是一位授业者：他是一位良师益友、培训师、听人忏悔的神父。³ 这是经萨特的修正与改良之后阿兰（Alain）的风格。然而，这种风格并不为列维 - 斯特劳斯特接受，因为他的

1 克里斯蒂安·卡雷特引用了让 - 保罗·萨特的话。

2 Castor（河狸），是友人对波伏瓦的昵称。——译者注

3 参见让 - 路易·法比亚尼：《共和国的哲学家们》。

血液与它深深排斥。他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然而，不管政治活动多么频繁（甚至比萨特更加频繁），拉昂的学生们对此毫不知情，而他的这些活动也没有影响他授课的内容。同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这个新的教学模式所体现的“使命感”，尽管他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将使命感活用到民族学的研究上，从此与哲学分道扬镳。

改 行

民族学的门外汉

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准备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时候，法国民族学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这门学问正在转变为一门学校里的学科：它让人们热血沸腾，让人们对科学，同时也对先锋派的艺术品味产生了不可动摇的兴趣，这是一种对异域风情的迷恋。这门学问成为某种世界潮流，它的所有内容在左翼人道主义者的讲话或者人民阵线殖民地改革派的主张中展现无遗。为了模仿洛特雷阿蒙的风格，我们可以说，这是前超现实主义乔治·巴塔耶与巴黎文献学院学生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风格的混合，而他们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物件。在诺瓦耶子爵（Noailles）（他是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友好协会的主席）的资助下，这件古董得以公开展示。10年后，它被贴上了民族科学研究的标签，被收藏于人类博物馆。

我们常常注意到人类学与先锋派之间“长久的毗邻关系”¹，这是一种法国特色。我们无法在别处看到这样的联系。在法国，一些超现实主义（其中的“异端”分子），比如，巴塔耶、莱

1 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论超现实主义中的民族志元素》（« Du surréalisme ethnographique »），载《文化中的病态：20 世纪的民族志、文学和艺术》（*Malaise dans la culture. L'Ethnographie, la littérature et l'art au XXe siècle*），巴黎：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1996 年（初版时间为 1988 年），第 129 页。

里斯（Leiris）、德斯诺斯（Desnos）、格诺（Queneau）、林布（Limbour），与民族志研究的圈子保持了非常热络的合作关系和友好关系。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期刊《文献》（*Documents*）中。1930—1931年，这份出版了15期的期刊成为分享新的世界观的平台。对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而言，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民族学”的态度，一种颠覆传统的态度。1914年的战争给这些人留下了一个破碎不堪的西方文明，以及造成这一结果的范式：现实性（*réalité*）、常态性（*normalité*）、优越性（*supériorité*）。由于这些既有的信仰出现了很大的缺口，我们熟悉的城市里出现了陌生的事物，这是超现实主义运动者追求的事业，而他们也颠覆了传统的认知，他们带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选项，这些选项成为刺激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灵感。双方共同的世界观表现为对高阶文明与低等文明之间所有等级标准的否定，这种主张也体现在《文献》之中，这份期刊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拼贴各种图像与文字，从西方高雅艺术到城市文化的图腾、从地区手工业到摄影、从异国玩意儿到好莱坞电影、从爱斯基摩人的面具到毕加索的画作，所有东西都能成为他们的材料。期刊以“文献”为名，而文献刚好也能刷新艺术的概念，因为“物”登上了艺术舞台，而艺术家们和民族学家们开始主张将“物”视为艺术品。¹ 乔治·巴塔耶与民族志学者阿尔弗雷德·梅特罗维持了一生的友谊；迈克尔·莱里斯在民族学与文学领域均有建树。他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这些人见证了1930年代法国民族学与其他领域的友好合作、与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

此外，民族学这门学问立志要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新的学科。要完成这个目标，教育机构和人的参与都是关键因素。两次世界

¹ 参见文森·德巴恩（Vincent Debaene）：《告别旅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法国民族学》（*L'Adieu au voyage. L'Ethnologie française entre science et littératur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10年，从53页起。

大战之间的民族学站在四位巨人肩上，他们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保罗·利维（Paul Rivet）、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与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一项大计划——人类博物馆的建设工程——改变了这门学科，也为它找到了一个新的安身之所。人类博物馆替代了之前的特罗卡德罗博物馆，成为一间新的“异国玩意儿旧货铺”¹。因此，这段民族学的历史完全就是“两座博物馆的故事”²。

莫斯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研究者、地位不俗的老师、社会主义者、德雷福斯派，他有些放荡不羁，“处于困窘之中”³（à la confusion inspirée），是出了名的爱保持沉默者。他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他在民族学研究所讲课，民族学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是这门新学科的摇篮。他的听众既有学生，也有殖民地出生的学者，后者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壮大了民族学。莫斯是涂尔干的侄子。他培养了第一批民族学家，他们去田野考察。但莫斯本人并未进行这样的实践。莫斯向他们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培养了他们学者的野心，借此机会，民族学这门年轻的学科进入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殿堂，与社会学平起平坐。保罗·利维自己曾是一名军医，他改行学习民族学之后便专门研究哥伦比亚。⁴利维后来成为有名的美洲专家，他也是一名聪明的政治家：他是社会党成员，也是成立于1934年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戒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发起人。1930年代，专制政体和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得势，利维贯彻学术人文主义，把它当作自己的使命。利维在学界没有莫斯那样的声望，但他做了一件事，

1 詹姆斯·克利福德：《论超现实主义中的民族志元素》，载《文化中的病态：20世纪的民族志、文学和艺术》，第138页。

2 同上书，第137页。

3 参见詹姆斯·克利福德：《论超现实主义中的民族志元素》，第127页。原话出自安德烈·勒罗伊-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

4 克利斯提那·罗利埃尔（Christine Laurière）的专著对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参见《保罗·利维：学术与政治》（Paul Rivet.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档案丛书”，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社（Éditions scientifique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2008年。

为民族学找到了一个安家落户的地方：他从 1928 年起负责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的改造工作；1937 年，他成为人类博物馆的馆长。而这座博物馆是法国传播民族学知识的标志性机构。得益于他在政界的朋友们的帮助，利维成功地将民族学列入一个主张人文主义和改革的左翼团体的政治日程。吕西安·列维 - 布留尔，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他的存在，而在那个时代，他曾是一位“明星人物”：他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法国社会科学界著名的代表人物、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而他的声誉来自他对“原始思维”浅显易懂、观点强硬的解释。与利维一样，他也是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他为民族学创造了一个政治和社会网络，这是其他人办不到的。利维常常从他这里获得信任与支持。¹

乔治·亨利·里维埃完全是另一类人物。他反复无常，风格多变，但也很迷人，这与信仰专一的军医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筹备人类博物馆建设，1928 年，利维把这位能够演奏管风琴、爱好爵士乐的翩翩少年拉拢到自己的阵营，而年轻的乔治·亨利·里维埃是约瑟芬·贝克（Joséphine Baker）——他是民族学博物馆志学者——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个建设项目也牵涉 1937 年的世界博览会²。陈旧的特罗卡德罗宫以及它轮廓分明的风格（继承自 1878 年的世界博览会）被外形朴实、延续 1930 年代功能主义风格的夏洛宫（palais de Chaillot）替代。作为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部分的人类博物馆将安置于夏洛宫内。这栋建筑物的建设对列维 - 斯特劳斯的事业有着巨大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说。在

1 托马·赫尔斯（Thomas Hirsch）整理了列维 - 布留尔的思想，考证了他对当下法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参见托马·赫尔斯：《人类学的“弗拉马利翁”？列维 - 布留尔、田野调查和民族学》（« Un “Flammarion” pour l’anthropologie ? Lévy-Bruhl, le terrain, l’ethnologie »），《起源》（*Genèses*）2013 年 1 月，第 90 页；托马·赫尔斯的博士论文：《法国（1901—1945）的“社会时间”：社会学意义上的时间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历史》（« Le temps social. Conceptions sociologiques du temps et représentations de l’histoire dans les sciences de l’homme en France, 1901-1945 »），博士生导师为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4 年。

2 参见尼娜·戈尔古斯（Nina Gorgus）：《橱窗魔术师：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Le Magicien des vitrines. Le muséologue Georges Henri Rivière*），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2003 年。

這個過程中，具有更强科學性的研究工作逐步展開，民族學學科建立了起來。這與特羅卡德羅博物館展覽和受眾中彌漫的一種遠離科學、與胭脂水粉為伍的氛圍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一代人逐漸成長起來，其中包括阿爾弗雷德·梅特羅、馬塞爾·格里奧爾（Marcel Griaule）、米歇爾·萊里斯、安德烈·舍弗納（André Schaeffner）、喬邁·狄泰倫（Germaine Dieterlen）、德尼茲·波爾姆（Denise Paulme）、路易·杜蒙（Louis Dumont）、雅克·蘇斯戴爾（Jacques Soustelle）。¹民族學先是誕生為一門田野研究的學科，與室內研究泾渭分明。神聖的“田野”代表了需要造訪異國百姓，而這是嚴謹治學的保證。因此，這門年輕的學科與當時無數冒險家們的做法區別開來，冒險家們創作故事並將故事廣為流傳。²這是一門剛剛誕生的學科，地域實踐的必要性是它的核心內涵。它的任務不是長期與當地居民住在一起，而是探查、收集信息和物件。³文森·德巴恩（Vincent Debaene）說，因為沒有一本正經的課本教導研究的方法論，研究工作就顯得非常業餘；而英國則不同，他們有著堅實的民族志研究傳統，所以也出版了相關書籍。儘管馬塞爾·莫斯也印了一些《供旅行家、管理者和傳道士使用的描述性民族志手冊》（1926）⁴，但法國人幾乎都是在實踐中學習。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一些著名的考察活動，其中處於第一梯隊的是馬塞爾·格里奧爾領導的達喀爾—

1 唯有莫里斯·林哈德（Maurice Leenhardt）例外。10多年前，他就已經對新喀里多尼亞進行了田野考察。其田野考察的理由（傳教）與歷史時機（生於1878年，卒於1954年）使他的考察具有重要意義。

2 參見文森·德巴恩：《告別旅行：科學與文學之間的法國民族學》，從第65頁起。

3 參見貝諾瓦·德·萊斯圖瓦勒（Benoît de l'Estoile）在這一問題上的相關闡述：《收集世界的文化：遠征的民族志研究者》（《Collecter les cultures du monde : des ethnographes en expédition》），載《他者的誘惑：從殖民展到原始藝術》（*Le Goût des autres. De l'exposition coloniale aux arts premiers*）。

4 1947年，德尼茲·波爾姆（Denise Paulme）在一本民族志研究的手冊中嚴格以“研究指導”（《Instructions》）作為其中一章的標題。

吉布提（Dakar-Djibouti）考察团（1931）。¹ 这些考察活动成为法国民族学的备忘录，同时，它们也促进了收集工作的开展，收集在民族志研究中至关重要。于是，博物馆和具体的研究地域成为民族学的两大中心，一个是展开实际研究的场所，另一个则是研究机构所在地。在它们的基础上，这门年轻的学科急着与古玩商店和探险者划清界限。但民族学研究总是伴随着一段让我们今天觉得有些沉重的冒险，因为这些冒险需要在殖民地展开。

我们长期打着殖民展与人类博物馆势不两立的虚假旗号，称1931年的殖民展只关心异国风情的物件，而人类博物馆（1938）则代表了学术人文主义和一门民主的学科，以此借口隐藏人类博物馆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殖民历史的事实。事实上，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Benoît de l'Estoile）曾严肃地指出，不论殖民展还是人类博物馆，两者都表达了我们“对他人的兴趣”，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在1930年代的法国，两者都从“殖民地改革”的角度肯定了人类多样性的正面价值，而在殖民地改革的主张之下，法国民族学的主要支持者、殖民地的部分管理者以及社会党大部分成员集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年轻的列维－斯特劳身为社会主义运动分子，与利维的信仰不谋而合。他在1929年的一篇以“社会主义和殖民化”为题的文章里表示接受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遗产，但他希望能够改变这些遗产的命运：“在殖民帝国这个现实面前，社会主义者虽然关心社会组织形式，但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不能否定殖民地的价值，我们应该站出来，给予他们我们的信任，同时，要求自己把这样的信任转化为改善殖民地土著人生活条件的动力。”² 利维并不拒绝海洋部对殖民地

1 让·雅曼（Jean Jamin）：《失乐园的宝藏（有关达喀尔－吉布提的考察）》（« Objets trouvés des paradis perdus [à propos de la mission Dakar-Djibouti] »），载雅克·艾纳尔（Jacques Hainard）、罗兰·卡尔（Roland Kaer）编：《“热情”展》（*Collections Passion*），纳沙泰尔：民族志博物馆（Musée d'ethnographie），1982年。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社会主义和殖民化》（« Le socialisme et la colonisation »），《社会主义大学生》第1期，1929年10月，第7—8页。

的关心，海洋部不仅资助了他建造博物馆的计划，也资助了一些考察团，其中包括了达喀尔—吉布提考察团。针对达喀尔—吉布提考察团，1931年3月，海洋部还投票一致通过了一项法律。海洋部此举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帝国以便更好地管理帝国，并且传达人民阵线有关殖民地的学说。利维自在地承认人类博物馆是“一个殖民博物馆”¹，里面的藏品基本上来自帝国的殖民地。如果民族学与反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与民族学走得很近的先鋒派有反殖民主义的主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民族学与反殖民主义存在联系），“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民族学的建设还能得到公共资源的帮助”²。此外，民族学得到支持不仅仅是为了让它在法国土地上美化帝国的形象，更是为了堵住全世界人们的悠悠众口（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利维辞去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戒委员会里的职务，他用这种方式反对这个他曾参与创立的协会竟明确表达反殖民主义立场。换言之，人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学不是一门附属于殖民主义的学科，而是一种伴随改革殖民地的主张而付出的努力，而民族学应当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科研成果。

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往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几乎没有参与，甚至一丁点都没参与。他没有成为莫斯学生中的一员，尽管他在1931年秋天取得教师资格证后联系过莫斯：“7月，我刚刚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民族志研究非常吸引我，如果您能给我一些建议，我会感到非常高兴。10月20日左右我就要去服兵役了。如果您能在那之前见一见我，我就感激不尽了。”³这对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的年轻夫妇与民族志领域有过一些交集（迪娜·德雷福斯曾在民族志博物馆干过一点活，这似乎是她哲

1 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他者的诱惑：从殖民展到原始艺术》，第73页。1938年5月31日，保罗·利维向达拉迪尔（Daladier）写信。

2 同上书，第74页。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塞尔·莫斯的信（1931年10月4日），被收藏于法国当代出版纪念馆（Imec）马塞尔·莫斯档案库。我要感谢爱丽丝·康克林（Alice Conklin）的帮助。

学课程的一部分¹），但这些我们通过档案偶然了解到的“客串活动”只能证明列维-斯特劳斯——就像他一直挂在嘴上的那样——在这时就是一个民族志领域的门外汉。²他与民族学有过两次接触，但每一次都是用别人的名义或者他的假名：1930年，当列维-斯特劳斯还是乔治·莫奈的助手时，他亲笔撰写了一篇有关“毕加索和立体主义”³的文章，文章最后发表于《文献》，但署名是众议员乔治·莫奈；1931年，克洛德父亲接到一笔大订单，客人要求他为殖民展的马达加斯加陈列厅准备装饰画。他在民族志博物馆里画了很多背景画，克洛德站在这儿或那儿，在两个马达加斯加妇女（或者殖民地管理者）的中间，帮助父亲完成收尾工作。正是因为殖民背景的活动，克洛德才与这座利维和里维埃正在建造的博物馆初次相遇。这难道不让人惊讶吗？

他把出国的机会当作神的命令，这也合乎逻辑，因为他并不信教。15年后，他已经是一名公认的民族学家，他把这个在他人生中决定性的时刻重新解释为古希腊悲剧中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的降临。下面这段有名的段落是《忧郁的热带》里第二部分第五章的开头：“1934年秋，某个周日早上9点，我的事业因一通电话而有了着落。电话那头是谢列斯泰·布格雷，当时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那些年，他待我甚是亲切，但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首先因为我不曾是师范生，其次（更重要的是），就算我是师范生，他也只对自己的学生表达关心，而我并不是他的学生。我猜，他一定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了，因为他突然这么问我：

1 《学生研究报告（1932）》（« Rapport sur le travail fourni par les étudiants en 1932 »），乔治·亨利·里维埃将它交给了马塞尔·莫斯；编号1176，1932年6月3日，法国当代出版纪念馆马塞尔·莫斯档案库。再次向爱丽丝·康克林表示感谢。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也有所提及。参见《忧郁的热带》，第41页：“我与民族学完全没有交集，我从未听过一堂民族学的课。我记得在1928年，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最后一次来索邦，给学生们上了那堂具有纪念意义的讲座，我虽然知道有讲座这一回事，却完全没有想要去听的意思。”

3 乔治·莫奈（Georges Monnet）（作者实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毕加索与立体主义》（« Picasso et le cubisme »），《文献》（*Documents*）第3期，1930年，第139—140页。

‘你还想做民族志研究吗？’——是的！——那么，你可以提交成为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系老师的申请。圣保罗有很多印第安人，你周末便有事可做了。但你必须在中午之前把你最终的决定告诉乔治·杜马。”¹

这通电话有着货真价实的戏剧效果，而这些往事都一一记录在《忧郁的热带》里。这个荒唐的提案、唐突的要求、短暂的决策时间以及谢列斯泰·布格雷的失察（圣保罗的郊区很久以前就没有印第安人了）都造成了一个彻底的、未被预见的断层，就像被刀子砍过一般：离开欧洲，去往巴西！事实上，谢列斯泰·布格雷与列维-斯特劳斯并不亲近，他认识列维-斯特劳斯是因为他曾指导过克洛德第一篇哲学论文。在出发去巴西（从后来看这次旅行才知道它来得多么突然）之前，年轻的夫妇曾向他求助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学习奖学金，他们希望能“去美国接触民族志研究”。布格雷认真地为列维-斯特劳斯拉夫妇担保，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欧洲的一位密使崔西·B. 基特里奇（Tracy B. Kittredge）表示，“我在这两位年轻人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认识了他们，他们通过了考试，他们两人都很聪明，也很勤奋。年轻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交给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本科学位论文写得非常不错”²。但他们的经历并不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要求，美国人向布格雷解释道：“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在短期内考虑他们的要求。他们在民族学领域应该只是刚刚入门。而我们原则上需要更有经验的申请人，要求他们证明他们在自己想要从事的社会科学的特定领域能够进行独立研究。”³第一次与北美

1 《忧郁的热带》，第34页。乔治·杜马是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时期的著名心理学家，因代表法国在南美开展文化业务，他的名字被广为传颂。他还参与成立了一大批高中、大学和科研中心。

2 谢列斯泰·布格雷给崔西·巴雷特·基特里奇的信，时间为1934年10月26日。参见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编号61 AJ 94。感谢托马·赫尔斯向我提供这份资料。

3 崔西·巴雷特·基特里奇给谢列斯泰·布格雷的信，时间为1934年11月7日。参见乌尔姆路高等师范学校“布格雷档案”。再次感谢托马·赫尔斯的帮助。

的接触以失败告终，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失败。北美计划落空之后，巴西成为他们的选项。

“使命”驱使还是“另有所图”？他为什么要成为人类学家？

为什么要成为人类学家？或者是“巧合”¹或者是“另有所图”²。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把民族学的“使命”当作一个选项，是他被它选中而不是由他做出选择。“与数学或者音乐一样，民族学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真正的天职。就算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探索这个领域。”³基于这种必要性，他常常提到他的一些动机：童年的爱好（他喜欢海外风情的古董）、这门新学科提供的工作机会（“情况不同了”⁴）、一些他读过的民族学的书籍带给他的鼓励。1933年，他读了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的《原始社会》，发现了一种可以同时兼顾职业训练和冒险爱好的选项，这在雅克·苏斯戴尔⁵或者尼赞身上都有所体现，而尼赞曾对他表示自己被民族学深深吸引⁶。除了这些原因，克洛德后来还认为他喜爱认识事物的个性似乎与民族学研究非常契合，并戏称这是他“新石器时代的智慧”⁷。总之，很多事情都能说明他为什么踏上征程，为什么走上民族学的道路。这个重要的决定对列维－斯特劳斯特的人生、对人类学学科的命运影响深远。

1 《亦近，亦远》，第27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我是谁（上）》（« Ce que je suis, I »），《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1980年6月28日，第16页。

3 《忧郁的热带》，第43页。

4 《亦近，亦远》，第28页。

5 1929年，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1912—1990）成为一名师范生，1932年，获得了高中哲学教师资格。他是利维的学生和弟子，一拿到高中教师资格，他就出发去了墨西哥，目的是研究奥托米人。他在墨西哥学习纳瓦特尔语（*nahuatl*），并开始熟悉多门玛雅语言。1936年，他发表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国度》，193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1938年起，担任新成立的人类博物馆的副馆长。

6 《亦近，亦远》，第27—29页。

7 《忧郁的热带》，第41页：“我有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智慧。它就像是土著人的火耕之术，点燃了这片土地，甚至点燃了其中未被侵略之地。为了在短期内有所收获，它给了土地一时的养料，却留下了一片狼藉。”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既有对社会职业的考量，也有对学术研究和人生旅程的规划。这些问题并不是只有列维－斯特劳斯一个人需要面对，他自己可能不会相信。

年轻人漂亮地展开了职业生涯并且融入社会活动之中，他也与家庭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尽管这些家庭牵绊也让他变得多愁善感。作为老师，年纪尚轻的他授课时不屑于沉闷的重复。除此之外，他也非常投入政治生活：当时（从1934年春天与人民阵线建立盟约起），社会党正积极地追求权力。我们可能对此感到惊讶，而让我们更加吃惊的是，他竟然创造了一个将他从这些稳定的环境中连根拔起的“危险处境”，还最终接受了它。列维－斯特劳斯思考了法国社会的“恶”，发现了去往他处研究另一个社会的选项。他自己刚要向民族学跨出一大步，此时，似乎与他周围的世界还没有什么不和谐之处。

去巴西以及选择民族学不完全是因为他想要同时摆脱政治和哲学，这与《忧郁的热带》里描述的要与它们一刀两断的论断并不一致。当然，我们发现年轻的政治运动分子克洛德对他在建设性革命里的政治伙伴不无微词：克洛德觉得他的同志有时过于严厉地批判布鲁姆，他反而相当崇拜布鲁姆；此外，1933年1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7月发生骚乱的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一批“新社会主义者”，他们因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及为了与马塞尔·戴亚、阿德里昂·马尔凯（Adrien Marquet）划清界限而分离了出去。3万运动分子离开了组织，在法国这片土地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党派，加入他们的有众议员、参议员以及六个联合会¹。尽管列维－斯特劳斯与戴亚非常亲密，他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但他夹杂在两种信仰之间备感煎熬。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让他想要逃避，他希望寻找第三条道路。但是，这并未说明民族学就是一个替代

1 参见亚历山大·帕勇：《政治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2—153页。

品或者一条新的道路；相反，民族学可以被看作另一种政治和哲学诉求。在发表于《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好几篇文章里，克洛德明确地表示，马克思以及其他一切哲学思想都必须“浸透在现实中”。此外，我们必须增长学识，这就需要学习“内容丰富的学科，比如民族志研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的这门学问如今为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所用”¹。起初，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运动分子从一种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待民族学，在他眼里，社会主义革命派和民族学研究都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之上。他在《忧郁的热带》里表示，社会科学的选择与他对哲学的“厌恶”息息相关，他因为“厌恶”哲学而走上了民族学道路，而民族学“就像一块漂浮木”²。但他在后来一些访谈中表达的观点与这种说法不甚相同：“我并不是说要与哲学划清界限。因为从本质上说，我们都是在研究哲学。但这是另一种哲学，它既不需要内省，也不是要我们思考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人的状态；它力争以思考作为起点要求我们了解人的各种经历，不管这些经历离我们有多么遥远。”³当克洛德出发去巴西之时，他没有放弃幻想在政界获得一官半职：“我去巴西，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我看见自己在圣保罗积极地通过广播了解选举结果，得知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以及乔治·莫奈被提名为部长的消息。我非常肯定他会需要我，而我也会响应他。那时，我已经万事俱备，马上可以出航了。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⁴这个令人痛心的小故事只会影响那些空等一通电话的可怜人，而它并不能证明列维 - 斯特劳斯特对政治“心灰意冷”才选择了民族学。事实上，尽管他已经全身心投入民族学研究之中，他仍不忘关心政治。一通电话带来

1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马塞尔·戴亚〈社会主义视野〉》。参见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 - 斯特劳特的世界观》，第 164 页。

2 《忧郁的热带》，第 40 页。

3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遥远的目光”》，第 29 页。这是迪迪埃·埃里蓬与列维 - 斯特劳斯特访谈的内容。

4 《自画像》，第 20 页。

的小插曲：1934年10月的一通电话让他获得了远赴巴西的机会；1936年5月的一通他没能等来的电话嘱咐他“安分守己”。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那些决定远赴巴西的理由之中只反复强调一条——他对职业前景的考虑。而从他的口气中不难听出内疚的情绪。“那些让我成为民族学家的理由，我承认，并‘不单纯’：我几乎从未因为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之后获得的机会而感到高兴，我试图寻找一条出路。尽管，当上老师的第一年，我觉得非常开心，但很快……在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对于哲学老师而言，民族学是一条‘出路’。我认识保罗·尼赞，因为他是我某位表姐的丈夫，有一天，他跟我聊了这些事。我喜欢露营，喜欢在山间散步，喜欢大自然的生活，所以我便去了巴西。”¹他常常说他不擅长上课或者开讲座，他把这种“不擅长”解释为先天的缺陷。的确，这项“不擅长”对教师，尤其是中学教师而言，意味着职业生涯中的一大障碍。而民族学则让他避开了中学教师传道授业的日常工作，让他直接进入了大学；而与他同时代的所有高中教师资格获得者至少需要在外省和巴黎的高中待上十几年。我们还记得列维-斯特劳斯不是师范生，所以他想要进入高校任教则更加困难。而这个背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那些“不单纯”的动机。我们可以笃定地说，选择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学科意味着可以获取不错的回报，因为这是一个“对手较少”²的研究领域。这也是在法国、德国和美国有那么多犹太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科学奠基人的原因之一。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这些法国社会的新鲜人若是选择了传统学科便要遭遇更大的困境。维克多·卡拉第（Viktor Karady）指出，科研创新可以被理解为“打

1 《我是谁（上）》，第16页。

2 维克多·卡拉第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犹太裔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一个问题的简单阐述》，载约昂·海尔布朗、雷米·勒诺瓦和吉塞勒·萨皮罗主编：《社会科学史：向皮埃尔·布迪厄致敬》，第166页。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十六区分部）的会员证：

1927年，他成为社会党的一员，1935年，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破常规的成功之道”¹。1930年代初的克洛德正是这样想的。他也部分认识到自己的想法，后来，他这样表示：“19世纪犹太社会地位的攀升与社会科学成长为独立学科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个‘温床’——我指的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环境——还留下了空余的位子，如果我们这些新鲜人在这方面发展，则不需要面对过分激烈的竞争。”²

“——基于爱好？——就是因为爱好。”

“出路”（porte de sortie）这个表达方式直到最后仍让人琢磨不透。当然，它指的是摆脱中学教师的身份，这一点一清二楚。但民族学研究要求地理上的隔绝，意味着要远赴他乡展开研究，

1 维克多·卡拉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犹太裔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一个问题的简单阐述》，载约昂·海尔布朗、雷米·勒诺瓦和吉塞勒·萨皮罗主编：《社会科学史：向皮埃尔·布迪厄致敬》，第165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我是谁（下）》，《新观察家》1980年7月5日，第18页。

这些民族学的特性为“出口”一词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而这个“出口”还诱惑了与他同一代的其他哲学家。

尼赞离开了乌尔姆路，解缆起航。他想品尝兰波长途旅行的痛苦。从亚丁回来后，他沉醉于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有其他人也与列维-斯特劳斯和尼赞一样对哲学老师的工作感到不满。对异国的兴趣、对世界的好奇代表了193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焦虑。他们拒绝枯燥乏味的抽象概念，从根本上说，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为这个他们捕捉不到的世界感到伤心难过。最后，他们都向往能够真实地感受事物与生命。萨特、尼赞、列维-斯特劳斯，每个人都在那时选择了一条“出路”：萨特选择了现象学，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民族学，尼赞选择加入政治革命派。这是193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界里的三种烈性毒品，它们加快了三人的生活进程，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实质，让他们与事物亲密接触。

民族学是其中一个选项，并不是最糟糕的选项。正在经历重组的民族学处于动荡的变化之中，新的成员、新的机构以及新的视野让人热血沸腾。这门新的学科打破了文人的传统，它给普通的物件赋予了崇高的地位，还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名词收入囊中：

“民族学以人为研究课题”¹。此外，它将研究工作的传统分类公之于众：室内的学术大家与收集资料的观察家。从此，民族学家们将展开实地考察并悉心记录下将被用来分析的各种资料。知识分子和探险家之间的对立、不断变化的思想与亲近大自然的生活之间的落差、学术界与感性世界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民族学跨越了这些从笛卡尔开始便延续下来的西方文化中古板的障碍。在民族学的摇篮之上聚集了一群精灵，他们竞相累积经历、增长学识。做一名行动派的知识分子！一位热情的年轻人不愿被修辞学捆绑住手脚（他对修辞学已经了如指掌），他走向了民族学，

1 米歇尔·莱里斯称之为“新民族志研究”。参见文森·德巴恩：《告别旅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法国民族学》，第76页。

把民族学当作一个真正可以实现的承诺。民族学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漂浮木”，是米歇尔·莱里斯“赎罪的机会”。宗教用语恰好表现了他们对民族学的热切期望。¹

很多年之后，当克洛德在法兰西学院的穹顶下发表就任院士的讲话时，他向作家蒙特朗（Monterlant）致敬。身为新晋院士的克洛德做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比较：“我们这一代里很多人希望从民族学、从蒙特朗那代人得到的经历，也是战争和体育能给的。”²他在《忧郁的热带》中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往“他处”：每个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工业化社会）都存在这样的“他处”，好让这些“逃离”的社会成员能够在历经考验之后名正言顺地荣耀归来，而这些荣誉与正统的地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到³；在我们的社会中，探险、运动成就或者战争经历构成了多余的场景，它们让社会成员们与之发生摩擦，或是在摩擦中超越自我，或是营造出让热血少年想要挑战的艰难处境。克洛德接着写道：蒙特朗认为体育是“介于战争时代的肉体抒情诗与和平时代的官僚作风之间的一种活动[……]，战争代表了一种被推向极限的民族志经历——首先把这些经历推向极限的是战争赖以存在的那些特殊的考验；其次，这份推动力来自战争造成的人的混居，因为法国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多元，而这种人种的混合状态让人感到水土不服，之后，人们便开始寻找水土不服的原因”。每一代人都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他处”：蒙特朗的“他处”是战争；至于列维－斯特劳斯，民族学否定了之前那段冒险的暴力成分，同时，从中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于是民族学便成为他

1 这一整段请参考文森·德巴恩：《民族学的声誉》，载《告别旅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法国民族学》，从第74页起。

2 艾米丽·朱莉亚：《法兰西学院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就任仪式上的演讲（1974年6月24日，巴黎）》，载《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106页。

3 “追逐权力”：《忧郁的热带》，第28页。

新的“他处”¹。

总之，“选择”民族学符合列维－斯特劳斯自己以及一代人的期望。简单地说，选择一门学科的决定并不只是科学思考的结果。1961年，乔治·沙博尼耶（Georges Charbonnier）向克洛德征求意见，因为他想要转向民族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向他解释道，自然科学学者选择学科时有很多深层次的理由，“这些理由有时可以追溯到个人很久远之前的经历”，而且他们“态度也非常积极”。甚至连数学家也符合这种情况。“——基于爱好？提问者说。——就是因为爱好。”²

1 参见让－弗朗索瓦·贝尔（Jean-François Bert）：《马塞尔·莫斯的工作室》（*L'Atelier de Marcel Mauss*），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CNRS éditions），2012年，第126页：“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库尔是莫斯1930年代初的学生。他指出，莫斯曾在一节课上提到，自己唯一的‘田野工作’是一战期间长期担任口译员的经历。”

2 乔治·沙博尼耶：《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话（1961）》，《真实的程度》，第18—19页。

5 世界的迷雾

就像是一位游荡于山野之间的城里人。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¹

我们能够简单描述在踏上去往巴西的旅程之时，克洛德的精神状态和世界观吗？我们不需要描绘一整个哲学体系，因为它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发现，从认识论的角度猜测他的情绪如何。

克洛德的世界观是一个待解开的谜团，他很早便迷上了思考，1935年，他已经习惯了思考。他的世界观和思考的习惯是他鲜明个性的基础：他渴求理性，眼里迸发着火花，同时也保留着“内心的疯狂想法”，而它们为他天马行空的幻想提供了跳板。十年如一日，从未变化。克洛德就像是一位游荡于山野之间的城里人，陶醉于理解这个世界的混乱秩序，然后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这项重要的任务值得献上一生。

认识论

敏锐的眼神（他童年的好奇心磨炼了他的眼神）、收藏的爱好、分类的学问（矿物与动物的分类）、艺术、可以四处漫步的城市、对自然的探索（从布列塔尼、诺曼底的海滩到塞文山脉的石山）：列维-斯特劳斯慢慢地为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建立了雏形。童年结束之后，他“随意地画了很多像样和不像样的画”²，从此，他确信，尽管自己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他却没有掌控艺

1 《忧郁的热带》，第48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失败者？我们都是》。

术创作的才华，他有的是学习艺术的才华。¹他既不是画家，也不是音乐家（这让他终生遗憾）。年轻的克洛德猜测，只有在学习中他才能“创造”，他致力于理解造物主的活动和神性，可他在创作过程中也没能找到答案。

创造的神秘性与知识的地位

克洛德常常这样说：知识并无用处，它应当是自我的一个目标。“努力理解事物，是活着的过程中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它是我们存在的最好的证明，或许是唯一的证明。”²打发时间、证明自己、拯救自己。从此，“认识事物”成为穿过事物表象、发现事理的方式，毋庸置疑的是，人受到启发后能发现真实。这项理性的事业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成果：无尽的欢乐、生存价值的证明。而这些成果把“知识”的概念奉为世俗化过程里的重要一环。知识承担着救世主的角色，因为在一个脱离宗教的社会里，它代替宗教找到了“绝对”的事物。

无疑，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身上有一种“神秘感”³，尽管他自己无视宗教，甚至“对宗教的话题不胜其烦”。但他认知的欲望刚好符合“认识”这一行为的期待。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在《忧郁的热带》里自称拥有“新石器时代”的智慧，而这段话也常常得到后人的评论：“就像是土著人的火耕之术，点燃了这片土地，甚至点燃了其中未被侵略之地。为了在短期内有所收获，它给了土地一时的养料，却留下了一片狼藉。”⁴为什么他会这样急不可耐？因为他厌恶重复，我们在拉昂高中二年级的课堂上对

1 与让－克洛德·布林吉尔（J.-C. Bringuier）的访谈录《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纪》（*Le Siècle de Lévi-Strauss*）：“我并不从事创造活动，我只全身心地投入创造活动的研究之中。”

2 《快报》带你走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快报》第1027期，1971年3月15—21日。

3 《亦近，亦远》，第14页：“然后，即使我一直对宗教之言充耳不闻，我也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宇宙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甚至永远不能被我们所参透。有时候，与固执的理性主义者相比，我反而与宗教信仰徒相处得更加自在。至少信徒们保留了一种神秘感。”

4 《忧郁的热带》，第41页。

此已经有所了解，但根本原因在于，他懂得的知识还远远不足，这使他不得不对同一个对象学习两次：“当我担任考官时，学识不足让我觉得进退维谷：因为，我随机抽中的问题，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应当如何作答，而学生还需要给我答案。我的问题已不用多说。好像这些内容在我面前遁去了身形，只是因为我曾一度将心思放在它们身上。”¹一方面，实在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他敏感的神经让他能够轻易地发现它们、轻松地与它们接触；另一方面，实在的事物存在着消失的风险，比如，传统的哲学会将人们认识事物的闪耀瞬间简化为几个抽象的概念。消沉的情绪等待着，他的世界分崩离析。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民族学意味着他可以体验无穷无尽的事物（所有的文化），带着渴望的心情“建立世界与他之间新的联系”²。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克洛德是如何渴望拥抱世界，渴望掌握一切。他不希望世界从他手中溜走，与西拿（Cinna）一样。西拿是他在多年之后创作的话剧里的角色，而话剧的创作不过是他在巴西生活中的一次叛逆之举。“我对自己说，没有人能——即便是柏拉图也不能——看尽这个世界里所有的花花草草，因为它们是无穷无尽的；而我要学会辨认所有的花花草草，我要收集恐惧、寒冷、饥饿、疲倦带给我的感受，而你们待在封闭的房子里，享受着粮仓里丰富的食物，甚至无法想象这些情景。我吃过蜥蜴、蛇以及其他会让你感到揪心的食物，我把自己当作刚刚皈依的信徒，开始体会他们的感受，我确信我将在世界和我之间建立新的联系。”³

克洛德用他的五感吞食世界，以此来理解世界。他内心深知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是不可分的，而感性世界的价值在他童

1 《忧郁的热带》，第 41 页。

2 同上书，第 408 页。

3 参见纳唐·华德（Nathan Wachtel）的文章：《西拿的征程，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 La quête de Cinna, Claude Lévi-Strauss »），《批评》（*Critique*）第 620—621 期，1999 年 1—2 月，第 123—138 页。

年的丰富经历中得到了证实，是他童年的“遗产”之一。他的童年让他的五感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这对他的生活而言意义非凡。列维-斯特劳斯在作品中写道：“因为没能理解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同时，身陷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这两种不同的认知逻辑之中无所适从，我感到十分恼火。从童年起，我就感觉自己需要在人生中进行尝试，我想尝试搭建一座从这一头跨到那一头的桥梁。”¹

三个情妇以及一个……

克洛德试图解开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对立关系，但他的才能还远不止于建立一座栈桥。知识对他而言意味着跳入虚空之中，是表象（现实的事物，那些我们日常所见的事物）和事实（事实指基石，真相的基石，它比现实的事物更加贴近现实）之间的断裂。这种特殊的才能很早便可见端倪，这种才能与他特别丰富的人生经历脱不了关系：“事实上，我个人经历中未曾变化的是，我一直被那些看似不能被人理解、偶然的事物深深吸引，并尝试着从背后发现它的合理性。”²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用哲学语言表达了这种需求，他指出，这是一种“从洛克、笛卡尔的哲学风格转变为人文、社会科学，从次性到初性（次性迷惑人的眼睛，而初性与现实相符）”³的过程。

在《忧郁的热带》中，他给出了他认为能代表认识过程的三个意象，而每一个意象都与他早年见过的风景、接触过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他的“三位情人”，他这样称呼它们，就像是三段认识论的小故事。在故事里，克洛德的学者身份和谐地融入了他的人生，为他自己的世界观建起了框架。从这个框架出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失败者？我们都是》。

2 同上。

3 《〈快报〉带你走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111页。

发，他建立了学者远大的抱负。

首先是精神分析：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通过一位同班同学的帮助（他的父亲马塞尔·纳唐 [Marcel Nathan] 是弗洛伊德众多信徒中的一人，欧洲的美好年代来临时，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建立了一个不对对外开放的绅士俱乐部，但玛丽·波拿巴 [Marie Bonaparte] 与纳唐十分亲近，因此，破例加入了俱乐部）在高中接触了弗洛伊德，而後者的作品出版仅有十几年。在那个时代，因为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心理学深深地渗透到法国医学界，所以精神分析并没有得到礼遇。1920 年代，通过艺术与文学的管道，这门研究心灵的新科学才真正为法国民众所知。弗洛伊德的几部作品有了法语译本，对他尖锐的批判也进入了大众视野（主要是夏尔·布罗代尔 [Charles Blondel] 对弗洛伊德的批判），精神分析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了一种真正的“潮流”。而我们发现，在无尽的好奇心和“广其学”的求知欲的驱使下，列维 - 斯特劳斯也没有落于人后。与民族学一样，精神分析与先锋派艺术（主要是超现实主义运动）存在着各种联系。精神分析激发了先锋派的创作灵感，一大批造型艺术作品面世；它也影响了文学以及电影（电影指的是《马布斯博士》）。对于克洛德这名哲学系的学生而言，阅读弗洛伊德的文字让心理学和主体哲学的课程内容黯然失色，也让理性与非理性、知性与感性、逻辑与前逻辑这些重要的二元关系失去了意义。从人最不理性的行为中发掘最具意义的元素，这个精神分析的观点成为他认知的第一个转折点。他自然地接受了这个转变，因为他自己也有同一种感受：“真正的现实”从未真正实现。

马克思主义也企图改变现实，以让人充分理解现实：“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科学与物理学不同，社会科学不再建立于事件之上，而是建立于感性认识获得的论据之上：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模型，学习这个模型的属性以及它设计实验室的不同方

式，最后我们把观察报告用于解释我们的感性认识，而我们的解释可能与预想的结果相差甚远。”¹ 这个建模的过程让我们接触到另一种现实的事物。克洛德认为，科学应当重视实验室，而不要依靠人的认知，因为人的认知借助经验认识世界。

在列维－斯特劳斯心里，知识本身代表了他第三位情人。我们可以从《忧郁的热带》里那些热情的文字中感受到这一点。他眼里最符合范式的“情人”是地质学，这是一门他通过自己的眼睛发现的学科。少年克洛德登上了塞文山脉的“香山”，发现了这门学问。事实上，在1920年代末，尽管经济问题严重，他的父母依然买下了一家废弃的养蚕场，家里人那里过了几年露营生活。养蚕场靠近瓦勒罗盖（Valleraugue），位于一个叫坎卡布拉（Camcabra）的小村庄。村庄周围一片荒芜，因此，后来他的父母把这儿当作战争避难所。1950年代至1968年前，塞文山脉得到了现代化的改造，公路也建了起来。列维－斯特劳斯觉得，这片土地往日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人迹罕至、雄伟壮观的大自然景观是这片土地不可磨灭的印记。克洛德带着地图和露营帐篷展开持续很长时间的徒步旅行，他还夜登埃古阿勒峰（mont Aigoual），他的每一任妻子都与他一同参与了挑战²；他漫步于地质的历史中，感到美梦成真；他还认真地追踪朗格多克地区喀斯高原上两个地层的交际线。对克洛德而言，在杂乱无章的风景中逐渐认识到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这个过程就是“认识”所代表的典型意义。越过塌方、荆棘和断层，他要寻觅“重要的意义”或“庄严的含义”。因为后者突然照亮了感性认识的所谓现实，让我们发现了其中的不完善之处，更让我们理解事物的那一刻感到欣喜若狂：“奇迹发生了，这是偶尔才会发生的事，”克洛德在《忧郁的热带》里这样写道：“神

1 《忧郁的热带》，第46页。

2 与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2011年10月29日。

秘的裂缝两边竟然同时出现了两株绿色植物，品种不同的它们分别选择了最有利的土壤；在岩石里，我同时发现了两块菊石，它们经历了不同但复杂的退化过程，用各自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几万年的历史，突然空间与时间融合在一起；某一时刻表现出来的生动的多样性让时代与时代之间发生重叠，也让时代得到了永恒的传承。思想与感性让我们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每一滴汗水、每一次肌肉弯曲、每一次喘息都是符号，它们代表了我的身体在运动过程中创造的历史，而同时，我的思想感受到运动的意义。我感到一切都是可以认知的，交替的世纪和变换的地点之间互相呼应，最终，它们之间的语言障碍也得到了解决。”¹

为了形容这个认识论形成的时刻，列维－斯特劳斯化身为充满激情、语言丰富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就像回到了普鲁斯特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来创作的那个时刻。不论是对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普鲁斯特，感性与理性认知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帮助他们实现了更多的成果；他们内心的愉悦来自时空的碰撞，从此，这种感受成为他们存在的基础；因此，主体与客体（在此处是自然风景）的融合成就了一种宗教的领圣体，而所谓“奇迹”不过只是开始而已。两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列维－斯特劳斯需要通过肉体劳动获得知识，知识根本上是靠运动得来的（汗水、肌肉收缩、喘气），而普鲁斯特认识事物更多依靠机缘以及某个时间点对事物意义的领会。

山峦无疑是列维－斯特劳斯认知活动最理想的布景。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将对岩层丰富的塞文山脉“矢志不渝”的热爱转移至森林身上。在森林里，他使用相同的手段，但付出的汗水要少得多。如果森林代表了他的成熟时期，那么山峦——尤其是海拔在1400—2200米的“放牛的山地”——则代表了少年时期。海洋的魅力在于广阔，而山峦则不同，它是一片“密集的风景”，

1 《忧郁的热带》，第45页。

上至山口、下至峭壁之间的山谷，它挺拔的身形下凝聚着各种有意义的事物：“我在登山过程中需要耗费太多体力，让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耗费体力的过程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大山的存在。它既反叛又调皮，它总是对我隐藏它的另一面，但这只不过是为了让我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可以领略它的另一种风情罢了。大山的风景在我看来就是一出舞蹈，而我是一位指挥者。我若能成功抓住那些启发了这支舞蹈的伟大真理，我便能够更加自由地进行指挥。”¹

这个奇迹渴望知识，它着急得直喘气；它与克洛德童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拥有着知识那魔法般的魅力。事实上，与超现实主义一样，列维-斯特劳斯认识事物的模式需要幻想的能力：幻想现实（réalité）的不同层面，这些不同层面之间存在联系，但也存在森严的等级关系。因为这里的“现实”（réalité）包括了一切其他实在的东西，它们被赋予意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是完整、至高无上的存在。但超现实主义者想要通过“完全解放”（tout lâcher）的主张来实现的并不是同一种“超理性”（super-rationalité）。不论如何，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见证了事物被揭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透过表象发现了一种深层次的、被隐藏的、强大的现实。

在另一段人生经历中，克洛德也经历了发现的过程，正是这段经历培养了他的世界观。在他前往巴西的前夜，我们可以对他的世界观有所了解。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常常在书信中提到自己热衷于阅读侦探小说，而相比法国的侦探小说（roman policier），他似乎更喜欢英国侦探小说（detective novel）的风格。他特别喜欢美国作家 S. S. 范·达因（S. S. Van Dine）（也叫威拉德·H. 莱特 [Willard H. Wright]）的小说，喜欢小说里的侦探菲洛·万斯（Philo Vance），一个有些玩世不恭的业余的“艺术”

¹ 《忧郁的热带》，第 357 页。

调查者。从1926年开始，小说一发表他就买来读。他对这些小说的评价非常正面，针对最新出版的小说，他写道：“这是颠覆了侦探小说体裁的最棒的小说。”¹

迷恋侦探小说在他这一代人身上司空见惯。诞生于19世纪末的侦探小说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一方霸主，它的出现为虚构作品（小说或者电影）的阵营增加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然而，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在最近揭露了侦探小说、骑士小说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三者都建立于“谜团”之上，解决谜团的首要工具是调查，而它们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就是揭露事实。侦探小说与社会学一样，它们都质疑表面的“现实”，它们把异常的现象、矛盾、反常的现象、随机的现象作为检视的工具，最终赋予“现实”更深刻的意义：

“表面上的现实虽然一目了然但无疑是一种幻影，尽管它有着正经的身份，但它与真正的现实是不同的。深刻的现实不为人所观，甚至会给人造成威胁（这里指骑士小说里那些阴谋），它没有正式的身份，但要比表面上的现实更加真实。”²与调查罪犯的方式、破解阴谋（共济会、国际恐怖主义或者各种邪教组织的阴谋）的线索一样，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思路：它将社会生活描述为一个完整的、必须按照自己独有的规则运作的整体。

对侦探小说的广泛阅读无疑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对谜团的认知方式，他对谜团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他常常使用侦探小说里的词语阐述他在民族学领域的抱负：“一方面，这里有着无穷的谜团和经过加密——所以等待我们解密——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很难触及真相，一些调查的方式最终带给我们非常荒诞的结

1 致蒙德马桑德父母的信（没有记录日期）：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谜团与阴谋：关于调查的调查》（*Énigmes et complots. Une enquête à propos d'enquête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新法兰西评论》，2012年，第15页。

果。”¹一些民族学家曾多次向列维-斯特劳斯这种“侦探级别的洞察力”致敬，他们希望借助这种洞察力来梳理神话的各种版本与神话在不同文化空间的传播现象。巴西民族学家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补充道，这种方法“非常符合侦探小说的要求，但列维-斯特劳斯把它用在了他最后两册著作——《神话学》——里”²。

时间的介入

认识世界的深切渴望很早就列维-斯特劳斯心里扎根，并且一直未变，而他与世界的关系则在不断变化之中。要想掌握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对时间的所有幻想可能并不容易。然而，我们可以尝试了解时间变换的过程，克洛德的学识与对小说的爱好都是依靠时间培养起来的。

“堂吉诃德式作风”

“我认为，堂吉诃德式作风的本质是一种固执的愿望：在当下重拾过往。如果某一天，一个人意外地忘记了他曾经的样子，我会给他这把钥匙。”³这意味着寻找隐藏于当下的过往，或者说，发现“地毯里的图案”⁴。就像是，我们超越了当下对我们的诱惑，揭开了现实的面纱，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将回溯过去。列维-斯特劳斯的父亲也曾是一位与现实“脱节”的堂吉诃德，儿子克洛

1 《〈快报〉带你走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141页。

2 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能够扩散的结构主义存在吗?》(«Un diffusionnisme structuraliste existe-t-il?»),载菲利普·德斯科拉编:《列维-斯特劳斯:世纪之旅》(Lévi-Strauss, un parcours dans le siècle),巴黎: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Odile Jacob),2012年,第29页。

3 《亦近,亦远》,第134页。

4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地毯上的图案》(Le Motif dans le tapis),艾洛迪·维亚勒冬(Élodie Vialleton)译,阿尔勒:南方文献出版社,1997年。图案就像是埃德加·爱伦·坡《失窃的信》,虽呈现于众人面前,但大隐于市。参见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巴黎:瑟伊出版社,1999年,从第11页起。

德这样说。整个家族都生活在 19 世纪积累的财富的光芒之下，年复一年地消耗这些财富。如果童年时期的克洛德透过没落的当下，深刻地理解了家族历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1935 年，年轻的老师完全融入了他的时代，他通过工作成为时代的一分子，政治占据了他的时间，让他参与到那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变迁之中，他反抗不公，拒绝不义，心怀热情。他向往革命，喜爱先锋派艺术家，喜爱弗洛伊德、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主张和平主义，还表达了他处的渴望。之前我们提到，他喜欢塞利纳和尼赞。在这些因素下，我们很难将“对人生悲观”这个他成熟时期的重要标签贴到年轻的克洛德身上，1935 年出航的时候，他年仅 26 岁。他若是生在其他时代，例如，19 世纪，那么他会拥有一个更加惬意的生活。然而，年轻的克洛德喜爱研究技术，他对摄影、电影和汽车着迷，无疑，他属于 20 世纪。巴西改变了这种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他非常相信人类理解和掌握世界的能力，他可能已经成为 19 世纪的一分子，并且将一直留在上个世纪。如果“伟大的 19 世纪”和 18 世纪的阿尔萨斯是他幻想的对象，它们仍不足以让克洛德怀疑当下的价值，尽管他并不喜欢当下。一切迹象显示，克洛德深深地扎根于当下，即便他以批判的态度面对他的时代。年轻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虽未经历那些过去的岁月，却是历史的承载者。而过去是一个相当丰富的世界，丰富得足以让他把空间上的旅行当作回到过去的旅行，这就有些像他小时候对地质岩层的追踪。他准备好穿越大西洋，去搜集有关巴西和当地居民的资料；同时，他开始阅读让·德·雷瑞在 16 世纪中后期创作的故事，这是他离开欧洲之前在精神上的准备工作，而通过这种方式，他将自己安置于新世界的门口。

热爱之始：让·德·雷瑞的16世纪

1934年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同意于第二年2月出发去巴西。他在人类博物馆（当时，这座博物馆仍是特罗卡德罗博物馆）的图书室里读了一些书，做了一些研究。他被让·德·雷瑞这个名字吸引，就像中了魔一样。这位日内瓦人“纯真的目光”¹让时光机器运转了起来。1556年，雷瑞离开了日内瓦去瓜纳巴拉湾（里约热内卢）支援维盖尼翁上将。维盖尼翁上将被困在他的科里尼堡（Fort-Coligny），被天主教带给他的心灵上的难题折磨。维盖尼翁想要皈依新教，他要求让·卡尔文（Jean Calvin）给他十几个人手帮他度过这个危机。一边是葡萄牙人，他们在北方，时刻准备集结人马登陆巴西海岸；另一边是图皮人，他们已与白人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科里尼堡的一小队人被围困在两方人马中间，十分焦虑。经过了长年累月，他们中的一些人娶了妻并且过上了土著人的生活。让·德·雷瑞便遭遇了这种情况。为了躲避维盖尼翁一天天更加严重的疯狂行为，他不得不逃往印第安人的部落寻求庇护。他在印第安部落的生活如今成为我们手中的故事。他还为这个故事添油加醋，让它既有宏大的背景也有滑稽的内容。列维-斯特劳斯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具有成为小说的潜质：“多么精彩的一部电影！”²但让克洛德感到陶醉的，是一种“（雷瑞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为此“我们需要这本民族志文学杰作《巴西游记》”³。

为什么是杰作？因为它“能忽视或者抛弃成规，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真实样貌，理解这些人与物”。它“不浪费精力”⁴。不同于他的兄弟和竞争对手安德烈·特维（André Thevet），《南极法国

1 《关于让·德·雷瑞：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 Sur Jean de Léry. Entretien avec Claude Lévi-Strauss »），载多米尼克-安托万·格里索尼将之整理为书的导言，即让·德·雷瑞：《巴西大地上的旅行》（*Histoire d'un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ésil*），“经典丛书”，巴黎：口袋书出版社，1994年，第7页。

2 《忧郁的热带》，第69页。

3 同上书，第70页。

4 《关于让·德·雷瑞：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第9页。

的特点》（*Singularités de la France antarctique*）的作者，雷瑞具有打破固定思维的才能。五十几年前，欧洲人发现了巴西海岸并对它进行了考察，而仅仅五十几年之后，雷瑞并没有被前人的发现捆绑住手脚。16世纪要感谢宽厚的列维－斯特劳斯特，他迫不及待地要看看16世纪的那些早期探险活动，他很珍视这些历史：这个世纪，地域之间的接触还没有变得那么频繁，人们的好奇心仍十分强烈；两个世界第一次接触，它们带着天真的好奇心和平等的尊严互相打量、互相端详。这种观察他者、被他者颠覆以及根据与传说非常不同的现实场景——这些西方现代背景下的传说是西方人多次踏足蛮荒之地后创作出来的——做出解释的能力，克洛德在让·德·雷瑞身上见到了蛛丝马迹。但总的来说，克洛德在蒙田和拉伯雷的时代发现了这种能力：“在拉伯雷或者蒙田这样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纯真的目光，而这么美妙的眼神之后便再也不得见了。”¹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带着这部文学作品登上了美洲的海岸。雷瑞的故事是他的枕边故事。它将克洛德带向雷瑞和他的图皮人：玻璃碎片、风景、海边的忧郁故事。就像停留在时间里的某一刻，克洛德还不是民族学家，但幻想着成为民族学家。这位欧洲人既是侦察山峦的孩子，也是沉迷于侦探小说的少年，还是守候在公共汽车上的高中生。他抵达了里约热内卢，口袋里装着让·德·雷瑞的故事。他知道寻觅另一种现实是通向真实（le vrai）的最可靠的道路，而真实对他而言意味着美好的曙光。“读雷瑞帮助我逃离这个世纪，让我与被我称为‘超现实’（sur-réalité）的东西重新取得联系。而此‘超现实’不是超现实主义者们所说的那一个‘超现实’，它是一种比我见证的现实更加真实的‘现实’。被雷瑞摄入眼中的很多事物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事物，并且，是在四百年前。”²

1 《关于让·德·雷瑞：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谈话》，第9页。

2 同上书，第13页。

第 2 部分

新大陆（1935—1947）

6 圣保罗的法国印记

巴西是我们生命中的巅峰时刻。

1985年5月30日，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在法兰西学院就任仪式上的演讲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于1935年2月2日登上了开往巴西的客轮，接着，在巴西待了整整4年。

他的旅行和一部分短暂逗留的经历，克洛德都把它们当作对第一次跨洋之行的重温之旅。其中不仅包括了哥伦布与葡萄牙人卡布拉尔（他从萨尔瓦多登陆）的探险，也包括了以让·德·雷瑞为代表（让·德·雷瑞的口袋本一直放在可及之处）的16世纪其他探险家的旅行。法国对巴西的影响在1930年代仍然非常显著，它为两国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圣保罗大学的建立更是加深了这种关系。克洛德来到巴西后，在这所大学里工作、教书。他用法语授课，而法语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巴西学生的第二外语。

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是带着一个伟大抱负开始民族志研究的：他立志在欧洲与拉丁美洲之间传递知识。1934年，圣保罗大学成立。考虑到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社会的限制（而这些问题也影响了这位年轻人与新晋社会学老师的命运），派法国老师（但也有极少数意大利和德国老师）去这所大学任教的计划虽然令人心潮澎湃，但计划不会顺利落实。

二战后，克洛德只回了巴西一次，那是1985年，他承认自

已欠下了“很大一笔债”¹。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印第安人给他提供了未来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也是因为新世界景观的整体面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所。所有的事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因此，这片土地成为人文科学的实验室。巴西成为法国社会科学的“黄金国”。如果乔治·杜马的“巴西作战”意在将法国的理科与文科介绍给巴西，那么它也将拉丁美洲的视野带入了法国的历史编纂学、地理学和民族学之中。

我们在15年后看到了成果。1949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研究南美洲的一期特刊里邀请年轻的大学老师们去亲眼看一看：“去那儿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别读太多书。多看看。”“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经历是未知的[……]它们不可以被分解成那些容易理解的模式。”²列维－斯特劳斯和圣保罗的一小队人——包括费尔南·布罗代尔、皮埃尔·蒙贝和罗杰·巴斯蒂德——满心欢喜地展开了探索，他们睁大眼睛观察巴西当下的真实情况，后来，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转向了土著人居住的那些远离尘嚣的岛屿。³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远离巴西》（*Loin du Brésil*），与维罗妮可·蒙泰尼（Véronique Mortaigne）的谈话，巴黎：尚丹尼出版社（Chandeigne），2005年，第11页：“巴西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它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我远离家乡（éloignement），体验了完全不同的事物，还因为它帮助我找到了我的职业。”

2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导言《历史面前的南美》（« L'Amérique du Sud devant l'histoire »），《拉丁美洲研究（论文、评论等共计48篇）》（« Quarante-huit études, essais, comptes rendus et mises au point. À travers les Amériques latines »），《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 ESC*），1948年10—12月。1949年以特刊形式（《年鉴手册》第4期）再版，第208页。

3 我要特别感谢圣保罗大学教授费尔南达·佩肖托（Fernanda Peixoto），感谢她在巴西的热情接待，让我拿到了这些巴西经历的文献。在她和她的学生（尤其是路易莎·瓦伦蒂尼）的帮助下，我的研究才得以顺利展开。后面的注释中，我还将逐一表示感谢。

美洲之行

登上门多萨

在离别欢庆活动结束后，他们匆忙起航。法国与美洲联合委员会对自己操办的宴会描述得十分冷漠，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欢庆活动的“沉痛氛围”，而在活动最后，“巴西作战”之父乔治·杜马还不忘提出最后几点嘱咐（“必须好好着装！”¹）。最后，1935年2月4日，克洛德和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与两位同事让·莫格（Jean Maugué）、皮埃尔·乌尔卡德（Pierre Hourcade）相伴，乘坐门多萨从马赛港出发。他们在法国南部冬日的愉快氛围中出航，“口渴时来上一杯苏打水，一饮而尽，身心舒畅到了极点”²。

“门多萨”既是货船也是客轮，具有双重功能。它是海洋蒸汽运输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transports maritimes à vapeur）船队的一分子。克洛德的那些跨洋之旅一直搭乘这艘“门多萨”船。它载上几名旅客，在海上漂浮19日，中途在西班牙和非洲海岸停靠，并在停靠的过程中装货、卸货。旅程的第一段，门多萨沿海航行，乘客们能够趁机游览船只停泊的城市。第一座城市是巴塞罗那，门多萨在晚上离开马赛，第二天清晨就抵达了巴塞罗那。列维-斯特劳斯乘坐出租车穿梭于城市中，那些宽阔的林荫大道、城市的美景、丰富的绿化（马路两边各是一排橘子树）、高迪的建筑作品（他忘记了它的名字）让他如痴如醉。“但其中最棒的是建筑：简直美疯了”³，他给父母写信的时候这样说。彩色马赛克的大楼、教堂里做成花的形状的钟楼、“用熟铁建造

1 《忧郁的热带》，第8页。

2 同上书，第49页。

3 1935年2月5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写给父母的信，现在是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个人收藏的一部分。写信时，克洛德正在“门多萨”客轮上。

的、浮夸又适宜居住的神迹一样的”¹房子。年轻的克洛德因这些从未在法国见到的事物感到又惊又喜：“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它们完全都不像是建筑物。可以说，美好的情绪一次又一次爆发。”²乘客们从兰布拉大道走向港口。之后是颜色分明的塔拉戈纳：蓝色的大海、鲜艳的硫黄色、红色的油桶、一堆堆橙子以及黑色的煤——“一幅好画。”少年的热情感染他的语言：船上有九位乘客，而在甲板上，他们感觉只剩下自己。旅程中的伙伴们很好相处，尤其是让·莫格。这位逃离了蒙吕松高中（lycée Montluçon）的年轻的哲学老师聪明、不拘于成规，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牙齿不适》（*Les Dents agacées*）里向我们分享了列维 - 斯特劳斯在巴西的不凡经历。《牙齿不适》是一本实事求是又饶有趣味的回忆录。在那个时刻，“我们只管享受生活”。列维 - 斯特劳斯需要承担家庭的担子，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父母。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鼓励父母到巴西与他们相聚，似乎在他的印象中，圣保罗就是黄金国，是家道中落、面临经济困境的欧洲人的一片乐土。

经过达喀尔（Dakar）之后，门多萨穿过公海，十几天后抵达了里约热内卢。从此，他的生活中充满新事物与发现新事物的乐趣，他只好沉醉其中；晚上，发动机的震动反而让他“心平气和并且感到幸福”³。奇怪的是，横渡这片没有标记的大西洋打乱了旅行的价值。静止的感觉就好似客船向旅行者们展示着幻灯片，而幻灯片为观众们献上了“世界的转盘”⁴。列维 - 斯特劳斯“感谢这些恩赐”⁵，他聚精会神地与这些事物对话，没有什么能打扰他的兴致。在莫格的回忆中，他似乎一直“孤身在甲板上漫步，

1 1935年2月5日，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写给父母的信，现在是莫尼克·列维 - 斯特劳个人收藏的一部分。写信时，克洛德正在“门多萨”客轮上。

2 同上。

3 《忧郁的热带》，第49页。

4 同上书，第50页。

5 同上书，第51页。

他没有闭上眼睛，可整个人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害怕刚刚记录下的一切会从他的身边溜走”¹。

他调动全身的感官究竟在看什么呢？可能是云朵漫无章法的运动，或者是“超自然的灾难”，比如日出日落？克洛德在《忧郁的热带》里曾对后者进行了几页的分析。这些为人所知的内容是他当时写下的。15年后，他认为把这些文字放在文本的这个位置非常合适。这种普鲁斯特式的拼剪（pastiche）虽然有些俗气，但也有几分作家的风采，这也是在他了解具体的事物、了解它们是如此丰富的过程中，对他的语言、对他捕捉现实和翻译现实的能力的考验。似乎，在即将进入奇妙的新世界（这是他日后将要探索的世界）时，列维-斯特劳斯想要用他的眼睛和笔触揭示它的无与伦比、它丰富的内涵、它不可言喻的美好之处。

中途还有另一段精彩的文字：“赤道无风带。”这是《忧郁的热带》第八章的开头。这个风平浪静的区域里，两个半球的风在这里集合和互相抵消，因此带来了一片平静，然而平静之中也潜伏着危机。航海者把这里划作赤道线（他们也害怕平静中隐藏的波浪）。空气暗淡无光。天空比海洋还要灵动，而海洋则比天空更加灰暗。人的感官能够捕捉到的标记互相颠倒，它们好像是邀请克洛德把焦点放在进入新大陆之前最后一道门槛上——代表完全进入美洲的“最后的标志”。在一个“甲板上度过的无眠的夜晚、期待美洲大陆的夜晚”²里，他们热情地举杯共饮，这时，他们可以幻想黄金时代的神话，幻想16世纪先驱们的冒险，幻想皇家探险团的遭遇，以及西方世界、西方经验、西方知识与西方信仰面对另一个世界时所承受的“撕心裂肺的考验”³。列维-

1 《牙齿不适》，第81页。

2 《忧郁的热带》，第63页。

3 罗曼·贝尔特朗（Romain Bertrand）将之放在历史语境进行比较。参见罗曼·贝尔特朗：《历史的另一面：东方与西方相遇（16—17世纪）》（*L'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 Récits d'une rencontre Orient-Occident, XVI-XVIIe siècles*），巴黎：瑟伊出版社，2011年。

斯特劳斯还可以幻想他的旅程，好像欧洲和美洲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星球。

“新大陆”的气味

一些符号的出现说明“新大陆”就在眼前：热带长尾鸟（paille-en-queue）、海燕等鸟类，一队队银色的飞鱼。但“最先出现的是一种气味”：它混合了异国的辣椒与发酵过的烟草叶的味道。这是一种属于陆地的味道，一种充满了植物气息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对“巴西”这个名词嗅觉上的“强烈认同”。仅次于气味的是景色：巨大的马尔山脉（Serra do Mar）沿着海岸铺展开来，十分显眼。船只从北往南航行，从里约热内卢到圣多斯的过程中，马尔山脉也一路前行。这尊无法测量的庞然大物十分结实，这些特征从今以后便代表了广阔的新大陆，也要求他调整自己的看法。

里约热内卢让他失望。他对比例的认识被一个景点弄糊涂了，因为景点的名声与大小并不匹配：科科瓦多山以及甜面包山在他看来像是“掉落在人间的残齿”¹。克洛德在这座因美景而出名的城市里漫步，它让他想起了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尼斯和比亚里茨，因为这里既有一种亲切感，也有一种疏离感。这是从历史角度而言的，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亲切与疏离。看穿这一切的他做出了第一个总结：“与其说热带地区具有异国风情，不如说它是老旧的。”²然而，他也发现了一些真正的不同之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融合要比欧洲的城市更加和谐。在里约，马路扩展了房屋的空间，房屋内外的空间发生了渗透。而他对另一种与欧洲颠倒的情况感到有趣：由于空间有限，里约的社会阶层按照海拔高度分布的规则刚好与欧洲南方城市相反。马赛或者那不

1 《忧郁的热带》，第66页。

2 同上书，第74页。

勒斯的资产阶级喜欢海拔较高的住宅，因为这样的房子空气新鲜又有能望向大海的视野；里约的贫民窟分布在小山上，那里缺水又长期被阳光照射，经济条件优越的市民则搬到了环抱在小山周围的山谷之中，这些山谷“就像是一副窄窄的手套，把手指裹得紧紧的”¹。

克洛德对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为他南下的美妙旅程提供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南下指的是，从“梦中的热带”开始沿着巴西海岸线一直到圣多斯的旅程。这条几千千米长的海岸上有一片细沙沙滩，沙滩的上空是海边郁郁葱葱的山脉，此外，小岛和小湾让海岸的轮廓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几个慵懒的小港口偶尔会展现出18世纪宫殿辉煌景象的残留痕迹，那是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金子经济带来的成就：乌巴图巴和帕拉蒂曾是运送金子去欧洲的出口港。这段旅行需要空间上的移动，也必定随着时间推移。因此，当他们抵达圣多斯，旅行结束，他们也回到了“当下”。现在，咖啡成为黑色的金子，是巴西这一地区的“黄金”。从19世纪末开始，咖啡这一农产品为圣保罗州带来了繁荣，而圣多斯港成为咖啡主要的出口港。

在圣多斯，一小群法国人受到了朱里欧·德·梅斯奎塔·菲略（Julio de Mesquita Filho）的迎接，他是《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o S. Paulo*）的所有人，是来自圣保罗的大资本家，也是圣保罗大学创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圣保罗在内陆，距离圣多斯100多千米，连接两地的是一条颠簸的公路，名字叫马尔路（Caminho da Mar）。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海洋山脉造成的两地800米的海拔之差。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感受到的第一次“热带冲击”来自海岸森林。海岸森林繁衍于原始的斜坡之上，它让克洛德呼吸到茂密植被带来的新鲜空气。但山顶的景象就不同了：西边一片空旷的赭石色景色，那是巴西中部的大高原。高原的高

1 《忧郁的热带》，第74页。

度随着阶梯不断下降，直至与亚马孙盆地保持水平，就像“一张向海边倾斜的桌子、一片被潮湿的丛林和沼泽包围的荒地、一块卷曲的跳板”¹。我们注意到他对地理特征的生动描述与维达尔·白兰士一模一样，列维－斯特劳斯还在巴西遇到了白兰士的女婿兼弟子伊曼纽埃尔·德·马顿（Emmanuel de Martonne）。这片寸草不生的高原成为列维－斯特劳斯日后所熟悉的巴西风景，他在圣保罗的生活、在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的考察过程都有这片高原的身影。它向列维－斯特劳斯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例如，裂缝、山脊、沟壑，但同时，“天上下起了布列塔尼那样的蒙蒙细雨”²。

逆着山脉走势从圣多斯到圣保罗的风景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被砍得光秃秃的土地上只剩下荒芜的景象，勃勃生机一去不复返，急功近利的开拓者短期的暴力开发之后又将这片土地丢在脑后。这些都是在咖啡经济成长起来、巴西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在巴西加快现代化脚步的过程中，（淘金、制糖、咖啡豆种植、可可种植、橡胶产业的）发展高峰相继出现，而这个现代化的进程与那片被遗忘的风景一样混乱不堪。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见到的 1930 年代的巴西突然跳出了它的殖民地时代。巴西摆脱了佩德罗二世的统治，1889 年，巴西帝国成为共和国。早在 1888 年，巴西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这些往事距离克洛德去巴西的那一年还不足 50 年。巴西第一个共和国一直延续到 1930 年，它建立于圣保罗的寡头势力之上。共和国给予每个州很大的自治权，州与州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以联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1880 年代咖啡业的兴盛改变了圣保罗州西部的高原，那里建起了庄园，庄园里种起了单作的巨大的植物。仍未摆脱奴性的工人负责种植，为庄园大家族服务的管家负责管理这些工人，因为，庄

1 《忧郁的热带》，第 80 页。

2 同上书，第 79 页。

园的主人们常常不在。同时，巴西出现了大量的移民人口（300多万人），他们集中于巴西南部的咖啡树种植区，服务于圣保罗的这项新兴产业。除了意大利人，德国移民也成为巴西南部的开拓区里的农业人口，这些开拓区位于巴拉那州、南里奥格兰德州或者圣卡塔琳娜州。此外，从1908年起，日本人开始从圣多斯登陆巴西这片土地，然后进入咖啡庄园里工作。他们最后常常成为生产稻米和蔬菜的农耕者。扎根于巴西的这群移民存在感很强，而他们的团体又很封闭。当列维－斯特劳斯和同事们抵达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时，它已经表现出文化多元的潜质：根据圣保罗各个社区之间非常鲜明的城市地貌的区别，我们可以找到像纽约那样的“意大利城”（在贝希加区）或者“东京城”。里约和圣保罗建立了不同的城市特色，里约是快乐之城和政治中心，而圣保罗是一个大型的工业城市；而乡村生活受到殖民背景对精神世界的影响，所以仍旧非常传统。然而，社会、经济、城市的变化让“庄园主共和国”里的寡头势力的秩序面临危机：农民起义、共产主义运动（1927年“普雷斯特斯纵队”的精彩历史）、陆军年轻军官发起的几轮“尉官派”起义。1930年，巴西的新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推出了一项政治条约，借此加强了联邦州政府对城市中产阶级的监管。瓦加斯调停了当地精英分子和“中尉们”之间的矛盾，他主张极端的政治手段，使1930年代政治对抗的氛围非常浓厚。1937年，他废除了原有的国家体制，建立了“新国家”，对这块新的政治版图加强统治。1935年2月末，年轻的法国儿女们来到圣保罗，尽管这个国家在多个方面发生着快速的转变，可他们对这些事情还知之甚少。但他们很快便通过学习掌握了这些信息，因为政治时局和经济时局与他们南美之行密切相关，也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计划、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与同行的伙伴们身上发生的事情相比，这些影响要深远得多。

圣保罗的幻景

抵达圣保罗之后，法国老师们受到了圣保罗州州长阿曼多·沙理士·德·奥利维拉（Armando Sales de Oliveira）的接待。他们在特米纳斯酒店（l'hôtel Terminus）落脚，特米纳斯酒店是一间市里的豪华大酒店。他们的到来也得到了当地新闻界的报道。照片和表示欢迎的文字说明了，他们是贵客（personae gratae）。

狂欢节刚刚开始：“当天夜里，我们出门探索这个城市。在一个贫民街区，一座有着绿色窗户的矮房子里传出了响亮的音乐声。我们看到，有人正在房子里跳舞。我们向他们走近。一个看门的黑人告诉我们，进去跳舞可以，但如果只是看看就免了。于是我们便认真地跳舞，但我担心自己舞艺不佳，会给年轻的黑人姑娘们造成不快，而她们却完全忽略了我们的动作，接受了我们的邀请。”¹ 她们服装的羊毛材质与圣保罗夏天的热浪并不合适，她们因此不停地出汗。

第二天，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Paul Arbousse-Bastide）带着他们在城里转了一圈。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早他们一年来到巴西，已经熟悉了环境，是他们的前辈。他是社会学老师，也是乔治·杜马的远房弟弟。列维－斯特劳斯曾多次提到，这些“走马观花”的环行是有价值的：它向克洛德展示了一座外国城市的风貌，让这位行色匆匆的游客透过无知的双眼记录下城市赐予他的深刻的印象和充满意义的惊喜。这些匆匆一瞥的经历让他们产生了直观的感受，日后长时间的居住与生活让他们难以再次捕捉这些感受。那时，克洛德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圣保罗呢？圣保罗很吵闹，有多副面孔。它也给克洛德一种“未完工”的感受，这些感受都有迹可循。克洛德用他的徕卡相机拍摄了照片并把这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伤的圣保罗》，莫雷拉·萨勒斯学院（Instituto Moreira Salles）：巴西文学出版社（Companhia das Letras），第5版，2009年，第43页。我要感谢翻译人员路易莎·瓦伦蒂尼在我访问圣保罗期间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些照片收录进《忧伤的圣保罗》（*Saudades de São Paulo*）之中：正在建造的大楼、热闹的市民生活、各种招牌，以及一种乡土气息（车子很少）；一群母牛平静地走在马路上，而马路一侧是人满为患的电车。时空发生了碰撞，这里既像芝加哥，也像巴黎，也有里斯本的味道。一些黑人穿着贴身的白色衣服，而另一些则穿着破烂衣服；“茶树高架桥”（*viaduct du Thé*）下方有棕榈树；尽管没有城市规划，但沿着地势的起伏，一条条大道建了起来（圣若奥大道正在建设）；圣保罗最初的那片区域曾只是耶稣会的活动地带，它位于多岩石的山嘴，两条河流在那里相聚并流入铁特河（*Rio Tietê*）。经历了传道活动的高潮之后，这座城市成为新兴的咖啡买卖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交易地点集中在它的“三角区”，一个现代城市的中心区域。从所谓“第二次奠基期”（这是皮埃尔·蒙贝的叫法）开始，圣保罗快速发展，它的居民从1886年的4.8万人增加到1935年的112万人。¹ 3/4的圣保罗人出生在巴西之外：城里一半是意大利人；还有很多德国人，一些日本人和仅仅几千个法国人。财富持续快速的的增长也反映在城市治理之上。这座巴西的城市染上了欧洲色彩：电车、林荫大道、共和国广场（里面建有花园和市戏剧院）。此外，庄园主们通过联姻和频繁的社交在圣保罗建立起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或是住在帕卡埃姆布山丘上，或者住在带有殖民风格、被棕榈树和西吉诺波利斯区的花园点缀起来的官邸里。人和地点创造了美好时代的美好生活。1930年代的圣保罗保留了些许当时的痕迹，而移民者的下一代，他们的财富大多来自制造业而不是来自土地，为了区别于他人，选择居住在圣保罗人大道。这条位于山顶的大道把城市一分为二，调和了这些新权贵从外界带来的不同建筑风格。这些

1 参见巴托罗梅·贝纳撒尔（Bartolomé Benassar）、理查德·马翰（Richard Marin）：《巴西史（1500—2000）》（*Histoire du Brésil, 1500-2000*），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建筑风格无耻地展现着新晋权贵们创造的成就：“马塔拉佐家族差人建造了一座面积很大、罗马风格的房子。房子的几何结构非常简单，建筑材料是白色大理石。有着犹太人血统的雅费家族为房子增添了各种穆斯林艺术装饰品，像是要打造一座清真寺。曾兹家族（Zenz）模仿英国社会的生活，而具有一定写作才华的蒂奥利耶（Thiollier）居住在一座资产阶级风格的漂亮房子里，让自己好像身处吕埃（Rueil）或者维西涅（Vésinet）。”¹ 一幢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俯视着城市里的一切，它的名字是马蒂内利大厦。马蒂内利大厦淡粉色的身影表明了首都圣保罗的决心：它想要成为热带地区的纽约。因此，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人生第一次见到摩天大楼并不是在纽约，而是在圣保罗。探索这块“新大陆”的方式非常错乱和与众不同，因为他不是通过原型，而是通过复制品才展开探索的。

因为圣保罗是属于新大陆的城市，列维 - 斯特劳斯很快便爱上了它。“圣保罗对我来说从来都不坏。这是一个野性的城市，与所有美洲的城市一样……”² “野性”指的是它陷入了工业城市可怕的节奏之中，从“新生快速过渡到衰败，从未留恋过往”³，因此它只经历了短暂的变化周期。圣保罗人吹嘘说，在 1935 年，他们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建一栋房子。尽管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在巴西期间从未更换住所，但房子的地址却不断变化：辛西纳托·布拉加路 212 号或者 345 号。这便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幢列维 - 斯特劳斯夫妇居住的房子出现在《忧伤的圣保罗》里的几张照片上，后来，克洛德的父母也搬了进去。房子被树木环绕，有一种殖民建筑的魅力，它面积很大，有一扇熟铁铸造的大门，虽然门上带有一些锈迹。铁门代表了不老旧、舒适的居住

1 《牙齿不适》，第 87 页。

2 《忧郁的热带》，第 85 页。

3 同上书，第 82 页。

环境，而铁门前方的福特汽车更为这种舒适生活提供了保障。在巴西买车说明了他的变化。从雪铁龙“三叶草”到福特，这代表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年轻的老师们需要这样的变化，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事先应当如何幻想：“我们都是外省高中里的普通老师，我们想要逃离的想法和我们对研究的热情受到了乔治·杜马的关注。一开始，我们住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后来我们搬进了带院子的私人大别墅，还雇了佣人伺候我们的夫人（我们家里第一位佣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黑白混血的姑娘，但我们不得不解雇她，因为她常常趁我们不在穿上我太太的连衣裙去狂欢节的俱乐部里跳舞；之后，有一对不足四十岁、迷人的葡萄牙姐妹，可我们必须两人一起雇佣，因为她们不想分开）[……]我们的生活并不奢侈。他们其中一人是裁缝，他来家里给我们量尺寸，做图样。食物和服务业价格便宜，这让我们觉得跨越了好几个社会等级。”¹ 克洛德在《忧郁的热带》里写道，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移动，也是社交空间的变化：旅行中，人身处的位置变了，人的地位也变了，它会变高或者变低。在巴西的旅行是克洛德最富有的一段经历；而几年之后的纽约之行很快便又让他陷入经济危机。这些社会地位的曲折变化占据了他人生的一部分，他一直期待一种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然而，直到1950年代末，这个愿望才真正实现。在此之前，巴西是他的乐园。晚他几个星期抵达巴西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租了一辆汽车，意大利司机开着车送他去大学。

那时的生活非常惬意。除了非常优越的物质条件，列维-斯特劳斯还能欣赏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各种各样的风景，并用他城市漫步者敏锐的眼睛发现“新鲜的事物”。他的街区在富庶的“稚尔丁保利斯塔区”（Jardim Paulista）边界处，而他大部分同伴都在稚尔丁保利斯塔区选定了住宅，这让他感到高兴。它靠近圣保罗人大道，位于一个向市中心延展的混合街区的高处，混合街

¹ 《忧伤的圣保罗》，第8页。

区海拔较低、靠近屠宰场的区域住着意大利人和黑人：“辛西纳托·布拉加路与圣保罗人大道平行，比它海拔低一些，但仍然位于高地之上。离辛西纳托·布拉加路不远处，我们可以眺望一整个混乱不堪的街区。我频繁地在这个地区闲逛，被不同的风景深深吸引：现代风格的建筑、仍然带着乡土气息的大道、有着田野风貌的山丘和城市风景中的乡村风貌。”¹ 贝拉维斯塔（Bela Vista；或贝希加区 [Bexiga]）的这种城市风景在一张照片和一幅雷蒙·列维-斯特劳斯的画中保留了下来，他高高的个子在照片中显得特别突出。² 在城市面前，父子两人敏锐的观察力觉醒了。他们漫步其中，进行打探和收集，两人欣赏城市的习惯相同，甚至最不经意的动作也一模一样。但圣保罗不像巴黎，它不会被人轻易看透，昨天不会，今天也不会；但与所有大城市一样，它也会回收产品和潮流，于是爱逛古玩店的聪明人就能有所收获：“那时候，我们可以在圣保罗游荡。但它不像巴黎或者伦敦有很多古玩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圣保罗只有一家古玩店，名字好像叫‘考尔特·雷奥’（Corte Leal）。店里并没有我们想要的前哥伦布时代的陶瓷制品，也没有土著人的玩意儿，我们只能在橱窗里看到一件被打碎的卡比利亚的瓷器。我为辛西纳托·布拉加路上的房子买了四五件巴西上世纪末的家具，这些实心楸木制成的家具在庄园里还能见到，在城市里已经过时了。的确，除了城市本身，我们不能再向它要求其他可供冥想与沉思的物品。杂乱无章的秩序之中，不同的事物混合在一起，让我们觉得困惑：教堂与殖民时代的公共建筑、破旧的房屋与 19 世纪的建筑物，以及其他当代的事物……”³ 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在圣保罗的这所年轻大学里全力“解读圣保罗这篇文章”，如今，他已经是这儿的社会学老师了。

1 《忧伤的圣保罗》，第 49 页。

2 这幅画挂在巴黎圣日尔曼大街“拉丁美洲之家”（Maison de l'Amérique latine）的某个接待大厅里。

3 《忧伤的圣保罗》，第 16 页。

巴西的法国科学界

根据法令，圣保罗大学成立于1934年1月25日。它成为巴西学术界的创世神话以及重要的典范。它代表了圣保罗人现代化的决心，也代表了法国与巴西之间神圣友谊的顶峰。从建立初期开始，法国和巴西两方都为圣保罗大学安排了很多计划和“使命”，让这所顺应需求而出现的新大学面临着重重考验。总之，它与在欧洲所有追求学术自由的大学都不一样。

为什么是圣保罗大学？

从法国的角度看，在圣保罗建一所大学无疑是一项在国外推广法国作品的政策，用外交部的话说，就是“文化影响力”。当时，法国意识到自己的衰退，计划扩充“软实力”并与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的政治宣传对抗。¹ 创建于1920年1月的法国海外事务局（Service des œuvres françaises à l'étranger）负责组织这项类似外交的文化活动，而在1930年代，身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究员的让·马克思（Jean Marx）一直担任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的文化外交把重心从它的优势地区——近东——转向美洲和中欧地区。1933年，300多名法国老师被派往国外的两百多所高校任教。对外交部而言，这个对巴西进行文化渗透的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法国的文化影响力是传统的（法国经济上的存在感很低，而文化影响力相对较大）；由于国内大学职缺较少，所以不乏想要去国外的申请人；而乔治·杜马是法国研究拉丁美洲的大家。

事实上，这位有着炭黑色眼睛的塞文人和新教徒对巴西上流社会（*gran fino*）一见钟情。他为众人所知、为众人所敬，他在

1 这些问题请参考雨果·苏博（Hugo Suppo）：《法国对巴西的文化政策（1920—1950）》（«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française au Brésil entre les années 1920-1950 »），巴黎第三大学拉丁美洲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1920—1938 年远赴巴西的 17 场旅行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足迹遍布这些新成立的机构：1922 年，里约的法巴两国联合高等文化研究所；1923 年，圣保罗的法国巴西高中；首批考察团的考察对象是圣保罗大学，后来好几次考察中，他又去了联邦地区大学、里约大学、阿雷格里港大学……乔治·杜马是大学教师、心理学家、师范生，他鼓动激进派的政治人士们采取行动，也激励了处在沉闷环境中的年轻的师范生们（好友谢列斯泰·布格雷也提供了帮助）；同时，他代表政教分离的法国——这是一个由理性主义和孔德派主导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与圣保罗当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然，重要的是这位在巴西用法国的科学当作武器的“征服者”自己必须是奥古斯特·孔德的专家。¹此外，他的学生了解，他有着不同凡响的口才，能诱惑他人，与他的好友让·马克思一道，他能在拉丁美洲呼风唤雨（他也得到了保罗·利维的帮助）。

对巴西而言，圣保罗大学的创立正值寡头制度面临危机的时候。1930 年，瓦加斯登上共和国总统之位后，将圣保罗的精英分子从中央权力中排挤出去，这场危机从此爆发。1932 年，寡头政治集团尝试推翻瓦加斯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成立圣保罗大学是圣保罗当地旧家族的领袖尝试进行的“复兴”活动之一，他们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受到压制，因此希望在文化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重拾荣光。他们用上了新的工具，用欧洲年轻人的培养标准看待圣保罗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迎头赶上”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和政治学学院（它完全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圣保罗市文化处和“哲学、科学和文学学院”（这个学院完全参考法国模型）

1 乔治·杜马是《两位实证主义圣人的心理研究：圣西蒙与奥古斯特·孔德》（*Psychologie des deux messies positivistes : Saint-Simon et Auguste Comte*）一书的作者。

2 参见塞尔吉奥·米塞利（Sergio Micelli）：《巴西的知识分子和权力》（*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au Brésil*），“巴西丛书”，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 / 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MSH/PUG），1981 年。

伴随着圣保罗大学的建设计划而建立起来，时间上几乎保持同步。这些机构成立的背后都存在着报复的欲望，这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报复（圣保罗州对抗联邦政府），而不是社会层面的报复（乡下的大资产阶级对抗支持军队的小资本主义）。尽管原话并非如此，但法国领事 M. 潘戈（M. Pingaud）在报告里指明了圣保罗大学成立的用意，他是这样理解的：“圣保罗大学要成为巴西圣保罗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¹

就像是 1870 年战败后的法国人，1932 年之后的圣保罗人读了《文化和精神改革》（*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认识了雷南（Renan），他们希望能够真正振兴文化。² 这个伟大项目的发起人还包括梅斯奎塔家族（famille Mesquita），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朱里欧·德·梅斯奎塔·菲略，他是一名新闻人，也是大报纸《圣保罗州报》的所有人；让·莫格称他是“温驯的狮子”，对他“像冒险家一般灰绿色的眼睛”³ 和给予法国代表团的帮助大加赞赏：“他把法国代表团的任务当作自己的工作”。与州长阿曼多·沙理士·德·奥利维拉成为姻亲后，梅斯奎塔家族成为很多文化事业（期刊、出版社和机构）的资助者；圣保罗大学是他们的文化旗帜，而立宪派是他们的政治臂弯。1937 年，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圣保罗大学成为选举宣传的论题。这把大学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因为就在 10 月，瓦加斯瓦解了旧政权，建立了“新国家”。人们对圣保罗大学的命运感到担心。所幸的是，它经受住了风雨，并持续存活到今日。

1 《法国驻圣保罗领事潘戈向罗比安递交的报告》（« Rapport de M. Pingaud, consul de France à São Paulo, à M. de Robien »），外交部档案（AMAE），法国海外事务局（Service des œuvres），巴西档案，1932—1940 年，第 443 卷。

2 2011 年 8 月 5 日，在圣保罗，安东尼奥·坎迪多·梅罗埃苏扎（Antonio Candido Mello e Souza）讲述了其亲身经历。见证圣保罗大学成立的人物已所剩不多，安东尼奥·坎迪多是其中一人。他是让·莫格的学生，他的妻子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

3 《牙齿不适》，第 91—92 页。

他们是文化大使还是学科发展的代言人？

于 1935 年抵达巴西的年轻老师们很快发现了问题：现有的信息让他们对社会和文化问题摆出了“错误的姿态”¹，因为创立一个机构并不一定能实现他们这趟旅行将要展开的远大计划。

此外，这些老师的招募程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1934 年的第一批代表团是由大学老师组成的，他们满足一定的年龄要求并且工作能力得到认可。此外，他们常常是天主教徒²：罗贝尔·加里克（Robert Garric）教授文学，皮埃尔·德方坦（Pierre Deffontaines）教授地理，埃蒂安·伯尔纳（Étienne Borne）教授哲学，埃米尔·科纳尔（Émile Coornaert）教授历史，米歇尔·贝尔韦耶（Michel Berveiller）教授古典文学；最后，资历略浅的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教授社会学。6 个老师的意识形态不能与圣保罗寡头政治格局里的自由派或者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此外，他们谨慎地在圣保罗开展除了授课以外的日常活动。1935 年，程序发生了变化，招募代表团成员的外交程序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的招募对象不是“成熟的老师”，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年轻的高中教师资格获得者。这些年轻人渴望摆脱高中的教学任务，去巴西这片土地上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有了博士论文，他们回到法国后便能直接向大学提交求职申请，职业、学识、社会关系都将发生变化。

1935 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其他人一同前往巴西。费尔南·布罗代尔教授历史，皮埃尔·蒙贝教授地理，让·莫格教授哲学，皮埃尔·乌尔卡德（Pierre Hourcade）教授文学

1 《亦近，亦远》，第 33 页。

2 参见让－保罗·勒菲弗（Jean-Paul Lefèvre）：《1930 年代法国高等教育界的巴西公派任务》（« Les mission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au Brésil dans les années 1930 »），《20 世纪：历史期刊》（*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第 38 期，1993 年，第 24—33 页；居伊·马蒂尼埃尔（Guy Martinière）：《法巴交流史》（*Aspects de la coopération franco-brésilienne*），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82 年。

（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继续任教）。另一处变化是，理论上，这些新老师任教三年（而不再是一年）。杜马在外省高中物色的这些年轻的教师资格获得者中，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进展最快，他已经开始动笔了。他带着资料出发，将记录着塞维利亚资料的微缩胶卷塞进行李之中，这些资料都是他论文的营养。他研究的是16世纪的地中海，克洛德对此钦佩不已。为了装下数量庞大的资料，布罗代尔一抵达便额外租下了一间宾馆的房间。至于列维-斯特劳斯和蒙贝，他们想要利用自己对拉丁美洲研究的先驱身份成为这个新鲜领域的专家，拉美研究的价值与研究空间都不容小觑；而莫格以讽刺的口吻称自己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气质”¹（他自己不那么确定未来会成为大学老师）。将要在1938年接替克洛德的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带着一个有关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博士论文课题出发，但穿越大西洋的经历让他改变了想法。这位未来研究巴西黑人的著名民族学家、巴伊亚州（Bahia）康东布雷教（condomblé）的大行家与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同姓，但两人之间并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很快，因为其中一人身材肥胖而另一人身材瘦小，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大巴斯蒂”（o Bastidão）、“小巴斯蒂”（o Bastidinho）²！

从此，年轻的法国儿女们需要面对三方面的烦恼，而这些烦恼让克洛德在巴西生活的那些年阴云密布，尽管在经济上十分富有。

首先，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教书或干一些他们想做的事，这是他们来巴西的原因，而他们的工作处境完全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作为法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他们获得了当地媒体、圣保罗的学术权威和有身份的女士们接待大使一般的热烈欢迎；他们必须参与几个社交活动，并对大学之外的听众开设几场讲座。克洛

1 《牙齿不适》，第94页。

2 2011年8月5日，在圣保罗，安东尼奥·坎迪多·梅罗埃苏扎讲述了其亲身经历。

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35年春天的讲座里谈了《进步的危机》。这篇后来不幸遗失的文章，它的主题大有继续研究的潜质。¹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布罗代尔或者蒙贝并不渴望成为国际关系的半个专家，也并不渴望代表法国讲话，他们反而希望拥有一种国际视野而不是国内视野，投入各个学科的科学的研究，教授新的研究方法。²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处境也发生了变化：一方是法国文化的大使，另一方想要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学者。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远赴巴西的意义在于成为一名具有全球视野的学者，而创办学校的目的却是推广法国文化。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个差别，我们还将见到第二个不同之处。

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同事们不想成为代表法国的大使，他们也不愿意被看作圣保罗寡头集团的战士。事实上，他们并不喜欢瓦加斯和他的同伙。列维－斯特劳斯身上社会主义者的直觉让他对梅斯奎塔家族“傲慢”³的姿态感到难以忍受，他和同僚们感觉自己成为“罗马帝国的主顾”⁴。年轻的老师们工资翻了三番⁵，成为暴发户：他们住在大别墅里，有佣人和汽车。他们向一屋子谦虚的学生讲课，而学生们对他们充满敬意，把他们看作“统治阶级的仆人”⁶。别人也鼓励他们，叫他们“享受新主人那

1 苏博在博士论文《法国对巴西的文化政策（1920—1950）》中提到这场讲座。皮埃尔·蒙贝（Pierre Monbeig）的博士论文则以“巴西的日本移民”（《L'émigration japonaise au Brésil》）为题。“进步的危机”这一主题已有人进行了研究：1934年，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以“进步的危机”为题进行写作。1936年，该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2 参见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外交大使还是研究人员？》（《Ambassadeurs ou chercheurs?》），《学者共和国（1870—1940）》（《La République des universitaires, 1870-1940》）第八章，巴黎：瑟伊出版社，1984年。

3 《忧伤的圣保罗》，第10页。

4 同上。

5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皮埃尔·蒙贝、让·莫格每月可挣2600法郎，而费尔南·布罗代尔和皮埃尔·乌尔卡德（Pierre Hourcade）较为年长一些，月薪可达3500法郎。他们的工资一半以法郎支付，一半以耳瑞斯（milreis，即巴西的旧货币）支付。有人对让·马克思表示不满，因为耳瑞斯的贬值使他们的收入缩水。参见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巴西档案，1932—1940年，第443卷，圣保罗大学资料。

6 《亦近，亦远》，第31页。

种生活——转转汽车俱乐部、赌场和赛马场”¹。让·莫格投入漫长的感情游戏之中，而克洛德则不同，他几乎不去圣保罗当地的沙龙，偶尔去那里也不过就是用讽刺的口吻对这场“文明游戏”的巴西式规则批判上几句。1950年代末，圣保罗人读了《忧郁的热带》，他们几乎没能理解克洛德用来形容他们的植物的隐喻和植物学研究的笔调：“为了躲避这群冷酷的动物，圣保罗的精英就像他们心爱的兰花一般，成为无精打采的植物，一种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充满异国风情的植物。”²后面的描述也不痛不痒：这是一场“社会学的小步舞会”，里面有社会角色（大资产阶级）、政治角色（改革派、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文化角色（先锋派艺术家），而在这个处处受到钳制的社会里，每一种角色都只有一个代表人物。这些法国老师经历的混乱的社会现状更加印证了克洛德对巴西上层社会不留情面的诊断（尽管一些巴西人觉得他说得非常公道，但他们也只能低声耳语）。对他们而言，巴西是一块职业跳板，不论法国和巴西当局的说法是什么，他们为年轻学生们开设的课程便是巴西未来的杠杆，这个杠杆也能用来对付赞助大学的贵族资助者们。他在巴西的经历距离他创作《忧郁的热带》只有20年，这让克洛德能够轻松地带我们回顾这段曲折的故事。

1 《忧郁的热带》，第8页。

2 同上书，第87页。

CONFERENCIAS PUBLICAS PROMOVIDAS PELA FACULDADE DE PHILOSOFIA

O prof. Claude Levi-Strauss realizou hontem a primeira dissertação da série que vai levar a effeito, sobre "A crise do progresso"



Ao alto, o prof. Claude Levi-Strauss, quando proferia a sua conferencia — Em baixo, aspecto da assistência

Em proseguimento, ao cyclo de conferencias promovido pel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e que está a cargo dos professores da Faculdade de Philosophia, Sciencias e Letras, falou hontem, no salão João Mendes Junior,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o prof. Claude Levi-Strauss, cathedratifico de Sociologia daquelle Instituto de alta cultura.

Levando a effeito a primeira preleção, da série, que, sobre "A crise do progresso", vai ali realizar, dissertou o conferencista sobre "Progresso e retrocesso".

Inicialmente, diz que o progresso como resultado de trabalhos e realizações do homem, é, por isso mesmo, a essencia do espirito humano.

Salienta, depois, que o bem e o mal, já ocorridos, não podem ser considerados desta ou daquela forma, ou seja como um bem ou como um mal. Porque tudo quanto occorre constitui esta-

phas da civilização, phases do progresso.

Rebateu a seguir o conceito segundo o qual a concepção do progresso pode ser comparada á evolução do homem. Este, frisou o conferencista, tem uma trajetória que pode, mais ou menos, ser determinada, pela propria idade.

O progresso, no entanto, tem fluxo e refluxos, retrocessos e avanços, períodos de fadiga e épocas de decadência, ou melhor — marchas e contramarchas.

Essas contramarchas, no entanto, nunca vão até o ponto de partida. E, sempre, antecedem um avanço maior, que vai além do ponto em que se verificou o retrocesso.

Depois de se referir ás diversas phases do progresso humano, até a segunda metade do século XIX, quando teve inicio o desenvolvimento das indústrias e da machina, observou que, após a conflagração europeia, entrou a humanidade num período de du-

vidas e incertezas. Não se pode prognosticar, ao certo, se, doravante, o progresso será maior na Sciencia, ou na Arte.

Não pode haver duvida, contudo, de que, em virtude desse phenomeno, estamos numa época de retrocesso.

É evidente a ansiedade que empolgou, totalmente, os povos. Há incertezas e hesitações, entre a humanidade.

Tudo está a indicar, no entanto, que, passada esta phase de agitações, entrará a humanidade num período de progresso ainda maior, que determinará uma evolução que atingirá, por certo, limites hoje imprevisíveis.

A CONFERENCIA DE SEGUNDA-FEIRA

A proxima conferencia será feita pelo prof. Pierre Houssier, na segunda-feira vindoura, ás 21 horas, no mesmo local. O seu thema será: "Baudelaire e Verlaine, precusores do movimento poetico contemporaneo."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题为“进步的危机”的公开演讲，听众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圣保罗人。《圣保罗州报》（1935年8月9日）作了相关报道。

最后，除了已经提到的问题，在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的列维－斯特劳斯还感受到一种完全属于精神层面的不适，这种不适来源于这个国家对社会学的定义和应用：他们还停留在奥古斯特·孔德的年代。在巴西，实证主义的旗帜——秩序与进步——从188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里高高飘扬，列维－斯特劳斯表示，由于“受过教育的巴西人从孔德过渡到涂尔干”¹，实证主义以及之后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成为“温和的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这种自由主义成为寡头集团打击个人权利常用的意识形态武器”²。然而，抵达巴西的克洛德“公开地反对涂尔干，反对一切将社会学回归形而上学的主张”³。他反涂尔干的一时立场也得到了与他同辈的哲学家的支持，而这种反对的情绪来源于一种由上至下的“传承”。因为涂尔干的学说被一步步传递到他的手里。事实上，仍旧“活跃”的涂尔干学说的信徒之间产生了“间隙”⁴。一方是法兰西公学院的莫斯、东方语言学院的葛兰言（Granet）、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西米昂（Simiand）（除了这些在研究机构任职的研究人员，还有唯一一名大学老师哈布瓦赫 [Halbwachs]）；另一方是布格雷、弗高内（Fauconnet）、戴维（Davy），他们与激进派和共和党政府走得近，作为巴黎大学的老师，他们教授哲学，但这种哲学里混杂着法律，他们还主张一种狭隘的道德主义。狭隘的道德主义让1930年代的年轻学生们感到无法忍受。而列维－斯特劳斯是通过后者的教学活动接触到涂尔干，因此他对涂尔干的态度才会如此“前后不一”⁵。但克洛德认识到涂尔干学说的精

1 《亦近，亦远》，第32页。

2 《忧郁的热带》，第48页。

3 同上。

4 关于这一段，参见约昂·海尔布朗（Johan Heilbron）：《涂尔干学派的演变（1920—1940）》（« Les métamorphoses du durkheimisme, 1920-1940 »），《法国社会学期刊》（*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第26期，第203—237页。弗朗索瓦·埃朗（François Héran）进行了总结，参见第397页。

5 1958年，集合了多篇文章的《结构人类学》（上卷）出版。“《结构人类学》出版于1958年，涂尔干的百年诞辰之时，一位不忠的弟子向《社会学年鉴》的创刊人涂尔干致敬”。

髓之后便改变了主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洛德会与涂尔干的侄子以及第一个弟子马塞尔·莫斯持有一些相同的见解。克洛德给他的信中这样说：巴西人认为社会学是“一种附属于市政府或者国会权力机构的工具”¹。那时他之所以转而投身社会科学，是因为他想利用社会科学打破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壁垒，最终捕捉那复杂、不存在于所有思想体系的现实。这也是他不急于宣传其社会学主张的原因，刚刚抵达巴西的克洛德正积极地了解英国民族学的经验论。他所持的这种观点很快让他与同事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另一位社会学老师——就社会学理论和教学的主张发生了摩擦。

法国代表团：鼎盛与没落

当社会学教席人数从一位变成了两位时（而圣保罗人对社会学课程又特别喜欢），身为其中一位的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写道：“至于第二位社会学教席，很抱歉，我并没有可以向您推荐的社会学家人选。我们应当需要一位年轻老师（但不是过于年轻的），他要对社会学研究感兴趣，并且愿意把巴西作为他研究的领域。”²通过谢列斯泰·布格雷和乔治·杜马，我们知道这个机会落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身上。然而，抵达巴西之后，克洛德完全没有兴趣教授社会学，因为他来此地的目的是民族学。1935年春天开学之后，两人之间围绕社会学这门学科而产生的摩擦愈演愈烈，而两人对教师权力的论战更是火上浇油。列维－斯特劳斯对学术自由的问题不依不饶，他激烈反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的权威。后者被授予了一个“代表团负责人”的虚职，所以并没有吹嘘的资本；此外，他是社会学系的主任，这是另一个没

1 1935年11月10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塞尔·莫斯的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档案盒编号181。

2 参见苏博：《法国对巴西的文化政策（1920—1950）》。

有实权的职位。总之，列维－斯特劳斯生硬地拒绝他授课的内容受到干预，并完成了—个涉及科研和教学的15页左右的反提案。它的题目《文化社会学与教学》¹展示了克洛德对课程内容设计的想法。在这篇短文里，他控告社会学家仍追求思辨，控告他们把社会学当作“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因为，他接着指出，“思辨的方法不能为问题寻觅到现实的解决方案，它仍只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庇护所”。克洛德拒绝赋予社会学科学那样的地位，因为他认为社会学还处在初级阶段；而社会科学中已经取得实效成果的两门学科是考古学和民族学。他保留了涂尔干的传统，但在表述的时候谨慎小心，他还借用了涂尔干的话：“民族学常常为社会学的不同分支带来成果最丰硕的革命”，这句话出自《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列维－斯特劳斯敢于反抗，他要求设立—个独立于社会学系的文化人类学的教席，但巴西当局和法国外交部没有响应他的要求，而法国外交部更是为这个状况感到难堪。乔治·杜马勃然大怒：“我要死在圣保罗大学里了[……]列维－斯特劳斯希望申请设立—个民族学教席，然后在他的课上讲民族学。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希望克洛德应当教社会学，因为他就是为了教授社会学而来这里的。于是，矛盾[……]我的意见是，列维－斯特劳斯野心勃勃并且表现得有些过于激烈了，我们当然可以免去他的职务，但你们也许还记得，我们除了他没有别的人选了。”²

1936年7月，“列维－斯特劳斯问题”甚至被搬到了圣保罗大学校长安东尼奥·德·阿尔梅依达·普拉多（Antonio de Almeida Prado）、两个中学校长和1936年刚到巴西的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面前，未来，弗朗索瓦·佩鲁将负责讲授

1 完整的文献参见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巴西档案，1932—1940年，第443卷。

2 1936年12月1日乔治·杜马给让·马克思的信。参见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巴西档案，1932—1940年，第443卷，圣保罗大学资料。

政治经济学。¹ 矛盾差一点就成为对错的问题。代表团分为两派，一派支持阿尔布斯 - 巴斯蒂德，另一派支持列维 - 斯特劳斯，问题则变得更加棘手。莫格、蒙贝以及布罗代尔——尤其是布罗代尔——支持列维 - 斯特劳斯，50多年后的院士授职仪式上，布罗代尔也提到了这些细节。他们之间的联盟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年轻的老师都认为科学应当建立于田野研究之上，而这种研究应当尽可能从教条（实证主义、涂尔干的思想、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关心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内容，并且主动忽视作为雇主的巴西精英分子提出的与当地有关的要求。这些纠纷的起因在于新兴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本身存在的模糊语义，列维 - 斯特劳斯就陷入了这个困境之中（民族志研究、文化社会学、原始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当人民阵线获得政权时，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感到兴奋，而这让圣保罗寡头集团感到忧虑，不和的气氛更加恶化。人人都知道克洛德心系左派，这在他与保罗·利维和人类博物馆的联系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在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他成为一场小规模“猎巫行动”的受害者。不论如何，1937年，事态继续恶化，并在1937年12月以不续约的结果落幕，当时他的三年合约刚满。

他们就像建起了一个高卢村庄，尤其是当他们与其他外国教师在一起的时候。年轻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学院为它的成员们感到骄傲：七位法国人、六位意大利人（其中包括了诗人翁加雷蒂 [Ungaretti]、数学家路易吉·范塔皮埃 [Luigi Fantappiè] 和一位反法西斯的物理学家欧卡里尼 [Occalini]）、三名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裔德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就像列维 - 斯特劳斯日后多次造访的位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1 争议围绕保罗·阿尔布斯 - 巴斯蒂德（Paul Arbousse-Bastide）递交给让·马克思的两份报告展开。一份报告没有记录日期，名为“关于列维 - 斯特劳斯先生和夫人的情况记录”（« Note sur le cas de M. Lévi-Strauss et Mme Lévi-Strauss »）；另一份报告的时间为1936年7月30日。参见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巴西档案，1932—1940年，第443卷，圣保罗大学资料。

Research），圣保罗大学也是一所具有国际格局的学校。然而，每个代表团，尤其是法国代表团，似乎都歪曲了这项国家行为的意图。好几位法国老师指出，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要争取优异的表现，要争取听众，每个人都认真地观察听课学生的人数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巴西的成败将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每一人都试着让自己被手下的朝臣们环绕起来，而自己手下的数量应当压过邻居的手下。这就是法国，这就是法国的大学，只不过在热带的场景下，它们显得有些好笑，也不那么合理。”¹朝臣奉承着阶梯教室讲台上的女歌唱家：“我们离开阶梯教室时就像是离开音乐厅的演奏大师。”²让·莫格似乎用他的才华和不拘陈规的风格让听众目瞪口呆。³

3—11月，一周6节课，每节课55分钟：这是圣保罗大学老师的日程表。而他们授课的对象中有一半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女性（尤其是第一年），另一半是学生。从第二年开始，新大学的成立颠覆性地改变了社会地位晋升的机制，因此它吸引了“那些想要利用我们颁发的文凭去寻找工作的年轻人；而律师、工程师、成熟的政治家则担心今后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所以想要‘以身犯险’”⁴。1936年，209位学生注册入学，其中33位学生是就读社会科学的大一新生，但二年级的学生只有两名。

露天的实验室：社会学之乐

法国人经常去奥德翁电影院看迦本（Gabin）和茹韦（Jouvet）的电影⁵，培养一些非常法国风情的爱好，他们敏感的天线则热切地伸向巴西，想去探索那里的真实情况。蒙贝、列维-斯特劳

1 《亦近，亦远》，第37页。

2 《牙齿不适》，第97页。

3 2011年8月5日，在圣保罗，安东尼奥·坎迪多·梅罗埃苏扎讲述了其亲身经历。

4 《忧郁的热带》，第90页。

5 参见《牙齿不适》，第102页。

和布罗代尔马上发现了“新大陆为他们提供的这片独一无二的实验场”¹。他们刚刚迈入职业生涯，有着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的视野；他们渴望在一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创立或者重新创立人文科学，让这些人文科学也充满朝气。作为哲学家，列维 - 斯特劳斯被巴西的现状、城市发展的形态、大格局的设计以及快速的变化深深吸引。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巴西，观察突然出现与消失的事物。他与皮埃尔·蒙贝的友谊让我们看见，在课堂上以及在个人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对巴西这块土地念念不忘。这是他的巴西经历造成的。

户外教学

尽管遭遇了很多阻碍，身为圣保罗大学社会学老师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展开了严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看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统一。他完全投入了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之中，他将经验看得格外重要，反对一切思辨活动。因此，他激烈反抗正统的涂尔干实证主义。我们知道阿尔布斯 - 巴斯蒂德感到十分愤怒。

他不认同被他称为“形而上学”式的社会学，他认为，对原始人的认识——民族志——是所有好的社会学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35年，他开设了一门以“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²为题的课。在他提供的参考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四部经典作品：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的《原始社会》、冯·甘奈普（Van Gennep）的《图腾问题的现

1 《忧郁的热带》，第49页。

2 课程分别以下列主题进行分类和命名：家庭社会学（婚姻、乱伦的禁忌、亲属关系、一夫多妻制、图腾氏族的组织形式、母权制）、经济社会学（社会的原始形态、原始共产主义）、政治社会学（原始社会的统治和法律）、宗教社会学（图腾崇拜），以及社会现象的比较研究。

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的《人类婚姻史》¹。但他的兴趣不止于此。他开设的课程包罗万象，从“原始社会学到城市人类学，其中也涉及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以及体质人类学”²，它们在圣保罗大学年鉴里保存下来的课程概述中皆有迹可循。

列维-斯特劳斯反对经院式的闭门造车，他让学生们在城市里展开调查研究：“我让他们在他们居住的马路、市场、十字路口展开实践，他们需要亲自观察不同空间里的居住环境的变化、居民的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职业活动等。”³ 圣保罗变化的脚步很快。对这位正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是一个绝妙的机会：他能够亲眼观察这些持续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想象欧洲漫长的历史。克洛德迷恋圣保罗，他热爱游荡于城市之中，但也不忘对学问的坚持，两种面貌都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向布格雷如此解释：“圣保罗是我们认为不体面的一座城市，而我却对它特别有好感，我喜欢它的杂乱无章和缺乏条理的风格。这是一种纯粹的‘城市现象’，我们可以漫步在各个街区，发现城市显露出来的不同面貌，从黄泥茅屋到北美风格的摩天大楼。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美妙的体验；而对城市的研究、对城市成长以及停滞不前的原因的分析、职业和国籍的空间分布，这些都是我教学的基础。”⁴ 灵感以及城市化的趋势属于法国社会学传统中关注的对象，它们被称作“社会形态学”，即不同人群的社会组织形式。

1 费尔南达·佩肖托（Fernanda Peixoto）和她的学生们的研究成果十分具有开拓意义：费尔南达·佩肖托：《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城市与田野工作》（« Lévi-Strauss à São Paulo: la ville et le terrain »），“埃尔纳手册丛书”，载《列维-斯特劳斯》，巴黎：埃尔纳出版社（L'Herne），2004年，第79页；费尔南达·佩肖托和路易莎·瓦伦蒂尼：《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大学、文化处、民族志与民俗研究学会》（« Lévi-Strauss à São Paulo: l'Université, le département de culture et la Société d'ethnographie et de folklore »），《欧洲》（Europe）第1005—1006期，2013年1—2月，第71—81页。

2 《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城市与田野工作》，第79页。

3 《忧伤的圣保罗》，第14页。

4 1935年11月20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谢列斯泰·布格雷的信，现被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61AJ93。

这位年轻老师主张直接观察以及田野调查，他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文献资料，对现象进行了解析，还指导科研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位学生德希奥·德·阿尔梅依达·普拉多（Décio de Almeida Prado）后来成为戏剧批评家，他还记得这种非常具有法国作风的实践教学：“他向我们要求的第一个作业是根据他整理出来的历史文献对 1820 年代的圣保罗市进行社会分析。在有关原始社会中亲属关系规则的课堂上，他没有让学生们展开天马行空的幻想，反而给每人一系列不同的家谱树。他向我们详细解释了族群的社会规则，并向我们提问其中谁与谁结为了夫妻。”¹ 这不是大课的教学方式，讲台上也没有女歌唱家。此外，列维－斯特劳斯作为老师，并不展示才能，而是要求学生进行思考。他不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两者之间微妙的区别非常重要。他的学生埃贡·萨登（Egon Schaden）后来成为巴西的人类学家，他提到了这一重要的区别：

“他讲课并不生动，但他将观点阐释得非常清楚。他的教学方式非常有趣。他通过课堂讲解、研讨课和讨论会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读书。他那时并不出名，可来听他课的人却不少。”² 阿尔梅依达·普拉多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心里，话语是一种透明的管道，它给了我们认识到论证过程的机会。如果我们真的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便是学会思考。即使在很长的推导过程中，我们也不会离开正题，确保论证的各个部分得到很好的衔接。”我们在克洛德担任教师的很多课堂上听到了这种上课的语调，他始终主张授课应当以促进研究为主，而不应当以展示既有的知识为中心。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始终充满抱负，他为自己的教学

1 费尔南达·佩肖托和路易莎·瓦伦蒂尼：《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大学、文化处、民族志与民俗研究学会》，第 75 页。原话出自阿尔梅依达·普拉多（Almeida Prado）。

2 《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城市与田野工作》，第 78 页。原话出自埃贡·萨登（Egon Schaden）。

成果感到高兴，为提出设立人类学教席的要求感到自豪，他在1935年10月17日的《圣保罗州报》中提到“建立一所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设想。它的目的是，趁时机未逝，参考国外大型研究所，在圣保罗大学里指导和集中发展巴西的民族志研究，因为克洛德感到发展民族学迫在眉睫；此外，展开对美洲大陆的对比研究，并且培养一批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建议建立一份“美洲人类学大档案”，并且制作一本大型的地图册，“地图册里美洲大陆的地图上标注不同〔文化特征〕的分布区域以及不同的人口密度”¹。我们只能被这位青年老师身上源源不绝的精力深深折服：他将研究与认知工具（档案、地图册、调查、研究机构）统一起来。1935年秋，我们在圣保罗看到了草案，25年后，随着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成立，学者的梦想将得到部分实现。从一开始，科学实践和研究材料便不可分割。

一片又一片土地

城市并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唯一的猎场。这些法国知识分子喜爱在体验的过程中发现事物，这将他们以及他们的另一半带往圣保罗的近郊；而他们就变身为现代的探险家（他们的着装有一些探险家的味道），对这里的一切兴致盎然：“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里充满着对比，它们刚好是我们强烈好奇心的猎物。在法国代表团里，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皮埃尔·蒙贝是地理学家，让·莫格是哲学家，我们与我们的夫人（莫格是里面唯一的单身人士）组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小团队。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发现事物的机会，为此，我们奔跑于圣保罗的郊区；为了满足自己考古研究的朦胧的愿望，我们一会儿穿梭在沿海地区，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建立一所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Em prol de um Instituto de Antropologia Física e Cultural »）。参见费尔南达·佩肖托：《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城市与田野工作》，第79页。

小心翼翼地经过沟壑之上的栈桥，一会儿跑到城市北方仍旧种植着咖啡树的地区。”¹ 两张照片见证了我们这段经历。其中一张照片上，迪娜·列维－斯特劳斯在这群人的前方，勇敢地踏上一座藤桥（脆弱的藤桥）；在另一张照片上，迪娜用手指为布罗代尔和让·莫格指出几片碎玻璃的所在之处，这些碎玻璃是印第安人在这片咖啡种植地上居住过的痕迹²：蒙贝、布罗代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小型“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痕迹，他们设想可以展开学科交叉融合的田野研究……

除了这些周日的远足，学科交叉融合也表现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皮埃尔·蒙贝密切的联系之中。地理学家蒙贝致力于探索圣保罗的西部和巴拉那河北部地区，30年之后，他着手研究巴西境内整片亚马孙流域。1935—1948年，蒙贝待在圣保罗，对美洲开展了测量工作，他重新定义了标度、距离、周期性的运动，目的在于完成一项针对“移动景观”——开垦带（*franges pionnières*）——的大型研究。因为那时还不能进行民族志调研（圣保罗郊区没有印第安人，所以他无法着手展开民族志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以徒步、骑马或者乘坐卡车的方式与他的同事及好友蒙贝一起进入森林开垦区，并深入这些移动的开拓者团体之中。这是一个欧洲多民族聚居区：“经过了一晚上长途跋涉之后，森林真的成为一种风景。森林之中有大型的植被，也有小面积的棉花、大米和玉米种植地。同时，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了木头房子，它们就好像构成了一座座木板之城。房子很大，显得车站特别小。慢慢地，我们看见了开垦区。这里种满了树木，其中一些仍旧挺立的树干上有着新文明带来的烧焦的痕迹。”³ 蒙贝常常用战场来形容这片开垦区。列维－斯特劳斯首先把巴西形

1 《忧伤的圣保罗》，第18页。

2 同上书，第19页。

3 皮埃尔·蒙贝（Pierre Monbeig）：《圣保罗州的开垦者与种植工》（*Pionniers et planteurs de l'Etat de São Paulo*），巴黎：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in），1952年，第12页。

容为“带有一种烧焦气味”¹的地方。两人一起前行，“感受、眼观、聆听他们走过的这些土地上的新鲜事物”²。

这些沿着铁路线路（隆德里纳 [Londrina]、拉多耶尼 [ladoyenne]、坎贝 [Nova-Dantzig]、罗兰迪亚 [Rôlandia]、阿拉蓬加斯 [Arapongas]……）铺展开来的原始城市让列维－斯特劳斯欣喜万分。他见证了一座城市的诞生。城市的四个坐标在无意之中成形，城市功能逐步完善，城市的建设与审美要求互相结合。这是“真正的人类的创造”³，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它最简单、最基本的性质，以及开始一项创造活动的天赐。“在这些森林之中偶然形成的四四方方的城池里，马路笔直，所以从一开始都非常相似：它们的走向缺乏各自的特点，在几何上看起来大同小异。只不过，有一些马路是中心大道，另一些马路则在城市外围；有一些马路与铁路或者公路平行，另一些马路与铁路或者公路垂直；因此，第一类马路与交通方向一致，而第二类则与交通要道相交或者成为交通要道的终点。商店和生意人选择在第一类马路上进行买卖，因为它们能招揽客人；个人住宅和一些公共服务喜欢在第二类马路上落脚，或者被迫迁到此处。两种马路互相交融，市中心与市郊、平行与垂直，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四种不同模式。未来的居民中，一部分人能愉快生活，另一部分人则感到不如意；一部分人能取得成功，另一部分人则陷入失败。”⁴ 这是一位散发地理学家气质的列维－斯特劳斯，他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不同的空间之中，而他所用的词汇能够很轻松地被翻译为图形。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口头上的表达和几个月后另一幅有名的草图（他画下了博罗罗村庄的社会结构），他将对地理学的偏爱表现得一

1 《忧郁的热带》，第35页。

2 赫莲娜·安格蒂·萨尔吉罗（Heliana Angotti Salgueiro）：《蒙贝，“田野”上的地理学家》（« Monbeig, un géographe sur le “vif” »），载《景观之书》（*Pages Paysages*），2002年第9期《代表》，第47页。

3 《忧郁的热带》，第112页。

4 同上书，第109—110页。

清二楚。¹ 这些“开垦带”意味着克洛德从观察土地的表象开始转向观察原始社会，观察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学这门学科，或者说，维达尔·德·拉·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学和他的弟子们，成为法国民族学传统的助力，1937年9月，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伊曼纽埃尔·德·马顿抵达巴西。当时，法国民族学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他的到来成就了一次远足：几名教师带着学生来到位于曼蒂凯拉山脉之上的伊塔蒂亚亚远足。伊塔蒂亚亚是巴西最高峰，它在圣保罗东北方，距离圣保罗约300千米。《忧伤的巴西》里有几张照片记录了这堂值得纪念的“地理教学课”。首先，为了抵达这座海拔2800米、多岩石的山峰，他们费尽了千辛万苦。他们开车经过了一段几乎没有通车的公路，然后改骑马，最后徒步登山。一张没有相框的照片好奇地将伊曼纽埃尔·德·马顿穿着皮靴走向山顶的形象永远保存了下来，就像是向这场徒步展开的地理考察活动致敬。他们在高海拔的环境中接受了教育：“马顿临时上起了课，课中，他很好地对一个文本进行了解释，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堂文学课。我认识到，一片风景如果经过一位大师的观察和分析可能是一次充满激情的阅读体验，可以创造出拉辛戏剧作品的精神力量。”² 我们注意到，对马顿而言，巴西的经历也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时刻。在巴西的时候，他重新思考了甜面包山的问题，即气候对腐蚀现象的影响，他想要在他的地理思想中建立一个新的概念——区域性的地理形态学。他只有离开欧洲的那座半岛才有机会获得宽广的想象空间。³

1 参见埃尔韦·特里（Hervé Théry）：《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皮埃尔·蒙贝与罗杰·布鲁内特》（« Claude Lévi-Strauss, Pierre Monbeig et Roger Brunet »），载《地理之声》（*EchoGéo*）第7期，2008年（2008年11月24日，数字版上线：<http://echogeo.revues.org/9503>）。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巴西》（*Saudades do Brasil*），巴黎：普隆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3 我想要感谢让-路易·迪西尔（Jean-Louis Tissier）又一次帮我梳理了历史知识和对地理问题的认识。



（1936年夏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左）、让·莫格（中）、热内·库坦（右）三人在福特汽车前留影——正是这辆汽车将他们带往圣保罗北部、距离它1500千米的戈亚斯州。

在此之前的两次远足是发现之旅，因为他们与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有了亲密的接触。我们先聊聊第二次远足。时间是1936年夏，那时正值大学暑假。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向让·莫格和热内·库坦（René Courtin）建议，他希望两人陪他出行。热内·库坦刚来接替弗朗索瓦·佩鲁，是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教师。克洛德要一路往北穿越巴西高原，直到戈亚斯州（Goyaz）边境。他希望能在阿拉瓜亚河边遇到印第安人，因为阿拉瓜亚河是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他们一路上需要经过坎皮纳斯、乌贝兰迪亚、戈亚尼亚（它宣称自己是一座新城市，而那里实际上仍是一片工地）、戈亚斯（这座有着殖民背景的城市曾是砖石之都，而这儿如今非常喧闹）。库坦，未来《世界报》的创办人之一，同意了克洛德的请求，他全新的福特车载着他们到了开车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将汽车献给冒险的旅程。他觉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非常有魅力。克洛德猜想土著人遵守

的婚姻规则中可能会存在，例如，最精妙的数学，这也让库坦浮想联翩。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把他领进了一个现代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世界。当他对布罗代尔吐露心声时，非常擅长数学的布罗代尔不忘讽刺民族志学者的科研抱负，他说，民族志学者常常不能解代数方程”¹。于是，三个人结伴出发了。列维－斯特劳斯“将他漂亮的相机斜挂在肩上，他戴着一顶奇怪的帆布帽，它既有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鸭舌帽，也有点像弗里吉亚软帽。库坦好像要去塞文山脉打猎，他穿着法兰绒长裤和羊毛外套，带着一把防身用的步枪”²。他们来到 1500 千米之外的目的地，途中，穿过了无数风景，看见了这个转型中的国家的无数面孔。早上，他们从铺在地上的睡袋中醒来，看见了两个卡拉雅部落印第安人的身影。两人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村庄，克洛德马上便展开了民族志工作。他向村民提问，试图让他们听懂自己说的话，并进行一些记录。有一个女孩制作了两个小玩偶，而玩偶身上的男性生殖器与玩偶的大小不成比例。针对这些玩偶，列维－斯特劳斯完成了他第一篇民族学文章。离开的气氛是伤感的，但对于文明的渴望也很强烈：“在车里，我观察坐在库坦身边的列维－斯特劳斯。他严肃的表情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狂喜。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大城市，回到舒适的生活中，但首先，我们可以洗澡了！”³

但是，一年之前，也就是 1935 年夏天，他已经有了第一次民族志实践经历。他与其他老师一道在巴拉那展开了一次远足，他称他们是“大学教师旅行团”。另一次，他只身一人，但一位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SPI）的公务人员与之同行，两人进入了大森林深处，这是一片海洋山脉潮湿的针叶森林。他骑着马在圣赫罗尼莫保护区（San Jeronimo）展开了十几天的旅行，这片保护

1 《牙齿不适》，第 118 页。

2 同上书，第 119 页。

3 同上书，第 121 页。

区里居住着坎刚部落印第安人（Kaingang）——一个与格族（Gé）有亲属关系、被图皮－古拉尼部落（Tupi-Gurani）赶到南方的部落。尽管巴西南部茂密的森林给他们提供了庇护，可是德国、波兰和乌克兰移民因开垦的需要又将他们赶了出来。终于，1935年，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注意到了这些印第安人口，于是将他们安排到保护区。坎刚印第安人与现代文明有了简单的接触之后，很快又回到了原始的生活模式。克洛德期待能够见到真正的“他者”，而这次相遇让他感到失望：“我感到很失望，蒂巴吉的印第安人既不完全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也没有保持‘原始’的生活。”¹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惊讶地发现了文明碰撞之下产生的一堆超现实主义的破玩意儿：抛光石头制成的捣具边上是破碎的缝纫机。他们离洛特雷阿蒙不远了。这段《忧郁的热带》里的文字是列维－斯特劳斯第一次将西方描述为破坏者，但这些话可能并不是在考察时写下的。当这位自学成才的民族学家第一次与他的研究对象相遇时，他心中充满了苦涩的滋味，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得太晚了。不是因为这个滑稽的混合体不能激起他的兴趣，不能给他民族学知识，而是因为他不能经历让·德·雷瑞曾经历过的事情。德·雷瑞生活的时代里充满了英雄故事，而他与印第安人的第一次接触好像是一出“悲伤的喜剧”²。然而，这段文字以一个美丽又感伤的瞬间结尾，他与印第安人的接触似乎最终被没有国界的美食拯救。这是一种圆滚滚、苍白色的虫子“科罗”（koro），“它白色的脂肪流了出来，我咬下去的时候有过犹豫：它有黄油浓厚和顺滑的口感，尝起来有椰奶的味道”³。

1 《忧郁的热带》，第143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59页。

3 《忧郁的热带》，第149页。

7 深入巴西

我感觉，我又一次经历了 16 世纪第一批航海家经历过的那些冒险。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亦近，亦远》（*De près et de loin*）¹

列维-斯特劳斯夫妇初到圣保罗时，自然与法国来的老师们走得非常近，但也常常与圣保罗当地的大家族们来往，朱里欧·梅斯奎塔和《圣保罗州报》则是这些大家族之首。这些人最终成为夫妇二人的雇主。两人不是在圣若奥大道《圣保罗州报》的办公所在地，就是在圣保罗大学医学院，医学院成为文学、科学和哲学学院的所在地。由此可见，他们在圣保罗的社交方式仍然具有欧洲人的特点。但是，渐渐地，1935—1936 年（尤其是 1936 年），这对夫妇开始与这两方交往对象保持距离，反而去亲近更加拥有当地生活气息的巴西人。

这个转变基本上是因为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由于一些职业和工作单位的原因，她开始接触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 1893—1945）。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对他们圣保罗那些年的工作与生活影响很大。但这位带有光环的名人十分友善（这也为他们之间建立友谊奠定了基础），他的出现让列维-斯特劳斯夫妇深入了解巴西。首先是巴西的民俗风情，然后是巴西人和巴西音乐。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与他现代主义运动的好友们聚集在全新的圣保罗市文化处。他不仅是理想的领路人，也是帮助他们展

¹ 《亦近，亦远》，第 34 页。

开第一次考察的贵人。1935年11月—1936年3月，列维-斯特劳斯夫妇认识了他的热情，以及他孔拉德式的口吻。这种口吻一直伴随着克洛德和他民族志研究的冒险。在考察期间，克洛德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印第安人，而现实给了他冲击，因为他们既不是欧洲人想象中的“高贵的野蛮人”，也没有美国人想象中的“红皮肤”。几个星期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都生活在“精神高度兴奋的状态”¹之中。第一次实地考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苦涩的反思（这些成果当然出现在考察之后，记载于《忧郁的热带》里），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它们是有关巴西的第一手文献资料。1936年3月，他们回到了圣保罗。卡杜维奥人生动的带饰和博罗罗壮观的丧葬仪式似乎完全决定了克洛德的民族学研究生涯。

迪娜、马里奥、圣保罗（1935—1938）

“文化大事”

安东尼奥·坎迪多称，圣保罗大学（1934）和圣保罗市文化处（1935）几乎同时成立，这是一件“文化大事”²；同时，列维-斯特劳斯夫妇也刚刚抵达巴西。两个机构成为他们两人的伙伴，如果第一个机构是他们来巴西的理由，那么第二个则成为让他们留在巴西的理由。

这个文化处的宗旨是“进行文化领域公共政策相关研究与保护圣保罗市历史、艺术遗产”³。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它在历史文献收集、教育、图书馆、文学艺术传播领域开展了工作，这些工作是为了整合文化事业。通过流动图书馆、度假营地等活动，

1 《忧郁的热带》。

2 安东尼奥·坎迪多·梅罗埃苏扎与作者的谈话，圣保罗，2011年8月5日。

3 费尔南达·佩肖托和路易莎·瓦伦蒂尼：《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大学、文化处、民族志与民俗研究学会》，第76页。

这个文化处让人联想到人民阵线的政策，先锋派艺术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计划不谋而合，因此，圣保罗离巴黎并不遥远。在巴黎，国家由左翼主政，民族志学者和诗人想要把艺术和大众传统当作一个熔炉。巴黎的政治环境与圣保罗不同。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前行的翅膀”¹并且重新获得政治地位，圣保罗的寡头势力扶植了一些学术机构和文化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文化处是正被边缘化的圣保罗自由主义精英分子与192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共同造就的产物，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发源于巴西寻根运动，后来成为1930年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事实上，现代主义诞生于1922年，圣保罗市剧院举办的现代艺术周是它诞生的象征。1928年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ofago*）²的发表让这场运动能够继续展开。这个文本基于先锋派的激进论调，否定西方文明的理性主张，宣扬一种“自由的原始主义”。它尤其主张将巴西文化看作吸收所有不同文化的过程，而这些不同的文化都是继承自巴西的历史。³对多元性和种族混合的赞扬带有超现实主义中非常浓烈的原始主义色彩，它与当时很多不同的尝试——探索、辨认和创造有深刻含义的巴西现实——相呼应。1933年，吉尔贝托·弗雷尔（Gilberto Freyre）的《卡萨格兰德和奴隶区》（*Casa-Grande e senzala*）出版。此书在1952年被罗杰·巴斯蒂德翻译为《主人与奴隶》（吕西安·费弗尔为之作序）：吉尔贝托·弗雷尔是累西腓的贵族，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博士导师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指导。他的同性恋倾

1 参见《亦近，亦远》，第31页：“圣保罗的人自以为，在这个沉睡的殖民地国家中，他们是向前飞翔的翅膀。”

2 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文章，米歇尔·里奥戴尔（Michel Riaudel）：《论文集》第60期，2008年9月，国际哲学公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数字资源。

3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54页。

向让他在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研究巴西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在博士论文里，他以种植园里白人主教与奴隶之间存在性关系为出发点，指出这样的性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¹性是此书的核心问题，他进行了大胆的分析，而它的另一个核心是对抗巴西人因为混血身份而产生的羞耻感。这本书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将混血看作国家特色与1870年以来巴西作家笔下长期表达的观点——混血是一种人的退化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²，阿弗拉尼奥·加西亚（Afrânio Garcia）这样写道。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描写巴伊亚州（Bahia）的小说、塔西娜·都·亚玛瑞（Tarsila do Amaral）的绘画作品、海托尔·维拉-罗伯斯（Heitor Villa-Lobos）的乐曲以及他作品中的地方主义色彩：在这个聚焦巴西文化的时刻，所有人都以满腔热情投身创作，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但在1930年代后半段，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火药，这种火药本身充满了不同矛盾。因为瓦格斯的“新国家”从1937年开始广泛地推广桑巴舞，并为了自己独裁统治的需求而宣扬民族混合的意识形态。

文化处成立之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被要求担任主任一职，但没人对此感到奇怪。当他还活跃的时候³，圣保罗的人们称呼他为“马里奥”。他是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他也是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音乐史学家和音乐学院的教师。他的小说《马库纳伊玛》（*Macunaíma*, 1928）为他赢得了名声但还不够不上“名望”二字。他既不是食利者，也不是圣保罗寡头集团的一分子。他从未离开巴西，不像家族里的表兄堂弟，他们都会去欧洲接受更好的教育。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是一个贫穷的亲

1 参见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Maria Lucia Pallares-Burke）：《吉尔贝托·弗雷尔：热带的维多利亚时代之人》（*Gilberto Freyre, um Vitoriano nos tropicos*），圣保罗：圣保罗州立大学出版社（Editora UNESP），2005年。阿夫拉尼奥·加西亚（Afrânio Garcia）的书评，参见《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SS*）第2期，2006年3—4月，第476—479页。

2 阿夫拉尼奥·加西亚，第476—479页。

3 例如，市级图书馆被命名为“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图书馆”。

戚，他自学成才，没有结婚，与母亲和妹妹为伴。他没有公开自己同性恋的性取向，成日里有女性围绕在身旁。他魅力超凡，但他外形可憎。他肤色很深，性格古怪。¹他以文化处作为桥梁，牵头组织艺术家和有创作才能的知识分子与赏识他们才华、准备向他们提供资金的资助见面。这是一种将土著人原始文化重新纳为己有，并把它当作新“巴西人身份”培养基的现象。身为文化处主任，他一心多用。他也是调查民族音乐的先锋。他通过建立声音档案集（主要是巴西东北方区域的声音档案）在文化处建立起民族音乐调研的传统。同一时期的美国，约翰·洛马克斯（John Lomax）也将奴隶和黑人囚犯最后的歌声，以及有奴役黑人历史的美国南部的一部分音乐记忆保存了下来。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被一群圣保罗知识分子包围，他们中间主要是塞尔吉奥·米列（Sérgio Milliet）和保罗·杜阿尔特（Paulo Duarte）。当列维－斯特劳斯慢慢远离法国圈子，他们迅速地成为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建立的第一个圈子。迪娜是这两个圈子之间的调解者，因此，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

“在《圣保罗州报》那个傲慢的圈子里——他们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没记错，朱里欧·德·梅斯奎塔·菲略是州长阿曼多·德·沙利斯·奥利维拉的连襟），我与我的同事们只是他们的主顾，我说的是古罗马背景下的主顾。与其他人一样，在市文化处，我觉得更加自在。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历史学家、学究、散文家围绕在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这位有独特见解、对民俗和大众传统充满兴趣的大诗人身边，他们是塞尔吉奥·米列、鲁本斯·博尔巴·德·莫赖斯（Rubens

1 参见塞尔吉奥·米塞利（Sergio Micelli）：《巴西的知识分子和权力》（*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au Brésil*），第33页起。

Borba de Moraes) 以及保罗·杜阿尔特。尤其是保罗·杜阿尔特, 我与他之间培养了兄弟一般的友情, 一段延续至纽约和巴黎的友情。”¹ 列维-斯特劳斯珍视这份友情, 而他自己后来朋友不多。1940年代末, 他回到欧洲之后与他接触的那些人都算不上真正的朋友。² 几十年之后, 当他谈到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或者保罗·杜阿尔特时, 他的眼睛里闪现着光芒。³ 没有人怀疑他们之间热烈的友情, 这些不期而遇的友人就像他的兄长(他们当时三十几岁, 比列维-斯特劳斯大几岁)。他们骨子里流着巴西人的血, 所以也非常欧洲化: “我与马里奥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关系非常亲密。每次他们来家里, 我们都一起出门活动。因为我了解法国的知识分子运动和文学运动, 我很自在地与这些巴西的现代主义者展开对话, 我们的交流建立于平等的关系之上。”⁴ 他们之间非常深厚的友谊建立于这些事物之上: 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散发的艺术家气质、对先锋派艺术家作品的浓厚兴趣(当时克洛德仍很痴迷这些作品)以及对大众文化和巴西现实问题的关注。

在文化处存在的三年(1935—1938)里, 列维-斯特劳斯夫妇经常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来往, 因为他是教导两人巴西民俗知识的导师。他们频繁地走动, 互相欣赏; 由于想要了解传统节日中丰富的民俗风情, 他们一同去圣保罗近郊的村庄考察; 他们阅读对方的作品, 并以书信互相往来。因此, 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拿到一本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民族音乐学的作品时⁵, 带着一脸神魂颠倒的神情(这种情绪慢慢地消

1 《忧伤的圣保罗》, 第10—11页。

2 2012年4月18日, 弗朗索瓦丝·埃里捷(Françoise Héritier)接受了作者的访谈, 叙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3 1985年, 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接受了访谈。访谈视频保存于圣保罗大学人类学图像与音像实验室(Laboratório de Imagem e Som em Antropologia)。他在访谈中这样评价马里奥·德·安德拉德: “他特别活跃、热情, 有领导力。”

4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在圣保罗: 城市与田野工作》, 第80页。

5 这应该是指1933年出版的《音乐, 甜美的音乐》(*Música, doce música*)。

失，因为当时他不怎么会读葡萄牙语的书）向后者写信，“您收集的东西太棒了。我花了一整个晚上赏析这个一根琴弦临时做成的乐器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旋律丰富，有自己的味道，像是一种奇妙的诗歌。您让我从一种新的角度观察巴西，我对您可谓感激涕零”¹。

列维－斯特劳斯夫妇加入了文化处的圈子，他们参与了“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的建立，这些活动证明了他们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野外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学会终于在1937年成立。一方面，这所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主持的机构致力于研究城市——它的发展过程、社会与文化变迁、城市变化——以及培养一些熟练掌握民族志调查方法的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对民族学的兴趣来自两个互不相干的原因（但它们造成了这个共同的结果）。出发前往巴西的时候，乔治·杜马似乎默认迪娜·列维－斯特劳斯可以至少在圣保罗法国巴西高中获得一个教职，或者在圣保罗大学获得一个教职。然而抵达巴西之后，迪娜并没有获得任何工作，因此，失去了所有个人经济来源。所幸他的丈夫经济尚属宽裕，暂且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但这对现代夫妻拥有一样的教育水平，他们对这个状况并不满意。克洛德向让·马克思和地方当局表达了多次对他夫人事业的担忧，因为他的夫人与他一样，也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迪娜除了履行妻子的义务之外也想要做些别的事情，她对家务活十分抗拒（1935年，克洛德的母亲来与他们做伴，她扛起了家务的重任）。于是，迪娜有了空余的时间。而克洛德在大学里的工作困难重重，他与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的对抗使他要圣保罗大学里建立人类学研究所的计划受到了阻碍。而他从文化处的活动中得到了慰

¹ 1936年10月25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现被收藏于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archives IEB），属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的一部分。参见《现代》（第628期）刊登的四封信，2004年8、9和10月，第259页。这封信也是其中之一。

藉，同时文化处也为一个具有多个未知数的方程找到了答案：马里奥从克洛德人类学研究所的设想中看到了文化处进行民族志研究的使命；迪娜在文化处里找到了工作，而克洛德也在其中展开研究活动。资助两人 1935 年 11 月第一次考察活动的正是文化处。渐渐地，市政府及其文化处成为知识分子聚集之处，克洛德夫妇，尤其是迪娜，在文化处组织起了活动。

从 1936 年 4 月起，迪娜在文化处开设了一门教授民族志研究的课，一周两节。50 多名听众中既有学生，也有市政府的公务员。听众的数量让她不得不增加课时。她用“实践”二字向让·马克思解释课程的性质，因为这门课教授的是进行田野考察的方法。¹她与几名稍有经验的学生共同展开了一次体质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他们的调查对象是“圣保罗市的蒙古斑”²。这个研究课题中，他们使用上了法国人类学当代的研究方式——问卷调查。第二年，文化处有了一个功能完备的人体测量仪，迪娜·列维-斯特劳斯撰写了一本为学生提供指导的使用手册（它的内容主要涉及体质人类学）。³我们发现，体质人类学在迪娜的研究和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它对克洛德而言也非常重要。两人曾经尝试在考察过程中开展人体测

1 1936 年 12 月 10 日，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给让·马克思的信，现被收藏于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1932—1940 年，巴西档案。

2 蒙古斑呈深色，大小不一，出现于新生儿的背部或臀部。常见于皮肤黝黑的孩子（尤其是亚洲儿童）身上，因此得名。

3 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作为（旧）巴黎大学的老师，编写了《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实践指南》（*Instruções praticas para pesquisas de Antropologia física e cultural*），圣保罗：圣保罗市文化处藏书，1936 年。

量的工作，然而重重阻碍之下他们无功而返¹，克洛德对此事几乎缄口不提。然而，体质人类学在193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特，因为种族这个概念在当时非常受重视，而体质人类学也异常受人欢迎。

迪娜开设的课程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为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的成立提供了助力。她的学生们通过圣保罗当地的报纸向列维－斯特劳斯特女士“致敬”，于是，人们得知了这个学会成立的消息。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中配有一张照片，照片中央的迪娜容光焕发，学生们围绕在摆满了食物的桌子周围，其中包括玛丽亚·斯特拉·基马拉斯(Maria Stella Guimares)、马里奥·瓦格纳·维埃拉·达库尼亚(Mario Wagner Viera da Cunha)、塞西莉亚·德·卡斯特罗埃西尔瓦(Cecilia de Castro e Silva)、拉法埃尔·格里西(Raphaël Grisi)、安妮塔·卡斯特洛(Annita Castello)、马尔孔德斯·卡布拉尔(Marcondes Cabral)、塞拉菲卡·马尔孔德斯·佩雷拉(Serafica Marcondes Pereira)等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只是他们的陪衬²。图说写道：“由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发起的民族志学者俱乐部：巴西第一个民族志领域的研究团体。”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学术“学会”，但迪娜后悔使用了俱乐部这个时髦的字眼。它的章程(法律实习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对章程进行了校阅和修改)³在1937年确定了下来：马里奥

1 “我们只对男性印第安人进行了几次人体测量，因为女性印第安人十分怕羞。无论是卡杜维奥人还是博罗罗人，我们都没有拿到骨架和骨头的数据。[……]因为印第安人的排斥，采集血液进行分类也没有成功。他们不愿接受拍照，也反对被采血样，原因是，他们害怕会因此殒命或被施加巫毒之术。”这些话经巴西当地媒体的整理，后被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Luis Donisete Benzi Grupioni)引用。参见《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 Claude Lévi-Strauss parmi les Amérindiens. Deux expéditions ethnographiques dans l'intérieur du Brésil »)，载《巴西印第安人：巴西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Brésil indien. Les Arts des Amérindiens du Brésil)，巴黎：国家博物馆联合出版社(RMN)，2005年，第315—316页。

2 1936年11月4日的《晚间日记》(Diário da Noite)，参见“巴西媒体(1935—1937)”主题档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编号NAF28150，档案盒编号232。

3 1937年4月29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现被收藏于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属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的一部分。

是主席，迪娜是首席秘书，而马里奥·瓦格纳（Mario Wagner）是财务主管。

作为学会成员的历史学家路易莎·瓦伦蒂尼（Luisa Valentini）¹指出，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是以美洲文化研究者学会、皇家人类学学会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它的目的是将研究工作职业化、推广信息收集的流程、建立文献库、整合资源。迪娜参加了学会的很多日常组织工作：她以既严肃又幽默的方式定义了教学与研究。她参与的这些工作正好反映了她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建立的友谊。

虽然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没能长期延续下去，但它曾是圣保罗重要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学会比大学更加自由、更加具有活力。学会的成员通过实践进行思考，高声畅谈民俗、民族志、科学与艺术；他们举起鸡尾酒，向创始团队的远大抱负致敬。学会举办了一些讲座。1937年5月，迪娜思忖：“什么是民俗？”她的丈夫展示了几项新的研究成果：《卡杜维奥印第安人的物质文明》以及《卡拉雅人的玩偶》。学会创办了一份简报，而克洛德这篇研究卡拉雅人玩偶的报告便发表于简报之上。《市政档案杂志》（*Revista do Arquivo municipal*）是另一条出路，它发表了好几篇克洛德的文章。比如，克洛德题为“立体主义与日常生活”（*O Cubisme e vida cotidiana*）的文章，它诞生于巴黎，那时他还年轻，克洛德从他同辈人的角度谈了谈立体主义的影响。又如他第一篇真正属于民族学家的文章《博

1 这是费尔南达·佩肖托指导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其学位论文为《一间人类学实验室：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迪娜·德雷福斯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相遇（1935—1938）》（«Um laboratório de antropologia: o encontro entre Mário de Andrade, Dina Dreyfus et Claude Lévi-Strauss [1935-1938]»），圣保罗大学，2010年。该论文现已发表，参见《一间人类学实验室：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迪娜·德雷福斯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相遇（1935—1938）》，圣保罗：阿拉梅达出版社（Alameda），2013年。

罗罗人社会结构研究》¹，而这篇文章也被收录进《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里。²学会推崇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的教学材料，并且紧密依靠影音技术。所以，当迪娜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做伴到圣保罗郊区一座不大的殖民城市时，她背着一部摄像机，因为她想要见证“圣灵之节”。圣灵节是巴西天主教徒的伟大时刻。而天主教与其他传统共同生于巴西这片土地。例如，被基督教“驯化”的穿着白色衣服的黑人国王、马上的“卡瓦哈达之舞”（Cavahada）以及被称作“孔加达”（Congada）的“冠冕”仪式。迪娜曾拍摄了以此为主题影片，而她的影像作品被收入圣保罗电影资料馆之中。³她对圣保罗民俗风情的兴趣让她现身国际民俗大会，她代表圣保罗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参与了1937年巴黎的这场盛事。

圣保罗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迪娜的热情，而她也受到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与所有学生的爱戴。与列维-斯特劳斯夫妇走得近的马里奥·瓦格纳说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妻子热情、喜形于色、待人亲近；丈夫则稳重、严肃，有时有些傲慢：“马里奥和我们大家一样都非常喜欢迪娜，因为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年纪与我们相仿。列维-斯特劳斯甚至有些嫉妒她，但这不是没有缘故的。我常常去两人在辛西纳托·布拉加路的家中做客，因为他们常常在家里举办学会成员的聚会。我们可以与迪娜侃侃而谈，忘记时间。列维-斯特劳斯则频繁地从一旁经过，打探我们正在做什么，但他却始终不迈进我们谈话的那个房间一步。他在房间之外不停地踱步，好像要告诉我们：‘我就在这儿，我希望你们

1 《博罗印第安人社会组织形式研究系列》（« Contributions pour l'étude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Indiens Bororo »），《美洲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第28（2）期，1936年，第269—304页。

2 《市政档案杂志》（*Revista do Arquivo municipal*）第3（27）期，第8—79页。

3 《圣灵节：摩基达斯克鲁易斯市（1936年5月30日）》（*Festa do Divino Espirito Santo. Mogy das Cruzes. 30 mai 1936*），由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一人拍摄下来。现收藏于圣保罗州文化处。

别再继续聊天了！’。”¹ 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和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体现在民族志和民俗研究学会的诞生过程中，也体现在迪娜参与的活动、她在学会内部担任的职务之中。这些联系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处会接收两人在当地民族志考察活动中获得的一部分收藏品。今天，巴西历史重新审视了迪娜的功绩，当然，这未必不是对她的过誉。总之，我们认识的迪娜积极融入圣保罗的生活中，她与市政府和政府员工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是她让这些考察活动的设想得以实现。²

民族志研究的洗礼（1935年11月—1936年3月）

出行的计划与条件

1935年11月10日是列维-斯特劳斯出行的前夜。他向马塞尔·莫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不是到马托格罗索考察的理想时机，因为马托格罗索正值雨季。但大学的全职教学工作让他忙得不可开交，这个时间段是他唯一的空当。这也是他选择“到这个相对便利的地区”³ 对那里的印第安人进行考察的原因。首先，他计划到卡杜维奥人居住的潘塔纳尔沼泽（Pantanal）进行考察，“这里十分荒芜，但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陶瓷制品，我们希望能从矿床里找到一些古老的样本，国家博物馆帮助我们展开了探索与研究”⁴；其次，他计划考察韦尔梅洛河（Rio Vermelho）以北的博罗罗人。考古视角对他重建史前美洲的工作非常重要，而这个重建的过程便是他这次考察活动的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55页。文中提到了马里奥·瓦格纳（Mario Wagner），但没有写明文献来源。

2 参见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16页。

3 1935年11月10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塞尔·莫斯的信，现收藏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28150，档案盒编号181，属于“书信”主题档案的一部分。

4 同上。

认识论框架。

巴西报纸对它的报道让它累积了一些知名度；而大西洋另一侧，保罗·利维在《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上提到了这个“派往巴西的代表团”，从此法国学术界也了解了这个由法国教育部共同资助的代表团的存在。然而，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Luis Donisete Benzi Grupioni）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特在巴西中部地区的第一场考察活动与这个时代的其他民族学考察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基于假设，而这些假设是当时理论思考的成果；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材料。”¹ 这些假设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巴西报》（*O Jornal*）对他进行的采访中，他做出了解释：他关注到一篇发表于《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的旧文章。文章称卡杜维奥人身体上的绘画与圣塔伦（Santarém）和马拉若（Marajó）盆地的陶瓷制品上装饰性的图案存在关联，但考古学家对这些陶瓷制品已十分熟悉。“卡杜维奥人（圭库鲁人最后的子孙）与这些工业化的部落（亚马孙盆地漂亮的陶瓷品便出自他们之手）之间曾经存在怎样有趣的联系呢？”对于将人口与文明作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者而言，这个问题也是有待于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美洲人口的流动，准确地说，在于亚马孙盆地范围里的人口流动。因为亚马孙盆地的研究资料比大陆西部少一些，西部安第斯山脉巨大的文明成就获得了学者们的青睐。出发之时，年轻的民族志学者对莫斯说了这番话：“确实，我们会更喜欢安第斯高原，甚至想要一直研究下去。”列维－斯特劳斯特却从未再对安第斯地区表现出这样的热情，他将要经历的一切改变了他的想法。莫斯鼓励列维－斯特劳斯特要坚信自己的理论主张，也不要放弃对这个地域的偏爱：“不要过分执着于安第斯地区，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地区。因为我从巴西这片

¹ 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15页。

土地上展开的史前考古中认识到这里存在着伟大的文明，所谓史前考古，主要是指亚马孙下游的史前考古。这儿有非常先进的陶瓦制作工艺，这种工艺与中美洲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源于秘鲁文明。”¹ 所以，他要通过卡杜维奥人，在中美洲延续至美洲盆地这片区域中寻找那个古老又伟大的文明的地理版图。这个工作既需要考古学的手段，也需要人体测量学的介入。

莫斯在信尾中这样说，“当然，这封信是写给你们两人的。在我心里，她与你是一体的”²。虽然这段附言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它告诉我们，在这片土地成为两人必然的选项时，“两人合作”成为民族志研究中一种工作和认识事物的方式。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民族学还没有深入校园，因此，这个领域里出现了众多女性角色。1930年代，德尼兹·波尔姆（Denise Paulme）、热梅娜·蒂丽翁（Germaine Tillion）、德博拉·利夫奇茨（Deborah Lifschitz）崭露头角。而有时她们也与另一半一起从事研究：这是解决双方不能共同生活这一家庭问题的一种方式。这对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夫妇也进行了有效的分工，因为女性研究者更容易接触土著妇女。婚姻能经受住实地考察工作造成的矛盾吗？婚姻会得到巩固还是陷入困境？在踏上征程的时候，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占据他们的心房，但多年之后，它们将卷土重来。

1 1936年2月20日，马塞尔·莫斯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信，现收藏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28150，档案盒编号 181。

2 同上。

Um casal de cientistas franceses em visita às tribus remanescentes de uma grande nação indígena

As ligações dos guayanaus com a cerâmica do Marajó — Curiosas observações do sr. e sra. Levy-Str. acabam de regressar de Matto Grosso

Quando o professor e a senhora Levy-Strauss, aquele professor de Sociologia da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e esta assistente do prof. Dumas, no Museu de Ethnographia do Trocadero de Paris, resolveram aventurar-se em busca de contacto pessoal com os povos indígenas do interior de Matto Grosso, em novembro último, mal sabiam que dessa viagem resultaria, ape-

na exatidão de tempo da visita, resultando que o material recolhido, principalmente para seus estudos de anthropologia, foi pequeno, visto que sem uma real intimidade os índios se recusam às verificações necessárias.

— "Rival" — diz-nos o prof. Levy-Strauss — esteve cinco annos com os índios da America Hespanhola. Nós tivemos semanas. Colhemos apenas algu-

ditos, bem como difficillaram a obtenção de chapas photographicas, temendo perigos de morte e entistamento. Quanto a parte propriamente ethnographica, os resultados alcançados são mais preciosos nas observações sobre a constituição tribal, organização da familia etc. etc. Uma publicação inseria no "Americanist", anterior á guerra de 14, chamou



bar de sua rapidez, uma sa serie de contribuições para o

de Matto Grosso, fizeram essa excursão em do Estado de seu Nacional e cez. Chegados agora a esta capital, o distincto casal de cientistas gentilmente conceder ao DIÁRIO DE S. PAULO as impressões que tiveram dessa viagem.

A EXATIDÃO DE TEMPO — Os dois cientistas franceses queixaram-se, primeiramente, da

omestricas, as do sexo ulheres se reserva.

Nella se affirmava haver ligação entre as pinturas corporaes dos laduvros e a cerâmica do valle do Amazonas

rem). Ora, os gasyacauru, não pertencem aos povos de lingua gô, rão nem tupys nem tapuias, ar-se pela origem nas. Esses índios acham localizados em Matto Grosso. Que curiosa ligação e deriam ter sido no passado, com as tribus indígenas que produziram a magnifica cerâmica do valle do Amazonas? Considera

A CERAMICA DO VALLE DO AMAZONAS

— A classificação pelo tempo — prosegue o prof. Levy-Strauss — também não foi conseguida, pois a isso se os in-

(Da succursal do DIÁRIO DE S. PAULO) — R. Vito de S. Leopoldo, 2 — Phone. 3-66

ACTOS DO DIRECTOR DA ALFANZUGA

[suporitivo, Milhão, Menna (relatório); 2.º director suporitivo, Arlay, Peniche]

卡杜维奥人身上的花纹

一个三人小组轻装上阵（几个旅行箱和一个帐篷）。他们在1935年11月底离开了圣保罗。克洛德夫妇与热内·西尔兹（René Silz）做伴，而热内在这个有名的团队中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成员。他是法国的农业工程师，是克洛德的高中同学。他们对这次考察所做的记录不幸遗失。所幸我们还能从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的描述与迪娜保留下来的一些笔记中了解些许内容。¹

他们乘坐火车直达埃斯佩兰萨港（Porto Esperança），西北铁路线（Noroeste）的最后一站。经过巴拉那河（Rio Paraná）和特雷斯-拉各斯（Três-Lagoas）之后，火车又跑了三天，最后将他们送抵马托格罗索。马托格罗索单调的风景让人觉得乏味不堪，而这些风景成为他们深入巴西、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透景画”：“平坦或者说没有起伏的高原、遥远的地平线与灌木；偶尔出现的瘤牛群被经过的火车驱散。”²从埃斯佩兰萨港起出现了一些火车支线，它们像脆弱的栈桥一样穿过了潘塔纳尔沼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沼泽，这片沼泽占据了巴西南部的中央区域，并且一直延伸至巴西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边境线。卡杜维奥人生活在这片梦幻般的景色中，在博多克纳山脉的山丘上安家。这是巴西政府在20世纪初分给他们的保护区：“瘤牛群躲了起来，它们躲在山丘顶上，就像是躲在漂浮不定的拱桥之上；而沼泽之上体形巨大的鸟群形成了小巧的岛屿，岛屿有白色的，也有粉红色的，它们是火烈鸟、白鹭和苍鹭。”³作为民族志领域的新手们，他们在法国人拥有的“庄园”里建立起自己的“街区”。这是在埃斯佩兰萨港南部，并且距离埃斯佩兰萨港100多千米的“法国

1 《迪娜·列维-斯特劳斯旅行纪事：圣保罗、波尔图、埃斯佩兰萨》（« Récit de voyage São Paulo-Porto-Esperança par Dina Lévi-Strauss »），第11页。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28150，档案盒编号11，属于“文件”主题档案的一部分。

2 《忧郁的热带》，第150页。

3 同上书，第151页。

庄园”。迪娜在这里与他们重逢，此前，她因为生病不得不原路返回。这次考察活动几乎完全自给自足，被列维－斯特劳斯形容为一次“游手好闲”的考察活动。而他们也有一些不变的惯例，比如，每天用芦管饮用两次巴西茶（chimarrao maté），一次是早上 11 点，一次是晚上 7 点。这是“一种社会习俗和个人陋习”¹。从这儿开始，他们需要骑马才能抵达卡杜维奥人的居住地，整个过程耗时三天。他们的目的地居住着大约 200 个印第安人，而他们的定居点有三个。“那厘克”（Nalike）是他们主要的营地，五间可怜的茅屋整齐排列在那儿。12 月底，被热带强烈的暴风雨困住的游客们在这里落脚。

突然，他们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对比，受到了冲击：“落魄”的印第安人生活艰苦，就像是贫穷的农民；而“卡杜维奥人凭借顽强的个性将他们过去的一些痕迹保留了下来”²，因此，他们还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卡杜维奥人通过熟练的日常活动，例如，织造、编篓、造绳以及翻线戏，与贵族部落和战争部落建立了直接和密切的联系。这些 19 世纪的贵族部落和战争部落以骑士骄傲的姿态参与了巴拉圭的武装冲突（1864—1870）。而我们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中再次发现，他心里住着一位“堂吉诃德”。所以他在当下的土地上“淘金”，去寻找过去光辉的影子。但在这片土地上，他首先发现的是这美妙的手工艺，于是急不可耐地收集手工艺品。他对收集物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恰恰证明了他对民族志研究的一腔热忱。当他离开时，他提着自己的小手提箱，还带着木雕像（它们的用途至今仍是一个谜）、珠宝、扇子、吊床以及有着精妙图案的陶瓷制品。而他在另一次考察活动中详细记录的翻线戏是当时美洲文化研究者的研究课题之一。

1 《忧郁的热带》，第 156 页。

2 同上书，第 167 页。

卡杜维奥人的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它让列维-斯特劳斯“为之倾倒”：年轻以及年老女性拥有身体彩绘，这是她们用美洲格尼帕果（jenipapo）汁作为颜料一口气完成的¹；从列维-斯特劳斯拍摄的照片上看，她们的身体和脸庞蒙着一层饰有不对称花纹的薄纱，这让他想到了西班牙巴洛克时代熟铁上的图案。在卡杜维奥人部落里停留的15天，列维-斯特劳斯对这些涡线花纹着迷。他试图复制这些图案，所以他让卡杜维奥妇女在叶子上画下这些图案，后来，他将这些叶子一并带走。这里有大约400张画，它们既不是扭曲对称，也不是经过翻转而来的，这让他困惑了许久。在克洛德和迪娜拍摄并且保存下来的两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女人们沉醉于这种装饰艺术时表现得风情万种。尽管面部轮廓那般复杂多变，她们的笔都能坚定地画下这些充满智慧的线条，这让人惊叹不已。²突然，列维-斯特劳斯身上的画家细胞恋上了这种奇迹一般保留下来的美妙艺术。我们还注意到，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让他选择卡杜维奥人作为第一次田野考察对象的因素中，异常重要的是一位意大利业余画家圭多·博贾尼（Guido Boggiani）。这名画家在19世纪末“留下了指示以诱使和暗示”³我们关注卡杜维奥人。列维-斯特劳斯一生都在思考这些抽象的构图、复杂又系统的线条，就像是在思考一个亟待解开的谜团，所以，他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却使这些解释变得与谜团本身一样复杂。在这些卡杜维奥部落花纹的启发下，他拓展了其他理论领域。在《忧郁的热带》里，他思考这些绘画的二元性、它们的不对称性以及土著人艺术的社会意义。但这些思考活动并

1 一种热带树的果实，它名字的意思是“留下痕迹的水果”。

2 《那厘克村》（Aldeia de Nalike），博多克纳山脉（Serra Bodoquena），马托格罗索州，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圣保罗文化处的光碟资料共包括两部影片，这是其中一部）。参见伊曼纽埃尔·莱克勒克（Emmanuel Leclercq）：《原始生活的四个片段：巴西的电影导演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Quelques fragments de vie primitive: Claude Lévi-Strauss, cinéaste au Brésil »），《现代》第628期，2004年8—9月，第329—332页。

3 《与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的访谈》，拍摄时间为1985年。影片拷贝保存于圣保罗大学人类学图像与音像实验室。

未发生在 1936 年。列维－斯特劳斯需要一些时间来解释这些神秘的图画，这成为他一生的动力。尽管这些画是结构主义诞生的原因之一，它们也不能掩饰一个事实：1936 年的列维－斯特劳斯还不是结构主义者。

1936 年 1 月 15 日，他们的征程临近尾声。克洛德向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讲述那厘克村的故事：“那里的女人总是用她们精湛的画技在自己的脸上画画；她们做的陶瓷品好看又朴实，我带回了不少样本。此外，我们还能听当地人说有趣的传说，向他们了解以前的社会情况。显然，他们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在潘塔纳尔沼泽，温度出奇地高，然而，那厘克的某几个晚上让我们冷得发抖！蚊子也与想象中一样嗜血无情。但这里有那么多有趣的事物，其他问题都显得不再重要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圣洛伦索河（São Lourenço）以及博罗罗人居住的地区行进。”¹



左图所示的图案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本子上记录下来的卡杜维奥人复杂的花纹。这些卡杜维奥妇女在身体和面颊上画下的花纹里存在着看似对称的图案。

1 1936 年 1 月 15 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现保存于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属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的一部分。

博罗罗歌剧

卡杜维奥人的图像艺术深深震撼了他们，与博罗罗人的接触也让他们收获了一种绝妙的美学体验。只是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如果卡杜维奥人是画家，那么博罗罗人喜爱在脆弱的物体上下功夫，例如，羽毛、花朵，而花环则是各种仪式上的装饰物。所有这些在博罗罗人身上的见闻都在列维－斯特劳斯预料之中，因为博罗罗人与卡杜维奥人不同，他们从19世纪开始就频繁地接受外来访客，所以他们常常出现在南美洲民族学的档案之中。对民族学家们而言，他们就是“万里挑一”¹（*morceau de roi*）的，因为博罗罗人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此外，他们还有值得称颂的美学创作水平、多元的宗教文化以及新奇的宗教仪式。博罗罗人的每一天都是节日，而访客来到此处也会陶醉于这些无穷无尽的仪式。博罗罗人是民族学家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列维－斯特劳斯也是这般翘足企首。在这次小规模考察活动中，他们搭着卡车完成了第一段路程，随后登上独木舟。他们从科伦巴出发，顺着巴拉圭河，最后抵达圣洛伦索河和它的支流韦尔梅洛河。人们告诫他们要小心，因为当时正在暴发黄热病。他们的焦虑情绪却因河岸上的身影得到了缓解：列维－斯特劳斯夫妇在河岸上发现了“两个赤身裸体的身影在陡峭的河岸上手舞足蹈，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批博罗罗人”²。

尽管博罗罗人与慈幼会传教士长期保持联系，他们留给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一印象却是远离尘嚣，他们似乎纯洁得没有沾染半分俗气。事实上，慈幼会的神父并未让博罗罗人皈依慈幼会，与之相反，他们是经博罗罗人的“传教”而成为慈幼会神父的。他们还在多年之后整理出了《博罗罗人百科全书》，一本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所以，在三位欧洲人眼中，这些印第安人几乎没有

1 《与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的访谈》，1985年。

2 《忧郁的热带》，第205页。

受到文化同化，而这样的认知恰好与西方哲学中描绘的野蛮人形象保持一致：魁梧又漂亮的身体上未着衣物，深入骨髓的宗教信仰让他们以骄傲的姿态纵声欢笑并且跳起了舞蹈。这些活动便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这些骄傲的男子戴着羽毛的装饰物，变成了一群小鸡！¹ 列维－斯特劳斯“沉迷在博罗罗人丰富的文化内涵之中，被它的奇妙之处深深吸引”。²



这让人想起童年时的他：那时的克洛德喜爱去歌剧院听瓦格纳的音乐，为这种整体艺术所折服，因为这种艺术给了他“丰富多彩的内容”³。

从第一晚开始，博罗罗人的歌声便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耳边久久徘徊，就算他曾接受过那么多高等艺术的熏陶，也不免为之心动。“听到这些歌声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他们的声音时不时突然中断；而他们乐器的响声——加长的渐强、渐弱——填补了歌声的空缺；他们通过歌声的停顿与响声指挥舞蹈的节奏，而响声的长短、强度和质感变化多端，就算是我们那些大型音乐会的乐团指挥也不见得能够了解它们代表的意义。”⁴ 这场音乐会歌声雄

1 让－皮埃尔·博勒诺（Jean-Pierre Beurenaut）、豪尔赫·博丹斯基（Jorge Bodansky）和帕特里克·孟格（Patrick Menget）：《谈〈忧郁的热带〉》（À propos de *Tristes Tropiques*），1991年，法德公共电视，46分钟。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让－克洛德·布林吉尔（Jean-Claude Bringuier）、皮埃尔·杜马耶（Pierre Dumayet）、让－约瑟·马尔尚（Jean-José Marchand）、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和米歇尔·特雷盖（Michel Treguer）的访问。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法德公共电视，2008年，1小时33分钟。

3 《忧郁的热带》，第206页。

4 同上书，第210页。

壮，因为只有男歌手参与其中。在那儿居住的三个礼拜，克洛德每晚都与这样的歌声为伴。事实上，这些涂了朱红色颜料的战士骄傲得就像黑秃鹫，他们忙碌于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其中一种仪式是马力朵之舞（Marid'do），这是一种葬礼仪式，克洛德与迪娜将它拍摄了下来。我们能看到马力朵舞的整个筹备过程，一个直径为 1.5 米的藤条编织起来的圆饼（舞者头顶着它跳舞）是它的道具，我们能看到舞蹈分为预热、祈祷、祭品献祭三个部分，还能欣赏他们的舞姿。这些工作也是由男人们完成的，女人们只能坐在一边看着。¹ 迪娜在她的课上常常使用这段影片。

仪式（主要是葬礼）、宇宙观、婚姻规则、神话：这些民族学传统的研究对象也是列维－斯特劳斯耗费一生精力研究的对象，它们在这次短期的考察之旅中得到了充分的调查研究。被称为“博罗罗社会学老师”² 的翻译人员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来源，多亏了他的帮助，克洛德成功收集了珍贵的资料。翻译人员的参与对民族学家而言显然十分关键，因为博罗罗人并不会葡萄牙语。但是，基于实地考察的日常活动，不同的经验带来了理论上的启发，但他的理论论述还未成形。凯亚拉（Kejara）的博罗罗村落约有 140 人，克洛德从这个村落里茅屋的地理布局中发现了规律。这是一个环形的村庄，而与水流平行的分际线将村落的空间一分为二，村民也因此分为两组人马：策拉（Cera）和图加雷（Tugaré）。村庄中心是男士居住的房子，单身男子住在这儿，而这儿也是白天男人们的活动场所。村里的茅屋分段排列，绕成一个圈子。在此基础上，一个复杂、精妙的几何形状出现了，这个与卡杜维奥人花纹同样精妙的图形凌驾于姻亲关系和人口流动的变化之上，它始终存在：一个个

1 《“马力朵”之舞》（*Dança do Marid'do*），凯亚拉（Kejara），1936 年 2 月。参见圣保罗文化处电影资料馆。

2 《忧郁的热带》，第 208 页。他大约 35 岁，在慈幼会神父的教诲下，学会了基础的葡萄牙语。

体永远属于他母亲所在的那一半村落，而他只能与村落另一半的成员缔结婚姻关系。“在结婚时，男性成员穿越林中空地，走过那条将村落一分为二的理想的分界线，在村庄的另一侧定居。”¹世袭的“亚群”以及职业分工的初始过程让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地理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就像身处开垦区的新兴城市一样，列维-斯特劳斯在露天的环境下观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空间分布。他还认为在社会等级（博罗罗人之间存在社会不平等）和互惠关系之间存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关系，他通过这个模型来理解“村庄两边共同生活、休戚与共的紧张关系”。1936年的这场考察活动并没有提供足够多的资料，研究工作仍然停留在经验层面，但它为后几年的假设提供了空间，博罗罗人村落一分为二的结构也成为文献中的素材。在那时，列维-斯特劳斯明智地将研究对象缩小至“格”（Gé）这一族群的辐射范围。由于柯特·尼姆衍达朱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这个课题成为研究美洲文化的民族学家的田野考察的目标之一，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后来，列维-斯特劳斯称博罗罗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说，博罗罗人是“伟大的结构主义理论家”。而博罗罗人的理论可能与他自己尚未成形的结构主义思想²“不谋而合”，因为两者都冠上了“结构主义”之名。我们可以幻想他如何一步步成为结构主义大师，但从结果来看，我们便能发现，凯亚拉的土著人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自我”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1 《忧郁的热带》，第213页。

2 《谈〈忧郁的热带〉》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称，自己始终有“一种结构主义者的使命感，幼时也是如此”。

归 途

有限的考察

2005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意外地于70年之后再次见到那些物件，“当他考察回来，为了便于巴西和法国之间的交流活动，他将这些东西交由圣保罗市文化处保管”¹。在法国举办的巴西年活动中，一场展览奇妙地将这些1935—1936年的收藏品聚集到一起，一方面是为了向公众展示，另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年迈的人类学家。

这些充满巴西记忆的收藏品是他第一次民族志考察活动的战利品。它们一开始被保存于圣保罗，然而，50年间从一个机构被辗转搬迁到另一个机构，以致所剩无几。后来，负责展览的专员——同时也是研究民族志考察史的史学家——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让它们重见天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的交流规则（因为其他地区的考察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在1933年，仅仅在第一次巴西考察的两年前，22698号法令设立了巴西“艺术和科研考察活动监督委员会”²。直到1968年的30多年间，这个委员会监督并管制在巴西展开考察的外国人以及巴西本国人，他们特别重视文化与艺术财产、植物、矿物和动物的保护，防止学者将它们携带出境。路易斯·多尼塞特称这个委员会“是多个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国家形象需要民族主义观点的表达，需要确定国家版图并对国家进行统一的管理。而对国家进行统一管理的过程要求将土著工艺作为巴西一国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³。也许它也是几年前引起议论纷纷的马尔罗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序》，载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巴西印第安人：巴西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第17页。

2 艺术和科研考察活动监督委员会（Conselho de Fiscalização das Expedições artísticas e científicas no Brasil）的档案保管于里约热内卢的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MAST）。

3 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18页。

（Malraux）事件的一个“缩影”：这位年轻、爱冒险的作家从吴哥窟（Angkor Vat）盗取了高棉人（khmer）的几尊小型塑像。监督委员会摆出一套官僚作风，让办事过程异常烦琐，列维－斯特劳斯在第二次巴西考察活动时竭力与之周旋。但它的本意在于杜绝殖民者的掠夺，为此，监督委员会还设立了法国与巴西的合作条款。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委员会确保了藏品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针对这些从别处（比如非洲）来的展览品，取得它们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¹此外，尽管官僚作风对克洛德而言是枷锁，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却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官僚作风导致文本和资料的数量增加，而这些材料至今仍保存在里约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MAST）之中。

对卡杜维奥人和博罗罗人开展的第一趟考察活动是在监督委员会的许可下进行的，克洛德一行轻松地拿到了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这张许可证允许夫妇两人在巴西全国自由组织考察活动。里约国家博物馆对他们这项研究的经费赞助为他们提供了“便利”。考察结束后，“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团交由巴西保管的民族志物件清单”（1936年11月）中，有161件来自博罗罗人，164件来自卡杜维奥人，2件来自特雷纳人（terena），1件来自坎刚人。这328件藏品留在了巴西，交由文化处保管，而不是由事先设想的国家博物馆保管，因为迪娜和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决定通过文化处设立一个民族志博物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对国家博物馆馆长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Heloisa Alberto Torres）表示的那样，圣保罗和里约之间藏品的分配基于“巴西式的主次关系”。他并没有介入分配的过程，但他竭力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些留在圣保罗的藏品——包括他非常喜欢的陶瓷——

1 《他者的诱惑：从殖民展到原始艺术》。

完全不能与国家博物馆里约分馆的藏品相提并论。¹

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拉讽刺了当时不被信任的气氛：“我心怀‘鬼胎’，试图带着一车车超过法国配额的弓、箭、羽毛帽子逃出巴西。”²事实也正是如此：法方交予人类博物馆的物件共计 602 件（341 件来自博罗罗人，230 件来自卡杜维奥人，31 件来自瓜拉尼人或者坎刚人），超过了半数。另外，除了这些民族志意义上的藏品，列维－斯特劳斯拉夫妇将用 8 毫米胶片拍摄的影片留给了巴西人。这是一种试图平衡双方利益的举动。

民族学者的头衔

民族学家们在 1936—1937 年初的冬天回到巴黎。1937 年 2 月 3 日，那些带回法国的收藏品在位于圣奥诺雷市郊路（rue du Faubourg-Saint-Honoré）与波艾蒂路（rue La Boétie）交叉路口的威登斯坦美术馆（galerie Wildenstein）展出，两人也出席了活动。展览的主题是“马托格罗索的印第安人”（克洛德与迪娜·列维－斯特劳斯拉考察团）。人类博物馆学术单位的性质最后呈现为保罗·利维在展览收藏品目录里介绍性的一段话，理论上，首次展览应在这座新的博物馆里进行。但夏洛宫修建工程的滞后让这个计划成为泡影。最后，举办这个展览的标志性意义被赋予另一个重要场所，即美术馆：一方面，民族志研究中审美的情趣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艺术界对当时的民族学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博物馆的建立就是为了

1 1936 年 11 月 5 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Heloisa Alberto Torres）的信：“但是，我向您坦承，我不认为您会对我从博罗罗部落带回来的东西感兴趣。您看过比它们有趣千百倍的东西……”；“卡杜维奥部落的瓷器不会像国家博物馆那两件那么珍贵，您不用担心……”我要感谢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馆长赫洛伊莎·多明格斯（Heloisa Domingues）女士允许我参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与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之间的书信。参见下一章。

2 《忧郁的热带》，第 18 页。

形成这种格局。

在这个转折点，列维－斯特劳斯积极地主张这些收藏品具有美学价值。“这是一套不错的民族学收藏品，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可以进行对比。我们在卡杜维奥人那里收获了这些有花纹的陶瓷品以及皮肤上独特的图案，这些东西在美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从博罗罗人那里我们收集了动物羽毛、动物牙齿和动物指甲的装饰物，因为他们甚至要为自己狩猎的武器和工具配上这些装饰物。有些东西真的非常漂亮。”¹ 他们的考察活动与这次展览的第一个以及主要的成果是，他们在艺术、物质和科研领域都获得了成功。这是一种混合了不同内容的民族学研究，它试图挖掘原始社会之美。博罗罗人的羽毛装饰非常“值得一看”，它们甚至可以和多贡地区那些漂亮的面具媲美。

这套藏品系列（超过 600 件收藏品）是为了弥补人类博物馆史前美洲藏品的不足，收集这些藏品也是当时展开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收集国外那些可能就要灭失的物件。列维－斯特劳斯陷入必须在灾难发生之前拯救它们的情绪之中，他的同行们也认同这种观点。他们发表的一些见解使民族学研究成为一项紧迫的工作。于是，在展览收藏品目录中，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表示：“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完成‘非濒危’物件和‘濒危’物件的收集工作。”这项任务之所以紧迫，是因为印第安人居住的土地正逐渐获得开发，印第安人开始融入国家生活（在橡胶以及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发生全球性危机时，这两个现象得到了缓解），同时，印第安人有效的生育控制使他们的人口骤减。这种保存（物件、仪式和神话）的职责显示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其中也不乏其他考量。米歇尔·莱

1 《亦近，亦远》，第 35 页。

里斯在达喀尔-吉布提考察团¹时的反应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米歇尔·莱里斯描述了考察团如何借助殖民统治的便利进行强取豪夺。然而，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严肃地表示：“我对这些人感到羞愧，因为他们除了这些东西一无所有，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是无可替代的。”²而这种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收集行为也会在交换过程中遇到阻碍。所以，缺乏耐心的列维-斯特劳斯只能忍受，并耐心地展开斡旋：“这位印第安妇女想要卖掉这个罐子吗？当然，她非常愿意。但不幸的是，这个罐子不属于她。那么它属于谁呢？她沉默不语。属于她的丈夫吗？不对。属于她的兄弟？也不对。属于她的儿子？更不对。这个罐子属于她的小女儿。她的小女儿是我们想要的全部东西的所有人。她三四岁，蹲在火堆边，双眼被我刚刚戴在她手指上的戒指所吸引。我们与这位小姑娘僵持了很久，而她的父母完全没有参与整个谈判的过程。一个戒指和五百个雷亚尔（reis）让她动摇。一个胸针和四百个雷亚尔拿下了她。”³

学术成绩单是考察活动的第二项成果。随着展览的举办，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举办了几场讲座，开设了几堂研讨课。这些活动让我们年轻的民族志学者融入了巴黎的社会学界。1月9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阶梯教室里，他借助投影设备开设了一场关于马托格罗索印第安人的专题讲座。此外，他受布格雷邀请于1月11日与一群特定的听众进行交流，他“与我们的年轻人谈论自己民族学的研究课题。这四五个年轻的哲学系学生希望在索邦的课程之外接触一些社会学的内容”，他们会面的地点在布格雷负责的社会文献中心。此前，布格雷还邀请

1 参见让·雅曼：《失乐园的宝藏（有关达喀尔-吉布提的考察）》，载《“热情”展》，纳沙泰尔民族志博物馆，1982年。

2 《忧郁的热带》，第147页。

3 同上。



《展览品目录手册》的封面。1937年1月21日—2月3日，这场展览由威登斯坦美术馆主办。封面人物是一位博罗印第安人，被他称作“博罗社会学教师”的当地翻译。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为列维-斯特劳斯特夫妇建立了名声。

他“与一些社会学同僚喝茶聊天”¹。布格雷将他带入学者的交际圈，而莫斯则是列维-斯特劳斯特报告考察结果的对象。列维-斯特劳斯特向这位“上司”传达了几条可以确定的结论：“在经济和宗教方面，部落与部落之间互相帮助，就像是沿袭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宗教仪式传统。部落按阶级由各个子部落组成，至少从分级的大致逻辑上看，这个系统与澳大利亚部落非常相

1 1937年1月4日，谢列斯泰·布格雷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信，现保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61 AJ 93。我要感谢托马·赫尔斯向我提供这份文献。

似。另外，除了阶级等级之外，经济秩序也等级森严。”¹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年轻的学者紧紧追随着莫斯脚步：他参与了交换礼物这一仪式的地图的绘制工作，而这项工作的发起人正是莫斯。田野考察的目的之一正是验证这位大师提出的假设，为此，列维-斯特劳斯还提出了几个非常具有政治意涵的问题（土著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和互惠行为，权力关系和统治体系），而他之后也将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于几个月后在《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²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博罗罗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研究》（《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期刊）。文章得到了法国民族学界的一致称赞。他严谨的治学之道以及与社会学同事们的亲密关系让他成为这个圈子中的一员。当时最出名的民族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对列维-斯特劳斯表示钦佩，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决断力与他在实地考察中表现出来的工作效率大加赞赏：“这是您第一次田野调查，您是天生的民族学学者，您在学术领域有着不可估量的前途。”³更让克洛德吃惊的是德国大民族学家柯特·温克尔（Curt Unckel）对他的看法。温克尔独自一人在巴西中部地区待了好多年，他有一个印第安名字，这是1906年圣保罗的瓜拉尼人送他的名字——尼姆衍达朱（Nimuendaju）。这个名字对人类学这门学科而言，代表了一种学者身份、一种独立的研究风格、百科全书式渊博的学识以及与研究对象和谐共处的能力。1936年，尼姆衍达朱（1945年，他在一个印第安人村落逝世）是一个人类学神话，他懂得好几门土著语言，是研究巴西土著人最优秀的学

1 1936年3月14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塞尔·莫斯的信。

2 《1936年》，第28卷，第28/2期，第269—304页。

3 1937年4月24日，吕西安·列维-布留尔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信。现收藏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95，属于“致克洛德的信”（Correspondance reçue）主题档案的一部分。

者。所以，列维－斯特劳斯非常合理地将他的文章递给尼姆衍达朱，请他指教，因为我们年轻的民族学家对尼姆衍达朱既钦佩又景仰。然而，1936年11月10日，尼姆衍达朱给他回了信，信中表达了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感谢，并直接围绕村落之间通婚的话题展开了讨论。他与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对话的态度就像朋友或者同事。尼姆衍达朱鼓励列维－斯特劳斯有机会应当进行更加长期的田野调查。第二天，尼姆衍达朱向他圣保罗的同事——也是圣保罗大学的教师——赫伯特·巴尔杜斯（Herbert Baldus）表达了这篇文章给他的感受，当时作者列维－斯特劳斯还默默无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谁？[……]我读过他发表在《圣保罗州报》的一篇文章《在文明的野蛮人之中》（Entre os selvagens civilizados）。文章里面对土著人研究的着眼点让我觉得非常有趣。他之后在《美洲文化研究学会会报》发表了《博罗罗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好像它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们应该怎样期待他未来的潜力呢？”¹1937年1月17日，几个月之后，他坚持认为：“值得称赞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才接触民族学不久，却在短期内深入学习并能够准确地把握博罗罗人的社会情况。我想起我是花了6年时间才完成卡内拉（Canela）的社会学研究，而他的介绍形式简短，非常具有吸引力。”²尼姆衍达朱也不忘向他的美国同事罗伯特·路威介绍这颗新星的诞生。认识路威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意味着打开了通向整个美国人类学学术网络的大门；然而，他们之间的联系还不能成为列维－斯特劳斯成功之路的敲门砖，

1 1936年11月11日，柯特·尼姆衍达朱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信。参见埃琳娜·维勒普尔（Elena Welper）：《柯特·温克尔·尼姆衍达朱：打破巴西民族志研究传统的德国人》（Curt Unkel Nimuendaju: Um Capítulo Alemão na Tradição Etnográfica Brasileira），里约热内卢，社会人类学研究生项目，国家博物馆，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UFRJ）硕士学位论文。我要感谢埃琳娜·蒙泰罗·维勒普尔（Elena Monteiro Welper）准许我参阅这份文献，同时，感谢路易莎·瓦伦蒂尼翻译这些用葡萄牙语写作的书信。

2 同上。

但几年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路威的关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踏上流亡之路时，列维－斯特劳斯之名在美国民族学界声名大噪，美国的大门向他敞开。

我们可以无限想象尼姆衍达朱在书信中表现出来的期许之情。即使与列维－斯特劳斯从未谋面，尼姆衍达朱迅速掌握了情况，用琐碎的材料构建人物模型，于是，很快了解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治学的方式。除了对他学识的观察，尼姆衍达朱也没有忽视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完整的个体。他欣赏后辈犀利的眼光和对经验的把握，称赞他能够抓住短暂的瞬间，而不依赖时间的眷顾。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前途无量”……

8 “马斯默·列维”与南比克瓦拉人

我们在列奥米尔-塞瓦斯托波尔站（Réaumur-Sébastopol）的路口筹备巴西中部的民族志考察活动。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¹

如果把列维-斯特劳斯 1937 年即将踏上的考察之旅比喻为戏剧舞台，那么幕布打开之后将会呈现十分跌宕起伏的剧情。去巴西中部最偏僻的地区考察当地不同的印第安人族群，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克洛德以作战的姿态不顾一切、积极地进行为期一年的准备工作时，资金问题、行政手续办理上的困难以及政策面的阻碍却接踵而来。总之，克洛德心无旁骛且心如磐石。而出发之际，为这个项目提供支持的机构因为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不受新任当权者喜爱而变得有心无力。考察活动就像是一个孤儿，而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女士就像是它过于多情，甚至有些溺爱的母亲。最后，1938 年 5 月初出行的克洛德在 1939 年 1 月 12 日返回法国。

克洛德对南比克瓦拉人（Nambikwara）的考察之行声名远扬。《忧郁的热带》出版于 1955 年，大约在考察活动 20 年之后，克洛德在其中重新审视了在巴西这片土地上展开的考察活动。得益于它的发表，我们获得了新的材料和不同的观点，可以从中感受那段岁月里的英雄故事。这个文本揭露了巴西那些年的风风雨雨，也多少隐藏了外人不能体会的艰难困苦。在 1994 年和 1996 年发表的两册《忧伤的圣保罗》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口吻中带着更多苦涩，而年轻的民族学家牢牢戴着一顶探险家的帽子，背着考

¹ 《忧郁的热带》，第 243 页。

察活动的记录册及徕卡相机，他所见到的美妙的事物以身体、精神上的折磨作为代价。巴西民族学家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Luiz de Castro Faria）以及生物学家热昂·阿尔贝·维拉尔（Jehan Albert Vellard）也参与了这次考察，他们对“北方山脉考察团”（Mission Serra do Norte）的这次考察活动也有自己的看法。

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再一次踏上巴西这片土地并且进行考察也是一次重新审视考察经历的机会，因为考察经历并不完全是清清楚楚的。而重新验证考察经历对克洛德的学术生涯、对他的作品而言都十分关键，因为考察经历是学术和写作最坚实的基础。这次考察活动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同时，针对此次考察活动，社会反响不一（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人们对这次考察活动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诚如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中肯之言，它是列维-斯特劳斯和巴西之间“错过的约会”¹。

北方山脉考察团及考察活动的档案

前期工作

1937年3月，列维-斯特劳斯回到巴西展开了第三次教学工作，这也是他在巴西的最后一次教学工作，他的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他知道自己合同结束之后不会续签。与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的矛盾和1937年末新的政治环境对他十分不利。一年内气氛不断恶化：在里约，整合运动者（Integralistes）标榜自己是纳粹（他们炫耀纳粹党的党徽），排斥犹太人的政治宣传越来越多，而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一轮轮罢工和游行。列维-斯特劳斯在1937年9月25日写给马塞

1 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序言《错过的约会》（« Les rendez-vous manqués »），巴西版《远离巴西》，圣保罗：圣保罗州立大学出版社，2011年。法语翻译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欧洲》第105—106期，第83—90页。

尔·莫斯的信中真诚地表示：“总统选举在即，巴西时局十分动荡。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政权的变动让它变得一团糟。哲学学院险些陷入麻烦。巴西的未来就指望这场斗争的结果了，这是毫无疑问的。”¹两个月后，斗争于11月10日结束，政变者建立了“新国家”，一个独裁的政体。一直到1945年，热图利奥·瓦加斯都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圣保罗大学是在他的政治对手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以直接成为新政权将要肃清的对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是法国人，也是犹太人，还是社会主义运动者，他身在圣保罗，似乎与圣保罗大学的寡头势力格格不入。据1938年接替他岗位的罗杰·巴斯蒂德称，决定不要与克洛德续签合同的正是朱里欧·德·梅斯奎塔·菲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远离教学活动是因为梅斯奎塔·菲略认为他‘太危险’，确定他参与的法国人民阵线是一个‘共产主义’团体，于是梅斯奎塔·菲略直接决定了他的去留。”²之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回忆起，朱里欧·德·梅斯奎塔·菲略曾在他人入选法兰西公学院之后抱着“一种向克洛德认错的态度”³赶来祝贺：一种他擅长的手腕。

陷于这种复杂的政治和教学环境中，列维－斯特劳斯特认为必须离开圣保罗大学，并全身心为第二次考察活动做准备。因为他对第二次考察活动的野心要远远大于第一次。展览“马托格罗索的印第安人”在巴黎大获成功，此外，同事们对他也十分认可，这两个因素激励他继续努力。他想要为博士学位储备研究的素材。他对莫斯说，他尝试“尽可能利用当地图书馆的资源来让他为博士论文而准备的参考文献更加充实。他已经有

1 1937年9月25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给马塞尔·莫斯的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档案盒编号181。

2 罗杰·巴斯蒂德（Roger Bastide）与伊雷内·卡多佐（Irene Cardoso）的谈话。参见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魯皮奧尼：《受到监管的收藏品和考察活动：巴西艺术和科研考察活动监督委员会里的民族学家》（*Coleções e Expedições Vigeadas: Os Etnólogos n o Conselho de Fiscalização das Expedições Artísticas e Científicas no Brasil*），圣保罗：Hucitec/Anpocs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3 同上。

了大致框架。剩下的工作交由田野考察”¹。在为博士论文开展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非常具有计划性，推进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模型的确立、问卷的设计或者说他研究活动的框架的架设，他还希望组织一支比上一次更加精锐的队伍来展开调查，因此，进行了预调研。他接受了利维和梅特罗的建议，向维拉尔医生（Dr Vellard）抛出了橄榄枝。维拉尔医生既是医生，也是伯南布哥生物研究所（Institut biologique de Pernambuco）的所长。他也希望柯特·尼姆衍达朱可以加入团队，而尼姆衍达朱拒绝了他的提议，称自己要忙于东部高原上格族人（Gé）的社会问题研究，历时很长，所以在一年以内都抽不出时间。事实上，尼姆衍达朱只是不喜欢维拉尔，此外，他也习惯了一个人工作，所以排斥一切需要合作完成的考察活动，譬如，列维-斯特劳斯正在筹备的这场考察活动。这是1937年11月，当时列维-斯特劳斯已经回到法国。

《忧郁的热带》将这一段巴黎的插曲一带而过。克洛德只花了几页的篇幅加以描述，所以这段插曲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继续跟随他的脚步深入巴西并且深入了解人类。然而，以南比克瓦拉人为主线的第九章的头几页让我们觉得非常困惑，因为它是这样开头的：“我们在列奥米尔-塞瓦斯托波尔站的路口筹备巴西中部的民族志考察活动。”²列维-斯特劳斯提到了考察团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筹备活动：他们买了玻璃彩珠来与印第安人以物换物。克洛德表示很难把握印第安人的喜好：“我来到巴黎的一个陌生的街区，这里陌生得就像是另一个亚马孙。在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商的眼皮子底下，我试着进行挑选。我不知该如何从他们的商品中进行挑选，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

1 1937年9月25日，给马塞尔·莫斯的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档案盒编号181。

2 《忧郁的热带》，第243页。

的需求。我只能一心想着土著人的标准。我尽可能在绣花珠（它们是所谓洛可可式的珍珠，而将它们串起来的丝线重量不轻，并且装满了盒子）中挑选个头最小的。我试着用嘴咬，看看它们是否坚固，并且将它们含在口中，看看它们是否经过批量染色，以确保它们不会在第一次过河的时候就褪色；我让他们觉得这批货对自己而言十分重要，我用印第安人的眼光挑选颜色：首先是同样受欢迎的白色和黑色，然后是红色；其次是不太受欢迎的黄色；最后，为了安全起见，我也挑了几个蓝色和绿色的珠子，但蓝色和绿色可能会被丢在一边。”¹ 想象一下，当这些店主（其中许多是在附近的桑提尔服装商店区工作的中欧犹太人）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绅士正一脸严肃地对他们的珠子又是吮吸又是嘴咬时，脸上是何等困惑！文森·德巴恩（Vincent Debaene）说，这次买卖经历就像民族志活动中角色的颠倒：“民族志学者在巴黎的捷克商人面前成为印第安人。”² 他远离了熟悉的巴黎西面的街区，身处一个平民街区，这让他觉得从原本的世界中跳了出来，并以土著人挑剔的眼光挑选货物。

在巴黎的这几个月，他明确了研究机构能够给他怎样的后勤支援，也向法国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了他的职业身份。从1937年6月5日起，一项由让·扎伊（Jean Zay）签署的教育部的决定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成为一个科研考察团的负责人，教育部还将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考察团的名字是“帕雷西考察队”（Serra des Paressi）（这个名字调整了很多次）。他接受了教育部的派遣，而法国海外事务局持续给他发放法国方提供的工资（3000法郎），他的妻子也拿到了1500法郎的月工资（这个数额与她在圣保罗市工作所得一致）。在圣保罗大学任教合同结束之后，列维－斯

1 《忧郁的热带》，第243—244页。

2 参见文森·德巴恩：《“巴黎的亚马孙：一个未知街区”——超现实主义和民族志叙述》（« “Un quartier de Paris aussi inconnu que l'Amazonie” . Surréalisme et récit ethnographique » ），《现代》第628期，2004年8、9和10月，第135页。

特劳斯夫妇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算拿到了与巴西那些年收入数额相近的工资。而研究机构也有进展，现代的人类博物馆已经在夏洛山岗上建设完工，保罗·利维作为它的馆长，成为克洛德的主要后盾和完美的保障。保罗·利维愿意以人类博物馆的名义支持列维-斯特劳斯的这次考察活动，并且持续主动跟踪巴西考察活动的各种进展，他对考察活动非常重视。他向外交部指出，“这些纯粹科学研究的考察团虽然不被寄予厚望，但却能够深入地与南美洲人展开交流。考察团活动展现了法国对他们国家的兴趣，是收服这些认为自己被欧洲大国忽视或者轻视的南美洲人民民心的最好方法。38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是最好的政治宣传，因为它激起当地人强烈、敏感的爱国主义情绪”¹。

最后，继让·马克思和保罗·利维之后（好几年之后），对列维-斯特劳斯意义重大或者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洛吉耶（Henri Laugier）：他是一位名声响亮的生理学家，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他通过女友玛丽·库托利（Marie Cutoli）的关系网和财力认识了最负盛名的法国先锋派艺术家。他与利维一样，也是左翼成员，所以对一门能够解放人类又自诩民主的学科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好感。1936年，他是新成立的“科研处”（Serv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的负责人，1939年，秉持同样理念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成立，他便成为新机构的一把手。在洛吉耶和人民阵线关系网的帮助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考察活动也得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

1 外交部档案，美洲，1918—1940年，普通档案（Dossiers Généraux），第206期，《给德布雷西的通知》（« Note pour M. de Bressy »）。参见雨果·苏博的博士论文：《法国对巴西的文化政策（1920—1950）》，第585页。

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民族学、民族、探险

与第一次考察一样，考察地点和部落的选择是长期考量的结果。克洛德基于不同的因素做出决定，物质是一方面，学术是另一方面。他从一张较为全面的问卷出发，有时他的假设会非常疯狂。当时的美洲文化研究因为缺乏文献资料所以非常贫瘠，而这个现状要求学者在这个领域内逐渐累积成果：“理解美洲”，指的是通过认识历史——我们猜想美洲的历史相对较短，只有几千年¹——了解这里的人口密度、人口分布、人口移动以及部落之间的联系。它也指对南北美洲在内的整个美洲世界进行统一的设想，暂时放下安第斯山脉与列维-斯特劳斯即将深入考察的巴西高原西部边界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

渐渐地，他希望为他的考察活动制定路线，当时的考察活动也都会规划路线。他们穿过马托格罗索州西部（这是马托格罗索州最偏僻的地区），沿着西北方向从库亚巴（Cuiabá）走到玻利



“皮卡迪亚小径”：巴西荒地“塞尔陶”（sertão）的一条小径，它是700千米范围内的唯一路标，俗称龙东电线杆。

1 《忧郁的热带》，第247—254页。

维亚边界，抵达马德拉河盆地（bassin du Rio Madeira）。这个巴西地理意义上以及民族志意义上的“大穿越”¹不是为了与一群人见面，只是为了了解格语（gé）、图皮语、阿拉瓦克语，接触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颜色，让他可以完成巴西地图的绘制。²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渴望认识美洲，而不是为了以美洲作为例子来理解人类”³，为此，他才踏上征程。他很快便会与南比克瓦拉人相遇。

因为南比克瓦拉人很少为外界所知，所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更加希望了解他们。16世纪的探险者早已认识了图皮-瓜拉尼人（Tupi-Guarani），当时，图皮-瓜拉尼人刚刚抵达巴西沿海地区不久，在离河岸不远处定居了下来。图皮人居住地的西北方向有加勒比人（Carib）以及阿拉瓦克人（Arawak），他们是加勒比海域岛民的祖先，辗转经过中美洲和北美洲成为加勒比海域的岛民；居住在西边土地上的格族人不为外界所了解，尼姆衍达朱研究过他们，而列维-斯特劳斯有了与博罗罗人接触的经验后，认为他们“源于一种同质化的文化，说同一语族下的不同方言，过着水平较低的物质生活，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宗教思想。难道他们不是巴西第一批住民吗[……]？”⁴列维-斯特劳斯以他敏锐的嗅觉展开调查工作。为了找到“最接近西方人的格族人”，他还试图寻找一个“失落的世界”。“失落的世界”是柯南道尔小说的名字和《忧郁的热带》第24章的标题。他从这样的“原始文化”（Ur-Kultur）中获得了启发，也发现了原始之美：其精髓在于回到事物的根源。

1 《忧郁的热带》，第245页。

2 同上书，注释6，第1758页。

3 同上书，第245页。

4 同上书，第246页。



旱季，巴西荒地（位于马托格罗索）上一片荒凉的灌木区。

列维－斯特劳斯做出这个选择基于两个理由。一是现存资料非常有限，但这也为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角度；二是这些 1910 年代的资料与“龙东元帅”（*maréchal Rondon*）有关，而龙东元帅是 19 世纪巴西的重要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居住期间，龙东元帅仍然在世。这些材料指的是龙东委员会的档案、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回忆录《穿越巴西丛林》（*Through the Brazilian Wilderness*, 1917）——回忆录描述了 1914 年对龙东展开的为期四个月的康拉德式的考察——以及民族学家埃德加·罗凯特－平托（*Edgar Roquette-Pinto*）的著作《朗多尼亚州》（*Rondônia*）。1912 年，罗凯特－平托与龙东一道对这片区域进行了考察，后来，这位学者成为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分馆的馆长。¹

坎迪多·龙东（*Cândido Rondon*, 1865—1957）是一位军事工程师，他是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者，而巴西共和国培养了

1 参见文森·德巴恩：《说明》（« Notice »），载《忧郁的热带》，“七星文库”，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第 1685 页。

不少实证主义者。¹ 他于1910年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以及通过技术上的改善——为他们建立定居点——让印第安人融入巴西社会。这项有关土著人利益的政策虽然与那些迫害殖民人口的行为相比非常慷慨，但也仍然改变不了它管控这个地区、“征服巴西西部”的目的。龙东对边境线甚为关心，对靠近玻利维亚的土著人群体尤其关心，例如，南比克瓦拉人。龙东希望让印第安人安定下来，这样一来，他们能为新巴西工作，成为郊区的劳动者。受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启发，这些实证主义派军人认为必须让印第安人走上文明之路，因此，向他们施加了一种被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卡洛斯·德·苏扎·利马（Antonio Carlos de Souza Lima）称为“监护权”的东西：他们给印第安人分配公共土地，但印第安人只有使用权；1917年颁布、1928年修改的民法给了印第安人矿工的身份，而它们与巴西“同胞”或者海外民族学家的交流活动必须通过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展开。在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失去大权之前（它失去了经济支持，不讨政府欢心），它在成立之后的十年间，因为龙东元帅的大作为而活跃在历史舞台。拥有远大抱负的龙东竭尽心力建造了一条连接库亚巴和玻利维亚边境、长达700千米的电报线，建设工程困难重重。1914—1922年，在龙东的监督下，土著人穿越一条条河流，在灌木林或者丛林中建起几千根杆子。凭借工程师的才能，龙东就这样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他还发现了一片新的区域，从此以后，这片土地就冠以他的名字：“朗多尼亚州”。

讽刺的是，这条由被迫远离荒野生活的印第安人千辛万苦建

1 关于龙东与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参见安东尼奥·卡洛斯·德·苏扎·利马：《和平包围战：监管权、印第安人和巴西国家的形成》（*Um grande cerco de paz. Poder tutelar, indianidade e formação do Estado no Brasil*），彼得罗波利斯：沃兹出版社（Vozes），1995年；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的评论，《综合期刊》（*Revue de synthèse*）第3—4期，2000年7—12月，第489—492页；帕特里克·威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诗室里的诗人》，第77—79页。

立起来的电报线很快便因为 1920 年代初短波无线电技术的面世而被废弃。这段由实证主义者书写的故事带来了一条长长的“伤疤”（picada）。这条落后的小道穿越了这片荒地（sertão），曾是通往这个在 1930 年代仍旧非常偏远的地区的唯一方式。而沿路规则分布的电报站成为旅客的休息处：它们就像是可以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遮风挡雨的小茅屋。这个小型工作队由敞篷车和帕雷西印第安人（Pareci）组成，他们向定居在附近的部落传达重要信息。这是列维-斯特劳斯选择沿着龙东电报线对巴西中部展开考察的第二个原因。这条线路已经反映了克洛德这次考察的矛盾之处：这条线路让印第安人融入了现代生活，征服了这些蛮荒之地，统一了不同民族以及整合了巴西国土，但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它是通往一片危险地域的道路，他期待在道路的那头找到未经开发、未被破坏、仍旧远离尘嚣的世界。

巴西严密的监视：“多娜·赫洛伊莎”¹与国家博物馆

第一次考察活动中，成立于 1933 年的监督委员会轻松下发了一张允许这些“新人”在巴西自由通行的许可证。由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符合管理要求，因此，当他为第二个研究计划再次向这个监督委员会申请许可证时，丝毫没有担心：“这个考察团将要探索茹鲁埃纳河（Rio Juruena）以及吉-帕拉纳地区（Gy-Paraná）的源头，并在那里与土著人一起生活，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活动。其间，除了观察记录，考察团也会收集民族志和以自然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样本。”²考察团里计划有 5 名学者：一名人类学家（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一名民族志学者（列维-

1 多娜是对女性的称呼。因此，音译的“多娜·赫洛伊莎”就是指“赫洛伊莎女士”。——译者注

2 这封日期为 1937 年 4 月 6 日的信被保管于里约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是艺术和科研考察活动监管委员会“列维-斯特劳斯档案”的一部分。参见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 327—329 页。作者追溯了与官僚主义斗争的确切时间脉络，并点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斯特劳斯先生）、一名博物学家兼医生（伯南布哥生物研究所的维拉尔医生）、一名语言学家（指的是柯特·尼姆衍达朱，1937年4月10日，列维-斯特劳斯仍然希望尼姆衍达朱能够加入他的考察团）以及一名“制图师、资料处理大师”热内·西尔兹（他是农业工程师，也是克洛德第一次考察活动的伙伴）。

申请被递给了身为顾问的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她是国家博物馆派到监督委员会的代表。1937年5月28日，有了基本正面的回复，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巴西国家博物馆需派代表参与考察活动；他们必须将收集的物件从里约热内卢港带出巴西；此外，他们还需得到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的同意。1937年6月11日的回信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真记录需要满足的条件，确保这些条件都一一满足。¹ 申请有序地进行，他们似乎马上就能等到结果。然而，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的负责人维恩森特·特谢拉·瓦斯康塞洛斯上校（colonel Viencente Teixeira Vasconcellos）在1937年9月24日的来信中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理由如下：考察团可能会危及和平的状态，破坏这个地区与印第安人尚不稳定的和谐关系，而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为了维系这段和谐关系付出了很大努力。随信附了备忘录，这10页纸记录了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的规章和使命。而他们的使命是使印第安人免受“文明”行为的迫害，所谓“文明”行为，指的是科研和传教活动。整篇回信洋溢着热情，充斥着近乎家长的说话语气。1937年秋，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时，似乎还未马上掌握这些在巴西政权更替下而变得更加复杂的交涉程序。他们需要跨过的三座大山分别是：监督委员会、国家博物馆、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这三个机构因历史沿革和人员调动而紧密合作，在这段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

照片上，她与即将踏上征程的年轻的民族学家们聚首在与

1 这两处引文以及本段其他引文都出自第一封信。

国家博物馆里约分馆相邻的花园中。我们透过这位成熟资产阶级女性的外形观察到她作为监护人所表达的善意，她盘着发髻，戴着珍珠项链，眼神坚定地望着谈话对象。个性分明的“多娜·赫洛伊莎”（Dona Heloisa，女强人赫洛伊莎）手握实权。¹她在1938—1955年担任博物馆馆长，她的父亲是法学家阿尔贝托·托雷斯（Alberto Torres），一位巴西共和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便成为“卡里奥卡”（carioca）²的政治精英和顶尖知识分子。他的女儿是人类学专业出身，曾在前任博物馆馆长罗凯特－平托身边工作，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龙东、罗凯特－平托）——实证主义者们认为科学是思考社会的一种方式。她是管理这座博物馆的第一位女性，她主持大局的时候正值瓦加斯开始实施独裁统治，所幸，她的政治嗅觉和社交能力让她懂得如何巧妙地与之周旋。“多娜·赫洛伊莎”从未结婚，她是国家博物馆的“女王”，是巴西民族学的祖师。20多年间，她毫无疑问是“人类学领域的导演，而非演员”³。她与前往田野考察的众多民族学家保持书信往来。她让这些常常独自作业、有时甚至遭遇心理危机的民族学家重新振作精神，让他们以她的书信作为媒介与世界接轨。她从科学和巴西国家利益的角度收集、发布、挑选和整理信息。每一位外国民族学者都要与“多娜·赫洛伊莎”打交道，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列维－斯特劳斯也不能例外。而他们之间的

1 赫洛伊莎·多明格斯和玛丽扎·克雷亚（Mariza Corrêa）为这一段的写作提供了素材，两人于此献出了宝贵的时间。赫洛伊莎·多明格斯是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档案处的负责人，而玛丽扎·克雷亚作为学者，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人类学家和人类学》（*Antropologas e Antropologia*），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出版社（Editora da UFMG），2003年；《一位淑女的来信》（«Lettres d'une femme rangée»），《当代巴西副刊》（*Cahiers du Brésil contemporain*）第47—48期，2002年，第181—197页；电子书《致赫洛伊莎：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田野地图》（*Querida Heloisa/Dear Heloisa. Cartas de campo para Heloisa Alberto Torres*），玛丽扎·克雷亚和亚努拉·梅洛（Januara Mello）主编，性别研究中心（Núcleo de Estudos de Gênero），“探索丛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2008年。

2 指代里约热内卢这座城市。——译者注

3 玛丽扎·克雷亚：《致赫洛伊莎：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田野地图》一书的导言。《致赫洛伊莎：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田野地图》包括了多位民族学家有关巴西田野工作的书信以及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书信。

关系并不简单，因为在当时的巴西，反犹太主义情绪泛滥，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也不例外。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她是监督委员会的一分子，也与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关系非常密切。巴西国家建设艰难推进时，这两个机构积极参与了管理工作。成立于1818年、致力于研究自然历史的这座博物馆是巴西第一家研究机构，它在巴西共和国的政权下成为思考人类学的领地，共和党精英们常常通过博物馆发表对当时巴西重大问题的观点。重大问题指的是，将巴西多元的混血人口统一起来（印第安土著人、获得解放的黑人、欧洲移民）。这不只是一个单纯进行科学研究的地方，也是一个为国家政策服务的知识工厂。而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负责的是土著人的管理。¹

巴西当局对考察活动并不友善，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知情吗？1938年2月12日，他从巴黎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写信，向她建议调整考察活动的性质，同时，他也可以借机摆脱派驻到考察团里的代表：“我刚刚接到电话，得知圣保罗市同意了我几个月前代表法方提出的方案，我建议考察团从单一的法国行动（您曾经通过税收委员会批准了那次法国考察活动，您还记得吗？）改成法国与巴西联合行动。[……]我不知道这样的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但我认为这样的合作机会非常珍贵。您认为必须首先落实合作细节。我认为，既然考察活动是法国与巴西共同合作完成，那么分别代表圣保罗市、国家博物馆、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的巴西成员也是这个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在考察活动中执行他们的监督任务。您怎么看？”²她怎么看？白纸上留下了潦草的黑色字迹，她将答案写入信中，一封

1 安东尼奥·卡洛斯·德·苏扎·利马：《巴西土著主义：人口移动与管理知识的调整》（《L'indigénisme au Brésil. Migration et réappropriations d'un savoir administratif》），《综合期刊》第3—4期，2000年7—12月，第381—410页。

2 1938年2月12日，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信。参见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档案室，“列维-斯特劳斯档案”。

由他人交到她手上的信：“博物馆主张派专人负责科研工作。因为考察活动与科研有些不同，所以它与现行的法律并不冲突。博物馆只能接受他的建议，将代表召回。从斯特劳斯先生之前的信来看，他清楚博物馆并不只是想进行监督。”¹事实上，“多娜·赫洛伊莎”期望基于这样的合作在田野考察中为巴西培养一些民族学领域的新面孔。因此，博物馆召回了它的代表，同时考察团也失去了博物馆对印第安人保护工作处的影响力，陷入了双重困境。赫洛伊莎比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更加了解行政机构的混乱情况。克洛德显然并不完全了解官僚体系的那套作风，也不会料到这套官僚体系会给他的项目带来多少阻碍。总之，他意识到下错了棋，但为时已晚，在圣保罗当地朋友（主要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帮助下，克洛德一行迅速启动了备用方案。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再一次拯救了列维－斯特劳斯。1938年3月22日，马里奥·德·安德拉德通知监督委员会（以及赫洛伊莎），列维－斯特劳斯带领的考察活动将“完全”由文化处接手。他请求下发许可证，并委派一名成员对考察活动进行监督。事情终于在4月得到了解决。直到考察活动前夕，质疑的声音卷土重来。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担忧，1938年3月底在里约准备登船返回法国之际，他向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传递了一个口信。口信中充满着惶恐之情：“先生，我从蒙贝那里得知您曾在这儿，不幸的是，我与您错过了。佛罗里达号4点起航，我还有机会见见您吗？蒙贝向我提到考察活动遭遇了非常巨大的麻烦，而我完全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此致敬礼。”²在此刻，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和保罗·杜阿尔特因为

1 1938年2月12日，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信。参见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档案室，“列维－斯特劳斯档案”。法语翻译参见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28页。

2 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未记录时间），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管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瓦加斯的“新国家”政权而在政治界中失了势，这最后的求救也面临着危机。文化处存活了下来。

这场行政程序上的斗争的第一个后果是，经过两国联合考察团的可行性讨论后，这个法国考察团最终变身为一个巴西考察团。列维-斯特劳斯希望增加巴西的参与比重，但他没有意料到国家博物馆与圣保罗当地的行政机构居然成为“敌人”。“剥夺国籍”后又“给予国籍”，我们可以敏锐地发现巴西时局给人类学研究提出了艰巨的政治挑战。另一个后果是：科研队伍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与最初的设想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和维拉尔医生始终都在科研队伍之中，尼姆衍达朱因为先前提到的那些原因拒绝了列维-斯特劳斯的邀请。此外，热内·西尔兹消失了。博物馆年轻的研究人员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被任命为“监督人”，而他的职责是：“领导考察团，密切监督团员的研究方式、团员与土著人的关系，让研究人员按规则采取行动，必要时立即遣返考察团。”¹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法利亚还需要定期与赫洛伊莎和博物馆通报考察活动的进展。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是法方研究处的资助对象，也是圣保罗市一笔60康多²（等于6000万巴西雷亚尔）金援的领受人，因此，是学术和财务“领导”，但是卡斯特罗·法利亚是执行主管，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就有权利（和义务）终止考察活动，改变考察路线。我们可以认为是这些原因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动身时表现出迟疑。他希望自己是队伍里唯一的民族学家，所有在读的博士生很快就能理解他的理由：他希望为博士论文收集素材，归自己一人所有和使用。1937年4月10日，他向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的夫人对我说，您希望我对参与考察活动的巴西学者的研究

1 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28页。

2 康多：conto（复数为contos），巴西曾经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方向提供建议。您自然是最合适的决断者。我猜想，一位民族学家不会有太多机会进行个人研究，因为这个考察团的研究结果是我博士论文的素材。”¹ 克洛德建议这位巴西学者从事的是生物属型学的研究！事实上，不论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卡斯特罗·法利亚都没有将这些在考察活动中收集的资料用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博士论文内容更加丰富，巴西田野考察的内容要在15年后才会完整地展现于《忧郁的热带》中，而此书的出版也引起了一些波澜。1938年，卡斯特罗·法利亚既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也是“里约之眼”²，列维－斯特劳斯带着讽刺的语气这样称呼他。他在这个脆弱的小团体中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角色。1938年5月，这个团体终于迎来了解散的结局。



戈亚斯州科伦巴（Corumbá）的港口：他们乘坐蒸汽船沿着巴拉圭河，向目的地库亚巴出发。

1 1937年4月10日，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信。参见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档案。

2 参见《〈忧郁的热带〉任务》（«Mission Tristes Tropiques»），《解放报》1988年9月1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回应马修·蓝东（Mathieu Lindon）：“我们一度十分艰难地开展田野考察工作。它是代表巴西掌权者的‘财务检查人员’，但他十分害怕，浑身颤抖，被身上的重担彻底压垮。它一直试图叫停，阻碍我开展工作。我们必须是伙伴，因为我们身处同一条船，都很艰辛。”

龙东电报线

库亚巴

圣保罗当地媒体记录下了这次任务繁重的考察团出发前的最后准备。收音机、配备德国键盘的打字机、摄影机、猎枪（他们得到了携带武器的许可）、弹药、玩具、玻璃彩珠……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带着重达 1470 公斤的行李从圣保罗出发。他乘坐火车抵达科伦巴，然后登上蒸汽船，沿着巴拉圭河逆流而上，最终来到库亚巴。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沿着这条线路寻找博罗罗人的踪迹。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拉夫妇乘坐飞机直接降落在库亚巴，巴西中部地区民族志研究的中转站。所有人在 1938 年 5 月 9 日同时抵达目的地，除了维拉尔，他于 5 月 23 日与他们会合。他的迟到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城市的高处有一座 18 世纪巴洛克风格的教堂，这座城市还留有殖民时期专区政府所在地的痕迹。人们正在庆祝奴隶制废除 50 周年，但对考察团而言，这时候需要为考察活动进行周密的筹备，筹备期延续了漫长的一个月。他们走访当地政要，收集有关印第安人的信息，挑选作为交通工具的骡子，采购牛肉作为物资和食材。所以他们需要雇用赶骡子的人和牧牛人。牧牛人首领富尔亨西奥（Fulgencio）雇用的手下做事稳当，在他的帮助下，一切很快准备就绪。最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15 匹骡子、30 多头精心挑选的牛、10 多名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学术研究团队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商队。要知道，这些“访问者”的数量往往超过受访的印第安人。如果道路条件允许的话，他们将乘坐一辆卡车通往乌提利提站（Utiarity）。



库亚巴：马托格罗索州的首府，北方山脉考察任务的起点（1938年6月）。

白天，迪娜·列维－斯特劳斯在她的记录册上写下令她疲倦的旅行经历。这些被收入迪娜前夫个人档案中的一本本册子上记录了她一直到1938年7月底的那些考察经历¹：“无线电试验成功，我们还讨论如何增加箱子的防水性，并且翻遍整座城市寻找愿意尽快承担这项工作的木匠……昨天的食物订单还没定下来……除了整理东西和针线活，我们进行了讨论与对话。特别是与维拉尔取得必要的联系。选择性口，看看骡子是否可行。最琐碎的小事也会招来数不尽的麻烦事。”忙成一团的这伙人不停地记账，管理资金的进出，并给牛套上鞍轭。他们希望做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26：《迪娜的笔记本：圣保罗，1938年5月，乌提利提，1938年7月》。后面多条引文也是出自迪娜的笔记本。

到巨细靡遗：“扁担、皮包、泳裤、火柴盒、3000 公斤的食物（米饭、大豆、糖、盐、咖啡、巴拉圭茶、玉米粉、木薯粉、淀粉、饼干、胡椒等调味品、油、面条），以及来自圣保罗的物资箱里的肥皂、卫生纸、军需品以及喂食那些牲畜所需的玉米。”他们还准备了吊床以及堆积成山的药品，虽然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候都没有派上用场……

说《忧郁的热带》完全没有提到这次考察活动的内情是失之偏颇的。¹有关这次考察的细节就藏于字里行间，体现在讽刺的语气上，他的语气甚至像是荒诞地调侃这些必要的出行条件（描写牛的片段），将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描述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团非常繁重的前期准备工作、他们主要的资金保障（但他们还需要向保罗·利维请求更多资助，因为库亚巴的开支成本似乎比以前有所提高）、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总共二十几人）最终让这个科研项目顺利成行。这让我们联想到 19 世纪的伟大探险，比如，波拿巴远征埃及或者洪堡的科学探险。这些游走在民族志研究、生物学研究与自然研究边缘的探险活动集结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为的是完成用以建立博物馆馆藏的各种文件。这种进行广泛调查的模式让探险者在短期内深入了解他们的研究对象，让他们深刻地投入这个认知过程，完成一种“密集”的地域研究。在 1930 年代的法国，这种 19 世纪的探险模式仍是主流。由马塞尔·格里奥尔（Marcel Griaule）带领的达喀尔-吉布提考察团也是参照这种模式展开活动的。从公权力获得资助的他们像是一支学术特遣队，从西向东穿越了非洲，到处收集珍稀的花朵以备回到博物馆后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而英国人类学则

1 克利福德·格尔茨对此进行了分析，参见《文本中的世界：怎样阅读〈忧郁的热带〉？》（« Le Monde dans un texte. Comment lire *Tristes Tropiques*? »），载《这里和那里：人类学家作为作者》（*Ici et là-bas. L'Anthropologue comme auteur*），巴黎：梅塔耶出版社（Métailié），1996 年（初版时间为 1988 年）。格尔茨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消除了人类学实践中的一般规则，突出展示了一个“英雄模式”，对此表示批评。关于这一点，参见文森·德巴恩：《说明》，载于《忧郁的热带》，第 1686 页。

基于完全不同的地域研究规则，所以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才会花费几年时间独自一人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进行研究，最后完成了《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1922）。

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我们在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比尔·奎因（Buell Quain）身上看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投入，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在巴拉圭河上遇到了这个年轻人。比尔·奎因在库亚巴的时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在这儿，两人缔结了短暂的友谊。从纽约而来的比尔·奎因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将他交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让他在特鲁玛伊人居住的欣古地区（Xingu）独自进行几个月的研究工作。当时还有一些美国民族学家也在巴西进行实地考察：弗朗兹·博厄斯的学生查尔斯·韦格利（Charles Wagley）在塔皮拉佩人的聚居地，威廉·利普金德（William Lipkind）在阿拉瓜亚河卡拉雅人（Karaja）的聚居地。1937年夏天，列维-斯特劳斯也曾在卡拉雅人的居住地停留考察。迪娜·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比尔·奎因的样子有些“奇怪”，他自认为感染了梅毒，只因为他曾在里约与一位女士有染，所以便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苦修状态”。之后他将迎来悲剧命运：几年后，他在里约自杀身亡。1938年5月的库亚巴气温很高，孤云转瞬即逝，孤云下除了研究任务还有因学术研究而荡漾开来的波澜，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不能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学界大放光彩。¹

列维-斯特劳斯的考察团想要了解当地的情况以及印第安人的处境，因为这些情况也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变数。他们向龙东线

1 近年，比尔·奎因自杀身亡的神秘色彩启发了一位巴西作家贝尔纳多·德·卡瓦略（Bernardo de Carvalho）。他吸收了这个故事的灵感，创作完成了《九个夜晚》（*Neuf Nuits*），巴黎：梅塔耶出版社，2005年。

上电报站（帕雷西斯、朋特佩德拉、卡帕内马、乌提利提、茹鲁埃纳、南比克瓦拉、维列纳）的工作人员发送了一张问卷，向他们调查下列问题：（1）有印第安人居住在附近吗？他们是哪个部落的印第安人？（2）他们对人友善还是充满敌意？（3）他们会拿一些东西来以物换物吗？他们会主动要礼物吗？（4）他们常常来吗？（5）他们会说葡萄牙语吗？（6）他们穿得像经过开化的人一样吗？（7）他们的村庄在哪里？（8）他们会邀请文明世界的人访问他们的村庄吗？¹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他们士气大振，当有人发现印第安人出现，电报线上的通信员便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他们成为列维-斯特劳斯考察团成行与否关键的接头人。对所有人而言，上一轮屠杀和报复行为好像历历在目。这指的是1930年发生于茹鲁埃纳对新教传教士的谋杀。源源不断的不确定性让紧张的关系升温。在这场探险中，他们面对的是这片充满未知的土地，因此，他们面临着现实存在的危险。这便是冒险真实的一面。迪娜·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担忧：“冒险所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的‘南比克瓦拉人’绝对恶名昭彰。他们非常暴戾，有恶劣的大屠杀史。我不想冒生命危险，我想退出这场冒险。否则，这就不只是一场冒险那么简单了。”²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存在持有巨大的疑问，还对印第安人的性格抱有否定的态度，此外，旅程也不是一一规划好的，因为，路上的重重阻碍可能让旅程随时终止：“目前已经进入旱季。听说9月之后又将是雨季，10月，降雨量将会很大。可能我们还来不及步入回程就被大雨困住。然后，我们不得不一直待到明年。但针对这种突发情况，我们无法提前准备，我们既不可能准备食物，也

1 有关这份调查问卷，参见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另一个视角：北方山脉考察活动的日记》（*Another Look. A Diary of the Serra do Norte Expedition*），2001年，第50页。英语版仍由葡语版出版社（Ouro Sobre Azul）出版。这里引用的是英语版。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26：《迪娜的笔记本：圣保罗，1938年5月，乌提利提，1938年7月》。

无法准备药物，更别说其他东西了。这场旅行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天气的问题反而不那么困扰我了。”¹

这是一种意志消沉的状态，随着库亚巴的电报站点无限延续，这种状态便困扰着迪娜。红色斑点布满了她的身体。她似乎看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眼睛周围是闪烁的红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路西法之眼”，我们常常将带有化脓症状的眼部炎症比喻为“路西法之眼”。几个星期后，迪娜染上了眼部炎症，不得不从冒险中退出。她不仅对未来忧心忡忡，还对往事念念不忘。她在去巴西之前已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忧伤，她将这种情感上的危机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她称自己为印妮丝（Ines），“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并以伊曼纽埃尔（Emmanuel）指代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也是一名年轻的宗教信徒，还是一名革命者。他付出不懈努力，在诗歌、文学、音乐方面有所建树。他会成为著名作家、伟大的先驱还是默默无闻？”²迪娜对圣保罗发生的一切都十分在意：“在11号的报纸上，我发现文化处换了新部长。我不认识这位新部长。马里奥会去哪儿？文化处该怎么办？”³人生在虚构作品与货真价实的报纸之间发生转换，这清楚说明，这代年轻的知识分子需要文学，确切地说，需要小说这种表达形式，以尝试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变得模糊，尤其是当他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后，一切都得到圆满解决：“我只有一个愿望：出发、求胜、凯旋。我没有任何遗憾。没有这次冒险，我不知道远离圣保罗与巴黎后，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只是，我需要至少五年。[……]我准备好全身心投入，我只期待得到一个符号，我还不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它可能是旅程的起点，考察工作或者一段新奇、动荡但并不至于令人多愁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26：《迪娜的笔记本：圣保罗，1938 年 5 月，乌提利提，1938 年 7 月》。

2 同上。

3 同上。

善感的经历。”¹

相约乌提利提，踏上民族志研究之路

6月6日黎明，列维－斯特劳斯夫妇在卡斯特罗·法利亚的陪同下，乘坐卡车出发。事实上，此时，探险团已经失去了文化处的支持。文化处是他们主要仰仗的巴西政府机关，也是这次活动的资助方。因此，早晨，探险团沿着罗萨里奥公路向北动身的那一刻，它就几乎成为孤儿。

车队的搬运工和大部分人员提前一个多星期便已出发，卡车在距离库亚巴仅50千米的地方与他们会合。列维－斯特劳满腔怒火：“这是我第一次生气，但这也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发怒。在我深入探索的这个世界里，时间这个概念不值一提，我不得不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明白这一点。”²他们抵达的第一站是西罗萨里奥（Rosario Oeste）。这是一个千余人的小村落，“其中大部分是矮小且甲状腺肥大的黑人”³。唐巴多山脉（Serra Tombador）开始映入眼帘。路况十分糟糕，到处坑洼不平。在山顶一个叫作“开沙弗拉达”（Caixa Furada）的地方，控制杆的连接处发生断裂。卡车在荒野中停留了几日。其间，司机们向下一个村庄告知故障，并从里约获得了所需的零件。列维－斯特劳斯以一种豁达的心态接受“塞尔陶的天浴”，他是这样向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解释的：“我们猜到塞尔陶会给我们来一场‘天浴’，我们也因此获得狩猎的机会，并尝到再也无法被超越的美妙食物——南美鸚鵡汤、铠鼠炖菜、烤鹿肉和烤领西猯（一种介于野猪和刺猬之间的动物）——和可供畅饮的布里蒂果酒，这一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26：《迪娜的笔记本：圣保罗，1938年5月，乌提利提，1938年7月》。

2 《忧郁的热带》，第261页。

3 同上书，第263页。

切难道不是为冒险者俱乐部准备的盛宴吗？”¹卡斯特罗·法利亚拍了几张照片，记录了这段简短的插曲。司机们侃侃而谈，向他们讲述夜晚的故事。这是一些“《马库纳伊玛》（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小说）里关于狩猎、复仇和冲突的故事”²，让这段插曲变得温馨。卡车瘫痪之后，旅行的脚步停了下来。迪娜记了些笔记。头戴木盔（casque colonial）的克洛德则看着迪娜，心不在焉。6月14日，他们抵达帕雷西斯（Parecis）。此后，景色转变为沙土与高原，高原上布满矮灌木，而水流将高原分裂成几个部分。水向北流，汇入亚马孙盆地的塔帕若斯河（Rio Tapajoz）或者马德拉河（Rio Madeira）的支流。整个地区被称作帕雷西斯山脉（Serra de Parecis）或者北方山脉（Serra do Norte）。森林就像画布，装点着河流所在的这片土地，卡车则艰难地蹚过河水。它必须卸下重物后才能将之再次载上。当水下出现大片异常坚硬的砂岩，壮观的瀑布群也如约而至，其中包括萨克里河（Rio Sacre）的瀑布以及位于帕帕盖欧河（Rio Papagaio）沿岸乌提利提的大瀑布。经历了500千米左右的旅行后，6月16日，他们来到帕帕盖欧河。“我们瞧见河对岸有两具赤裸的身体，他们的主人是南比克瓦拉人。”³

三位民族学家在经历过眼花缭乱的一刻之后（卡斯特罗·法利亚也感受到并将之记录了下来），开始投入工作。二十几位隶属于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印第安人闻声赶来，他们被白人和礼物的气息所吸引。他们与乌提利提当地电报设备的护卫和茹鲁埃纳的耶稣会教士接触频繁。当探险团首次与南比克瓦拉人碰面时，其中一位传教士也在场，他鞍前马后，向探险团提供信息，在他力

1 1938年6月17日，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管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26：《迪娜的笔记本：圣保罗，1938年5月，乌提利提，1938年7月》。

3 《忧郁的热带》，第267页。

所能及的范围内教授他们南比克瓦拉语言的基本知识。因为，很快，第一个问题出现了。不同于此前接触过的任何一个部落，这群土著人中没有一人懂得葡萄牙语，也没有一人可以胜任情报提供的工作，任何形式的沟通管道都不存在。这让探险团心生恐惧，他们甚至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不幸的是，研究工作的开展难如登天。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位翻译，他们又完全不懂葡萄牙语，眼下，他们这门语言的语音系统又让我觉得如同天书。”抵达的第二天，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写信，从自己的笔记中寻找最乐观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南比克瓦拉人语言的旋律：“它的文字系统与欧洲人相近，它的旋律十分明确，遵循四四拍和五四拍。这让人联想到近代人记录下来的民间歌曲。”¹

另一边，迪娜观察女性南比克瓦拉人的身体，女性与男性一样，都赤身裸体，“乳房不大，但十分前倾，它们过早下垂，像是‘山羊乳房’”；迪娜观察木薯饼的烹调过程，以及纺织和耳环制作的技艺：“每天，我一吃完早饭就坐到印第安人中间去，为了观察他们，这样待上几乎一整天。既然没有翻译，不能规规矩矩地开展研究，这是唯一还能完成的事。”几天后，“我们努力工作，但毫无成果，因为，首先，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向他们提问，更不能了解他们向我们回答了什么。”卡斯特罗·法利亚观察印第安人张开弓箭的动作，拍摄了大量的照片；6月19日，他们打开留声机，让印第安人听着十分高兴，他们还给印第安人画纸，但南比克瓦拉人在纸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同一日，维拉尔乘坐第二辆卡车与他们会合，而牛肉与骡子则于7月9日才抵达，晚了足足15天。此后，卡车则被骡子所取代，变得一无是处。维拉尔以医生的敏锐眼光发现了一种眼部疾病，它与一种微型的蜜蜂（*Melipona ducki*）有关。这种被称为“夺目蜂”（eye-licker）

1 1938年6月17日，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管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的毒蜂寄生于眼睛之中，并传播疾病¹；夜里，南比克瓦拉人赤裸着躺在地上睡觉，以灰为被。维拉尔观察到的各种各样的皮肤病都是这样来的吗？作为当地草药的大专家，他克服挫折，成功提取箭毒，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箭毒是南比克瓦拉人的工具，他们善于用毒，并因此声名远播。6月30日，一只狗被维拉尔用来测试他提取的箭毒，最终窒息而死。“手术”成功了……

出行初始阶段就出现的普普通通的眼部感染在几周后恶化为具有传染性的化脓性眼部炎症。印第安人首先受害，然后，一些赶骡人也中了招，最后，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也受到感染。感染初期，迪娜还企图就地取材进行治疗，7月22日，她不得不从探险团中退出。她的丈夫陪她回到库亚巴，此后，她被独自送回圣保罗，最后送返巴黎。她的病情要求她接受持续治疗。她永远离开了马托格罗索州，与巴西、民族学和她的丈夫永别。但这是另一段故事。这期间，卡斯特罗·法利亚与乌提利提的南比克瓦拉人赶到茹鲁埃纳。8月1日，从库亚巴折回的列维-斯特劳斯和维拉尔也来到此处，与之碰头。在这里，探险团观察土著人如何开展“贸易”。其间，卡斯特罗·法利亚却成为眼炎的下一位受害者，维拉尔则承担起治疗的责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片灾难之地唯一的“幸存者”撤离到坎普斯诺武斯，孤独地度过十五天左右，与他做伴的是两队南比克瓦拉人。起初，南比克瓦拉人几乎不为列维-斯特劳所动，但在南比克瓦拉人与之相伴的日子里，他还是收获了全新的观察结果。最后，他在维列纳（Vilhena）又待了10余日（9月4—18日），与另几对南比克瓦拉人为伴。接近3个月的田野考察之后，南比克瓦拉部落探险环节在此时迎来尾声。

1 1939年4月2日，《马托格罗索州考察报告（由维拉尔医生撰写）》（« Rapport du Docteur Vellard sur la mission de Mato Grosso »），报告的对象是让·马克思。参见外交部档案，法国海外事务局，巴西档案，1932—1940年，第440卷，共56页。

一开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他所看到的贫穷景象深深撼动。南比克瓦拉文化缺乏美学的诱惑，这似乎是可悲又可叹的。他的第一印象“眼见非实”，他向马塞尔·莫斯解释道：

“这些人组成小团队，穿梭于沙地上的灌木区，猎捕蛇类、蜥蜴和蝙蝠，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澳大利亚。他们又好像告诉我们，除了不成形的村庄，他们还拥有精心照看的花园。同时，他们的物质文化十分贫瘠，这一点在南美洲独一无二；他们的集体生活十分惬意，个人生活则有诸多条条框框，拘谨得多。”¹刚开始，他没有发现任何趣味，既没有美学上，也没有宗教仪式上，更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趣味，这是他给我们的印象：没有漂亮的陶器，也没有惊艳的手工艺；没有阳具套，也没有令人啧啧称赞的羽毛帽；没有复杂的仪式，也没有社会规范或者复杂的亲属规则。与卡杜维奥人和博罗罗人不同的是，南比克瓦拉人带着这位民族学家认识贫穷，即南比克瓦拉人的贫困现状。尽管如此，列维-斯特劳斯仍然“兴致盎然”，他在给莫斯的信中如此总结道。他开始工作，记事本里满是与语言有关的笔记和词汇总结。这些笔记说明，他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这门构成交流障碍的语言。生活在南比克瓦拉部落的男男女女中间，渐渐地，他被征服了。这是一个渐生好感的过程，难以建立于几个步骤之上，但或许，透过三个强大的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端倪。在整个人生漫漫长路上，人类的萌芽阶段、奇妙的相遇、“人类的柔情”作为三个标签，不断传递着南比克瓦拉部落考察带给列维-斯特劳斯的冲击。

博罗罗部落和卡杜维奥部落被定义为“文明社会”（*société savante*），而“南比克瓦拉人让这位考察者自觉地、错误地将南

¹ 1938年7月7日，从乌提利提给马塞尔·莫斯写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档案盒编号181。

比克瓦拉部落标记为人类的萌芽阶段”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变负为正：物质文化和社会被分解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他以此为出发点，寻找最基础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是他一生都在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他始终抛开那些有关文明社会的问题，因为文明社会过于复杂，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社会形态。基础社会构成了模型，而南比克瓦拉部落就是一个样本。基础社会从缺陷所形成的异域风情中获取启蒙的力量。列维－斯特劳斯特认为，美洲盆地研究的优点之一在于，它不同于非洲研究等地域研究：“我和我的同僚们在南美发现的素材与非洲研究学者发现的东西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换句话说，相对较大规模、具有复杂的组织形态的社会形成了国家，拥有司法工具和警察力量。而我们在南美发现的社会人口较少，它们带给我们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学体验。首先，我们必须赶赴非常偏远的地方才可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并且跨越语言的障碍。我们有些像是天文学家，探索着与我们遥遥相望的星体，而我们仅仅得知它的几个最基本的属性。在这些规模极小的社会里，某些机制 [……] 联姻、婚姻的规则以及其他类似规则显得尤其重要。”²

南比克瓦拉人引导列维－斯特劳斯特寻找最基础的社会形式，他们彻底满足了列维－斯特劳斯特对第一次人类学考察的幻想。每当列维－斯特劳斯特读起对他个人而言具有启蒙意义的让·德·雷瑞，他的幻想便不断鲜活起来。南比克瓦拉人极少接触到白人访客，这点与博罗罗人不同。纪录片制作人马塞洛·弗达勒萨·弗洛勒斯（Marcelo Fortaleza Flores）在1938年乌提利提一带发现了一位年方10多岁的孩子，名为迪托（Tito），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还被其称为“马斯默·列维”（Massimo Lévi）。据他证实，

1 《忧郁的热带》，第271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与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的访谈，拍摄时间为1985年。影片拷贝保存于圣保罗大学人类学图像与音像实验室。

列维-斯特劳斯是他父母见到的第二位白人男性，20年前，他们见到的首位白人男性是龙东元帅。¹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科学幻想中，见“文明人”所未见之事物、体验文艺复兴先驱者之处境是常有的事。在后来与蒙蝶人（Mundé）的接触中，这个强烈的求知欲继续驱使他。蒙蝶人“从未被任何文献提及”²，这使列维-斯特劳斯的眼里充满纯真的渴望，渴望让他产生幻想。但他也没有忘记横亘在眼前的“天堑”（*cercle infranchissable*）³：缺少沟通渠道意味着他无法听懂他们的语言，但这已经说明这个部落有些保守。“我原想不断探索，直到认识蛮荒世界的所有细枝末节。在我之前，从没有人见过这些可爱的土著人，在我之后，也许不会再有人见到他们，我身处他们中间，感到万分满足。一段令人欢欣鼓舞的水上之行结束时，我发现了我的野人们。可惜的是，他们真的过于‘不谙世事’。[……]他们如此靠近我，就像是镜中的影像，我虽然能够触摸，却无法真正理解。”⁴

最后，与南比克瓦拉人一同经历日日夜夜之后，列维-斯特劳斯似乎被和蔼可亲、安闲自得、豁达大度的南比克瓦拉人以及他们的合作意愿征服。而人们却曾告诉他，南比克瓦拉人凶狠又嗜血。作为优秀的民族学家和莫斯的弟子，他关注南比克瓦拉人生活中四溢的情色氛围，捕捉公开挑逗的大胆行为与孩子们洗澡的场景，聚焦年轻妇女们的童真、南比克瓦拉人对动物的博爱、父母对孩子的慈爱（孩子们从不会受到惩罚）以及幸福美满的集体生活。在列维-斯特劳斯那时的笔记中，有一段话以午夜对话的口吻强调了南比克瓦拉人集体生活的幸福指数。《忧郁的热带》将之原原本本地收录其中：“在黑暗的

1 马塞洛·弗达勒萨·弗洛勒斯（Marcelo Fortaleza Flores），纪录片《走进亚马孙流域：跟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脚步》（*Après de l'Amazonie: le parcours de Claude Lévi-Strauss*），2008年，52分钟。

2 《忧郁的热带》，第348页。

3 同上书，第32页。

4 同上书，第349页。

草原上，营地火光闪烁。火源是对抗阵阵凉意的唯一武器，在火源周围，棕榈叶和树枝组成的迷你屏风仓促就位，替我们挡风遮雨；背篓里装满了破旧的玩意儿，它们是土地的财富；他们席地而睡，与这片土地周围其他同样好战和懦弱的部落为邻，夫妻之间紧紧相拥，相濡以沫，为了对付日常难题和忧伤情绪，互为唯一的慰藉。忧伤时不时占据南比克瓦拉人的灵魂。这位来访者与印第安人一同在灌木区‘露营’，完成了他的初次体验。面对南比克瓦拉人，他陷入焦虑之中，并对他们产生了怜悯之心。这些人一无所有，在这片险恶的土地上遭受着天灾的摧残，似乎已经透不过气来，他们浑身赤裸，在摇曳的火苗旁直打哆嗦。他小心翼翼地来回穿梭于灌木丛中，害怕弄伤了手掌、手臂或是身体，火堆的微光照在他的身上，给他染上了温暖的颜色。然而，这些苦难在低声交谈和阵阵笑声中变得暗淡无色。夫妻拥抱在一起，像是陷入对天生的另一半的怀念之中；他们互相爱抚，即使陌生人经过也不中断。似乎，他们都无比慈爱，并远离忧愁，像动物般容易且乐于满足，他们充斥着这些不同的情感，以最动人、最真实的方式表达着人类的柔情。”¹

埋头苦干的民族学家

田野调查留下的笔记本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探险旅途中这段由南比克瓦拉人带来的民族志经历。这些笔记本小巧，其中一部分得到了良好的保存，另一部分分散成页，它们是研究工作留下来的脆弱的痕迹。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是民族学家的档案，是供后期解读的黑匣子，也是一段奇妙同居生活的记忆。²

列维-斯特劳斯时常坦承，他的笔记“过分缺乏条理”³，

1 《忧郁的热带》，第292—293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巴西考察的笔记，现被保管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个人资料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20-125。下面的引文也出自他的考察笔记。

3 参见文森·德巴恩：《说明》，载《忧郁的热带》，第1687页。

它轻率地融合了水手日记和各种信息。10余页词汇表、多张语言学习卡（有时散落一旁）、发音方式的记录与乐谱的记录（乐谱的存在十分重要，它们说明列维-斯特劳斯对民族音乐兴趣浓厚，同时，也证实了他的音乐素养）、大量素描与图表（村庄地图、以翻花绳游戏中手掌和身体为主题的素描、以各种猴类为主题的素描，其中包括佐格佐格、楚西乌、瓜里巴、巴里古多）、植物、屋顶的角度、带有文身痕迹的面庞、竹子捆绑工具的编织图、参考文献、阅读笔记（他正在读罗凯特-平托于1935年出版的《朗多尼亚州》）、数量不菲的亲缘关系图、一些行列对查表以及几项人体测量数据也一并存在于他的笔记本之中。书写性质迥然不同的文字同时存在：“妇女保持蹲姿，双手握着一根木头的一端，木头垂直而立，她以此方式进行分娩。滚烫的木炭将脐带从根部烧断，再敷以对付炭火的药膏”，这是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式；“解手(tarnikititta)是这样进行的：他们用手在沙地上挖出一个洞，并蹲在洞的上方，此时需要一段竹子，他们试着握着竹子的一端，将它对准肛门，让竹子往下往后延伸”；他以社会学的角度描述采集橡胶树汁的工人“赛林盖格”(seringueros)、他们的工作时间表、汁液的存储量、被砍伐的橡胶树的数量与橡胶每公斤浮动的售价；对人口的记录则显示，印第安人的消亡不可避免；身临其境，他写下俳句：“库亚巴-罗萨里奥(Cuiabá-Rosario)：一头栗色奶牛以及从其嘴角向容器奔流而去的浅绿色液体/草原被点燃后刺鼻的味道/布罗塔斯之后的火山岩”；天气千变万化，“雷声响起，天暗了下来，我们发现，雨柱垂直而下，将一半的景色遮了起来。雨快来了吗？”“伴随着日出，一天开始了。阳光一缕，浮云几片；外出、归来、犯错、弥补。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让白天过得充实”。我们还在他的本子里发现了“为一部未动笔创作的小说而留下的笔记”，根据笔记，名为普拉东(Platon)的男子与名为奥迪尔(Odile)的女子生活于1920年代动荡的巴黎，

他们互相依靠，挣扎着在南美洲生存下去。故事里融合了康拉德与《阴谋》作者尼赞的影子，让他获得几分解脱。最近几年的复杂经历（政治、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进行的历险、时代背景下的恐慌（战争）、政治活动（政治阴谋与军火走私）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在寂寞时分大胆幻想过的声色犬马与放浪形骸，千丝万缕，共同织成了这个故事。他的笔记本中，亲缘关系图、语言笔记与图像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不仅如此，这些本子具有多重价值。本子的外观之美是一个方面，它们不仅颜色丰富，还沿袭了巴洛克风格，绘画练习册与学术记录卡片则体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能力。一个投入田野考察的民族志学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些本子还说明，本次探险属于真正的民族志之旅，而非哲学漫步。在此之前，曾有人宣称，民族学家的工作应当更多依靠推测而非仰仗经验，他们认为前者与后者无法并存。尽管记录一切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被列维－斯特劳斯敏锐的观察力、他对外形等术语深入细致的注释、投射于现实世界一草一木的强大注意力折服：物质的外观、符号体系、环境、人的理想都被他以昆虫学家一般的嗅觉捕获。他创作了大量图像，并与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使用 Contaflex 相机）同步拍摄照片（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使用的是徕卡相机与型号为 6×6 Voigtlander Superb 的相机），以保存田野工作的成果。两人拍摄的照片集却存在令人诧异的区别，以至于这些不同之处常常被后人提起。一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拍摄的照片集）艺术性极高，主角是印第安人，他们单纯的存在便足以成为相片的焦点，存在于世界之中就是美的，尽管不乏痛苦，他们的存在还被永远记录于《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另一方（卡斯特罗·法利亚拍摄的照片）则记录了考察工作背后的细枝末节、印第安人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全体考察团成员的身影以及各种交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卡

斯特罗·法利亚的作品建立了更加深刻的联系，因为它们以“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这些民族志考察工作的过程。照片里有什么呢？“我们发现，例如，《忧郁的热带》收录的照片可能让读者以为，拍摄地是一片广袤的草原，而事实上，这些拍摄场景与电报站所处的方位仅一步之遥。”¹十分明确的是，在这类移动的考察团中，中间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此例中，传教士、电报线的从业者以及开化的印第安人担任译介。考察的前一个阶段因为他们的加入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一个阶段，失去了这些译介的探险团惨遭失败，至少，他们碰上不少钉子。例如，在蒙蝶部落时，列维-斯特劳斯为语言不通的难题所扰，又如之后，在图皮-卡瓦希伯部落（Tupi-Kawahib）时，他的行程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而提前结束。事实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巴西的民族志研究只发生于印第安人部落与他们有幸遇到的“其他部落”的相交地带，这些相交地带的地理面积十分有限。贝诺瓦·德·莱斯图瓦勒指出，与同时期对非洲的考察相比，对马托格罗索州的考察脱离了法国殖民政府的保护，更糟的是，考察团不得不面对巴西政府打着保卫国家财产的口号而采取的吹毛求疵、疾言厉色的态度。总之，条件极度不利于考察。

“田野”里的生活水深火热。这样的生活不仅是年轻力壮的民族志学者们渴望的启程仪式，也是他们为了舍弃原来的世界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而四项巨大的考验让他们雪上加霜：疾病、抑郁、疲倦与危险。抵达乌提利提时，迪娜发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腹股沟部位出现渗出性湿疹”。疾病，作为众多足以证明实地考察艰难程度的指标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战争一般的破坏力：化脓性眼部炎症具有传染性，除了列维-斯特劳斯，

1 《他者的诱惑：从殖民展到原始艺术》，第170页。关于卡斯特罗·法利亚拍摄的照片，参见米歇尔·佩兰（Michel Perrin）：《交叉的视角》（«Regards croisés»），《人类》第165期，2003年1—3月，访问时间为2012年11月（2008年3月27日起，数字版可供访问：<http://lhomme.revues.org/index15782.html>）。

考察团的所有成员先后受到感染。也许是列维－斯特劳斯佩戴的眼镜让他躲过一劫。这是一场大灾难。迪娜感染了严重的炎症，离开这片战场时，已是半盲状态。身体治疗与食物一样都是必需品。然而，尽管精心筹备，有时，粮食仍供不应求，因此，像维拉尔说的，是考察活动无法摆脱的基本条件之一。食物不足与睡眠不足折磨着他们。但更坏的是，这片土地会突然瘫痪考察活动，让考察日程延期，让他们步履维艰或停滞不前。这些挑战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多次露出不耐烦的表情，缺乏耐心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还体现了冒险游戏获得荣誉之前苦涩的那一面。时间就这样流逝！这位民族志学者不断叹气。无事可做时做些什么呢？“我们等啊等，原地顿足，来回打转；我们重阅旧笔记，抄写下来并给出解释；或者，我们荒谬地履行职业责任，命令自己完成一项内容丰富却毫无意义的任务，例如，测量房屋之间的距离、逐一清点树堆的数量——树堆曾被用来建造简陋的屋子，而屋子已经闲置许久。我们进行反思：我们来此做什么？怀揣着怎样的希望？目的是什么？民族志调查究竟所指为何？”¹1938年8月15—30日，列维－斯特劳斯一人留在坎普斯诺武斯（Campos Novos），其间，低落的情绪席卷而来，让他深陷其中。被迫虚度年华让这段记忆特别鲜明，而攀比的心态持续造成不悦：“我离开法国快五年了，我放弃了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比我资质高的同伴们获得了更高的职级；像我曾经那样投身政治的朋友们今天已经成为众议员，不久后将位居部长。而我呢，穿梭于荒漠之中，追踪人类的破烂玩意儿。”²比较的结果令人不悦，而事实上，比较的对象有误。因为，据我们所知，列维－斯特劳斯从未“终结”他的大学教学生涯。巴西的经历反而给了他直接登上大学讲台的机会。田野调

1 《忧郁的热带》，第403页。

2 同上。

查是他博士论文的敲门砖，而博士论文允许他在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快速寻得教职。当他进入大学任教，他的同辈还在外省的高中任教，碌碌无为。然而此刻，他感到孤独无依，这种情绪十分强烈，占据了他的心灵。戏剧作品《奥古斯都的神化》（*L'Apothéose d'Auguste*）也是在这期间创作完成的。列维-斯特劳斯在愤怒与沮丧中写下这个剧本，以此反映他当下的经历。¹但这个无所事事的阶段并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他得以纵观整段民族志研究经历，回顾走过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揭露真相的危险时刻。一些人，例如，比尔·奎因等人，未能摆脱噩梦。这份职业造成了不少自杀事件。

无法掩饰的防备心理与野外一触即发的真实危险两者共存，孤独让前者更加有形。与南比克瓦拉人一道时，列维-斯特劳斯也陷入这种困境之中，尽管这些土著人表面上态度友好。他曾讲述一段故事，故事意在说明，这种随时可能逆转的友好氛围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殆尽，让人始料不及，取而代之的是厄运，因为一旦沦为他们眼中的侵略者，生命将在顷刻间结束。在圣保罗时，列维-斯特劳斯一行曾以一些大型的彩色热气球作为庆祝圣约翰节的道具，而后它们成为列维-斯特劳斯个人行李的一部分，同他一起旅行。某天晚上，他突发奇想，想要在印第安人面前进行热气球表演：“第一个热气球在地面上着了起来，引发开怀大笑，观众们似乎丝毫察觉不到它本该呈现什么效果。第二个热气球则获得巨大成功：它快速升起并飘入高空，直至距离让它的火焰有了星星的模样，它在我们上方飘来又飘去，许久之后消失不见。起初显露的喜悦却为其他情绪所替代。”²婴孩般的欣喜之情转变为男性公开的敌意和女性的惊恐反应。这场意外完全

1 原文被收录进“七星文库”：《〈忧郁的热带〉之外》（« En marge de *Tristes Tropiques* »），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第1632—1651页。

2 《忧郁的热带》，第291页。

可能以悲剧收场。我们知道，田野作业不只是收集数据，还包括实践、实验以及场景演练。我们期望从场景演练中获得启发，为此，我们无须精心计算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乌提利提一带的酋长（chef de la bande d'Utiarity）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召集了南比克瓦拉的不同部落。这些部落以传统集会的形式聚在一起，列维－斯特劳斯特则是这次集会的受益者。他希望透过集会观察在一个更大规模的社会中，交流与协商是如何开展的。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从茹鲁埃纳出发，两天后，来到75名左右的南比克瓦拉人面前。¹在此之前，他注意到，如果给南比克瓦拉印第安人纸和铅笔，他们会模仿书写的手势，写下曲折的线条。集会夜晚，趁着赠送礼物的时机，酋长从他的背篓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一些“纠缠的曲线”，他的亲笔创作。他激情洋溢地朗读起来，结束后，将礼物送到每一位主人手上。在这个出乎意料的剧情面前，民族学家错愕失色。这让他深刻反思文字的政治功能。他意识到，文字首先是一种统治工具，其次才是一种人造的记忆或者一种学习工具。于是，他得出一个反传统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文字表达的首要功能是方便奴役。”²

整理田野工作的难点与工具是一门必修课，是民族学家为自己设下的考验。为了完成对两者的总结，让我们转而观察工作氛围的变化。一种更加轻松的氛围出现了。这不仅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难题，甚至是一种必须避免的职业禁忌。列维－斯特劳斯特提到，南比克瓦拉社会里弥漫着情色的味道，因为，男性与女性成员都赤身裸体，毫无掩饰；他将南比克瓦拉人的情爱游戏描写了下来，在他看来，这些情爱游戏“更多出于娱乐和情感需要，而不是出于肉体需求”，因为他从未发现男性发生勃起，他从民族学家的

1 75名南比克瓦拉人、17个家庭和13间简陋的屋子：参见《忧郁的热带》第28章《写作课》。《写作课》描述了写作的诞生以及写作行为本身的政治功能，后来，雅克·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对之进行了批评。

2 《忧郁的热带》，第300页。

角度思考不同社会中羞耻尺度的相对性以及眼前这些社会中“规范”的全新含义。尽管如此，他仍清楚表达了自己烦恼之事：“因此，想要对一两位在沙地中摆弄身姿的漂亮姑娘保持无动于衷是十分困难的。她们像蠕虫一样光溜溜的，也同样在我的脚下扭动身体，发出阵阵痴笑。每当去河里洗澡，我常常被她们的撩拨弄得不知所措。她们有六七人，既有妙龄女子也有半老徐娘。她们一心想要从我手中夺走肥皂，她们对肥皂喜爱得不得了。”¹因此，除了疾病、饥饿与饥渴，民族学家的身体还受到另一件麻烦事的折磨。直到何时他才可能开窍呢？民族学家与土著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不被容许的吗？柯特·尼姆衍达朱与一位印第安人女性育有多子。这仅是个例。在《幽灵非洲》（*L'Afrique fantôme*）里，米歇尔·莱里斯说道，在埃塞俄比亚时，他曾迷上名为“爱玛维伊诗”（Emawayisch）的女子，虽然女子被恶魔附身的母亲是自己的考察对象。²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忧郁的热带》记载的只言片语只是为了对那些烦恼表达看法，他可不想去解决问题。身为民族学家，他反而落入南比克瓦拉年轻女孩们的手中，成为她们的玩伴。这让民族志研究中的主客关系颠倒过来。亲密的距离、对等关系，这些规则颠覆了他的情欲观和道德观，让身为欧洲人的他感到不可思议。尽管与列维-斯特劳斯表现得不同，维拉尔也因这些日常的挑弄而惊惶失措。这一点却似乎燃起了列维-斯特劳斯心中的怒火。他向日记倾诉，指责天主教的教育害人不浅。他在同伴身上发现，天主教的教育阻碍两性关系中肉欲的释放与和谐关系的建立。³在倾诉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情爱”和“自由精神”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与其疑似新教的表象彻底切割，表现得十分敏锐。

1 《忧郁的热带》，第284页。

2 参见乔治·德韦鲁（Georges Devereux）：《焦虑与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De l'angoisse à la méthode dans l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980年。

3 《笔记（已装订、无封面）：考察活动的最后阶段》：“巴西”主题档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25。考察笔记共计三本。

旅途告一段落，下一站是亚马孙流域深处

维列纳的旅程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考察活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不确定因素又多了些，例如，行程安排没有完全确定下来。雨季又增加了考察活动的危险系数。雨季开始后，选择回头路已经变得不现实了。从皮门塔布埃努（Pimenta Bueno）起，考察团只剩下三名学者：列维 - 斯特劳斯、卡斯特罗·法利亚以及维拉尔。同时，列维 - 斯特劳斯被南比克瓦拉族的礼物卢辛达（Lucinda）缠上了，小猴子卢辛达紧咬着他的靴子不放。考察团一行主要借助水路前进。驴和牛组成的车队部分存活了下来，并踏上了回程路，它们在富尔亨西奥的驱赶下，回到了乌提利提。景色徐徐变化，当主角们向北移动，亚马孙流域的样貌日渐清晰。特雷斯·布里提斯（Tres Buritis）的棚屋便已建于木桩之上。相比高原，人们更容易获得粮食补给（大米、菠萝、玉米和木薯）；由于动植物种类的变化，河流沿岸十分适合捕猎，其中包括野猪、鹿、獾、南美大鸮以及其他种类的鸮等。¹9月的部分日子里，他们忙于赶路。10月1日，他们抵达皮门塔布埃努。列维 - 斯特劳斯想要接触印第安人，“（他想）往这个方向前进，确定南比克瓦拉部落领土的范围，如有可能，研究一下图皮杜吉（Tupi du Gy）一族。我们没有一点办法知道这一族人是否仍然存在”²。

六位为电报线服务的图皮族印第安人（Tupi）使这些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考察活动的末期，列维 - 斯特劳斯发现了两个不同的部落。然而，他的希望一一落空。一行人顺着皮门塔布埃努河（Rio Pimenta Bueno）启程，五天后，发现了第一个部落。短桨发出的声音为旅程伴奏，而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划桨的动作不能碰上河岸的树枝，否则，将会遭受蚂蚁叮咬。10月9—15日

1 《马托格罗索州考察报告（由维拉尔医生撰写）》，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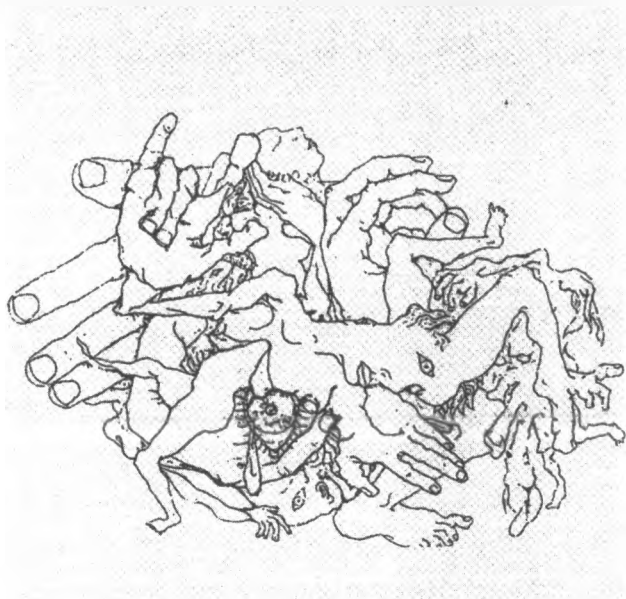
2 同上。

的六日间，他们在蒙蝶部落稍作停留，蒙蝶人还从未与白人打过交道。这些印第安人没有保留任何毛发，他们在保持卧姿的时候，借助木柴烧去了头发。他们还对自己的身体特别留心。他们的语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尤其在如此短暂的驻足期间，对话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等于建造巴别塔。于是，他们折回皮门塔布埃努。维拉尔身染疟疾，所以提前赶往乌鲁帕（Urupa）。列维-斯特劳斯和卡斯特罗·法利亚则在五人的陪伴下，顺着马沙杜河（Rio Machado）而下，10月27日，抵达图皮族的领地。他们受到了十分亲切的对待：图皮族人正准备离开村庄，民族学家一行的友善来访迫使他们中途折返。第二天，同行其中一人擦枪走火，痛失多根手指。他是艾米迪奥（Emydio）。卡斯特罗·法利亚陪他赶往乌鲁帕，维拉尔可以为其提供治疗。列维-斯特劳斯留了下来，与图皮族人共度了几日时光。村落里人不多，刚刚超过二十，他们生活于多配偶制下，遵守着十分复杂的宗教信仰，组成了一个神秘的社会。列维-斯特劳斯想要一探其中的奥秘。他发现，这些印第安人讨厌烟草，与南比克瓦拉族正好相反。结束逗留前，村落酋长还表演了“鬼上身”（possession）的轻歌剧《贾皮姆的闹剧》（*La farce de Japim*），剧情要求他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演出持续了两个晚上。而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些内容一字不落地记载于笔记本上。“在第二段尾声，塔普拉西（Taperahi）（酋长）从他的吊床上突然起身，开始毫无规律地走来走去，讨要‘卡乌安’（cahouin）¹，嘴里吟唱持续不断；他是被‘附身’了；突然，他抓起一把刀，冲向他的‘大房太太’坤阿兹因（Kunhatsin），后者几乎无处可逃，不得不往森林寻找掩护，此时，其他男性族人将其控制起来，强迫他回归吊床；一躺下，他便进入了梦乡。”² 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考察就在一种悲喜剧的氛围中结束了。随着杀人的最后一幕落幕，考察团也实质上迎来尾声。³

1 一种印第安人用玉米制作的发酵酒。

2 《忧郁的热带》，第379页。《忧郁的巴西》里出现的主角的照片，第193—197页。

3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105页。



艾米迪奥发生意外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完成了此画。他在《忧郁的热带》里写道：“早餐时间，我们注视着维拉尔如何从艾米迪奥的手里取出碎骨片，然后慢慢将它们拼接回去。这一幕既让人觉得恶心又让人深深着迷，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幕就像是森林，充满各种生命形态和数不尽的威胁。我开始以自己的左手为模型作画，我画的是各种各样的手，它们从扭曲的身体里探出来，像藤蔓一样纠缠不清……”

所有人在乌鲁帕重逢。马沙杜河边，一艘机动船正在驶来的路上（他们没有记录这艘船抵达的日期）。15天里，他们苦苦等待，除了钓鱼，还对四周探索了一番，因此，得空看清了一批又一批橡胶汁采集工的悲惨生活。在橡胶汁全球流通不畅的情况下，赛林盖格们的生活水深火热。疲惫是所有人的共同感受，而疟疾也十分猖狂。维拉尔与卡斯特罗·法利亚发生了口角，几个月共同生活累积下来的所有不满引发对峙，两人上演了终场的唇枪舌剑。当11月27日船只抵岸时，唇枪舌剑也就谢幕

了。¹他们顺流而下。旱季开始后，饮用水储备不足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一路上，风景美不胜收，一座座小岛数不胜数，引人注目。整个考察活动期间，卡斯特罗·法利亚坚持称呼列维-斯特劳斯为“列维老师”，此刻，他终于鼓起勇气唤其为“克洛德”。²时不时地，他们还能看见印第安人受人雇用，三五成群下地农耕的场景。这次考察之行的每个阶段，列维-斯特劳斯无不触目伤怀，他眼里，印第安人所剩无几，20年前人丁兴旺的景象已是一去不复返。他的同伴们也与他想法一致。他们认为，这是印第安部落的幸存者，为此，当考察结束时，情绪十分低落。最后的印第安人，或者说，夕阳西下的亚马孙流域的幸存者。取代英雄和开拓者的是一群“可怜人”³，他们“偏离常规的行事风格与看不见希望的人生”⁴让人体会到其中的苦难。这种苦难让人敬而远之。

马沙杜河在卡拉马（Calama）与马德拉河汇聚。他们抛下了原来的小船，乘上一艘小型蒸汽船。取代卡娜玛丽（Cannamary）的是瓦提冈（Vatican），后者舒适得多。几天后，也就是12月7日，他们抵达韦柳港（Porto Velho）。这儿有近四千人居住，还有一种“英式风格”。英国人建造铁路之后，将这座亚马孙流域的港口变为了自己的自治领（dominion），同时，英式村屋和下午茶成为这里的一道风景。12月11日，维拉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向当地的运输公司借了一艘船，登船来到巴西边境，随后，飞回了库亚巴。卡斯特罗·法利亚借助水路回到里约，在亚马孙流域绕了一圈，途经玛瑙斯（Manaus）和贝蓝姆（Belém）两地。自第一次抵达库亚巴后，列维-斯特劳斯历经9个月再次回到这

1 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另一个视角：北方山脉考察活动的日记》，第185页：“在整个旅行过程中，他坚持自己的作风，使自己与众不同。而由于我们的领导者完全没有威严，也没有热情，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局面。”

2 同上书，第192页。

3 《忧郁的热带》，第383页。

4 同上。

里。他到南比克瓦拉村落找回了卡车。卡车载着民族志研究的一系列藏品，以圣保罗为目的。它们将成为法国与巴西双边交流的成果。1938年5月，列维 - 斯特劳斯离开圣保罗，1939年1月12日，他重新回到这里。

他是“印第安部落的哲学家”？

巴西之“旅”刚刚收场，却还有下文。考察活动在结束之后常常被当作抨击的对象。主人公急于标榜自己是“学院派”，这也是引起负面评价的原因之一。2001年，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出版了他在第二次考察期间的日记《另一种视角》（*Um Outro Olhar*），又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这场舆论风波以及其他种种迹象都表明，巴西人对列维 - 斯特劳斯的田野研究褒贬不一。

卡斯特罗·法利亚的“另一种视角”

1988年，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80岁寿辰之际，卡斯特罗·法利亚已向《解放报》公开了考察活动的细节，马修·蓝东（Mathieu Lindon）负责与之对话。《解放报》希望重新审视这次巴西考察：

“这次考察是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成为大民族学家所付出的汗水。但我们说，他并没有‘该有的那种样子’。他语言不通，远离文明与自己的舒适生活还让他感到厌倦。他不与外人袒露心事，并且沉默寡言。他既没有与维拉尔，也没有与我建立深厚的友谊。我们完全秉持个人主义作风，自己写好自己的笔记。维拉尔一点儿也不清楚列维 - 斯特劳斯笔记的内容，反过来也是一样。对一名巴西人来说，这种经历则有不同的意味。其实，考察的目的更多的是出游而不是田野研究：连月的奔波准备就为了与土著人交际片刻 [……]。列维 - 斯特劳斯难以接受这么令人不适的生

活条件。一路上疲于奔命，他受够了这一切。他是货真价实的‘印第安部落的哲学家’。”¹“如果迪娜还没离开的话，结果会大不同，”卡斯特罗·法利亚补充道。他暗示“迪娜有类学家的潜质，而她的丈夫则对田野工作水土不服”²。说到田野工作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会有巴西人不约而同地贬低克洛德·赞扬迪娜，这种现象今天依旧存在。迪娜似乎给卡斯特罗·法利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待卡斯特罗·法利亚热情、友好，克洛德则冷如冰霜。待迪娜·列维-斯特劳斯踏上归程、与丈夫分道扬镳后，她对民族学的热情烟消云散。在一段视频采访中，她表示从未将之作为一项事业，她只是追随另一半而已。³她还记得考察过程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她根本无力承受，第二次考察开始不久后就败下阵来。她后续的职业生涯也是证明。迪娜已经重新变为迪娜·德雷福斯，1945年后，她先是担任文科预备班的老师，而后成为哲学课总督学（inspectrice generale de philosophie），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活动的一线。其中包括了1960年代教育电视台的一档电视节目，节目期间，哲学家们（整个哲学界都是座上宾，其中不仅包括乔治·康吉莱姆 [Georges Canguilhem]、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让·伊波利特 [Jean Hyppolite]、保罗·利科 [Paul Ricoeur]，还有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让-克洛德·帕斯隆 [Jean-Claude Passeron]、让-皮埃尔·韦尔南 [Jean-Pierre Vernant]、米歇尔·塞尔 [Michel Serres]）参与多人对话或者圆桌讨论环节，青年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则常常担任采访者。那些年，迪娜·德雷福斯成为哲学教育的标志性人物。这并不是因为她学术成果显著，而是因为她

1 马修·蓝东：《〈忧郁的热带〉任务》。

2 同上。

3 安娜-玛丽·佩西（Anne-Marie Pessis）为“人类学发展史（巴西篇）研究计划”（坎皮纳斯州立大学，1988年）而拍摄的访谈。她自己还是导演。“我并没有使命感。我随丈夫而来，仅此而已。另外，面对陌生、新奇的事物，我们也无法保持冷漠。我完成了能力范围以内的工作。”

不仅对教学工作热情满满，还“竭力投身哲学事业，表现出巧妙但又接近极限的力度”¹。

2001年，卡斯特罗·法利亚坚持这样写道：“北方山脉的考察之行一败涂地。”²事实上，他对外发表的日记中包含了大量资料，这包括他向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发送的电报和珍贵的照片。充实的文献使此书变为历史的见证，能够见证历史比一句单一、存在争议的论断要鲜活得多。他罗列了考察活动的详细日程与行进路线，描述了其后勤组织方式，重新关注考察团里的主要人物，得益于此，尽管盘根错节，一段有血有肉的情节再度上演。我们主要看到，两位男士各怀鬼胎，却能相安无事：一边，列维－斯特劳斯与印第安部落接触，让·德·雷瑞是他的榜样；另一边，卡斯特罗·法利亚关心的是自己国家的民族志研究之道，他阅读罗凯特－平托和大文豪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想要重新探索巴西塞尔陶的未知事物，借此构建一个现代的巴西。与这种将人类学应用于国家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做法不同，列维－斯特劳斯此行的目的是拯救濒临灭绝的原始社会，他想将其中一部分语言保护起来，将一部分物件保存下来。³

夺回失地

部分法国与巴西民族学家采取了与上述重磅作品不同的态度，他们试图重新思考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研究。他只停留了六个月（1938年7—12月），因此，时间不长；田野考察也没有如愿给列维－斯特劳斯的博士论文提供丰富的文献材料（而只给他博士辅助论文提供了足够多的文献）。尽管如此，从众多角度看，

1 阿兰·巴迪欧，2012年2月9日的电子邮件。

2 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另一个视角：北方山脉考察活动的日记》，第4页：“北方山脉的考察完全失败了。”

3 参见瓦西里·里弗隆（Vassili Rivron）：《土著人的视角？“列维－斯特劳斯考察活动”的档案》（« Un point de vue indigène? Archives de l'“expédition Lévi-Strauss” »），《人类》第165期，2003年，第306页。

巴西的田野考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只是，直到 1955 年《忧郁的热带》出版前，这段经历似乎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自己所说的更加适合田野工作。他表现出明显的经验派特征，对细节和宏观层面的把握能力出色，对周围的事物十分敏锐，并且向往“现实”。他在巴西的所有经历都是他向往的“现实”。经验派的代表性人物尼姆衍达朱这样判断。¹但他是根据当时的标准，当然，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判断的。开展田野考察的方式包括牛、驴以及勘探用的照相术，这种治学手段声势浩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考察活动才刚刚开始，它将马上成为一种过时的研究方式，取代它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沉浸论”。人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大误解只是张冠李戴：人们斥责列维-斯特劳斯未与印第安人单独相处几个月，批评他只待了仅仅几周，甚至短短几日。事后，列维-斯特劳斯解释称，他极其喜欢这种有些复古的“19 世纪科学”，尽管我们再也无法想象他一人跋山涉水，但更加自由自在的样子。对卡斯特罗·法利亚而言，列维-斯特劳斯是“印第安部落的哲学家”，常常陷入沉思，事实上，巴西考察的那些年，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理论的痴狂。他提出的问题十分规矩，没有跳脱于那个年代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涉及的是（南美）大陆上人类居住的形态与发展阶段，它们都源自让他兴致勃勃的不解之谜。例如，他观察到博罗罗人与卡杜维奥人之间的显著差异，一种是基本的物质文化，另一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与宗教组织，后者是尼姆衍达朱同样感兴趣的“格族的奇怪之处”（*anomalie gé*）。他于 1936 年完成的文章“不寄希望于大胆推测，到了 1950 年代，大胆推测成为列维-

1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和尼姆衍达朱之间的书信往来，埃琳娜·蒙泰罗·维勒普尔：《柯特·温克尔·尼姆衍达朱：打破巴西民族志研究传统的德国人》，硕士论文。

斯特劳斯研究巴西中部部落时的显著特点”¹。其间，结构主义颠覆了他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同时，从莫斯处延续下来的研究方法和“物件的神秘论”并没有受到年轻民族学家的质疑，他忙于收集物件，忽视了非物质现象的研究。卡斯特罗·法利亚还隐晦地对此表示批评。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仍然停留在人类博物馆设定的认识论框架之中：“当我为巴西考察之行的主要任务做准备时，人类博物馆还在建设中，而莫斯向它灌输了一种物件的神秘主义气氛。他并不是毫无道理地这样做。他认为，就算最小的物件，如果被正确解读，也可以完整地反映一个社会的物质结构与道德结构。田野工作中，我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我花时间收集物件、研究和描述物件与它们的制造工艺，现在，我后悔没有将时间利用在研究信仰与制度上。”²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学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嘲讽的语气，认为亲近印第安人、主张经验论的尼姆衍达朱（或卡斯特罗·法利亚）是对的，而主张理论治学、从具体经验中抽离出来、田野工作能力欠佳并且一直放不下学术名望的列维－斯特劳斯便是错的。³

每一段相遇虽然时间短暂，他却得以接触更多不同的部落。这种田野工作的另一项乐趣便在于此。在南比克瓦拉部落，“田野研究走向不利的一端。我必须尝试无米之炊”⁴，事后他这样说道。这与博罗罗部落里民族学素材丰富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不仅土著居民的生活模式“包罗万象”⁵，连民族学研究的

1 马塞拉·科尔贺·德·苏扎（Marcela Coelho de Souza）、卡洛斯·福斯托（Carlos Fausto）：《重夺失地：列维－斯特劳斯在美洲印第安人身上的发现》（《Reconquistando o campo perdido: o que Levi-Strauss deve aos amerindos》），《人类学杂志》（*Revista de Antropologia*），第47卷，第1期，圣保罗，2004年。我要感谢卡洛斯·福斯托给了我文章的法语版，因为法语翻译并未对外发表。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快报〉带你走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3 爱德华多·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错过的约会》，第86页。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日落：与鲍里斯·魏斯曼的访谈》（《Le coucher de soleil. Entretien avec Boris Wiseman》），《现代》第628期，2004年8、9和10月，第6页。

5 同上。

模式、规则和范式也是如此。民族学研究“不得不常常根据它遭遇的现实（特定且不可替代的现实）调整研究视角，修改提出的问题”¹。他获得了认识论上的优势，因为他能更好地理解其他学者“田野工作”的逻辑。²

最后，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田野工作形成的专业知识未能通过区域研究能力的建设给他的博士论文提供完整的素材，但这种“美洲低地的民族学”以一种更加婉转、更加彻底的方式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学术水平的发展。安娜-克利斯提那·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印第安人部落后发现了他们的特征，这些田野经验将其“科学幻想贴近印第安实情”³，给了即将到来的结构主义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感性基础：向他者敞开心扉、重视关系胜过物质、维护亲缘关系的价值等。换言之，就算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时还不是结构主义者，但若缺少了巴西的印第安人，他则不可能成为结构主义者。如果他去了非洲，他的田野经验也不足以让他于多年后提出那些理论假设。这是另一种审视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生和研究成果中田野工作重要性的方式。

1939年春，“时间的深渊”⁴

回到“文明社会”，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意味着回到现实时刻，先是圣保罗，后是欧洲。1939年春天的现实是战争即将爆发，黑暗的岁月就在眼前。宣告黑暗来临的是几件警察执法事件。他在此时痛苦离去，与众人分离，满是忧愁。他重回圣保罗，只

1 与玛努拉·卡内罗·达库尼亚的访谈：参见访谈录像，1985年。

2 《日落：与鲍里斯·魏斯曼的访谈》，第5页：“问：做人类学研究必须至少完成一次田野调查吗？答：当然是。问：为什么？答：为了更好地利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

3 安娜-克利斯提那·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美洲的堂吉珂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美洲人类学研究》（《Don Quichotte en Amérique. Claude Lévi-Strauss et l'anthropologie américaniste》），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埃尔纳手册丛书”，巴黎：埃尔纳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4 《忧郁的热带》，第391页：“旅行临近尾声时，我才开始对此次旅行的期限有了真实的感受。”

身入住滨海酒店(hôtel Esplanade),3月8日才退房启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或曾幻想过将这次漫长且特别的朝圣之行当作一段悠长的人生插曲,因为他将再度融入一个脱轨的世界。他渴望这一切吗?不,汽车后备箱与搜集而来的民族志研究材料证明,确实有事发生了。

“三车、六箱加一个布包裹”

民族学家须再一次走收藏品的分享流程,过程中除了误解、失望,还有程序上的拖延。¹抵达首都圣保罗两天后,7月14日,他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写信,向她致谢。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根据卡斯特罗·法利亚发送的电报,常常给他的妻子报信。他因不能随身携带博物馆的录音设备而感到可惜。有了“博物馆的录音设备,几个小时内,文件就可以整齐地汇总完成……”但,因为带回了“满满的学术资料”,整体而言,他对此行“十分满意”。他急于将这些资料的详细清单发送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²尽管对接方的态度和善,被人怀疑却不可避免,怀疑的眼光主要来自监督委员会。1月23日,监督委员会的负责人还向圣多斯(Santos)的海关审查员传递了一则消息:“由于这些物品价值不菲,我希望引起你们的重视,你们也要打起精神,拒绝我方的正当所有物从港口离开国土,它们要成为国家遗产的一部分。”³很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平等的方案:760件留在巴西,745件运去法国,巴西多出的15件属于孤品,因此必须留在巴西。1505件物品被记录进一张“登记表”(Registro)里。“登记表”根据物品收藏的地点进行分类,

1 关于这整一段,请参见路易斯·多尼塞特·本齐·格鲁皮奥尼,《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两次巴西内陆地区的民族志考察》,第330—332页。

2 1939年1月14日,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的信。

3 “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参见里约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档案室保管的“巴西艺术和科
研考察活动监督委员会档案”,编号CFE.T.2.054。

明确了法国、巴西两栏。¹巴西这部分原本应该成为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与罗凯特-平托的收藏品系列相邻，但这一计划从未实现。据我们所知，它们将一直留在圣保罗，首先由文化处保管，随后，辗转多家机构，此后 50 余年则完全消失了踪影。法国这边，出口许可于 3 月 2 日签发，但维拉尔的收藏品引发了问题。维拉尔不像列维-斯特劳斯那般谨慎，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物品清单，动物身体组织的收藏品被全部没收。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收藏品将被运往人类博物馆，这些东西共计“三车、六箱加一个布包裹”，1939 年 3 月 1 日列维-斯特劳斯给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写信，这样总结道。他向她告别，但仍不忘请她“替自己向卡斯特罗·法利亚问好”。最后一处争议围绕收藏品出口口岸，事实上，出口口岸是圣多斯而不是里约热内卢，这也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1939 年 3 月 8 日，他们终于出发。在里约热内卢中转时，列维-斯特劳斯期望能再看一眼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他实际上已被流放至首都“卡里奥卡”，被边缘化，他还渐渐向酒精和抑郁屈服。

“一切都会回归正常状态吗？”

迪娜在巴黎接受眼睛的治疗，逐步好转。她仍紧紧跟踪着巴西的消息。无人依靠，她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转变。她与巴西好友马里奥常常通信，还试图安慰马里奥，并向他坦白对自己有多么失望：“你能轻而易举地想象，我必须放弃我的丈夫和考察行动，经历了多大的绝望。如果这只是一场考验的话，我愿意接受。精神上，我也有点低落，但这肯定也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回归正常

1 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北方山脉民族志考察活动收集品登记总表》，参见里约天文与科学技术博物馆档案室保管的“巴西艺术和科研考察活动监督委员会档案”，编号 CFE. T. 2. 054；帕雷西斯（乌提利提）；南比克瓦拉部落（茹鲁埃纳）；南比克瓦拉部落（坎普斯诺武斯）；北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坎普斯诺武斯）；南比克瓦拉-昂纳尼（维列纳）；南比克瓦拉-卡巴内（维列纳）；南比克瓦拉-卡比西（维列纳）；特雷斯·布里提斯-巴拉欧·德·梅加萨欧-南比克瓦拉；皮门塔布埃努河-卡比西安纳；图皮（马沙杜河）；乌鲁米（马沙杜河）。

状态吗？”1938年10月1日起，她获得了贝桑松女子高中的哲学老师一职。但她的身体情况似乎不允许她上任。此时，她住在巴黎普朗特路（rue des Plantes）26号，过着“散漫、无用的生活”，还找回了“‘少年’时期的悲春伤秋”，这些都是她对马里奥说的原话。这一年，她27岁。时间变得模糊了：“我离开巴西两个月还是10年了？”她觉得自己老了，“获得了无可奈何的解脱”，“甚至没有注意到情绪的变化”。一封封长信相继送出。它们描绘了一位焦虑的患者形象，她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困住，但又热烈地希望将生活过得尽可能充实：“整个宇宙对我来说就像是钥匙的管理系统。里面有基本匹配的钥匙，也有完美匹配的钥匙；有不匹配的钥匙，也有完全不匹配的钥匙。宗教的启示经过一些修订之后，一定是一把完美匹配的钥匙。合理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是另一把匹配得不错的钥匙。不幸的是，近期，这把钥匙生了点锈，在锁眼里转不动身子。民族志研究也是一把钥匙，它能够匹配，只是有些轻巧。或者说，它只打得开小巧的锁，而且还得使上吃奶的劲。”她边听唱片边抽烟，她也博览群书，她还经常出门。她乐于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参与社交。奇妙的是，在这个漩涡中，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之类的存在主义者无异。¹

列维-斯特劳斯一行未能如约启程，因此，在离开巴西时，气氛僵硬得如同灾难来临。他后来表示，巴西之行是他人生中“决定性的经历”。布罗代尔也认同这种观点。然而，直到最后，他都与这段经历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出发前一个月，1939年2月，他与阿尔弗雷德·梅特罗见面，后者正准备去往阿根廷。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圣多斯，他从船上下来，在岸边等阿尔弗雷德·梅特罗。两人在港口漫步，观察货物装船与卸船的过程，最后来到沿海荒芜的海滩上，这样消耗了一整天。“但这些海滩对我们来

1 所有引文源自迪娜·列维-斯特劳斯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之间的书信。这些书信现保存于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属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的一部分。

说仍然被印第安人的阴影笼罩，那些与让·德·雷瑞和汉斯·史达顿（Hans Staden）一同生活过的印第安人，梅特罗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历史学家”¹。他们谈了什么内容？梅特罗在他的日记里给出了线索，他描述了自己对这位日后好友的第一印象：“列维-斯特劳斯到了。他像是从埃及画中走出来的犹太人：犹太人的鼻子和按照犹太人习惯修剪的胡子。我觉得他冷漠、拘谨，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法国学者。他领着我沿着沙滩走。[……]列维-斯特劳斯厌倦了巴西。瓦加斯是一个无情的独裁者，他唯一的目标是继续掌权。他的独裁主要依靠警察。[……]列维-斯特劳斯看不到南美的希望，他甚至快要在这次失败中发现某种宇宙的诅咒。他打算离开巴西，在巴西，什么工作都无法完成。[……]在圣多斯的街上漫游。一间咖啡馆里，骨瘦如柴的妓女们露出一口坏牙。二楼舞厅有爵士乐乐队的演奏。在破败的咖啡馆里，收音机播放着动感、轻快的狂欢节曲调。人们坐在房子的门槛上，凝视着黑暗又空旷的街道。”²

这个十分忧郁甚至有些黄昏意味的场景、《忧郁的热带》中回忆起来的警察暴力事件（例如，在巴伊亚州，列维-斯特劳斯短暂停留的那个地方，他被要求为衣衫褴褛的街头小子拍照）、瓦加斯邪恶的独裁政权、与梅特罗的会面：这些出发之前的最后记忆成为未来的征兆。例如，西印度版的维希镇压；又如，战争和流亡。

1 1963年6月17日，为了纪念刚刚离世的梅特罗，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这番言论。

2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旅程（一）：旅行笔记与旅行日记》（*Itinéraires 1. Carnets de notes et journaux de voyage*），巴黎：帕约出版社，1978年，第42—43页。

9 危机 (1939—1941)

驱赶不幸的方式就是当它未曾存在过。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费加罗报》，1989年7月22—23日

1939年3月7日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圣多斯出发，月底到达巴黎。两周前，纳粹入侵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整整一年前，奥地利被一个德语国家帝国吞并。这个帝国已经成为欧洲内部的威胁。这位仍然年轻的人类学家这年30岁，他经过多年的冒险成熟了许多，终年严肃的面孔如今被“可疑的胡须”²环绕。他带着新增的民族志收藏品和他的猴子卢辛达回到巴黎。他认为，是时候将收藏品开箱整理了。只是不会有展览了：“我在对藏品进行分类和分析时，战争爆发了。这也是第一任妻子迪娜和我结束夫妻关系的时候。”³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从1939年返回家园到1941年开始流亡之间的那两年是一场危机。危机是指疾病突然发展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期：人或康复，或死亡。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或者对宽广的世界而言，结果是康复。回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世界，他大惊失色。动员、斗争、战败、法兰西共和国70年历史的维希政治革命结束、被撤职、被镇压、与迪娜分离以及开始几乎属

1 1939年3月4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写信，告知自己将于3月8日途经里约，并邀请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上船共进午餐。他渴望获得解脱：“我有太多话想跟你讲。”但两人并没有如期见面，最终，马里奥于1945年离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再也没能与马里奥见上一面。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构思小说《忧郁的热带》时，以这种方式形容小说里的角色保罗·塔拉马斯（Paul Thalamas）。“七星文库”里收录了小说的几页草稿，参见第1629页。

3 《亦近，亦远》，第39页。

于奇迹的流亡。因为流亡反而为他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个黑暗而动荡的时期甚至对经历过它的人而言也是不可想象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僵尸”¹一样经历了这个时期，既不理解它也不期待它。可以说，那两年拥有疯狂的色彩。两年里，时局的转变和生活的轨迹完全不可预测。列维－斯特劳斯将1934年的自愿离开与1941年的被迫离开相提并论。但奇怪的是，第二次离开可能比第一次更加顺利，并且毫无疑问，激励了与第一次等等的创造力。第二个悖论：思想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热忱地希望与“历史事件”（Histoire）保持距离，然而，与其他宣称自己“主动接轨”世界历史洪流的知识分子相比，“历史事件”在他的人生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重回巴黎，重回现实，重回历史洪流

杂酚油的气味

从行政意义上讲，列维－斯特劳斯在1939学年开始前一直休假。他寄给马塞尔·莫斯的一封信里称，他将开始担任凡尔赛女子高中的代课老师，而他的妻子将被派往特鲁瓦（Troyes）的高中任教。²战争当然把所有这些计划都搁置了。但同时，他拥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考察结束后的标准工作内容：对第二次考察任务带回来的650件物品进行拆箱、分类、添加标签。这些物品或许不如第一次考察任务的战利品那么壮观，但它们数量可观，意义也旗鼓相当。尽管少了博罗罗那样的羽毛王冠，但其中多了更多朴实的人工制品：编织篮、唇饰（labret）、腰带、小件陶瓷品等。

他在人类博物馆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全神贯注地整理，将一

1 他这样描述自己学生时期的状态。参见《亦近，亦远》，第19页。

2 1939年8月11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从瓦勒罗盖（Valleraugue）给马塞尔·莫斯写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档案盒编号181。

件件物品索引成册，为将来的展览做准备，这是一项浩大又艰巨的工作。展览之后，它们还将成为博物馆的拉丁美洲收藏品，安置于他的老师与博士生导师保罗·利维的收藏品一侧。这项漫长的准备工作被认为是出版其学术作品的前置工作。学术出版物里，他将详细描述田野调查的经过并提出他的假设，这些假设为这位年轻人类学家的区域专业学识和学者身份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要设计一段反事实的历史：如果战争没有爆发，列维-斯特劳斯将会发表他关于巴西中央高原（该地区还几乎未被外界所知）印第安人的博士研究论文，并成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专家。他可以为美洲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甚至可以将拉丁美洲研究带回法国人类学界（出于殖民地的缘故，法国人类学界中，非洲研究更有市场），并创办其思想流派。可惜的是，战争爆发了。战争造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后果：列维-斯特劳斯被迫结束了这一项人类学研究工作，未再故地重游，他还远离了自己的收藏品，被迫与莫斯对他这代人灌输的物件的认识论道别。

1939年4—7月，列维-斯特劳斯在这几个月里像是按下了暂停键，花费数小时与他的收藏品亲密接触，日复一日。当他拆开包裹时，杂酚油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奇妙地将他带回了巴西冒险之旅。这种油性液体是苯酚和甲酚的混合物，被用作防腐剂，人们将其大量喷涂在笔记本、照片和各种物体上，保护它们免受害虫侵害。它的辛辣气味使它成为回忆过去的有效工具。¹ 这种气味在他和他的当下之间起到了缓冲作用，而50年后，列维-斯特劳斯仍然可以在其中嗅到冒险的味道。1939年春天，巴黎进入漫长的“浸渍期”，杂酚油将使巴西的经历得到永恒的记录，

1 根据维基百科，“杂酚油”（créosote）一词来自德语“Kreosot”，由两个希腊语单词——kreas 和 sôzein 组合而来：kreas 意思是肉体（chair）、肉类食物（viande）；sôzein 意思是拯救（sauver）、保护（protéger）。因此，杂酚油的意思是拯救肉体——保护纸张（的肉体）、拯救过去（的肉体）。

而不是使它终结。列维－斯特劳斯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我在其他地方”¹，正如他所说。每晚，一个失了魂的生命在结束长时间的编目工作之后，都要离开雄伟壮观的人类博物馆。他从夏洛山丘（Chaillot）高处往低处走，呼吸着沿路的空气。他闻到了什么？

1939年的世界对他而言不太真实。然而，就在他的眼前，由人民阵线赞助的1937年世界博览会上，纳粹馆与苏联馆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对抗。在“当代人”看来，雄伟且具有侵略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尤其是两方对建筑高度的较劲以及建筑物的庞大外形，概括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与两个强权国家间的疯狂竞争。但是，深入巴西印第安人部落多年后，列维－斯特劳斯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至少暂时不是）自己那个时代人的同代人，而是成为一个幽灵。1989年7月，1939年夏天的50周年之际，他接受了一次有趣的采访，并明确地谈到了他与“现实”的这种模糊关系：“我发现一张旧报纸躺在橡胶采集者小屋的地板上，并从旧报纸上得知慕尼黑协定在亚马孙地区达成。”²前来采访的记者对糊涂、不负责任到这种地步的新闻感到惊讶，列维－斯特劳斯做出回应时明确主张，与“现实”保持联系或者脱离联系可以借助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不都属于同一“现实”的同代人。使他与这段严峻危机保持距离的时间上的鸿沟将从根本上影响这位人类学家此后的人生历程。从那时起，他将领先或者落后于自己的现实时刻，很少与之同步。这与他青年从政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因此，1939年，他欣然承认，战争和歇斯底里的反犹太运动都没有发生。他还用相当粗糙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向梅特罗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Claude Lévi-Strauss regarde son passé. Être juif à la veille de la guerre »），《费加罗报》1989年7月22—23日：“问：战争和希特勒的恐怖世界降临时，您有什么感受？答：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我结束了考察。[……]我完全投入在两件上，一是分类整理安置于人类博物馆的收藏品，二是重新在巴黎安定下来。而且，我与第一任妻子分开也是在这一个月里。所以……我并不在状态中。”

2 同上。

解释反犹太主义。¹他没有期待或者理解任何事物。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人类博物馆里一些新人的到来也没有使他感到警惕，他们是流亡之中的德国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例如，鲍里斯·维尔德（Boris Vildé）、阿纳托尔·列维茨基（Anatole Lewitsky）。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逃避式的防御机制，但也是一种超脱的方式：“我对印第安人的关注比对世界情势的关注要多得多。”³为了说明他缺乏直觉，列维－斯特劳斯经常把缺乏想象力作为解释，声称它是一种遗传缺陷。缺乏历史想象力让他暂时免受即将到来的苦难，却是对从小形成的丰腴现实的残酷践踏。当真实事物全都为最疯狂的猜测提供素材时，我们也就不需要想象力了。

小说的诱惑、浪漫的分手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说法，这种缺乏想象力的表现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它不仅体现在历史、文学方面，甚至也反映在其存在方式上。在二战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尝试小说创作，但由于在描述人物和设计人物活动方面缺乏创造力而放弃了创作。然而，这部流产的小说十分有趣。主要因为它采用了《忧郁的热带》这个名字，并将它传给了一本十分不同、在15年后出了名的作品。除了标题和文学倾向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传承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两本《忧郁的热带》都以自己的方式说明了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决。列维－斯特劳斯1954年性质模糊的作品中透露出他对文学的向往，这著名的“第二本书”，正如文森·德巴恩（Vincent

1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旅程（一）：旅行笔记与旅行日记》（*Itinéraires I. Carnets de notes et journaux de voyage*），第43页：“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是嫉妒的表现。犹太人在通货紧缩的时期大获成功，让德国中产阶级心生怨气。”

2 未来，两人将成为人类博物馆的奠基人，并将为人类博物馆网络（Réseau du musée de l'Homme）而牺牲。他们是俄国犹太人，1936年归化为法国人，并与保罗·利维同一时期被征召入伍。1930—1932年，鲍里斯·维尔德（Boris Vildé）在德国待了两年，见证了纳粹主义日渐强大。参见朱利安·布朗（Julien Blanc）：《抵抗运动的开始：人类博物馆的抵抗（1940—1941）》（*Au commencement de la Résistance. Du côté du musée de l'Homme, 1940-1941*），“21世纪文库”，巴黎：瑟伊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3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Debaene)¹所描述的那样，表达了学术写作这一客观话语体系中主观的一面。1939年，以小说体裁明确传达的主观性与他日复一日地在人类博物馆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形成互补，这可能是逃避学术严肃性的一种方式。作者指出，这一尝试很快就遭到抛弃，但它表明这名年轻学者不仅感到焦虑，也不愿将自己局限于求知这一项事业。可惜的是，此路不通。

当然，小说与年轻的人类学家的新鲜经历没什么差别：“他深吸了一口气。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当他即将登上这艘船时，油漆、油毡和食物的过热气味使他肠胃不适，有一个瞬间，他动了动折回维拉斯的脑筋，这种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空中漫天飞舞的云团像是崭新、悲惨的幻想，其背景是普通的山峦与单调的植被，前方有岩石坡地，以及栗树浓荫下巨大的深色棚屋。棚屋不是水泥房子，它们的墙壁只是石头堆砌起来的，石头则来自附近小溪的河床。”²小说像列维-斯特劳斯的生活一样，不仅包括了旧大陆和新大陆，也包括了远离欧洲的旅行和新的经历，还包括大洋洲和上述文字描述的塞文山脉地区。塞文山脉地区是主人公的家，主人公保罗·萨拉玛斯（Paul Thalamas）留着“可疑的胡须”，是年轻的新教徒。小说这样开头：他身倚远洋客轮的舷墙，客轮开往南美。它简单参考了一个上了新闻的故事：一名旅行者去了大洋洲，并在留声机的帮助下愚弄当地土著人，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神。³小说中，开头的情节变成了“旅行者逃离德国占领的领土并试图在太平洋重新创造另一个文明的故事”⁴。旅行者既是骗子，又是乌托邦主义者，他对新人生的幻想都与新世界息息相关。小说里的一切都有迹可循，尽管并未创作完成，小说也说明，崭露头角的人类学家

1 文森·德巴恩：《告别旅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法国民族学》。

2 《〈忧郁的热带〉之外》，“七星文库”，第1628页。

3 有关这一主题，参见《日落：与鲍里斯·魏斯曼的访谈》，第9页。

4 同上。

需要通过其他视角来描述他的野外工作经验，并消除他对历史的恐惧。他声称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的存在。在叙述文本中，战争这一种历史灾难被认为是旧大陆的糟粕，并为新大陆创造了机遇。他居然预见了自己的流亡。

哈佛大学就读的纳博科夫一边对蝴蝶分类，另一边创作小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则对他的收藏品进行分类和记录。但他却很难为他的内心生活找到新的出路。他与妻子迪娜彻底分开后，陷入了痛苦之中。两人分离了9个月，迪娜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通信告诉我们，这期间她十分痛苦。克洛德回国后，两人的婚姻关系便结束了。迪娜因放弃民族志的考察任务而感到焦虑和内疚，再加上只收到寥寥数条消息，她陷入了精神上的痛苦。她不仅身体状况不佳，部分失明的经历以及永久保持这种状态的可能性更让她无法平静。在这些因素下，她感受到加倍的痛苦。无论是什么原因，事实是他们的团聚不温不火，特别是在他看来。夫妻俩在挽救爱情和继续冷漠的态度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没能挽救这段关系：“你所说的一切 [……] 以及你向我部分重复的话，即使没有被我完全领悟，也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已形同陌路。我不知道你早已不再爱我，甚至难以忍受我的存在，我对你已无任何意义。直到现在，尽管我一天中重复两次，但仍旧难以相信这个事实，我仿佛身处梦中。如果我知道，我会早点离开，因为我不可能重新点燃你的爱意。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对我感到非常失望。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也常常问你。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一拍两散……如果你的话给我一丝丝希望，我都会再试一试。我会努力让你没那么难过。但是我不能忍受不被人爱的生活。没有爱，怎么做都注定失败。”¹

此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这是走投无路时经典的解决方案：

1 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信（标注的时间为周一），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87。

迪娜企图在普朗特街的家中自杀，并在最后一刻被婆婆，即克洛德的母亲，救了下来。婆婆也住在这栋建筑里，她发现了蹊跷，才能救迪娜一命。¹ 此事后，夫妻关系迎来了尽头。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仍先后在巴黎、塞文山脉碰面，并将正式的婚姻关系维系到1945年。因为战争的爆发、动员和流亡排除了离婚的所有可能性。在1940年和1941年的几封信中，列维-斯特劳斯仍在谈论他的“妻子”，迪娜也在谈论她的“丈夫”。然而，从1939年春季开始，他们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列维-斯特劳斯与罗斯-玛丽·乌尔默（Rose-Marie Ullmo）开始了婚外恋。罗斯-玛丽·乌尔默是他的朋友皮埃尔·德雷福斯的亲戚，二战后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这种不满情绪的不对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只能推测。当走向生命的尽头时，他被问到这个问题。老人只说：“她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我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² 由于这段爱情经历存在时空上的错位，7年的婚姻被献上人类学的祭坛，成为祭品。

战 争

笑话（静坐战）

像数百万其他法国人一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被要求为他的国家服务。他这年31岁。他先在后勤和信号军中服役，后被调入邮政部（PTT）的电报审查部门。几周之内，他应该“把所有他认为可疑的电报都交给上级，而上级会立即想象自己正在处理一桩可以使自己晋升的大案。这也太过可笑”³。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关于他经历的“静坐战”和真实的战争，我们能作参考

1 2011年9月24日，作者与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的访谈。

2 帕特里克·威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113页。2007年，帕特里克·威肯接受了作者的访谈。

3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的只有几封信和事后的记载，但同辈人的一些证词，尤其是他的同辈人路易·普瓦耶（Louis Poirier）（又名朱利安·格拉克 [Julien Gracq]）最近出版的《战争手稿》，也证实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语气满是尖刻和嘲讽。¹两者都以一种文学体裁记录了他们的印象，同一时间，安德烈·布勒东敏锐地抢占历史时机，将之戏称为“黑色幽默”²。

列维－斯特劳斯申请接受英国远征军团联络员的训练。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也在这个岗位上：“首先，他们把我送进了索姆省某地的联络员训练学校，我接受了一些测试。我的英语只有初级水平，但还是通过了测试。他们把我送到马奇诺防线后的卢森堡边境，英国士兵还没有抵达那里，但可能会出现。如果他们来了，我和三四个联络员在那儿与他们接头。我无事可做，常常在田野上散步，打发时间。”³

段落的结尾让人想起了朱利安·格拉克的小说《对岸》：等待盟友，然后等待敌人。一方出现，另一方没有出现。确切地说，当德国发动进攻时，一个苏格兰军团确实到达了，但有自己的联络官。这使列维－斯特劳斯和战友的存在变得多余，甚至适得其反。⁴马奇诺防线的部署错漏百出。他被选中就是牵强附会（他的英语水平几乎为零），他还被派遣到毫无用处的地方（英国部队没有出现），最后被要求撤退。撤退前，他从未目睹战斗的场景，总是好像置身事外。他与历史擦肩而过：撤退的决定“可能挽救了我们的性命，因为该团在几天后全军覆没”⁵。

他在阿登（Ardenne）待命，度过了几个月。这段经历如何？

1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战争手稿》（*Manuscrits de guerre*），巴黎：约瑟·克尔提出版社（José Corti），2011年。

2 安德烈·布勒东：《黑色幽默集》（*Anthologie de l'humour noir*）。1940年由射手出版社（Le Sagittaire）出版的第一版在面世后很快就被维希政府列为禁书。

3 《亦近，亦远》，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当时是“第二营第164要塞守备步兵团联络员W，邮政编号193”。

4 指的是著名的步兵营黑卫士兵团（属于皇家苏格兰军团）。这是1940年5月23日的信。

5 《亦近，亦远》，第40页。

“那几乎是在巴西之行后。民族学研究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习惯了奇妙、奇怪、奇特的情况，而成为士兵后，我发现自己也处于奇妙、奇怪、奇特的情况之中。我完成了平稳的过渡。”¹ 这个类比并不是基于身体上的考验，而是基于普遍的疏远经历（*estrangement*）。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巴西的田野考察显然比战争要残酷得多。需要田野工作的民族学就像战争，战争也成为一种民族学实践。

这段时间，他赋闲无事，只能享受等待和让人不解的荒谬之事。接着，一件意义非常的事件降临：蒲公英给了他启示。² 在德国进攻之前，战争时期的孤独行者列维-斯特劳斯走遍田野，悠然自得，他像圣彼得得岛上的卢梭，进行了博学的遐想。“在法国北部的草原上，蒲公英在风中摇曳。列维-斯特劳斯仔细地观察花朵：如何看穿花朵的奥秘？它的形状可以说是完美的，但这是否使它们更易被理解呢？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将蒲公英与其他花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比，获得构成植物秩序的一系列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蒲公英分配等级。”³ 我们应该怎样总结这则简短的寓言？结构主义方法诞生的这一历史舞台表明，诗学的灵光一闪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如果结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战争的思想产物，但那也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我们将稍后再作阐述。但是，从自我超脱的经历中获得自然主义精神的觉醒，这是极有可能的。“静坐战”，甚至是真实的战争本身，尽管矛盾，却成为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共生的机会。朱利安·格拉克笔下，敦刻尔克（Dunkirk）的激烈战斗中，普里耶尔中尉在佛兰德西部的亚麻地上也经历了类似的顿悟，但最终在此处被俘。列维-斯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2 《蒲公英的启示》（« La leçon du pissenlit »），《世界报》1973年5月26日。吉尔·拉普居（Gilles Lapouge）向贝尔纳·潘戈（Bernard Pingaud）讲述了列维-斯特劳斯不为人知的经历。

3 同上。

特劳斯没有经历这些，他没有机会登上战场，连滑铁卢的法布里斯也比不上。

幻影（1940年5—6月）

事实上，士兵列维－斯特劳斯几乎一声加农炮都没有听到就从后来的“法国战役”中全身而退。他结束阿登的待命后，迎来了苏格兰人，最后，他经过数次弯路，与自己的部队在萨尔特（Sarthe）地区（埃夫隆附近）的一个村庄会合。他们乘火车从那里出发，前往波尔多。乱象再次盛行。“火车蜿蜒曲折地穿梭于法国土地上”，在他的军团军官和整个法国军队拥有的两个选项之间摇摆不定：要么遵守命令，按照1940年6月22日签署的停战协定前往波尔多投降；要么不服从命令，穿越至南部地区复员。最后，后者占了上风，火车停在了贝济耶（Béziers）。士兵将在拉尔扎克高原扎营，然后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稍作休整。在回答“那么，您从未上过战场？”这个问题时，列维－斯特劳斯回答：“是的。除了飞机扫射时打碎了我脑袋上方的瓦片之外，我从未被牵扯进真枪实战。”¹最近，有人对法国士兵在法国战役期间的战斗水平进行了重新评估。评估认为，最初的几周，他们逢人杀人、逢鬼杀鬼，此外，一些军团确实展开了真实的战斗。但是，连参与战斗的人也表示战争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不真实”的色彩也充斥于列维－斯特劳斯的战争经历中：组织混乱，指挥能力时高时低，下达的命令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游击战在法国各地此起彼伏，士兵和平民在逃生的恐慌中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亲友。朱利安·格拉克称之为战争的“幻影”²。几个月后，在《怪异失败》中，马克·布洛赫对这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做出了明确的诊断。但同时，人们迷失了方

1 《亦近，亦远》，第41页。

2 朱利安·格拉克：《战争手稿》，第66页。

向，纷纷采取冷眼旁观的立场。6月2日，列维-斯特劳斯通知莫斯，他已经“跑遍巴黎”，但现在却发现自己无所事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眼下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才好，你猜原因是什么。待命期间，我们忙着完成驻军的常规活动。这些琐事包括行军、巡逻、守卫、点名等，令人不悦。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¹好像战争还没有开始……后来，列维-斯特劳斯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这种对现实的违和感：“战争似乎并不真实。我们感觉好像是在拍戏，翻拍的是1914年的故事。但我们心不在焉。”²朱利安·格拉克确实看见子弹在飞，还开了几枪。作家与列维-斯特劳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术语，并自发地用一个隐喻表述他们的错觉：“一切都是假的，我们都感受到了。一切都是虚幻的，每个人都‘好像’在行动。做出符合‘英雄防御’这一传统的适当动作，下达符合‘英雄防御’的适当命令。[……]这场战争不会留下任何真实的东西，它能留下的只有模仿1870年法德战争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每一个细节时可笑至极的样子。人们或许还暗暗希望，它只是神奇的魔术。”³这种不现实的感觉几乎总是伴随着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它不但造成了战败后的创伤，也使这疯狂的几周令人难以接受。对1940年的法国人来说，这种残酷的破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在爱国的狂热氛围中长大，认为祖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并对马奇诺防线十分放心，因此，人人坚信自己的国家是无敌的。像列维-斯特劳斯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也是这样认为。在这种观点受到广泛拥护的背景下，全面溃败的现实使所有人瞠目结舌。但这也为维希的政治革命铺平了道路。几天后，1940年7月10日，当人民阵线议会宣布解散并投票通过了建立新政权的四项宪法法案，维希的政治革命开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作为联络员期间的信（CIP，邮政编号14014，日期为1940年6月2日）。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资料库，档案盒编号181。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3 朱利安·格拉克：《战争手稿》，第26—127页。

始了。列维 - 斯特劳斯如何评价其社会主义同胞、激进派前辈（同时也是众议员）的自杀行为？¹ 我们无从得知。

马克·布洛赫在“一名战败者的陈述”一章中进一步证实了列维 - 斯特劳斯和格拉克的观点。他说，失败本质上是思想上的失败，是策略上的失败。法国参谋长重温了 1914 年的战争，而德国将军发动了以速度决胜的当今战争。“在我们的战场上，这两股对立的力量像是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类历史时期。这样描述再贴切不过。”布洛赫用列维 - 斯特劳斯也无从否认的表述方式做出总结：“长期的殖民扩张让我们将战争理解为标枪与步枪的对抗。这是我们熟悉的模式。但这一次，我们扮演的是野蛮人的角色！”²

为了结束这场冒险之旅，我们来到 1940 年 7 月。此时，列维 - 斯特劳斯身处蒙彼利埃。“我溜出军营，去了学区的教育厅（rectorat）毛遂自荐。如果为了即将开始的高考，他们需要哲学考官，我可以提供服务。这个时机巧得很，我几天前就退了伍。”³ 这只是表明，在法国，一切都可能崩溃，但是高中毕业会考必须继续！

避 难

在南方

危机持续了两年，它的第三阶段发生于南方。这是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南方，但最重要的是，它也是被分隔线隔绝的南方。直到 1942 年 11 月，分隔线将法国一分为二。现在，指南针有了

1 只有 80 名众议员（他们主要是左派，但也有右派人士）拒绝让陆军元帅贝当手握大权。

2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奇怪的败局：1940 年写下的见闻录》（*L'Étrange Défaite. Témoignage écrit en 1940*），“Folio 丛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0 年，第 67 页。

3 《亦近，亦远》，第 41 页。另可参见 1940 年 7 月 22 日，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从蒙彼利埃给马塞尔·莫斯写的信：“一段耗时、麻烦的旅程中，我体验了失败的滋味，其间，我在蒙彼利埃接受了部分训练。我的地址是：大学城殖民馆。等待办理退伍手续期间，为了不让自己无所事事，我只能参加高考，聊以慰藉！”他还提到，妻子迪娜在加尔省他俩朋友的家中借宿。

重要的政治意义：北边是被纳粹直接统治的占领区；南边是维希法国。维希法国确保了临时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庇护，塞文山脉的丘陵地带尤其安全。列维－斯特劳斯投靠了父母，他的父母搬到了坎卡布拉的家宅，这儿离勒维冈（Le Vigan）不远，属于塞文山脉的丘陵地带。从这一刻起，他在这个屋子小住了几个月，他的父母则一住就是几年。这栋大约 10 年前买下的小屋变成了一个安全屋，他们在这里碰头、道别、接收信件、交换消息。塞文山脉是一片以“泥质”“片麻质”为特点的地区，其堡垒般的地理条件曾经经受住了路易十四的猛烈袭击。现在，它又派上了用场。它用长年累积的抵御精神帮助陷入流亡的人们，数个世纪前，新教徒也是在这里不屈地抗争。当他与来自瓦勒罗盖（Valleraugue）的邻居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¹一同展开忘却时间的徒步旅行时，两人一定领悟了那片土地散播的不服从精神以及它的历史。

然而，那时（1940 年夏季），新的流亡者们尚未完全了解他们的新处境。正如我们所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经常提到他在 1940 年 9 月的奇怪举动。他获得了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高中的教职，担心新学年即将开始：“然后，猜猜我做了什么！我去了维希，申请获准返回巴黎履行我的职责！教育部设在一所市立小学内，其中一间教室用作中学教育处的办公室。负责的官员错愕地看着我：‘凭您这样的姓，去巴黎？’他对我说，‘您就没思量过？’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²但他仍未理解透彻。回到塞文山脉后，他被告知有了新的任命。他来到了佩皮尼昂中学。在那儿，他得到了更多的暗示：他的新同事们回避了他，并避免了一切与种族法有关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1 安德烈·尚松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国民议会期间的同事。他支持人民阵线，既是政治活动人士，也是作家。（参见上文）。

2 《自画像》，第 20 页。

正开始萌芽。“只有体育老师才愿意向我展示他的同情心，也许他是抵抗运动的未来成员。”¹1988年，在对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进行有关这一主题的采访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Éribon）很难相信这一事实：“人们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处境的严重性？”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我们了解多少？谁真的了解？

列维-斯特劳斯解释了他的否定态度及其正当性，但今天，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认为，避免危险或保护自己免受危险的一种方法就是坚持自己的习惯。只要一个人设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生活，危险就不复存在了。这可能正是我要求返回巴黎的原因。我是一个居家男人。”²如今，我们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证词，这表面上荒谬的态度却也可以获得理解了。1940年，犹太裔的法国公民长大后崇拜法兰西共和国，其中许多人无法想象国家反犹太主义的存在。尽管他们已经看到了外国犹太人受到镇压，一些人成为法国公民后，仍被1940年7月22日颁布的法律剥夺了国籍。但是，他们在社会、思想和经济上都与来自东欧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产生了距离。即使在1940年10月反犹太人法令颁布之后，甚至在必须佩戴黄星这一污名化要求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对法国政府保持足够的信任，接受了向法国警察登记的命令。伊莲娜·贝赫（Hélène Berr）的《日记》强烈传递了这位来自上流阶级的年轻巴黎女性对犹太人身份的粗浅认知，以及当绞索逐渐收紧，她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竭尽全力抗拒。³这一举动并不是拒绝了解局势……当真相闪现时，这名年轻女子仍然坚持拒绝离开巴黎。在她对日常生存的零碎描述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知道”与“了解”之间的区别。《日记》记载的最后

1 《亦近，亦远》，第42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3 伊莲娜·贝赫（Hélène Berr）：《日记》（*Journal*），巴黎：达朗迪耶出版社（Tallandier），2008年。《日记》是在战争时代创作完成的，但战争结束60余年后才正式出版。

几天，她“了解”离开的必要性但并不考虑这样做。她想留在历史事件的中心。对这群上流阶层中爱国的犹太人而言，流亡绝不是他们的选项，流亡不仅是懦夫的行为，也将加深人们对漂泊无依的犹太人的偏见。

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伪装成一切如常。离开佩皮尼昂后，他回到蒙彼利埃，给预科班硬科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哲学，但这些学生对这门课并不在意。这正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门哲学课：一位放弃哲学学科的老师伪装成传道授业的样子，而学生们则伪装成认真听讲的样子。荒谬的教学活动成为荒谬的日常生活脆弱不堪的避难所。然而，1940年10月3日，《犹太人地位法案》（Statut des Juifs）出台，解雇信随之而来，避难所将很快消失。列维－斯特劳斯在蒙彼利埃任教的短暂期间，阅读了一本对他意义重大的作品。书籍虽然启发了他对法国人类学的思考，给了他灵感，但并未让他十分满意。书名为《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和近亲关系》（1939），作者是马塞尔·葛兰言（Marcel Granet）。它让他开始注意亲属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书中的分析使他感到兴奋，他钦佩葛兰言能够分解复杂的亲属关系体系，也欣赏整项研究的学术抱负：“我发现了一种适用于社会现象的客观思维方式。同时，我也很生气。葛兰言希望解释这些非常复杂的系统，却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解决方案，适得其反。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¹其学术观点形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但这段历史背景却与之产生了矛盾，并强烈否定了他对精神生活的向往。

从这一刻起，一切都既不简单，也不寻常。列维－斯特劳斯回到了塞文山脉这座堡垒。1940年秋冬季，他不得不解决一个拥

1 《亦近，亦远》，第139—140页。列维－斯特劳斯受到了葛兰言的启示，尽管这一层关系很晚才被人知晓。有关分析参见第十章《列维－斯特劳斯读葛兰言：隐秘的启示》（« Lévi-Strauss, lecteur de Granet ou la dette refoulée »），载弗朗索瓦·埃朗（François Héran）：《亲属关系研究的重要人物》（*Figures de la parenté*），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9年。

有多个未知数的方程。他该怎么办？是留还是走？如果离开，他应该朝哪个方向走？他的面前出现了几种选择，这些选择又将各自发生变化，因此，1940年的流亡者拥有众多的可能性。首先，乔治·杜马的一封信于12月递到他的手上：那个将他送去巴西的人希望帮助他获得《犹太人地位法案》第8条的豁免，该条款向为法兰西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犹太人提供了豁免的机会，可以解除他们的职业限制。这意味着列维－斯特劳斯必须接受维希政府及其行径，但获得豁免后，他可以继续教书、谋生。20多个杰出的学者在1941—1943年曾获得中央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的肯定，其中包括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医生罗伯特·德布雷（Robert Debré）和物理学家勒内·乌尔姆瑟（René Wurmser）。¹显然，年轻的民族学家尚未达到资格。当时，拒绝妥协和流亡于法国国内比离开法国的想法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

“我仍然是个坚定的浪漫主义者……我的父母在塞文山脉拥有一栋小屋，他们在战争初期就搬到了那儿。我想过，若有必要，我会躲进那片山脉，我对它十分熟悉，我可以躲在山上，以采摘果实和狩猎动物为生，与我在巴西中部时没什么两样。我用富有诗意的眼光看待事物。”²这是一种拥有抵抗意识的表现，但形式上，更像是塞文山脉的鲁滨孙漂流记，属于天真的冒险。然而，这些幻想的确增加了冒险的诱惑色彩。许多年轻人拒绝服从强制劳役而选择加入游击队，就是因为渴望体验这样的冒险。如果不去塞文山脉避难，他的另一个选项便是流亡。就像17世纪的胡格诺派一样，要么选择小心翼翼地信仰“沙漠”，要么逃离至新教国家。有时，两个选项处于微妙的拉锯战中，两者都会短暂地失去正当性，但一个终将战胜另一个。“平衡木的两侧几乎势均力敌，

1 参见克洛德·辛格（Claude Singer）：《维希：大学与犹太人》（*Vichy. L'Université et les Juifs*），巴黎：美文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2 《自画像》，第20页。

它们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¹。最终，离开或者留下的决定（前者被法国公民强烈排斥，犹太家庭的排斥情绪更加高涨）取决于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而非基于对机会与风险的评估。面对未知的未来，评估也只能依赖于片面的信息、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历史想象。

1940年冬，两种撤退方案开始成形。第一个是返回巴西，这更容易实现。即使客观的政治局势不利，但他对这个国家与其政府官员十分熟悉，他还有朋友留在那里。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那时，签证已经变得稀有且珍贵，列维-斯特劳斯很有可能已经认可了这个方案。他在《忧郁的热带》中讲述了在维希的巴西大使馆局促的底层空间，这个选项如何突然变得无法实现：“大使路易斯·德·苏扎-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s）是我的老熟人，他拿起他的印章，准备在护照上盖下去。当然，就算我是一个陌生人，他的应对之道也不会有所改变。就在此时，一名参赞以冰冷但礼貌的态度打断了他，并指出新的规定已经出台，因此，他已经失去了签发签证的权力。他的手臂仍然停在半空中，持续了几秒。大使带着急切，几乎是恳求的眼神，试图说服他的下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他可以盖下印章，我就算不能进入巴西，至少也可以离开法国。但一切都是徒劳。这名参赞继续凝视着他的手，最后，那只手落到了桌子上，停在文件的一旁。我拿不到签证，我的护照被递还给我，他以行动向我表示深深的遗憾。”²巴西大使试图盖下印章的行动最终流产，这生动地说明了在危难形势下，历史会发生剧变。

流亡仍未成定局。它是众多选项中的一种，但其他可能性在变化的过程中逐渐消失。马克·布洛赫即将离境，他已经获得了赴美任教的邀请函以及签证。但在最后一刻，他选择留下，他的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回顾过去：战争前夕，身为犹太人》。

2 《忧郁的热带》，第10页。

两个孩子因服兵役而不能跟着他离开。¹ 计划输给了其自身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尽管只需一个弹指他就能成功逃离。例如，偶然的相遇、仁慈的官员。但同样一个小动作也可以阻止他逃离。列维 - 斯特劳斯特受阻的原因是，巴西大使失去了他的权力。

然而，他终于可以离开了。列维 - 斯特劳斯特描述了维希政府官员因允许他离境而高兴不已，这一结果令人惊讶。的确，维希政府的政策总在变化，但截至 1942 年，政策鼓励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向海外移民，这是政府高层的指示。这一转变为他打开了机会之窗。1940 年冬天至 1941 年 5 月的几个月里，从西印度群岛通往美国成为可能。而这正是列维 - 斯特劳斯特要做的。同时，维希政府的行政秩序混乱常常让人不能及时获得必要文件，特别是出境签证。维希和华盛顿特区一样，有意和无意的官僚主义并不少见，它们往往造成阻碍。这正是各种签证到期日（离境签证、第三国过境签证、入境签证）令人头疼的原因。

在数周之内，尽管问题重重，但逃亡美国的选择还是占了上风。邀他去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教的邀请信，大概是 1941 年 1 月或 2 月，由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交到他的手上。他还在塞文山脉。邀请信与 1934 年 10 月谢列斯泰·布格雷的那通电话功能一样，不仅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还打开了通往新大陆的渠道。这封信的上游（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的个人档案中没有这些资料）还有一系列故事，其中包括建立对话的过程、学术交流的细节，以及烦琐的官方程序，我们可以通过冰山一角进行追溯。而这些故事都归功于美国社会在纳粹封锁欧洲时对欧洲开展的善意援助行动。

1 参见《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第 34—37 页。

美国的救援演算

从1933年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实施了一项计划，其宗旨是拯救那些被纳粹撤职的讲德语的学者。该计划为他们创造了大约250个职位，入选的老师被派往美国各所大学。作为该计划的参与者，基金会充当了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赞助商。这些大学和学术机构将会聘用这些处于危险境地的学者，并通过项目资助经费向他们支付前两年的工资。其中一个机构，即社会研究新学院，在此过程中特别活跃。这家不寻常的机构成立于1918年，政治上偏向左翼，是一所位于纽约的“公开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通过夜校课程提供成人教育，并将其视为标准学术教学的替代选项。从1933年起，大约60位流亡老师进入新学院任教。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学院的课程设置，并把它变成了一个人力资源国际化的大型学术中心，其研究焦点则是新兴的社会科学。1940年夏天，一项新的紧急计划在类似的背景下重新启动，它的目的也十分类似，但救助对象扩大到纳粹控制下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它是“欧洲学者紧急计划”。新学院及其充满热情的主任阿尔文·约翰逊重新担任起与基金会顾问对接的角色，新学院也在这一计划中充当了“分流站”¹。它一般给身为学者的欧洲新移民留出两年的喘息时间，好让他们在美国就业市场上找到一席之地。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将成为这一计划的受益者。该计划慷慨、务实，同时，十分有利于美国。发起人认为，该计划本质上几乎是植物性的，其目的是将欧洲学术传统中最强壮的分支嫁接到美洲大陆仍然疏落的枝丫上。由于资助名额只有一百余个，甄选过程十分紧张，甄选标准也十分具体。列维-斯特劳斯的职业经历和申请资料正是这些标准的真实反映。

1 《亦近，亦远》，第44页。

甄别申请人学术能力的高低主要基于简历的审查，但交给阿尔文·约翰逊的推荐信被证明更具决定性作用。有5封推荐信支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申请。¹第一封信的日期为1940年9月20日，伯克利大学教授罗伯特·路威用几句话解释了列维－斯特劳斯是怎样通过“有关博罗印第安人的优秀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及在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的帮助下，他在几年前才读到这篇文章。第二封信是1940年10月2日梅特罗本人在耶鲁完成的亲笔信。信的篇幅更长，论据更充分，因此，也更加符合基金会标准。耶鲁同僚支持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一个论点是，他对南美洲的了解将有助于南美洲研究成为二战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战略方向。鉴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罗斯福政府的“睦邻政策”中所发挥的准外交作用，梅特罗深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南美大陆兴趣浓厚。此外，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刚刚被任命为“美洲事务协调员”，而“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是当时最活跃的战时机构之一。很明显，这种拉丁美洲的倾向（学术倾向与政治倾向）十分有利于列维－斯特劳斯。下一个主要论点是，申请人是一位年轻且前途无量的学者。梅特罗巧妙地总结为：“他正在路上（he is a coming man）。”基金会显然更喜欢这种形象，这似乎比老派的索邦风格更有投资的潜力。年龄因素不是决定性因素，但确实可以排除那些自认为学术能力顶尖的学者。第三个论点是列维－斯特劳斯的英语水平。梅特罗根据这位年轻的法国人熟练掌握美国人类学文献的表象做出了推测。事实上，我们知道，当时，他的英语属于初级的初级。评估中对语言技能的强调表明，美国人热

1 后面这些引文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中的书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塔里敦）：R.G.I.1，档案系列编号200，档案盒编号52，档案袋编号609-610。我希望对皮埃尔－伊夫·绍尼耶（Pierre-Yves Saunier）和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员再次表示感谢。关于选拔的更多细节，参见《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第一章：《从避难到流亡：溃败与美国基金会（1940—1941）》（« Du refuge à l'exil : la débâcle et les fondations américaines, 1940-1941 »）。

衷于招募能够教书的知识分子。最后，申请人所面临的危险的远近高低有着重要但算不上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梅特罗早已成为列维-斯特劳斯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1937年，这位资深学者收到了有关博罗罗人的文章后，就对列维-斯特劳斯表示，他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令人兴趣盎然”¹。1940年，他赋予这些评语真实、可以决定未来的影响力。

第三封信的日期为1940年10月10日。它的作者是梅特罗的同事约翰·P·吉林（John P. Gillin）教授，两人均任教于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它从国家研究战略进行论证，强调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的地区属于新兴研究领域：“他的知识和技能在南美人类学研究中心自有用武之地，还将深刻影响美国的科学研究。”信里强调了北美人类学界对南美这片土地兴趣正浓，这是因为美国学者中尚未诞生南美研究的专家，它还强调了耶鲁大学正在组建一个以整块美洲大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队，列维-斯特劳斯的加入可以增强这个团队的研究实力。列维-斯特劳斯自己回顾这段申请经历时，将它描述为天时地利人和。他之所以申请成功，是因为“各种有利的条件——美国人类学家们认为他们已经研究了北美大陆的所有印第安人部落，开始不满于这一现状，并尝试寻找新鲜事物。他们将眼光扫向南方。我的研究成果出现得正是时候”²。第四封推荐信来自法裔美国人类学家乔治·德韦鲁（Georges Devereux），他有着犹太血统，出生于罗马尼亚，并曾定居巴黎。在巴黎时，他接受了莫斯和利维的学术指导。1930年代初，他在伯克利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路威

1 日期为1937年5月12日的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96：“每当我想到您研究博罗罗人的论文时，我总是将两个英语单词脱口而出——‘令人耳目一新’（refreshing）、‘令人兴趣盎然’（stimulating）。‘令人耳目一新’指的是，当南美民族志研究被一些业余人士所主导时，您的论文让我们摆脱了陈词滥调。‘令人兴趣盎然’指的是，我希望您的研究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里，人类学调查的方式将有所改变。”

2 《亦近，亦远》，第39页。

和克罗伯（Kroeber）是他的导师。后来，他在莫哈维人（Mohave）的部落中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因此，他是一位年轻的人类学家（与列维 - 斯特劳斯一样，出生于 1908 年），也是后来民族精神病学的创始人。他对列维 - 斯特劳斯的肯定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¹

除了援引评价标准，他还强调了同事“性格斯文且讨人喜欢”²。他在圣保罗结交的朋友们也是这样评价列维 - 斯特劳斯夫妇的。这句题外话给美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如果列维 - 斯特劳斯真的入选，美国学术界的社交生活将对他提出比法国更加严格的要求（也更需要他全身心投入）。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也得到了同一计划的资助，他与列维 - 斯特劳斯同时抵达纽约。这名语言学家虽被公认为杰出的学者，却差一点因为其倔强、易怒的性格而遭到拒绝，这使人们难以想象“他将如何承担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职责”。³ 因此，要想脱颖而出，申请人不仅要聪慧、学术上多产、能说英语、年轻，还要有优秀的伙伴以及足以应对校园生活各项挑战的能力。列维 - 斯特劳斯并没有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尽管他彬彬有礼，但他过于独立，只习惯于过个人生活。和同事们喝茶或听学生抱怨他们的爱情生活，这些似乎都与他无缘……1940 年 11 月 6 日，朱利安·H. 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发出了最后一封推荐信，进一步阐述了在那个历史阶段招聘南美洲这一领域的人类学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斯图尔德就职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民族学局以及史密森学会。并且，列维 - 斯特劳斯双脚刚刚踏上美国国土，民族学局就与之取得了联系。

1 在另一个契机下，乔治·德韦鲁从美国出发，穿越大西洋，抵达法国，并申请成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的研究人员。此时，列维 - 斯特劳斯也为乔治·德韦鲁提供了帮助。1963 年起，乔治·德韦鲁开始在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任职。

2 英语原文为 “Well bred and most likeable persons”。

3 1940 年 9 月 24 日，密歇根麦迪逊大学（Madi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迈尔斯·L. 汉利（Miles L. Hanley）给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写信。参见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R.G.1.1，档案系列编号 200，档案盒编号 46，档案袋编号 530。

当时，该局正在主持一个重要的团队合作研究项目：《南美印第安人手册》的编撰。该书的编撰工作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47年，其主编正是朱利安·H. 斯图尔德。

那时，阿尔文·约翰逊认为他已经掌握了有关列维－斯特劳斯的充足信息。他在1940年11月13日的信中这样总结道：“他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的研究领域也需要更多人手。”¹因此，他表示同意邀请年轻的法国民族学家来美。然而，他还需要说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后者显然对列维－斯特劳斯贫瘠的学术成果感到困惑，尤其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发表甚至还没有撰写博士论文。时间紧迫，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还“缺乏其科研能力的书面证据”²，难以做出决定。在这关键的一刻，保罗·杜阿尔特写给崔西·B. 基特里奇（Tracy B. Kittredge）的信送达收件人手上，崔西·B. 基特里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部门的负责人。信上记录的日期是1941年1月2日。这份“陈情书”没有提出任何新观点，但显示出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我们还记得，保罗·杜阿尔特不仅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朋友，列维－斯特劳斯圣保罗朋友圈的一分子，还是巴西驻欧洲外交使团的前成员。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保罗·杜阿尔特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法国战败的历史环境妨碍了申请人的学术研究计划，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迫切希望田野考察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出版。作为好友，杜阿尔特竭尽全力，不惜一次次地与阿尔文·约翰逊和基金会的代表们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崔西·B. 基特里奇终于给出了正面的回复，基金会承诺将在两年内提供5000美元的资助款，其中1000美元为差旅费。每年2000美元的薪水交由社会研究新学院管理，该学校将

1 英语原文为“He is undoubtedly a very good man and working in a field which requires more personnel”。

2 英语原文为“Lack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his scientific capacity”。

直接为其新进教师提供报酬。实际上，在基金会正式批准其申请之前，阿尔文·约翰逊已经发出了邀请。意识到情况紧迫，而列维－斯特劳斯也从长期定居美国的姨妈艾琳·卡洛－德尔维耶（Aline Caro-Delville）处获得了私人资助，因此，阿尔文·约翰逊必须在1941年1月发出邀请函。一时的乱象反映了两个机构的不同节奏：一边，新学院理解列维－斯特劳斯个人的情况，迅速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函几乎相当于一份雇佣合同；另一边，洛克菲勒基金会以美国学术界为标准，遵守一整套复杂的核查程序，因此，速度上自然慢得多。

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除此之外，他仍然需要美国国务院签发的签证。由于极端孤立主义的舆论泛滥，同时，国会不乐意接收来自旧欧洲大陆的难民，美国国务院的签证政策十分保守。罗斯福和战争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美国国内社会某些阶层的积极态度与领事馆官僚作风造成的拖沓，与某些国务院官员完全公开的仇外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结果难以预测。一般来说，对逃难的学者而言，这一过程相对简单，因为他们拿到了在大学任教的邀请函，他们也有资格申请配额外的签证，但烦琐的行政程序能对任何人说不。如果过去的政治倾向太“红”，财务前景太灰暗，签证就将被拒绝。所幸，阿尔文·约翰逊十分警觉，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最终顺利地获得了签证。似乎没有人知道他青年时期曾是热血的社会党人。

因此，救援演算包括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新学院和国务院之间复杂的协商过程。优秀的科研能力和必要的经济来源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救援演算也要求，申请人需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申请人遭受迫害的风险的高低也将得到评估。在法国，这一切都取决于维希政府的政策。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后，政府可以为其推翻政策。这是一个有效的过滤系统。维希政府只允许少数人逃离法国南部，他们主要从马赛港离境。马赛港是欧

洲各地难民的聚集地，列维－斯特劳斯也是难民中的一员。他有了宣誓书和签证，还需要一艘船。

流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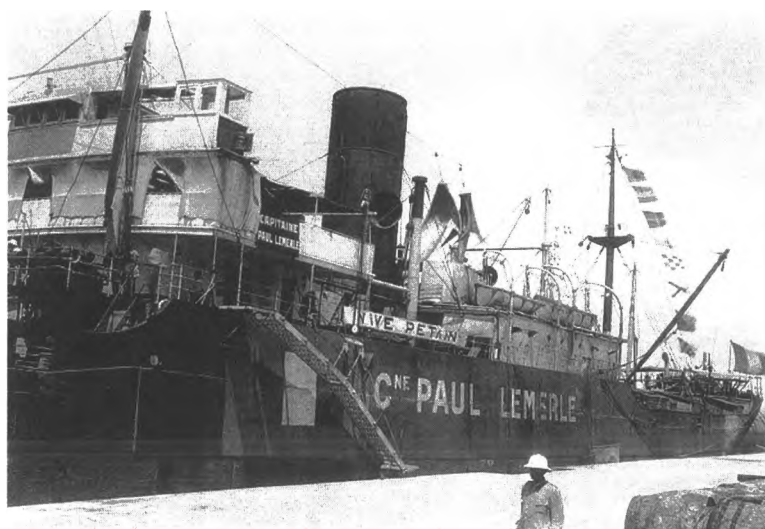
“驱逐罪犯”¹

1941年2月，他在马赛港码头周围徘徊，发现了一艘本应向马提尼克岛的船。这是“海上运输公司”的一艘班轮，他在巴西期间一直是该公司忠实的客户。该公司的一名雇员认出了他，并“仍然将[他]视为法国文化的民间大使”²，他借此机会成功买到了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Capitaine Paul-Lemerle*）的船票。班轮于1941年3月24日起锚，向西印度群岛驶去。列维－斯特劳斯的“战友们”十分不幸，他则不必向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求助，不需要依靠其紧急救援委员会的服务。³紧急救援委员会是流亡程序中起主要作用的机构。美方的邀请函、他与海员的交情让他一再受到特殊待遇，他与海上运输公司多次跨越大西洋的历史交集也是他获得特殊待遇的重要原因。这些特殊待遇十分有用，因为这次航行不是度假。此次航程的气氛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直到登船那天，我才开始了解情况。迎接我们的是几排头戴头盔的机动警卫队，他们紧握冲锋枪，守在码头这一侧，阻止乘客与前来送别的亲朋好友之间发生一切肢体接触。推搡和口角打断了离别的祝福。这绝不是孤独的冒险，而更像是罪犯被驱离国土。比这种恶劣待遇更让我吃惊的是乘客人数。我立刻发现，我们大约350人，全被压缩进一艘小轮船上，它只有2个船舱，

1 《忧郁的热带》，第11页。

2 同上书，第10页。

3 参见洛朗·让皮埃尔（*Laurent Jeanpierre*）：《瓦里安·弗莱和美国难民援助》（«*Varian Fry et le sauvetage des réfugiés aux États-Unis*»），载让－玛丽·吉荣编：《瓦里安·弗莱，从避难到流亡》（*Varian Fry, du refuge... à l'exil*），阿尔勒：南方文献出版社，2000年，共两卷。



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1941年3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登上了这艘船。

一共7个铺位。”¹列维－斯特劳斯被安排进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的其中一个船舱中，得到了一个铺位。这是多大的荣耀！这船不只载人，还偷偷承运了货物，因此在地中海和非洲沿岸停留了许多次。

越是接近热带地区，温度越是往上攀升，下面的货舱越来越不适合人待，船很快变成了漂浮的动物园，所有人类活动都转移到甲板上。洗衣、做饭，以及更重要的“卫生需求”在这两个小屋里都很难完成，因为这两间小屋的松木板已经被尿液浸透，这给精致的灵魂带来了货真价实的煎熬。这艘超载的载人货船穿越大西洋，同时，折射出多段历史：奴隶贸易以及20世纪初涌入纽约的经济移民潮。但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生中，这次旅行被比喻为另一次民族志之旅。这次的研究对象是未来的难民，“集中营追捕的羔羊”²，几乎濒临灭绝的部落之民。航行是艰苦而非

1 《忧郁的热带》，第11页。

2 同上。

舒适的，空间是拥挤而非宽敞的。他们需要吃苦而非享乐，而且，他们是被祖国驱逐而非被他国吸引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乘坐幽灵船从旧欧洲大陆出发的这段航行都代表了探险史诗的反面，是战争年代大规模流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15年后写《忧郁的热带》时，列维-斯特劳斯回溯1941年，将这段混乱不堪的终极经历当作新时代的起点，他认为，这标志着现代性已经饱和，而他将进入一个没有归属感的敌对世界。

在这艘破旧的载人货船上，也有不少杰出的乘客，其中包括艺术家、知识分子、工会领袖、政治人物、记者、医生、律师。他们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精英阶层，因为生为犹太人，或是因为政治异见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被迫离开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于是，甲板上出现了一群整齐的身影。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维克多·塞尔奇（Victor Serge）和安德烈·布勒东只是其中的几位。这些身影的主人声名显赫，身形却因时局之困显得憔悴（更不用说公海上的颠簸了）。维克多·塞尔奇曾是列宁的战友，因此，在眼神关切的前社会主义运动人士看来，是“元老和资深的前辈”¹，但其刻板的举止与其革命思想并不完全匹配。至于安德烈·布勒东，“他浑身不自在，在甲板上仅剩的几处空间来回走动；由于裹着厚厚的大衣，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蓝色大熊”²。列维-斯特劳斯讲述了他与安德烈·布勒东的第一次会面。在卡萨布兰卡中途停留期间，他听到安德烈·布勒东向护照检查官说出自己的名字后，决定上前自报家门，就像门徒向大师致敬一般。这名32岁的民族学家与这位“名声远扬”³的超现实主义者的地位高低立判：前者因鼎鼎大名的人物出现而受到了惊吓；后者仪态庄重，“超凡脱俗”⁴。因此，在当前情况

1 《忧郁的热带》，第12页。

2 同上。

3 《亦近，亦远》，第45页。

4 同上。

下不合时宜和过时，他却十分欣赏布勒东的这一点。这个年轻的家伙，既震惊又好奇，向“大师”传递了一张便条，开始讨论起艺术品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并将它发展为一项长期交流。对超现实主义者和民族学家而言，艺术品与文献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930年代初，《文献》期刊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¹也许人们对在茫茫大海上进行艺术性质的过多探讨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行为让人联想到两个男人不可动摇的严肃态度和无法解释的云淡风轻，他们沉迷于对讨论的纯粹热爱之中，就像是沉迷于已无力购买的奢侈品。然而，这种场面既荒谬又合理。同样，列维－斯特劳斯不仅与年轻的德国女难民调情，还大方地承认确有此事，但他通常对此类事情十分保守。举止喜怒无常是历史冲突造成的症状。历史冲突使情感指南针旋转起来，让他们强烈渴望能够活在当下。此时此刻并不适合开始一段恋爱关系。恰恰因为在这种时局下爱情没有规则可言，性爱和（或）精神恋爱反而成为必需品。离开马赛一个月后，船达到马提尼克岛法兰西堡海湾，此时，列维－斯特劳斯正在追求两名年轻的德国妇女。

热带的维希政府

在马提尼克岛，这些难民被当作囚犯，或被软禁于民宅或被拘留在法兰西堡外的营地：巴拉塔（Balata）、普安特鲁日（Pointe-Rouge）和拉扎雷特（Lazaret）的营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用讽刺的语气描述了抵达法兰西堡的情景。尽管马提尼克岛并没有被卷入战争，当地的官员们对战败表示自责，这让人有些困惑不解。作为贝当（Pétain）的狂热支持者，军官们迎来了这群“乌合之众”，他们是反法者、犹太人、外国人、超现实

1 《有关艺术作品和文献之间关系的说明（此文于1941年3月在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上创作完成，后交给安德烈·布勒东）》（« Note sur les rapports de l'œuvre d'art et du document écrite et remise à André Breton à bord du Capitaine Paul-Lemerle en mars 1941 »）以及他的回应，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看、听、读》，巴黎：普隆出版社，1993年，第139—146页。

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可供军官们发泄感情的替罪羊”¹。安德烈·布勒东还记得着陆后每个人遭受的言语侮辱：“在普安特鲁日（该岛的一个营地）中，他们对一位前往纽约追求学术事业的相当杰出的年轻学者 [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说：

‘不，您不是法国人，您是犹太人，自称为法国人的犹太人比外国犹太人更糟糕’ [……] 他们对我说：‘一个作家。声称应邀发表演讲并出版艺术书籍。美国人现在可以做很多好事，不是吗！法国人？他可以下船，但要受到秘密监视。’ ”²

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忧郁的热带》和《迷人岛马提尼克》（*Martinique charmeuse de serpents*；这是布勒东的文集，于1947年出版。安德烈·马松为之创作了插画）中，他们的情绪无常，情绪之间产生了冲突。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由于维希革命的力量向热带地区扩张，马提尼克岛上又重新恢复了严格的殖民地秩序。³ 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远离了战场，但它们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因此，被英美两国的军舰重重包围。当时，它们正处于残酷镇压和大型政治宣传的阵痛之中。布勒东嘲笑“当地人用皮钦语给予‘贝当好爸爸’的最新措施可怜的赞誉”⁴。难民们，不论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感受到殖民地秩序毫无缘由的暴力，不得不忍受虐待和屈辱：难民们的国籍被否认了，犹太人被承认他们独有的身份。直到这一刻，犹太人都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忘却这种身份。

难民们不仅受到诋毁和侮辱，还被命令不得接触“‘有色人种’。他们还是孩子，虽然个头很高。无论你们对他们说什么，

1 《忧郁的热带》，第15页。

2 安德烈·布勒东：《乱水》（« Eaux troubles »），《迷人岛马提尼克》（*Martinique, charmeuse de serpents*, 1947），载《全集》，“七星文库”，第3册，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9年，第387页。

3 参见埃里克·詹宁斯（Eric Jennings）：《热带的维希：马达加斯加、瓜德罗普岛以及中南半岛的国民革命（1940—1944）》（*Vichy sous les Tropiques.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 à Madagascar, en Guadeloupe, en Indochine, 1940-1944*），巴黎：格拉塞出版社，2004年。

4 《乱水》，第393页。

他们都会理解成另一个样子”¹。法国警察身着短装，表现出夸张的热情。他们营造出权柄在握的假象，不遗漏一个细节，但却没什么作为，最后，他们的声势被蚊子吸个精光。列维－斯特劳斯观察到一种被包围后的紧迫感，并认为这是孤立状态和潘趣酒过量导致的：“士兵们遭受集体精神错乱的困扰，这本来可以成为民族学家研究的对象。”²这支法国警察队伍让布勒东联想到德国警察的特征。尽管纳粹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比较（今后将有更加充分的发展）仍处于隐喻阶段，但通过列维－斯特劳斯观察到的大众信仰仍可一窥一二：一些马提尼克岛居民“解释到，希特勒与耶稣没什么两样，因为白人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没有遵循他的教义，希特勒才回到地球惩罚他们”³。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并未对此现象发表评论。

但马提尼克岛不只是一个地狱般的小岛，它还将列维－斯特劳斯（和超现实主义者们）与新大陆连接了起来。列维－斯特劳斯可以自由活动（这也是他作为大西洋国际航线老顾客获得的特权），“兴高采烈地发现了自亚马孙之行后就十分熟悉的多种蔬菜”⁴。他忙碌于整理考古收藏品的清单，考古是法兰西堡当地的宗教命令。他还迷失在贝利山（Pelé）的某个地方，享受了“难忘的漫步，足迹遍及整座岛屿。岛屿看上去比南美大陆更具典型的异域风情。它就像是一颗拥有植物纹理的深色玛瑙，镶嵌在有银色斑点的一大片黑沙海滩中。山谷中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人们只能感受到树蕨的存在，它们的叶片从其活化石般的树干中伸展开来，巨大、柔软、呈现羽毛状。由于滴水声连续不断，耳朵比眼睛更能洞察这些事物”⁵。

1 《乱水》，第390页。

2 《忧郁的热带》，第15页。

3 同上。

4 同上书，第16页。

5 同上书，第21页。

列维－斯特劳斯从法兰西堡起便申请成为波多黎各圣胡安（San Juan）的移民。《忧郁的热带》描述了在那里与警察发生了另一起事件。此后，西印度群岛的一系列小插曲迎来尾声。作为巴西记忆的一部分，这些小插曲都是为了表现新政府的人治特色，管理上的歇斯底里等同于效率低下。美国警察并没有比法国警察开化：列维－斯特劳斯随身携带的民族志文献——田野调查笔记、书目索引卡（有些是德语！）、印第安土著语言的词汇表——被美国海关人员认为具有重大嫌疑，因此受到了全面检查。海关很快便将它们认定为暗语。于是，列维－斯特劳斯被软禁了起来。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伸出了援手，这位人类博物馆的前同事现在是自由法国在南美洲的重要特使。此后，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出面，完全打消了海关的疑虑，列维－斯特劳斯才得以脱身。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了美国飞地，而北美洲将给他留下西班牙风情的永恒烙印。他于1941年5月28日抵达纽约。这时，距离离开马赛已近2个月。

这时，迪娜留在塞文山脉的坎卡布拉，住在克洛德父母的家中。在那儿，她给马里奥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因犹太人身份而被教育部开除，于是在蒙彼利埃开设私人哲学辅导课，过一日算一日。她描述了定量配给的现状、她讨厌的木底凉鞋和买香烟的长队。她仍然喜欢好看的面料和精美的连衣裙，但依靠丰富的想象力收敛了这方面的欲望。“巴西和轻松的生活离我很遥远！许多其他事情似乎也永远消失了：对生活的欲望（如你所知，从未牢牢地扎根于我的心里）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念。”¹ 迪娜谈到了无处不在的谎言、别人和自己身上的道德缺陷，仿佛战争给了她残酷的启示：“你知道我的丈夫已经离开欧洲。经过65天的旅程，他终于到达了纽约！现在，他已经遥不可及，但如果遇上了麻烦，

1 1941年6月13日，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存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他仍可能需要巴西朋友们的帮助。”¹ 她的关切表明，克洛德和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特之间就算不是友好分手，至少也是双方同意一致的结果。但在戏剧化的环境下，他们的分别不仅是婚姻的终结，也变成了一个世界的终结。迪娜为什么不跟随她的丈夫？后者是否曾提议迪娜借助他的邀请函，随他一同离开？所有证据都表明他这样做了。早在 1940 年 5 月 8 日，尽管这对配偶已经分开了几个月，但在一封写给马塞尔·莫斯的信中，列维－斯特劳斯特谈到自己可能获得一项美国资助，但他坚持认为他的离开不该中断妻子的职业生涯，并建议像巴西时一样，为妻子安排工作，他建议迪娜可以中断国民教育部的工作，在法国海外事务局谋得一个职位。² 1941 年 7 月 21 日，列维－斯特劳斯特从纽约给利维医生写信：“我必须通知您，我和妻子自战争爆发以来就已经分开。[……] 在我离开法国之前，我们经常会面，因为教育部任命我俩去蒙彼利埃，她正住在蒙彼利埃。她拒绝以我为跳板，因此，不愿随我离开去美国闯荡。”³ 迪娜本人几个月前曾写信给莫斯：“我觉得我无法申请美国的职位。你知道原因。你知道我处于怎样的精神状态。就算我今天同意，我也不确定从现在起一两个月后我能否兑现承诺。做出决定所需付出的精力超出了我目前的承受能力。[……] 我可能放弃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感到遗憾。[……] 拒绝这个邀请意味着，我以目前力所能及的方式履行了一项精神上的义务。”⁴

为什么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特留了下来，尽管从 1940 年秋天开始，一切迹象都表明情况只会变得更糟？虽然我们无法证

1 1941 年 6 月 13 日，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特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存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2 1940 年 5 月 8 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给马塞尔·莫斯的信：第二营第 164 要塞守备兵团联络员 W，邮政编号 193。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档案库，档案盒编号 181。

3 1941 年 7 月 21 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给保罗·利维的信。参见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心图书馆保罗·利维资料库“列维－斯特劳斯特与利维之间的书信”主题档案（2 APIC）。

4 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特给马塞尔·莫斯的信（没有标注时间），参见法国国家档案馆（2 AP 42 B2）。感谢托马·赫尔斯向我提供了这份文献。

实，但她可能不愿跟随前夫的脚步，因为前夫不再是她真正的丈夫了。这是职业能力出众的独立女性值得拥有的自豪感。留在法国说明，就算没了她，她也可以继续生活，更重要的是，可以生存下来。她写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多封书信显示，她仍然是一个热情的年轻女子，虽然有时会表现出阴暗的情绪，但渴望生活，并且拥有一个不受其他人支配的独立个性。在潜意识里，她可能还渴望充分体验历史，无论这段历史多么悲惨，她都希望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她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还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列维-斯特劳斯的父母先是躲藏在塞文山脉，后移居加尔省，并受到了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一家人的细心关照。

她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人格已不再是我身上无形的核心，而我正像我小说中的伊内斯（Inès）一样迅速消散，尽管这部小说可能永远不会面世：‘一天，伊内斯消失了。从此，人们再也找不到她了，因为她变成了一条河。’”¹从许多角度看，有关自我消散的幻想都十分有趣，它们不仅预示着她的隐秘生活即将到来，也预示着自从她从克洛德生命中完全抽离出来，她将从这个故事中彻底消失。列维-斯特劳斯的生活里将再次迎来新的事物。²

1 1941年6月13日，迪娜·列维-斯特劳斯给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信。参见圣保罗大学巴西研究所保存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档案。

2 从此，克洛德与迪娜便不再见面。唯一例外的是1980年代，由于克洛德的母亲爱玛·列维-斯特劳斯逝世，两人产生了有限的交集（寄送书本）。两人分开后，迪娜照常拜访爱玛，一直没有中断。

10 纽约市的法国人：流亡生活中的伟大创造 (1941—1944)

每天早上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美洲阅览室工作时，我都觉得自己回到了过去。它的顶上是新古典主义拱廊，四周是用老橡树装饰的墙壁，我坐在一位印第安人身旁。他身着羽毛头饰和串着珠子的鹿皮外套，正用派克笔做着笔记。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41年的纽约》¹，1977年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很少在《忧郁的热带》的自我分析中提到1941—1947年他在纽约市度过的6年，却浓墨重彩地记录巴西之行。他赞美纽约市有一种矿物质的美感，在一个段落中隐晦地提到了这段经历。然而，这个段落也只是他对美国城市大篇幅评论中的一小部分。幸运的是，除了后来完成的寥寥几篇文章外，我们还找到了大量其他文献，其中包括意义非常的《1941年的纽约》。流亡的现实感受和深刻经历可能与后来的回忆有所不同，纽约和巴西的情况都是这样。

流亡是一种十分矛盾的经历，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1941年，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战友们逃过了灾难，但代价是他们被迫与原来的世界一刀两断，还被丢进了未知之中。正如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好友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Patrick Waldberg）后来说道：

“他们的脸上充满了1940年的惊慌和恐惧。”² 他们惊慌失措，

1 《巴黎—纽约双城展》（*Paris-New York*），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CNAC Georges-Pompidou），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1977），第79—83页。参见《遥远的目光》，巴黎：普隆出版社，1983年，第355页。

2 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Patrick Waldberg）：《回忆似水》（« Au fil du souvenir »），载让·普永（Jean Pouillon）、皮埃尔·马兰达（Pierre Maranda）编撰《交流与对话：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六十周年纪念文集》（*Échanges et communications : mélanges offerts à Claude Lévi-Strauss à l'occasion de son 60e anniversaire*），拉艾（La Haye）：牧东出版社（Mouton），1970年，第581页。

迷惑不解，骨瘦如柴，就这样来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城市。奇怪的是，出于个人和其他原因，列维-斯特劳斯将会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他总是这么说。这些年始终保持着非常紧张的节奏，它们激发了他对美国人和美国事物的好奇心。他是一位年轻且前途无量的学者，游刃有余地游走在这座城市的各个阶层之间，斡旋于不止一个欧洲流亡团体与美国社会之间。他成功且高效地将他对探索的渴望、对辛勤工作的爱好和轻描淡写的波西米亚式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不需要背负家庭责任过活。列维-斯特劳斯 32 岁，是最年轻的流亡者之一。年轻人从小就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责任，为父母分担家计。¹ 后来，回到欧洲时，他快要 40 岁，但外表比他的年龄要成熟得多。他是老人堆里的年轻人，他总是像兄长一般，虽然外表成熟，但年纪却并不大。由于长寿，他总比别人年长一些。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的时间规律背道而驰：10 年后，在纽约，他过着 20 岁的单身汉的生活，在流亡生活的情感旋涡中，他的恋情接踵而至。他钟爱年轻、漂亮，且拥有法国教育经历的俄罗斯女孩。²

对传记作者而言，纽约经历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利于重新审视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结构主义的诞生不光是学术研究的结果，还与社会、政治、机构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结构主义正式诞生的标志是后来出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结构主义这一理论框架体系构思于 1940 年代而不是 1960 年代，构思于

1 事实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一直为家里分担重担。1940 年 10 月，尽管失去了教职，他还是根据收入情况拿出一部分钱交给家里人，要么给妻子和孩子，要么给父母。因此，他的父母才顺利地渡过战争这一难关。他们拿着假身份证件，要么躲在塞文山脉的家中，要么去德龙的热内·库坦家避难。

2 参见《回忆似水》。流亡期间，这个小圈子里，男男女女一边结合为夫妻，一边各奔东西。其中也有一些悲剧，例如：马塔（Matta）与年轻的亚美尼亚裔美国艺术家（阿希尔·戈尔基）的妻子搞在了一起；《VVV》的出版人戴维·黑尔（David Hare）娶了布勒东的前妻雅克琳·兰芭（Jacqueline Lamba）。列维-斯特劳斯向父亲讲述“雷诺瓦”（Renoir）的故事，在他流亡期间的伤感专栏里，“雷诺瓦”不停地结交新的女性朋友。参见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伊莎贝尔·沃尔德伯格：《没头没脑的爱情》（*Un amour acéphale*），巴黎：别样出版社（La Différence），1992 年，从 184 页起。

纽约而不是巴黎。最近，它又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这些新的研究挑战了独立科学创造的概念，强调了科学创造背后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意识形态和认识论。¹在科学研究（Sciences Studies）和思想社会学的启发下，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出现了。这种方法既没有那么唯心主义，又具有更加丰富的学术创造力。²在本章中，结构主义既是一种方法和一种世界观，也是严格意义上的范式，它用其丰富的内涵包容了流亡的经历。因此，结构主义不会局限于下列传统的叙述：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遇到了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因此，在那儿创造了结构主义，他还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汲取丰富的知识。它的诞生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让我们从档案开始追溯。

纽约夏天（1941年夏）的闷热与潮湿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于1941年5月28日抵达纽约。那天，这座城市的高温和潮湿带来了迷雾，因此，抵达曼哈顿岛后，他没能欣赏到预期的奇景。在西方的想象中，曼哈顿岛的奇景已经具有标志性的地位，但仍然能够造成精神上的震撼。在迷雾的笼罩下，这位年轻的民族学家只觉得自己“身在雄伟的模型前，但它的真实尺寸难以琢磨”³。欢迎的队伍已经就位：他的姨妈艾

1 参见文森·德巴恩：《告别旅行：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法国民族学》；洛朗·让皮埃尔（Laurent Jeanpierre）：《游走于多个世界的人物：二战法国知识分子美国流亡生活研究》（« Des hommes entre plusieurs mondes. Étude sur une situation d'exil: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réfugiés aux États-Unis pendant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伊曼纽埃尔·卢瓦耶：《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

2 参见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30多年来，拉图尔试图以人类学的研究视角重新解释“科学”这项西方现代性中的重要活动。参见布鲁诺·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Steeve Woolgar）：《研究室里的生活：科学成果的制造》（*La Vie de laboratoire. La Production des faits scientifiques*，1979），巴黎：探索出版社，1988年；《有关生存模式的调查：现代人的类学研究》（*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 une anthropologie des modernes*），巴黎：探索出版社，2012年。

3 1941年5月30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琳·卡洛-德尔维耶¹曾竭尽全力让她的外甥踏上美国土地；姨妈的女儿泰瑞斯(Thérèse)是半个美国人；杜阿尔特一家人(保罗和朱安妮塔)和他的表亲丽莱特·尼赞(Rirette Nizan, 即亨丽埃特·尼赞)也来迎接他。丽莱特·尼赞带着孩子离开了法国,但失去了丈夫保罗的消息,几年后才正式得知保罗去世的消息。²

今天,我们能够掌握这些内幕,多亏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41年4月25日至1942年9月13日寄给父母的50多封家书。³他每周准确无误地寄出一封信,50多封信构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纽约冒险初期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与后来涉及这段时期的几篇文章不同的视角。这些家书的语气带有难以掩盖的新鲜感:这个年轻人很快被这座城市征服,他的内心满是对城市生活的热爱。他很快便认为美国的环境对他是有利的,于是,展现出吃奶的力气来适应这里的环境。所以,这些信件是愉快、轻松,甚至无忧的纪事,即使它们也会传达列维-斯特劳斯对亲朋好友、父母、迪娜、德雷福斯一家人,以及卡昂一家人的担忧。卡昂一家人是父母的比利时友人,为了避难,他们也躲到了坎卡布拉。我们还应该牢记,考虑到审查的问题,他有时会加密他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涉及国际关系和政治话题的信息。此外,他总会留意不忘向父母报告平安,以宽慰他们。因此,他的信“读起来像文字游戏”⁴,并充斥着各种张力:信里既有心花怒放,也有撕心裂肺;既有对新事物的喜爱,也有对过往的怀念;既聊学术,也

1 艾琳·卡洛-德尔维耶是爱玛·列维-斯特劳斯的姐姐。她是画家卡洛-德尔维耶的妻子,一战结束后,跟随丈夫来到美国。1928年,丈夫逝世,但她留在了美国,积极地从事编辑、翻译和新闻工作。她四处奔波,多方周旋,为外甥来美募集资金。1941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成功抵美。

2 参见《纵情回忆录》。

3 这些书信是《“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的精髓,都有时间记录作为参考。后面相关引文也出自这本书信集。

4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原话。50年后,他重温了这些书信,并为《“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一书写了序。序言篇幅不长,里面提到了这一描述。

谈政治；还表达了对工作与社交活动的热切向往。简而言之，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所处的流亡状态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持续下去。

克洛德·L. 斯特劳斯特老师，格林威治村，西 11 街 51 号

1941 年 6 月 8 日，列维 - 斯特劳斯特通知他的父母，从此，他们可以将给他的信寄往这个地址：“西 11 街 51 号 [……]，收件人是克洛德·L. 斯特劳斯特老师。因为列维 - 斯特劳斯特是家喻户晓的雨衣制造商的名字¹，社会研究新学院将我的名字改成了这样。”他有了新地址、新的职业身份和新名字。与蓝色牛仔裤的大商人（法国民族学家似乎还不知道此人）同名尽管有些麻烦，但却帮助初来乍到的他立即摆脱了许多移民必须跨越的日常障碍：对美国人而言，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太晦涩。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但后来假意称突然被迫改名换姓也有趣得很。但显然，缩短名字是身份“受损”的象征，同样避难至纽约的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这样形容流亡生活。²

180 美元的月薪（他将慢慢开始接一些零星的私活）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两者当然不能让这位年轻的教授变得富有，但他也没有经历过一次财务水平急剧下滑的危机。他完全能够负担生活开支，尤其对廉价的伙食费十分满意（他始终十分在意伙食费的问题）：一美元足够保证一天三餐均衡。像其他人一样，他对餐点的种类和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感到震惊：速食餐厅、熟食店、自由的进餐时间，以及他十分喜爱的自助文化。他的家书一直主题明确，还经常描述他三餐的内容。这自然是为了让

1 这是原文献中的错误。——译者注

2 西奥多·W. 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的生命之思考》（*Minima Moralia. Réflexions sur la vie mutilée*）：这是阿多诺流亡纽约期间（1944—1947）写下的一系列短文。其中提到的“损害”并不完全指代流亡，而指的是现代生活的异化。异化的现代生活与流亡的境遇十分相似。

父母放心，让他们感受到美国生活的魅力。他的典型套餐包括“一块厚厚的烤牛肉、烤猪肉或烤羊肉，或者，汉堡牛排（碎肉）配上土豆泥、菠菜或其他一些蔬菜，再来一点黄油，并根据喜好在法式圆面包、黑麦面包或英式面包中自由选择。我很少吃甜点，但如果要点的话，我通常选水果派——蓝莓、苹果或菠萝派，偶尔在上面放一勺冰淇淋”¹。但过于投入描述这些食物后，他也会表现出懊悔，于是在末尾生硬地补充一句：“想到欧洲时，我会感到愤怒和悲伤。”²



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父亲伪造的身份证件，证件上显示的名字是雷蒙·鲁斯-索尼尔（Raymond Luce-Saunier）。战争期间，他的父亲在塞文山脉避难，而克洛德则逃向美国，成了克洛德·L. 斯特劳斯。

1 1941年7月14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1941年5月30日的信，同上书。



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母亲伪造的身份证件，证件上显示的名字是爱玛·鲁斯-索尼尔（Emma Luce-Saunier）。两人都保留了姓名中的名与姓氏的首字母，即 Lévi-Strauss 中的 L 和 S。

到纽约后的第一周，他主要忙于寻找住所，很快便有了着落。能在纽约市中心发现这样的避风港让他感到惊喜，使他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又美好的印象，他甚至将纽约与浪漫主义风格的巴黎进行比较。后来，他写道：“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和朋友们定居在格林威治村，那里距离时代广场只有几站地铁，仍然可以像在巴尔扎克时代的巴黎那样，找到一套只有两三层楼、屋后带一个小花园的房子。在我到达几天后，当我拜访伊夫·唐吉（Yves Tanguy）时，我在他居住的那条街发现了一间单间公寓并立即租了下来，公寓的窗户面向一个荒废的花园。为了到

达花园，你需要通过一条长长的地下室走廊，走廊的尽头是被一幢红砖楼藏起来的私人楼梯。”¹ 该建筑的构造使人们避开了地下通道另一端来往行人的目光，允许他们平静、秘密地生活，因此，十分适合这位新租户。这个“古怪”的公寓，“位于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格林威治村的绝妙地段（相当于哈斯拜耶大道 [boulevard Raspail] 上靠近格拉内勒街 [rue de Grenelle] 和巴克街 [rue du Bac] 的位置）”，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更不用说那低廉的房租了。房租只要每月 50 美元。这个价格还包括了一名家政女工的服务——“一位美丽的黑人女性”——以及位于门厅的自动应答电话。电话可以替他记录上午 8 点至晚上 10 点收到的所有留言。

但最令他着迷的是，他的单间公寓实际上是一间艺术工作室，这样的工作室附近还有很多：一间宽敞的单人房里，宽大的窗户与玻璃天窗相连。这还是艺术街区格林威治村的一间艺术工作室。1914 年之前，格林威治村便已经成为纽约文化和夜生活的中心，这里有许多爵士酒吧；格林威治村也是纽约市艺术街区的缩影。因此，列维－斯特劳斯与其他流亡者拿它与遥远的巴黎做比较也有理有据。他们将格林威治村说成是“纽约的蒙帕纳斯（Montparnasse），蒙帕纳斯正处于波因特杜朱尔（Point du Jour）和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的当中”。有一阵子，他曾想过搬到曼哈顿西北方向学术氛围更加浓厚的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但他散漫自由的生活态度和格林威治村低廉的租金让他放弃了这种想法。让他坚定信念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学院正位于 12 号街和第五大道的转角处，与他的住处仅几步之遥。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41 年的纽约》（« New York post- et préfiguratif »），载《遥远的目光》，第 347 页。

第一印象中的纽约

外国人的身份让他观察城市的视线中始终带着批判意识，而这种倾向只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在最初的几周中，列维 - 斯特劳斯特踏遍了曼哈顿，进行了“梦幻般的夜行”¹。与圣保罗时的情况一样，几何规则、合情合理、方方正正的网格与城市的混乱格局形成了对比，他对此感到惊讶万分。纽约是一团“大乱麻”。“尽管我希望一切事物都拥有统一的标准，但我发现纽约比欧洲更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²他看到的一些公寓和一些商店橱窗“异常离奇”³。他迅速发现了充满异国情调的小众市场，他若从公共汽车中望出去，必然会在这座文化多元的城市里注意到这些市场：

“这些东方风情的市场堆满了棉质织物以及来自印度、墨西哥和印尼的羊毛织物”，它们让我们回忆起“我们的摩洛哥市场，但摩洛哥市场比它们更加讲究。你在这里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来自欧洲的古玩店”⁴。

他对摩天大楼或整个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进行了描述，他的姨妈艾琳就在洛克菲勒中心工作。他发现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令人咋舌”，因为这儿根本见不到火车的影子，所有火车站台都位于地下。他被“普通民众的文明礼貌”打动了，“任何场所都不存在社会阶级的隔阂”。这条街本身就是“一处不断更新的奇观”⁵。他跟随超现实主义的几位朋友去了几家小酒吧听黑人音乐，“这里到处都是水手和妓女，像极了马克·奥尔朗（Mac Orlan）的小说”，他感到十分兴奋。他在哈林区的大型舞蹈俱乐部“萨沃伊”（Savoy）度过了一个周六夜晚。这个活动现场让他回想起六年前刚刚抵达圣保罗时曾目睹过的相似

1 1941年8月13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1941年6月8日的信，同上书。

3 同上。

4 1941年8月13日的信，同上书。

5 1941年6月15日的信，同上书。

情节。那里是如火如荼的狂欢节，这里是非裔美国人充满活力的纽约。他通过一个晚上了解了这样的美国：“不计其数的黑人在美妙的交响乐音乐中翩翩起舞，丝毫没有巴西狂欢节中非洲人的特征。他们拥有美国风格，但仍然疯狂得像是被脏东西附了身。凌晨两点，舞蹈比赛开始，这个场地变得非同寻常。参赛者们是15—18岁的孩子，哈林区的穷人。女孩们给自己穿上了不可思议的服装，装扮成既有几分像体操运动员又有几分像芭蕾舞演员的样子，跳出了我所见过的最漂亮舞步。男孩们表演了一种随意的杂技式即兴舞蹈：他们抓住女搭档（双方交替进行），将她们扔向空中，完成一千个空翻，同时轻松地保持这种节奏，永不掉拍。”¹ 列维-斯特劳斯欣赏这些舞蹈，也对其他事物表示肯定，与圣保罗相比，纽约更受他的喜爱。这说明，他的心中已然有了明确的比较意识，因此，在美洲大陆内部寻找差异。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在美国的经历就构成了旧大陆和新大陆之外的第三个名词。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进行“三角剖分”²，任何直接比较都失去了意义。

最终，列维-斯特劳斯主动避开了叙述纽约流亡故事时容易产生偏颇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美国与欧洲对立起来进行严格的比较，这通常对东道国有害无利，因为根据法国传统观念中明确的反美主义，美国是非人道、唯物主义和大一统的代表³；另一种看上去不太老套的做法是寻找对等物，以便利用已知的事物学习未知的事物。古斯塔夫·科恩（Gustave Cohen）曾是索邦的中世纪文学教授，也将成为列维-斯特劳斯在新学院和高等研究

1 1941年8月5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参见文森·德巴恩：《如同镜子另一侧的爱丽丝：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Comme Alice de l'autre côté du miroir... Claude Lévi-Strauss à New York》），载《避难与流亡之地》（*Land of Refuge, Land of Exile [Terre d'accueil, terre d'exil]*），佛罗伦斯·古尔德讲座（The Florence Gould Lectures），第11卷，2009—2010年冬，第59页。

3 参见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美国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历史演进》（*L'Ennemi américain. Généalogie de l'anti-américanisme français*），巴黎：瑟伊出版社，2002年。

自由学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的同事，他将摩天大楼视为“现代大教堂”¹；瑞士人德尼·德·鲁日蒙极富原创性地认为，纽约是一座“阿尔卑斯山一般”的城市²，它拥有壮观的山峰——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以及蜿蜒曲折的深谷，山谷中风声呼啸而过。很少有人懂得欣赏纽约不规则的美，不规则给了这座城市一种特别的美国魅力，为了欣赏这种美，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视角。列维－斯特劳斯特从一开始就属于这少数几个人。到了纽约后寄出的第一封信中，他很快省略了寒暄，并补充说：“这是非常不合比例的。”³他发现，要想理解“大苹果”就必须完成视角的切换：“那些坚持认为纽约丑陋的人只是被感官误导，形成了错觉而已。他们还没有学会切换视角，而是坚持将纽约作为一个城市，并对大街、公园和地标建筑进行批评。毫无疑问，客观上说，纽约是一座城市，但欧洲人的认知建立于完全不同的标准（欧洲的城市景观）之上。而美国的景观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体系之中，一个欧洲完全不存在的体系。纽约之美与城市无关，而在于，一旦我们放弃先入之见，城市就转变为一种不受城市规划规则支配的人造景观。纽约之美的重要价值包括丰富柔和的灯光、遥远但依旧清晰的轮廓、摩天大楼和深谷之间令人畏惧的悬崖峭壁，以及一辆辆鲜花般五彩缤纷的汽车。”⁴

纽约的格局超出了城市的规模，后来通过“特大都市”（megapolis）一词得以概念化。“特大都市”这个概念本身是由流亡至美国的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创造的，他将职业生涯的一大段时间献给了美国。毫无疑问，

1 古斯塔夫·科恩（Gustave Cohen）：《致美国人》（*Lettres aux Américains*），渥太华：拉尔布尔出版社（Éditions de l'Arbre），1943年，第36页。

2 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日记（1926—1946）》（*Journal d'une époque, 1926-1946*），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第451页。

3 1941年5月30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4 《忧郁的热带》，第65页。

身为外国人，他们必须完成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主张的视角转换，并学会欣赏美国东海岸城市组织形态的独特之处。这种对城市的理解既包容了西方城市现代性实现之前的形态（鲁日蒙感觉“身处史前时代”），也预示着西方城市现代性的下一个阶段。因此，地质信息和对曼哈顿的波德莱尔式幻想就像矿物质和水。

民族学家成了纽约艺术家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肆意漫步，在漫步时不忘思考。他开始对纽约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1941年夏天，他坚定、决绝地发起了三次进攻：创作第一本民族学著作、加紧学习英语、勇闯美国学术界。

在撰写《南比克拉瓦部落的家庭与社会生活》一文时，列维-斯特劳斯打算解决两个紧迫的问题。首先，他认识到自己只有尽快用英语发表学术作品才能在美国学术市场上名声大振。这也是他决定翻译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原因。做出这一关键决定后，他开始完善参考书目（但英文文献仍然相当有限），语言水平也从初级的初级开始不断精进。其次，这项工作实际上无法按时完成。因此，7月期间，他参考田野考察的笔记，遵照学术专著的经典写作模型，完成了200页。原本，他希望这篇文章是他进入美国学术界的护照，但事实上，它成为他的博士辅助论文（*thèse complémentaire*），1948年以法语（而非英语）出版。他选择的篇幅对一篇学术文章来说太长，对一篇美国的博士论文来说又太短，因此，并不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但那时，列维-斯特劳斯希望对他多年前的民族学考察进行一次总结，他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有几个晚上，结束辛苦工作后，他失去了耐心，曾这样惊呼：“我已经在那里经历了这么多，也花了那么长时间进行研究，还

用了这么多文字进行讨论，我对这些印第安人感到厌倦。”¹当时，他只发表过一篇关于博罗罗部落的文章，他的不耐烦显然更多源于未能尽早完成这项工作的愧疚感。因为离开巴西后的两年里，他一事无成。

就像他的朋友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一样（他曾去这位“现代和尚”²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拜访），列维-斯特劳斯将自己锁在单间公寓里，向亲属关系体系的问题正面宣战。亲属关系体系是他未来巨著的主题。然后，他的单间公寓（studio）变成了真正的工作室（studio）：“我的墙上已经挂上了一大张美洲大陆的地图，书架上，我已经开始从社区的各大书店商那里购买了一些书籍³。[……]但是目前，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这些亲属关系体系。这个过程十分漫长，需要准备大量纸张。我将在这些纸上完成复杂的拼贴工作，绘制无数的网格。只有完成这些，我才能开始整理我的资料。这些步骤都结束后，我打算把这些纸贴上墙壁！”⁴作为民族学界的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列维-斯特劳斯开始投入分离亲属关系体系这项漫长而艰巨的工作中。知识经济的性质、需要的材料（纸、剪刀和胶水），以及这个空间的原貌（艺术家的工作室）使科学生产接近于艺术创造。

列维-斯特劳斯给自己买了单簧管，偶尔也会吹一吹。他利用短波广播频道收听“精彩的音乐会录播”，还得知了纳粹突袭苏联的消息。1941年6月22日，他写道：“这场战争中发生了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这位博学的美学家想找回“由黑色石头雕刻而成的印度纸镇烟斗”：“家里没有称得上精美的东西

1 1941年7月14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1941年10月16日的信，同上。马松被描述为“一位现代和尚，沉迷于研究图像之形而上学”。

3 他发现了几册黄绿封面的精装版《美国民族学局年报》（*Annual Reports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原版，将它们当作《圣经》一般好生呵护，保存了足足一生。

4 1941年6月22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可以吸引我的眼神或者让我想要伸手触摸，单调得让人难受。”¹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他调整了工作环境。新的工作环境符合他的口味，满足了他对美的需求。只有被美丽的事物环绕，他才能求真。咖啡桌上的烟灰缸——列维-斯特劳斯在东哈林区买了波多黎各产的黑色烟丝来抽——旁边是两尊雕像，“一具轻木雕刻而成的金眼战士握矛下蹲，准备突袭；另一个是小巧的图腾，顶部有两个瘦长的三角形，代表着某种鸟类展翅之姿”²。这种鸟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沉迷于这项研究工作中的手工活时，列维-斯特劳斯也意识到要想妥善处理大量的文献还需解决很多困难，他带着疑惑在相关学科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在拜访数学家安德烈·威尔（André Weil）之前，他向比利时同事巴尔津（Barzin）求助，希望巴尔津“利用数学逻辑的方法对印度土著的亲属关系系统进行处理，他是数学逻辑的专家”³。但这种尝试还是失败了。数学解决方案比他自己的经验派做法慢得多，厘清一个亲属关系网络将花费数月的时间。列维-斯特劳斯有些失望，但巴尔津却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野蛮人的这种交集使他兴奋不已，好像在做填字游戏或破解谋杀案之谜一样。”⁴此外，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匈牙利人）M. 赫尔佐格（M. Herzog）给他上了“音位学的第一堂课”，这是美国语言学研究的最新领域。经过6个小时，列维-斯特劳斯感觉“受到了一些启发，但完全不知所措”⁵。这些可能微不足道的逸事属于现代学术界“流浪汉小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一种对列维-斯特劳斯有利的局面（其他学科的同事们可以向

1 1941年7月20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克洛丁·赫尔曼（Claudine Herman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 Claude Lévi-Strauss à New York »），载艾米丽·朱莉亚：《作品背后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20页。

3 1941年7月7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4 1941年8月13日的信，同上书。

5 1941年12月9日的信，同上书。

他伸出援手）。日后，他也将因此建立更多成果丰硕的合作关系。他后来透露，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座建筑物中，数学家和工程师克劳德·E. 香农（Claude E. Shannon）全神贯注地研究信息的编码，并开始创造他的通信的数学理论¹，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² 信息论之父香农是一个想象力丰富、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人，他激发了雅各布森对语言 6 种功能的理解。战争期间，在格林威治村林荫的庇护下，解密这一种科学研究的范式巧合地出现于这里的同一个地址。

难民还是移民？

他决定由自己翻译自己的文章，这个决定十分及时，也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列维 - 斯特劳斯强迫自己保持高产的状态，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³，但他在那痛苦的“分娩过程”中获得的语言技能被证明是一项成功的长期投资。幸运的是，他可以依靠他的姨妈艾琳（她偶尔做一些翻译），艾琳是他的编辑。他还可以依靠一本“绝妙的出版物”，他刚刚买下了《罗杰词库》（*Roget's Thesaurus*）的廉价版本。⁴ 他独自学习美语的惯用法，但只停留于书面表达。口头上，他几乎没有机会进行认真的讨论，只是享受“电影盛宴”。新学年开始后，他需要在新学院开设一门英语课程，讲授南美洲的社会学研究。他又一次毅然做出决定。他决定直接用英语为他的学生上课，不参考任何笔记。他害怕会在自己的研讨课学生（总共 10 人）面前盯着笔记，一动也不动。这些学生组成了一个相当国际化的群体，很少在意语言说得是否标准。事实上，美

1 《通信的数学理论》（1949）：香农解释，所有的信息，不论其内容是视觉上的、听觉上的或者其他形式的，都可以用 0 和 1 来表示。显然，他对通信的研究为今天的信息系统和数字系统奠定了基础。

2 《亦近，亦远》，第 46 页。

3 1941 年 8 月 5 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4 同上。

国人整体上都并不将语言的标准化当作一回事。最后，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们在“相当亲切的基础”¹上“你一言我一语”²。一个人与英语这门语言的关系反映了他眼里流亡的意义和状态。流亡可以被理解为暂时的避难，流亡者自己的民族身份依然不变；而法国人的流亡则表现为知识分子身上强烈的优越感。安德烈·布勒东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害怕英语会“污染”他的法语，将自己困在堡垒中，完全拒绝学习英语。这种流亡是一种寻求援助的迁移行为，东道国只是充当了一个“援助站”，流亡者等待着好日子的来临³；但流亡也可能意味着长期的逗留和更为实质的融合，对移民者的社会、文化、职业和民族身份产生持久且变革性的影响。

二战期间，大多数德国流亡者选择向海外移民，他们中许多人申请归化为美国公民。然而，法国流亡者往往不会忘记自己的家园，成为一个对美国现实缺乏好奇心但紧密团结的群体。就像几个世纪前“反革命”贵族的流亡一样，许多法国流亡者在战争后返回故土。用夏尔·莫里斯·塔列朗的话说，他们什么也没学，什么也没忘。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这种法兰西模式。在“流亡的太阳”⁴的照耀下，他迅速成长起来，急于将年轻人的全部热情投入美国学术界，最终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那个夏天，适应美国文化和通过写作进行高强度的英语学习让他感到疲惫，甚至产生了体力衰竭的感觉，但总体上还是颇有

1 《自画像》，第21页。

2 1941年10月4日的信。

3 有关“割裂式移民”（migration de rupture）和“保留式移民”（migration de maintien），参见保罗－安德烈·罗森塔尔（Paul-André Rosental）：《保留与割裂：分析移民现象的新角度》（《Maintien/Rupture: un nouveau couple pour l'analyse des migrations》），《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1990年7—9月，第1403—1431页。

4 参见维克多·雨果：“尽管流亡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靠近某个太阳，因此，也更快成熟起来。”《海洋》（《Océan》），载《全集》，“经典丛书”，巴黎：拉封出版社，1989年，第273页。

成效的。确实，夏末，他已经能够将他 200 页的英语手稿交给罗伯特·路威。后者通读了手稿并发表了一些评论：一些段落即使对人类学家来说，也过于理论化，因此，需要加入更加具体的描述……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对其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美国博士学位论文的标准。两国学位该如何对等起来？这个棘手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身处美国的法国人普遍认为，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远远胜过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不应被那些渴望获得其他较低学位的求学者轻视。”¹但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则相反：“如果考虑在美国闯荡事业，与未来的同事保持一致更加符合策略。”²抵达美国后的最初几个月，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列维－斯特劳斯能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正面回应，梅特罗的功劳不小，他很清楚这一点。1941 年夏天，梅特罗放弃了耶鲁大学的教授一职，前往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他的新工作是在朱利安·斯图尔德的监督下，主持一项规模庞大的合作项目——整理南美印第安人社会已有研究成果，将其总结为《南美印第安人手册》。《南美印第安人手册》很可能是“未来半个世纪南美人类学研究的最高权威之作”，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向父母解释道。³他认为这项工作极为重要，他应当优先处理。我们应该记得，他受邀来到美国的条件之一正是参与这些编撰工作。在整项工作中，列维－斯特劳斯负责的区域“北至亚马孙州边界，瓜波河是西边和西南边的界线，东至欣古地区，南至是库亚巴南部的一条边界线，总之，包括了马托格罗索州的大部分地区”⁴。这个项目让他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使他在国际人类学界崭露头角，他虽“挣得不多，却收获了认可”⁵。几个月后，11 月 27 日，他在华盛顿特区

1 1941 年 10 月 26 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同上。

3 1941 年 6 月 22 日，同上书。

4 同上。

5 同上。

待了三天后返回纽约。华盛顿特区像是“非常富有但有些过时的温泉小镇”，让他完全失去了热情，但国会图书馆则让他十分震惊。梅特罗在华盛顿特区有一间办公室。“它的确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蜂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劳作，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史密森学会所处的建筑像“宫殿中间的溃疡”（即购物广场中间的溃疡）一样，旧美国的魅力被新建筑——尤其是那些用来安置最近成立的战争机构的建筑——所掩盖。在那里，他遇到了朱利安·斯图尔德，斯图尔德美国特质浓厚的学者风范让他觉得气宇不凡：“高个子，胡须修得干干净净，孩子般天真。”¹列维-斯特劳斯天真地以为，参加《南美印第安人手册》的编撰工作等同于已经将获得学术界认可的机会握在手里：“我将靠一本书来创造历史，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这本书的权威性可能持续一个世纪。”在他看来，访问史密森学会使他被接纳为“美国官方科研圣殿的正式成员”²。此外，他还应邀在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发表了部分手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梅特罗兄长般的帮助。这也再次表明他在短时间内成功融入了美国学术界。

最初的几个月过去后，尤其是艰苦得几乎像苦修的夏天结束后，克洛德·L. 斯特劳斯开始了活跃但不放纵的社交生活。他建立起一个跨越多个社会环境的社交网络，尽管他的社交关系在形成时少不了机会主义的作用：首先是美国人类学世界。他已经渴望成为法国人的滩头堡，这在他要求父母向莫斯（朱尔丹大道95号）转达的话中得到了证明。他“工作很忙，这里的每个人都十分想念他，尤其是博厄斯和路威（Lowie），他们想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忙的”³。然后是拉丁美洲的学术圈。他

1 1941年6月22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同上。

3 1941年9月17日的信，同上书。

获得机会成为一个拉丁美洲中心的领导人后，与拉美学术圈有了更多的联系，该中心确实日渐成熟，他认为这将立即使他成为华盛顿的专家顾问，他称，在华盛顿，文化领域正是热点。“我的老同事每天都以越来越强势但十分可笑的自尊心面对我。[……]但是，所有这些（为将要成立的研究所向南美洲各地写信）暂时看来是徒劳无用的，也许有一天，它们将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并帮助我建立人脉、展示自己的价值。”年轻的学者带有清晰的宿命论。他有时也会参加艾琳姨妈的密友米玛·波特（Mima Porter）举办的晚宴。米玛·波特将他介绍给著名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除了纽约的这些社交生活，他远离了围绕在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身边的法国流亡文人圈：“这些人都过着奢华的生活，我无法与之伍。纽约是一个庞然大物，纽约内部不同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许多独立的都市。这些城市堆叠在一起，却从不融为一体。我要补充一点，出于一千种不同的原因，我与过于喧闹的世界保持距离，我也不知道这样要持续多久。如果我与他们拉近距离，我也不会立马成为他们的一员，甜蜜不会来得那么快，远远不会。”¹他与前国民阵线政府航空部部长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拥有社会主义者的同袍之谊，当两人共进午餐时，他十分警惕纽约的戴高乐主义者。在书信中，为了避过审查人员的耳目，他还称皮埃尔·科特为“皮埃尔·德·玛耶”（Pierre de Maille）²。他与法国学者们也同样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尤其在开始讨论是否在新学院内建立一所法国与比利时联合学校时。列维－斯特劳斯被问及此事时，起初十分抵触，但最终妥协。之后，他马上后悔做出这一决定，准备“伺机改口”。对他来说，新学院本身更为重要。不仅如此，美国人也认为创建这样

1 1941年8月5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为了躲避审查主动采取的措施。

一个机构没有什么前景。“我不喜欢事情的发展方向，这件事与安德烈·L. (André L.)¹ 牵扯太深了，不是我的作风。过去的一周里充满了阴谋诡计、秘密交易，以及让我感到十分厌恶的管理手段。我花了一番功夫才得以彻底摆脱它，发誓再也不会参与这类公共活动！此外，除了打电话、准备法规文件和奉承那些可悲的老人——这些老人担心没有学生来念本科学位，一副精神衰弱的样子——之外，我还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我曾经十分享受议会生活，视其为一种荣誉，现在，这样的生活对我不再具有吸引力。除了无忧无虑地继续我的工作，期待工作节奏不被打断，我别无他求。过去的三个月，我一直埋头苦干，然而，我还必须整理一堆资料，发表一堆文章，因此，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年。”²

一开始，列维-斯特劳斯十分亲近美国文化，并未固守法国人的身份，这十分有别于其他流亡者。几年里，他的态度逐步变化。但从最初的几个月开始，他就表现出“穿梭于多个社会环境（其中不乏偏僻的社会环境）的优秀能力”³。洛朗·让皮埃尔 (Laurent Jeanpierre) 指出，他对纽约的回顾性描述表明他敏锐地抓住了流亡带来的机遇，即在大都市中发展（或回避）人际关系的机遇。

“就像城市的纹理一样，社会和文化的纹理到处都存在空洞。”⁴ 城市纹理的开放性为新发现提供了希望，让阿里巴巴的洞穴得以存在，也在互无干系的社会活动之间架起了连接的桥梁。这种社交能力和“多元”⁵ 身份带来的心理影响被他的姨妈艾琳清清楚楚

1 安德烈·L. 指的是安德烈·拉巴尔特 (André Labarthe)。他是自由法国的重要成员，但在伦敦与之彻底决裂。随后，他来到纽约，成为左派中戴高乐的反对方。

2 1941年9月26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3 洛朗·让皮埃尔：《流亡人思想的结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形成》（« Les structures d'une pensée d'exilé. La formation du structuralisme de Claude Lévi-Strauss »），载《法国政治、文化与社会》(French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第28卷，第1期，2010年春，第63页。

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41年的纽约》，载《遥远的目光》，第63页。

5 洛朗·让皮埃尔：《流亡人思想的结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形成》，载《法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第65页。

地看在眼里，艾琳发现她的外甥“更有人情味、更加仁慈、更加宽容，也更加可亲”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拥有冷面滑稽的功力，也懂得做客之道。在由新学院组织在乡下进行的一日游（新学院资金雄厚的资助者提供了经费）中，他主动“讲述野蛮人的故事”和扮演探险家，让接待方感到颇为愉快。与法国人相处时，他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评论了法国国内的局势和国际局势：

“特里斯坦·伯纳德的话被我巧妙地转述，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容[……]：我们‘布洛克’（意为‘冻结’）了账户，但还要计算布洛克轰炸机（Bloch）的数量。”²这是减轻焦虑和内疚的好方法。焦虑和内疚是纽约流亡者幸福生活的阴暗面。

纽约的自由生活

超现实主义者们

1941年春季末，已经有数百名欧洲艺术家聚集的纽约市正迎来一群几乎完全复刻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与传说相反，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远远不如事后的关注来得热切。“我们很难想象1940年代初期纽约的气氛，那里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难民，其中达利是主要人物，然后是俄罗斯芭蕾舞剧的舞台和服装设计师帕维尔·切利乔夫（Pavel Tchelitchev）和尤金·伯曼（Eugène Berman），还有刚从德国回来的包豪斯学校的德裔美国人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美国环境，乔治·格罗兹张扬的表现主义风格被磨去了个性。[……]这群人中，国际名人夏加尔（Chagall）、莱热（Léger）、蒙德里安（Mondrian）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按照出场的顺序，他们分别是马塔（Matta）、唐吉

1 1941年6月12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1941年8月20日的信，同上书。

（Tanguy）、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布勒东和马松——纷纷出现，但并没有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¹ 艺术史学家和古画专家罗贝尔·勒贝勒（Robert Lebel）后来成为纽约超现实主义者的密友，他曾描述这些大师是如何尴尬地退场、如何被礼貌地送离现场，甚至提到了他们的“准匿名性”。

马克斯·恩斯特刚刚与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结婚，唐吉的妻子凯·萨奇（Kay Sage）则拥有巨额财富，其他人几乎无法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流逝，画家和雕塑家的适应能力（他们善于充分利用自己身处异国的背景，也擅长销售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显然与布勒东或墨西哥的佩雷特（Péret）那样的诗人有着天大的区别。诗人们陷入了可怕的财务困境。超现实主义者典型的群居性，既是他们生存的本能反应，也是创造活动的必要条件。他们几乎都生活在格林威治村，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抱团取暖的特性就更容易得到恢复：唐吉和布勒东生活于11号街，罗伯特·马塔生活于9号街，马塞尔·杜尚也生活在附近。但纽约并没有真正的咖啡馆，因此，在布勒东的热情组织下重新相聚后，团体成员们在彼此的公寓见面。马松和唐吉移居乡下，其他人在周末探访他们。

这段法语名人圈不为人知的历史，年轻的民族学家也有份参与，尽管这些“星辰有些暗淡无光”。除了布勒东之外，他与马克斯·恩斯特相识恨晚，后来，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他还与杜尚、唐吉交好。杜尚是亲切的兄长，而唐吉的艺术作品是列维-斯特劳斯十分欣赏的，但他的性格被认为“不够随和”。刚刚成为纽约客的列维-斯特劳斯还在哈德逊西侧安德烈·马松的家中与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会面。不仅如此，离此不远处还

1 罗贝尔·勒贝勒，《巴黎—纽约双城，重温马塞尔·杜尚、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Paris-New York et retour avec Marcel Duchamp, Dada et le surréalisme »），载《巴黎—纽约双城展》，第69页。

生活着一个“好奇的人，或者说，猎奇的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将铁丝和钢板连接起来，创作了美妙的声音作品。它们具有非常复杂的结构，有些看起来像垂柳，有些像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的紫藤花或兰花簇，但都维持着纯粹的几何形状，整个装置在微风中摇摆、旋转……”¹ 这是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除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外，列维－斯特劳斯特还经人介绍了其他成员：罗贝尔·勒贝勒、勒贝勒的妻子尼娜（Nina）、艺术评论家乔治·杜徒伊（Georges Duthuit）（他也是马蒂斯的女婿）、雕塑家伊莎贝尔·沃尔德伯格（Isabelle Waldberg）和她的丈夫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Patrick Waldberg）。列维－斯特劳斯特这样对他的父母形容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这位不太真实的人物：“他靠吃利息过活，十分安逸，我不知道他从谁那儿继承了一笔钱，也不知道这笔钱是出于什么名目。这大概是一笔遗产，而银行还须替他精打细算，因为他是一个‘急性子’。[……]他十分疯狂，生活杂乱无章，曾经做过一些疯狂至极的事情：或在长椅上睡觉，或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很讨人喜欢。”² 沃尔德伯格具备艺术史学家的眼光，1930年代，他常常参观人类博物馆，让列维－斯特劳斯特对之钦佩不已，而他也从没有让好奇心旺盛的后者感到失望。除了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外，沃尔德伯格于1943年加入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从而将秘密特工的身份增加到他丰富的职业经历中。沃尔德伯格与这位年轻的学者走得很近，发现列维－斯特劳斯特参加了越来越多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活动。他给了我们一幅列维－斯特劳斯特当时的可爱肖像：“在我看来，他被赋予了我所谓的体面的外表：瘦长的身材、窄且轮廓分明的脸庞、深邃且洞察一切的眼睛；他的眼神时而迷惘、忧郁，时而表现出专心凝视的样子，仿佛处于高度警

1 1941年10月16日的信，参见《“亲爱的爸妈”：致父母的书信集（1931—1942）》。

2 1941年10月10日，同上书。

惕的状态，这是他的脸上常常出现的凝重表情；除了凝重的神情，他有时也会露出十分接近奈瓦尔的微笑。所有这一切让我想到了某位西班牙大裁判官对科学做出的判决，他将荣誉点的研究变为至高点的研究。”¹

列维-斯特劳斯拉斯和超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布勒东）身上有着相同的优雅举止，这使他们的对话充满了规规矩矩但已经过时的都市气息，这也透露出两人身上的贵族仪态以及若有若无的丹迪主义，布勒东的身上尤其明显，列维-斯特劳斯拉斯也有相似的痕迹。² 后者很快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游戏和活动，这是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黎带来的事物：字谜、解读塔罗牌、集体造句游戏，以及“真心话游戏——游戏的规则是说真话，但不能带污言秽语。尽管略有不同，但它有时也让我想起名为‘女才子’（Les Précieuses）的文雅游戏和朗布依埃酒店（Hôtel de Rambouillet）的沙龙活动”³。

他们一起在城市中漫步，品尝异国情调的餐馆。超现实主义者游览跳蚤市场的传统行程被淘古玩的活动所取代。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斯经常讲述马克斯·恩斯特是如何在第三大道上发现了一间迷你的德国古玩店，并买下了一件美洲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马克斯·恩斯特向我们介绍了这家古董商。我们并不富裕，所以，无论我们谁手上有闲置的几美元，都会将那件令人垂涎的物品买下来。恩斯特身无分文时，他会让其他人知道。我们的古董商找到了销路，出售的货物也越来越多。实际上，[……]它们来自一家大型博物馆，该博物馆正在淘汰藏品中被认为是复制品的那一部分。这种做法就好像博物馆里允许存在复制品一般！当古董商知道他有市场时，便成为我们与博物馆之间的中介。”这

1 《回忆似水》，第 583 页。

2 参见德尼·贝多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斯》，第 144 页。

3 《自画像》，第 21—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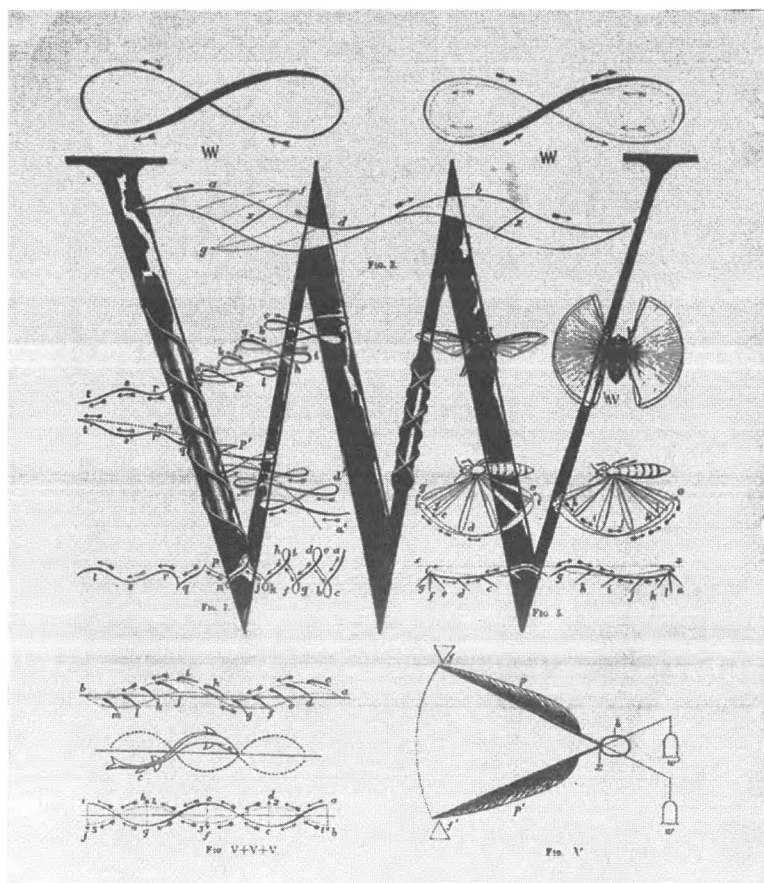
个过程的最后一步是，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所有人来到位于布朗克斯的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的仓库，直接挑选采购对象。几日后，这些商品就会神奇地出现在第三大道的古玩店中。这种意外收获重新定义了纽约，并证明了布勒东和列维 - 斯特劳斯特之间的“基本默契”¹。今天，当艺术和科学之间的默契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想象力仍能继续自由驰骋。²超现实主义组织表现出“高扬的求知欲”³，这让流亡生活的愉快氛围更具生命力，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段超出世人想象的友情破土而出。的确，两人与19世纪都颇有渊源，他们研究的对象也都是非理性和神话，尽管研究的方式各有不同。超现实主义与民族志之间的这些交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战争年代的纽约，列维 - 斯特劳斯特承认他须表示感谢：他须感谢超现实主义者，尤其是要感谢布勒东的洞察力，这是一种对美的灵敏嗅觉，类似猎犬一般的嗅觉。他对人类学物品的审美判断、洞察力的增长，以及大胆的叠加手法带给他的巨大冲击都要感谢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者教会我不要害怕马克斯·恩斯特在拼贴画中喜欢运用的毫无征兆、毫无章法的叠加。”⁴这种拼贴画的美学也是尚处于襁褓中的结构主义所需的养料，该结构主义否定了文化传播论，而主张切割和叠加。

1 《回忆似水》，第582页。

2 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知识分子和作家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 La nécessaire alliance des intellectuels et des écrivains »），《世界报》2000年2月10日。

3 《亦近，亦远》，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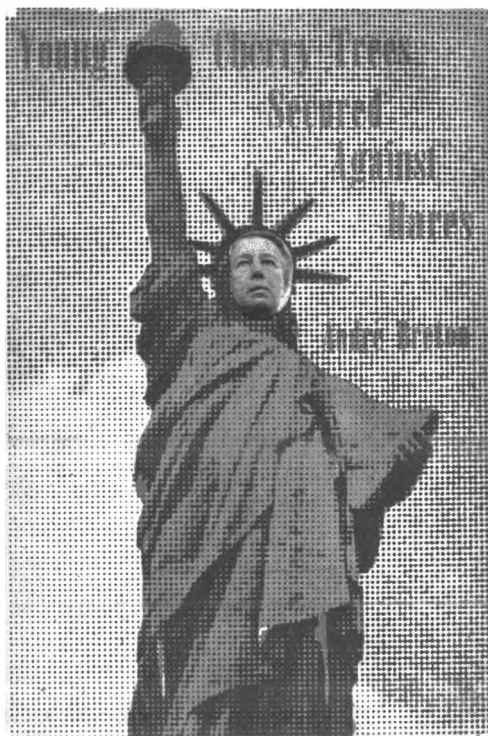
4 同上。



1942

NUMBER ONE

图为超现实主义刊物《VVV》第一期封面。战争期间，《VVV》在纽约出版发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投稿一篇题为《印第安人的化妆品》的文章。



1946 年，安德烈·布勒东在纽约出版了一本书，左图为书的封面。该蒙太奇照片为马塞尔·杜尚的作品。

布勒东试图重塑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但事倍功半。身为超现实主义的守护者，布勒东在纽约发行了超现实主义的杂志，但仍未能避免该团体成员同质性的消失。杂志的首期于 1942 年 6 月发行，其“编者的话”解释了标题缩写的来龙去脉：“VVV，即 $V + V + V$ 。这里有三个 V，V 不仅代表誓言（voeu）——我们势必要回到一个可居住、可思考的世界，也代表了胜利（Victoire）。胜利指的是，战胜目前地球上退化与死亡的力量，同时，超越第一个阶段的胜利，因为这个世界不能而且一定不会保持不变。因此，胜利也指，根除造成人与人之间长期奴役的原因。达成第二个阶段的胜利后，我们将迎来第三次胜利——消灭反对思想解放的任何事物。这是人类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期杂志的专题文章署名列维－斯特劳斯，题为“印第安人的化妆品”。文章里，列维－斯特劳斯重新谈到了卡杜维奥部落的绘画。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诗歌和一组超现实主义图像为文章提供了框架。在此基础上，这篇文章展示了这些花纹的神秘性，但只是向读者提供了印第安人脸部的绘画，没有开展新的分析。仅仅两年后，在同一个主题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和美洲艺术中的分裂》¹中，他给出了表示分裂的图案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基于卡杜维奥部落、太平洋西北部部落、古代中国和新西兰毛利部落的大量研究，通过对比没有明确定论的文化接触案例，提出了一种解释。他基于首次“形态的结构分析”，批评了文化传播的说法。²与他1936年的直觉判断相反，现在，他认为卡杜维奥部落的绘画不是西班牙人影响的结果，因为西班牙人登陆南美大陆的时间要晚得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分裂指的是隐性的阶级在空间上的表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分裂是多重人格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³（生物性与社会性、世俗与神圣，等等）。一个如此广袤的地理区域让他难以提前判断能够接触多少部落，直到他发现夸夸伊特人（Kwakiutl）的变形面具和钦西安人（Tsimshian）的木艺装饰品，他才确定，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部落之间的装扮风格保持着统一。他在第三大道的一间古玩店里以及在弗朗兹·博厄斯安排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房间里高兴地发现了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这些艺术。

1 论文以《亚洲和美洲艺术中的分裂》为题，发表于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期刊中：《复兴》（*Renaissance*），第2、3卷，1944—1945年。《结构人类学》一书也吸收了该篇论文，参见第269—294页。

2 同上书，第273页。

3 同上书，第285页。

窥镜另一侧的“暗道”：纽约的“隐秘出口”

“在纽约有一处神奇的地方，在那里，童年的所有梦想都一一实现，百年老树的树干或歌唱或说话，一件件难以形容的物品等待着游客们出现后做出焦急又呆滞的表情。[……] 它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天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开放参观，半明半暗的洞穴和摇摇欲坠的珍宝经过陈旧但十分高效的博物馆学研究方法的洗礼，让这个空间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它指的是博物馆一楼的巨大画廊，画廊展示的主题是西北海岸从阿拉斯加一直延伸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人。”¹ 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的艺术相遇是纽约经历的一大亮点，而当时，仅被当作一件小事。但这不是唯一的亮点：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特写下《1941 年的纽约》一文，文中，他回忆了纽约向他展示的“一千零一个阿里巴巴的洞穴”²，这座城市收纳了全世界的艺术遗产，允许那些冒险者像爱丽丝一般“穿过镜子抵达另一侧”³，镜子的另一侧是“仙境”：整个仓库塞满了莫奇卡（Mochica）、纳斯卡（Nazca）和奇穆（Chimu）的陶器，镶嵌着红宝石与祖母绿的金箱，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移民的遗物，一整套喜多川歌麿的木版画真迹（一个陷入困境的年轻男子准备与它们说再见），被一位德国男爵抛售的价值连城的秘鲁文物……

纽约绝不是人们印象中百分之百现代的城市，它将不同的时空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空间。它从方方面面模仿着 1970 年代的欧洲城市风貌，例如，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对世俗百态的包容，同时，也折射出七月王朝的法国——这是巴尔扎克在《金眼女郎》开头几页生动描述的法国。布勒东格外钟意这几页文字，

1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西北岸艺术》（« The Art of the Northwest Coast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发表于 1943 年的纽约，参见《美术杂志》（*La Gazette des Beaux-Arts*）。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 1975）的第一篇文章。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1941 年的纽约》，第 348 页。

3 同上。

曾发表了甚有远见的分析。他将巴黎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地狱的圈子进行了比较，有力地描绘了权力舞台的不断变化和社会流动的残酷性。社会流动不仅包括向上攀升，也包括向下跌落，是这一时期法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房地产投机活动造成的结果。¹ 巴黎利用同化和排斥的力量，保持着永恒的运动。这是一种有机的观点，也是 1941 年的纽约带给列维 - 斯特劳斯的感悟。就像潮起潮落一样，各个社会阶层的回收、重新分类、崩溃和重生也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垃圾”，这些垃圾被安置在大城市的角落和缝隙中，一旦失去了几乎全部的价值，就只能默默等待他人发现自己的存在。超现实主义者们尊重对位法规则，已经成为拍卖行常客的民族学家也顺从这一游戏规则——我们必须观察喜恶曲线的变化并且发现曲线的底端，才能定义何为美。这位颇具美学品位的民族学家在这个时代下，成为社会中的“垃圾收集者”²。

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我们既可以穿越时间，也可以穿越地理空间。列维 - 斯特劳斯发现了美国大都市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又一次预示了 1945 年后欧洲的变化，但对巴黎人而言，仍然是全新的事物。矛盾的是，纽约让他调动所有感官功能体验人类学。他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戏曲，常常观看演出，后来阿尔伯特·加缪也加入了他的队伍。每天午后到午夜，在布鲁克林大桥的第一个拱门下，一个多年前来美的中国戏班坚持表演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将它变成了传统。列维 - 斯特劳斯还常常光顾纽约的异国餐馆，尤其是中餐馆，对它们了解得越来越仔细。他那时结交的一个年轻朋友回忆道，他经常带她去中国餐馆，“点菜单上没有列出的菜品”³。他甚至用唐人街买的香辛料和一只北京

1 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用福楼拜《萨朗波》中阿米尔卡的军队来比喻纽约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参见《回忆似水》，第 581 页。

2 这是瓦尔特·本雅明在《外来人引人注目》（« Un outsider attire l'attention »）中对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描述。参见《外来人引人注目》，载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雇员》（*Les Employés*），巴黎：美文出版社，2012 年，第 136 页。

3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在纽约》，第 24 页。

烤鸭为她做了几道自己发明的菜，给这名年轻女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吃了 80 顿饭，吃饭便等于环游世界：“一天，我们前往哈林区吃大麦饭炸鸡；下一次，我们将尝试巴拿马龟蛋、炖鹿肉、叙利亚开菲尔、软壳蟹、牡蛎汤、墨西哥棕榈树蠕虫或眼睛清澈的章鱼。”¹列维－斯特劳斯特身处纽约，这意味着他身处北美，但他也可以找到中国和欧洲的痕迹，同时，还可以发现过去和将来。与他牵连最少的可能是“当下”。这台机器以难以置信的节奏在时间维度上来回移动，或追溯历史或展望未来，但它也成为足以消去“当下”的橡皮擦。这很可能是它最为致命的魅力之一。

因此，在纽约，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大众文化正有崛起之势，同时，这座世界主义的大都市已无力保护民俗文化——中国戏曲、意第绪戏剧、早期的美国民乐。纽约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城市，尽管与之形成矛盾的是，它并没有给布勒东提供任何灵感，布勒东也没有为它留下一字半句。文森·德巴恩（Vincent Debaene）称，它也是一个十分具有结构主义特质的城市：纽约存在复杂的“地层”，而纽约内部多重的时间与空间之间还发生着碰撞，这些因素使其成为“以分析多重认知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符号理论的实验室”²。这给了纽约它应得的正面评价，也高度肯定了列维－斯特劳斯特在纽约的经历。他本人认为，这段经历十分深刻。³纽约矩阵也以另一种方式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美学和结构主义认识论：它的突破、短暂的书信往来，以及“暗道”废除了时间独裁的统治。通过梦想、机会、游戏，以及通过丰富的情感和充实的脑力活动，人们可以摆脱历史的局限性。

1 《回忆似水》，第 584 页。

2 《如同镜子另一侧的爱丽丝：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在纽约》，第 60 页。

3 1964 年 6 月，列维－斯特劳斯特接受了《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访谈。他这样解释道：“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过得十分充实，因此，美国电影中所有能让我回忆起美国生活的内容都让我觉得非常亲切。这是影响我对美国电影评价的原因。”参见第 22 页。

这段历史“一步步地堵上了‘必然’这面墙壁上的所有缝隙”¹。纽约市充满了逃逸状态的甜蜜经历，与之相对，沦陷的法国被封锁、被围困，沦为纯粹的镇压对象，无法通过窥镜找到脱身之法。

学问与政治

1942年2月14日，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在纽约正式成立，3000人参与了成立仪式。战争时期，它的寿命十分短暂，但声誉得以延续。原因有二：第一，它致力于自由法国的事业之中，在学术界树立了威望²；第二，它位于第五大街66号的围墙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罗曼·雅各布森都在这里教书，两人的世纪相遇给我们留下了神秘的色彩，也让这里成为结构主义的诞生之地。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戴高乐主义和学术政治

建立“自由学院”是纽约戴高乐主义圈子的决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并未参与其中。该项目计划创建“法语学术国际组织”，收容大部分讲法语的难民学者。这项具有政治立场的学术倡议的目的既包括展示存活下来的法国文化，也包括将法国文化融入纽约市中心的这所“流亡大学”中。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年轻的社会主义人类学家不会马上就被这个项目吸引。但他将会成为该项目的一分子，并且变得越来越活跃。1944年，该机构面临发展危机，他同意担任其秘书长，之前，他将这个位子让给了亚历山大·科伊雷（Alexandre Koyré）。这所学院有一半像大学，有一半像法兰西公学院，是一所独具特色的机构。它位于学术生活与

1 《忧郁的热带》，第444页。

2 戴高乐认为，法国思想是两座“堡垒”之一，另一座是“剑刃”（tronçon d'épée）。法国尽管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但仍然可以依靠这两股力量。这是他重视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原因。参见《戴高乐演讲录》（*Discours et messages*），巴黎：普隆出版社，1970年，第335页。

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十字路口，在关门之前始终充满着流亡地位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它是一家常驻机构，还是战争的产物？是一个学术生产基地，还是政治代表的工具？是国际研究中心，还是代表坚持战斗的法国的勇敢旗手？“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究竟是什么？

自由法国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于1942年2月7日正式生效。根据这项法令，它的确是一所授予学位的大学，同时，它也迅速在当地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子。1942年2月，它招收了326名学生，开设了40门课程，拥有19名教师。1943年的第一学期，学生人数达到851人，常任或兼职教师共95人，课程达548门。学校受到了法国大学系统的直接影响，分为三大学院（文学、科学和法学）。学校的教职员中有几位声望甚高的学者，他们的公开演讲虽然没有吸引大批听众，也召集了一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前来听讲。托马斯主义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和古斯塔夫·科恩（Gustave Cohen）吸引了一百余名听众，把演讲厅塞得满满当当。物理学家让（Jean）和弗朗西斯·佩林（Francis Perrin）、数学家雅克·哈达玛（Jacques Hadamard），以及法学家博内（Bonnet）和米尔金-泽维奇（Mirkine-Guetzevitch）备受瞩目，他们总能获得听众的拥戴，并帮助学校在纽约建立一定的学术声望。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年轻、名声尚不响亮的学校职员，其学生数量十分有限。雕塑家伊莎贝尔·沃尔德伯格经常与罗贝尔和尼娜·勒贝勒一起参加他的民族学课程：“除了我们之外，最多只会有两名学生，但列维-斯特劳斯像是面对一大群听众一般教授这门课程。”¹1942年，5名学生注册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课。²

1 帕特里克·沃尔德伯格、伊莎贝尔·沃尔德伯格：《没头没脑的爱情》，第184页。

2 1942年3月2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的信。参见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保存的“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档案”。



图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宣传册。几名教师的头像也被载入其中。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还是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机构。除了免费的公开讲座外，它还举行了不对外开放的研讨会。研讨会由相关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主持与协调。学院内成立了三个“研究中心”和四个“研究所”，其中包括由让-贝诺瓦·雷维（Jean-Benoît Lévy）带领的戏剧与电影艺术中心（该中心表现得十分活跃）、由鲍里斯·米尔金-泽维奇（Boris Mirkine-Guetzevitch）坚定不移主持的法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是谢列斯泰·布格雷于1920年创立的社会文献中心的延续，洛克菲勒基金会作为资助方，通过乔治·古维奇（Georges Gurvitch）的渠道，成为社会学研究跨越大西洋的后备力量。乔治·古维奇参与了1917年2月的俄国革命，也曾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他将充分利用他的美国经验，成为二战后法国社会学的领导人之一。

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自然是社会学研究所的成员。该研究所有 32 名法国和美国学者，其中包括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皮特林·索罗金（Pitrim Sorokin）、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和地理学家简·戈特曼。但更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担任了拉丁美洲中心的秘书长，为其拓展了多个地方分部，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研究机构网络：民族学家雅克·鲁曼（Jacques Roumain）负责海地分部；安德烈·奥姆布雷丹（André Ombredane）及其圣保罗的前同事罗杰·巴斯蒂德、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和皮埃尔·蒙贝打理巴西分部；罗杰·凯卢瓦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国高等研究院，与罗伯特·韦伯－理查德（Robert Weibel-Richard）主持阿根廷分部的工作；随后又增加了一个墨西哥分部，由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领导，奥克塔维·帕斯（Octavio Paz）还参与了分部活动。美国人正在实施“睦邻政策”¹，因此，出于战略需求，对该中心饶有兴趣。法国人也对它有战略上的需求。法语仍然是南美文化精英传统教育中的第二语言，因此，身处纽约的拉美学子是法语授课课程的潜在生源。列维－斯特劳斯多次在纽约的法语媒体上发表文章，巧妙地在法国、美国和南美之间保持平衡。“有人可能会说 [……] 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巴黎曾经紧密相连，然而每过一天，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更加松垮，同时，华盛顿特区和纽约还促成了新的联系。这些新的联系不仅存在，也一天天紧密起来。我要说，从法国的立场来看，我们不应为此感到困扰。相反，我们应当也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强

1 罗斯福政府在第一段任期内推出的“睦邻政策”意在推翻 1823 年提出的门罗主义（doctrine Monroe）。门罗主义主张美国对南美有合法的干涉权。

这种联系。因为法国不该缺席这项泛美洲的伟大事业。”¹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存在讲座和研讨会两种教学模式，它们互为补充而非互相竞争。一种更符合法国习惯，另一种则更接近美国的教学传统。一种有可能使法国文化的“启蒙”得以永远延续，并让文化机构扮演政治角色，因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是法国事业在美国的前线。另一种源于更加神秘、谦虚同时也不设界限的教学方式，因此，清晰地向知识创新这一目标前行。1942—1943 学年，列维-斯特劳斯在哲学和社会学系开设了两门讲座课程以及两门封闭式的研讨课，同时为哲学和社会学系上课的有乔治·古维奇、亚历山大·科伊雷和雷蒙德·德·索绪尔（Raymond de Saussure）：每周四上午 8—9 点，第一学期，《种族与种族主义》（共 5 节课）；第二学期，《迈向人的新观念》（共 5 节课）；以及每学期每周四 9—10 点，《普通人类学》（每学期 15 节课）²。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抵抗带来了两个截然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概念：延续在法国遭到践踏的传统、批评需要重建的文化和政治遗产。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与自由法国建立了“非常牢固的精神联系”，作为位于伦敦的法国流亡政府的教育专员，勒内·卡森（René Cassin）亲口承认上述说法属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修饰“学院”（École）的形容词“自由”（libre）造成了模糊的空间，使其既可以吸引学术自由的支持者（他们总是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又可以吸引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事实上，自由法国组织通过发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拉丁美洲需要我们》（« Ce que l'Amérique latine attend de nous »），《为了胜利》（*Pour la victoire*），1943 年 7 月 4 日；《法国人与泛美洲主义》（« Les Français et le panaméricanisme »），《为了胜利》1942 年 1 月 24 日。列维-斯特劳斯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故事作为文章开头。这个故事说明，法国的影响已渗透拉美社会：1937 年，在戈亚斯州一个偏远的市镇，两名法国人遇见了一位老人。老人发现两人是法国人，以毫无口音的法语叫唤：“啊！先生们！法兰西！阿纳托尔，阿纳托尔！”老人远在巴西，对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表达了敬意。

2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主题档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3。

放一年一度的补助金，为该机构提供了部分资助，这部分补助金还包括了比利时流亡政府捐赠的1万美金。因此，温和的戴高乐主义者雅克·马里坦写信给戴高乐将军，感谢他对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前任校长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教授的逝世表示哀悼，这样的做法也显得合情合理。马里坦正要接过亨利·福西永教授职位：“学院将坚定不移地团结参与抵抗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共同对抗压迫。”¹虽然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未能成为勒内·卡森希望的一所流亡中的法国大学，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戴高乐主义运动中一股力量。这得益于以下原因：这里的教书先生政治立场十分明确，这里举办的辩论和讲座还被法语媒体和纽约的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此外，学院的学术成果十分突出。通过参与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研究机构的工作和发表学术成果，部分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立志成为二战后法国重建工作的专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其中一员。

列维－斯特劳斯与雅各布森：跨学科思潮的逐步形成

因此，正是在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列维－斯特劳斯才与罗曼·雅各布森结识。他们的相遇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诞生，为它提供了最初的灵感。列维－斯特劳斯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将之描述为一次顿悟：“那时，我只是一个天然的结构主义者，我身为结构主义者，对它却毫无认识。雅各布森告诉我在一门学科——语言学——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学说，而语言学是我知识的盲区。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启示。”²1976年，温习了雅各布森半个世纪前纽约的讲课后，列维－斯特劳斯“重新体验了34年前的那种

1 1943年3月20日，戴高乐将军给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电报。法国国家档案馆“卡森资料库”（fonds Cassin），参见382 AP55。

2 《亦近，亦远》，第62—63页。

兴奋”¹。列维-斯特劳스는经亚历山大·科伊雷的介绍才结识雅各布森的。因为人类学家正在寻求技术帮助，以“在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与一些巴西中部的未知语言作斗争”²。得益于两人的相遇，他“发现了结构语言学，因此，[他]能够将思考卢森堡边境某地的野花后得到的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一丝不漏的观点[……]”³。

列维-斯特劳스之所以能够跨越学科的界限，也因为他与一位年长者建立了持续一生的情谊。这位男性友人年长12岁，成为他成熟的兄长、导师以及学术上的榜样，让他钦佩不已，并且，从来不会令他失望。雅各布森是反法西斯的俄裔犹太人，曾在布拉格居住，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成员。在到达美国海岸之前，他穿过了饱经战火的欧洲，途经哥本哈根、挪威和瑞典，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冒险之旅。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深深扎根于1920年代初期革命烽火熊熊燃烧的莫斯科。它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其中，俄国形式主义、未来主义、立体派艺术和民俗研究互相融合，创造出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空间和知识生产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与1940年代的纽约十分相似。纽约有学者、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大型公共图书馆、丰富的原始艺术馆藏、研究型研讨会和波西米亚式的生活。⁴整个战争年代，雅各布森一直陪伴他的成长，改变了他作为学者的国家模式。列维-斯特劳스钦佩他有十分旺盛的体力。与年轻的同事不同，他喜欢喝酒，更喜欢讨论，直到凌晨才会叫停。他的体力也表现在惊人的语言能力，他能流利地说七八种语言。列维-斯特劳스还钦佩他源源不断的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的启示》（« Les leçons de la linguistique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为罗曼·雅各布森写的序。参见罗曼·雅各布森：《关于声音和意义的六堂课》（*Six Leçons sur le son et le sens*），巴黎：午夜出版社，1976年。《遥远的目光》也收录了这篇文章，参见191页。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一段友情的发展》（« Claude Lévi-Strauss: histoire d'une amitié »），《世界报》1971年10月16日。

3 同上。

4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137页。

好奇心，以及数量庞大、影响深远的书面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涉及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面世。雅各布森是演说家，也是作家，是一位真正的知识领域的竞技者，其跨国经历使不同学术传统交汇于一处。雅各布森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完美展现了一种成功的学术模式：他不仅学识广博，也极其严谨地进行理论上的突破；他的参考文献包容国际视野；他思考的问题甚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942—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特常常见到这个“伟人”。从1942年秋季学期起，两人都去对方的课堂捧场。雅各布森不仅与列维－斯特劳斯分享了他的语言学知识，还向他介绍了其他重要人物：弗朗兹·博厄斯——我们会再次谈到他——以及精神分析领域的成员。首先是同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教授的雷蒙德·德·索绪尔（Raymond de Saussure），雅各布森还向雷蒙德·德·索绪尔表示，他的父亲给语言学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其次是流亡中的精神分析家克里斯（Kris）、洛温斯坦（Loewenstein）和斯皮兹（Spitz）。¹就这样，一周又一周，在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封闭式研讨课上，在寥寥无几的观众面前，20世纪的重要思想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将亲属关系的体系当作一门语言，并且将这个体系中的每个要素理解为缺乏内在意义的音位，每个音位的意义在于它与其他构成要素在结构上的相关性。对不变量与潜意识现象的关注和重视是他新的研究方向，两者似乎分别受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启发而来。

事后，列维－斯特劳斯表示，如果不是因为雅各布森善意的劝说，他不会主动选择更不会坚持将其授课的内容记录成文字。他未来的博士学位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感谢它的学术氛围、制度保障、适宜的土壤和教学相长的环境。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特点是高度的学科

¹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一段友情的发展》。

交叉融合。但流亡使这种研究方法变得十分必要：汇集知识和资源是确保知识分子继续生存的一种手段。确实，他们有共同的图书馆，听对方讲课，并成为室友。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推动了法国社会科学研究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挂牌机构“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实践。这是结构主义诞生的特殊的机构体系，这种环境本身与结构主义所反映的学术创新——将语言学模型引入人类学——是同源的。因为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创新。¹这一创新发生于此时、此地，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瓦解了学科之间的壁垒。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创造了“醒悟”的条件。它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一套成熟的研究体系，这套研究体系拥有严谨的理论基础，因此，也可以应用于亲属关系的相关讨论，否则他也无从解释亲属关系之间的逻辑。近期，科学史的研究侧重于科学创新机制的研究，强调了创新与机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则倾向于将结构主义的历史与其诞生的机构背景脱钩，坚持认为这属于自己个人的突破。他始终强调自己与雅各布森美妙的友谊，对为两人创造相遇机会的那个机构绝口不提。

政治人类学家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是，尽管列维-斯特劳斯表现为一名出世的学者，但十分积极地参与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内部和相关场合中的政治辩论，与这一形象形成一些反差。他认为1940年法国的沦陷打击了自己1930年代的和平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仰，反复提到这样的描述。他的政治生活理当落下了帷幕，从那时起，他将始终做一个好奇而专注的旁观者，一生远离争斗：

1 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结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第1卷，《符号之“场”》（*Le Champ du signe*），巴黎：探索出版社，1991年，第34页：“正是从这一点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实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创新。”

“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后，我打心底里不再信任自己的政治判断。”¹事实上，在纽约逐渐成熟的学者形象只是大致上符合这一描述。根据他的举止、他的学识以及他对政治人类学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特成为这样一个人：他十分“希望重新在政治与社会学之间建立动态联系，但这种联系将完全不同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²。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内，列维－斯特劳斯特以戴高乐主义者的形象示人，十分亲近亚历山大·科伊雷和考古学家亨利·塞里格（Henry Seyrig）。亨利·塞里格和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一样，是伦敦驻美国使节之一。因此，他赞成将学校注册为美国的自由法国机构，即使这会损害其严谨的治学之道。这是教职工之中的一种立场。教职工们就二战后学校如何发展发生了争论，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态度：“那些认为自己完全是法国人的教职工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到法国并恢复他们的职业。在他们眼中，战争结束后，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应被解散。其他同事，归化为法国人才不久的外国人或二战前在法国避难的外国人并不清楚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们想知道法国的情势将会如何发展，保持观望态度。他们希望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继续运作，因为学院是他们与法国保持联系的纽带，让他们能继续受到美国的庇护。”³作为第一批难民营的成员，列维－斯特劳斯特继科伊雷之后，成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秘书长。1944年冬，他在巴黎生活了几个月，履行了秘书长的职责。然而，回到纽约后，他却惹怒了一些同事，于是辞职离开。1945年12月，他被任命为自由法国的文化参赞。成为文化参赞后，他提出了新的方案。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我是谁（上）》（«Ce que je suis, I»），《新观察者》1980年6月28日。德尼·贝多莱进行了引用，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第123页。

2 《如同镜子另一侧的爱丽丝：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在纽约》，第53页。

3 《亦近，亦远》，第69页。

我们还应指出，美国之音广播的法语节目中，列维－斯特劳也是“声音”之一。美国之音是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主要工具，每周，这个广播电台在世界范围内广播约 350 个节目，纳粹占领的法国也在广播覆盖的范围内。法文板块由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负责。在此之前，他是 1930 年代的新闻巨头，后来，他成为日报《法国晚报》（France-Soir）的主编。其他不同背景的人物也参与其中。列维－斯特劳与德尼·德·鲁日蒙（Denis de Rougemont）、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哲学家以及工会领袖保罗·维尼奥（Paul Vignaux）不同，他没有固定的专栏。就像为埃菲尔铁塔广播电台服务时那样，他只是一名播音员，还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演讲指定的法语旁白声，因为他的声音能更好地抵抗声音频率的干扰。他的团队里还包括安德烈·布勒东和乔治·杜图伊。美国之音是曼哈顿 47 号街上的一座巨型巴别塔，它广播的节目使用了 27 种不同的语言（包括斯瓦希里语！），雇佣了许多流亡者为其服务。在美国之音工作是聚集美国抗战力量以及维持生计的方式。参与无线电波的战争和“远距离抵抗”¹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抵抗方式之一。

列维－斯特劳是一名戴高乐主义者：他签署了效忠自由法国军队的协议，并被正式指派了在美国开展法国科学研究的任务。此外，他与许多戴高乐主义者或表现出这一倾向的对象建立了友谊。首先是亨利·塞里格，两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然而，两份文件清楚地显示，他并不是正统的戴高乐主义者，同时，也显示了他高明的政治手腕。第一份文件是列维－斯特劳写给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校长雅克·马里坦的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 1942 年 7 月。他不仅分析了法国战败的原因，还提出了解决法国困局的几个方案。

1 参见《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

这一页页纸虽未公开发表，却铿锵有力¹，其革命性的语气和颠覆性的内容胜过了千军万马：他对法国和英国这些民主国家的殖民历史提出了控诉，并指出，他们发起战争的目的与殖民地的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他认为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一场国际内战，并进行了一番论述。列维－斯特劳斯特先是彻底反驳了戴高乐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戴高乐主义者主张停战的做法并不合理，认为法国战败只是一时而非最终的结果，他还认为法国在1940年已全面溃败：“1940年6月17日，法国也许仍在坚持战斗，但是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著名的格言‘我们将会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更加强大’之所以显得悲哀，是因为它并不具有魔力，因此，既无法弥补我们力量的不足，也无法带给我们希望渺茫的胜利。同样，毫无保留地重复法国没有被打败的宣言也不会改变这种痛苦的既定事实。”戴高乐主义的信条被无情地否定。

在他看来，战争往两个方向发展。战争确实使民主制度与极权主义对立起来，但同时，在每个阵营内部，革命精神挑战了现有秩序，“新的人文主义的支持者也与传统价值的既得利益者对立起来”。在这场冲突中，民主国家处于极大的劣势，因为它们发现自己与某些原有目标出现了分歧：“在这里，极权主义运动的历史性发展可以戏剧的方式加以总结。时间上，它被压缩进不足20年的时间段内；空间上，它被推搡到欧洲这个舞台上。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欧洲自己作为主角，一直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欧洲试图将世界带向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消费的单一模式。同样地，法西斯主义主张赋予欧洲农业生产地的定位，仅德国一国保留工业生产的模式，尽管工业生产曾是欧洲各国为之疯狂的香饽饽。”指导民主国家开展斗争的社会准则并未实现，因此，

1 一份长达8页的非手写的备忘录。备忘录没有签名，对话的对象是雅克·马里坦。今天，这份文献位于美国圣母大学雅克·马里坦中心的“雅克·马里坦档案”中，档案盒编号17。1942年7月23日，马里坦给列维－斯特劳斯特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该文本的某些片段，我们可以根据这一点确定作者人选。

它们只有苦苦挣扎才能创造新的社会，这也是能够赢得战争的唯一力量：“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种族平等被认为是战利品，实际上，它们是胜利的前提条件。[……]这不是民主国家的胜利，而是迎接一个新社会的机会，这些民主国家可以在民主制度内接纳并体现新社会的存在（因为这也是它们唯一的机会），甚至必须这样做。军事胜利并未标志着世界转型的开始，而是世界转型的结束。”在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法国应该成为先驱。作者讽刺道，法国不该“小规模地”重复盟国在军事上的作为，法国可以也必须为这一社会变革提供精神食粮，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列维-斯特劳斯向往这样的社会制度和后殖民秩序，1942年，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的《民主制度的巨大考验》（*La Grande Épreuve des démocraties*）于纽约出版，列维-斯特劳斯为其撰写书评时，表达了同样的远见。书评带有高度评判性的口吻，它坚持以文字为媒介，在自由民主制受到威胁的情形下，为自由民主制提供深刻的辩护和生动的描述。“自由民主制走向黄昏，它最生动的形象无疑是一个步入垂暮之年的老人，像他的同胞们一样，老人忍受着寒冷和饥饿，在卡尔卡松（Carcassonne）的一间小旅馆里陷入沉思。”¹列维-斯特劳斯认为，19世纪的自由民主制未能成功将群众纳入其制度之中，使这一模式注定失败，并呼吁“建立一个有效、可行的民主制度”²。

第三份文件揭示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二战后法国的想象。他曾应邀以政治专家的身份参加1943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朱利安·班达〈民主制度的巨大考验：论民主原则的本质、历史与哲学价值〉评论》（《Compte rendu de Julien Benda, *La Grande Épreuve des démocraties*. Essai sur les principes démocratiques. Leur nature, leur histoire, leur valeur philosophique》），纽约，法国之家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1942年；《复兴》，第1卷，1943年10—12月，第4分册，第324—328页。战争期间，朱利安·班达躲了起来（主要躲在卡尔卡松），因此，避开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2 同上。

年2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平目的小组第23次会议，有多个美国国务院官员也出席了会议。¹两位年轻的法国人是新世代的代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参与政党活动的左派代表，直到1935年，他都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而保罗·维尼奥也是左翼人士，但从事的是工会运动，他于1937年成立了国民教育总工会（SGEN）。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自己对法国和欧洲短期与长期前景的思考，他坚持认为，以二战前的形势为基础想象欧洲社会的未来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份文件中，列维－斯特劳斯概述了未来的情形，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从经济、政治、殖民历史和精神风貌等各个层面与过去完全切割。根据会议记录，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二战后的欧洲由于制度的土崩瓦解将成为一块白板。建立新的制度并不难，因为旧的制度将被摧毁。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欧洲，不管它是否源自俄罗斯，西欧工人自己的能力仍主导革命，他们必须首先建立起自己的制度”²。首先，两名法国人都不赞成在短期内由盟国组建临时政府强行接管，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应由一个由总理事会和部门理事会组成的机构来确保过渡期内的管理秩序，彼时，法国社会正处于解放后的变革期，国家领导人将自然而然地从该机构中脱颖而出。戴高乐的名字一次也没有被提到。整场访谈中，列维－斯特劳斯展示了对地方政治的详细了解。他认为法国的弱点在于从拿破仑时代继承下来的过度集中的权力。中央集权可能曾是建立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权力过度集中于巴黎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并且，其破坏力已持续了

1 由杜怀特·E·迪（Dwight E. Dee）记录的会议报告《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平目的小组第23次会议（1943年2月8日）》（«23rd Meeting of the Peace Aims Group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8, 1943»），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0，属于“政治活动”主题档案的一部分。该文献是“保密资料”。

2 “他认为，由于国家制度纷纷崩溃，二战后的欧洲将从零开始。由于旧体制将被销毁，因此建立新的体制并不会十分困难。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欧洲，无论是否来自俄罗斯，它取决于西欧工人能否先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新制度。”

一段时间。他向地方行政官员和市议会议员致敬，认为社会党的最佳成员是各个市镇的市长。列维－斯特劳斯虽然主张彻底权力下放，仍然服从于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参议院尽管权力较小，却打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所有改革之举。关于殖民帝国的后续安排，他认为应该成全所有“准备独立”的殖民地（例如，印度支那以及有所保留的马达加斯加）。至于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所有穆斯林“个体”都应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其地位应与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相同：“每个人都应享有公民权利，无论其宗教习俗如何”（例如，穆斯林阿拉伯人中的一夫多妻制）。列维－斯特劳斯以文化多元主义和公民权利的普及政策为论点，认为阿拉伯世界将选择留在法国而不是要求独立。

他提出的最后一个主题回顾了“建设性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打击民族主义。法国解放后，民族主义很可能在法国社会重新浮出水面（特别是由于法国受到的屈辱），因此，需要寻找依赖国际力量这一传统思路之外可行的手段打击民族主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国际大国毫无用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可悲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国家主权的瓦解必须从内部启动联邦制；另一方面，建立经济机构将破坏国家内部各个团体之间的差异，例如，工人协会或企业协会之间的差异。”

这一毕提斯式的预言并未在解放后的法国应验。除此之外，列维－斯特劳斯的政治生涯只反映在人类学的学术出版物中。这些学术出版物涉及诸如权力、权威、战争、对待来客的态度，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上述三篇文章是他在纽约这些年发表的，虽然《忧郁的热带》中也能找到它们的蛛丝马迹，但在随后的系列出版物中绝了踪迹。他的美学著作经常被人引用，以亲属关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又还未完成，因此，这三篇文章给人一种政治

人类学将要诞生的错觉。¹

列维 - 斯特劳斯的论文《原始部落酋长的社会与心理研究：以马托格罗索州西北部南比克瓦拉部落为例》先于 1943 年以英语出版，后于 1947 年以法语出版。文中，列维 - 斯特劳斯展示了研究原始社会如何为当代社会带来全新的启示。在研究南比克瓦拉部落的酋长制时，他建立了一个国家理论，甚至为福利国家提供了人类学案例。研究该团体与其首领之间的互相让步表明，“国家为一种安全机制，这种说法最近因为有关国家保险政策（例如，贝弗里奇计划）的讨论而再次获得广泛认同，但它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基本性质的回归”²。在同一篇文章中，列维 - 斯特劳斯探索权力的起源和功能，为“互惠”概念赋予了重要的作用，使“共识”成为一切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人类学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将酋长解释为象征性的父亲，将国家解释为父权模式的结果，人类学反而为卢梭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论述提供了支持。卢梭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并不认同其反对者——特别是休谟——的观点，他们认为“契约”和“共识”不是次要的。对列维 - 斯特劳斯来说，这些是“‘文化’的原材料，没有‘契约’和‘共识’的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是不可想象的”³。这一结论与马塞尔·莫斯在其著名论文《礼物》中的主张相呼应。几年后，列维 - 斯特劳斯对两人在这一点上的联系上进行了解释。酋长的权力取决于其交流能力，同样，战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交流，尽管这属于暴力的交流。

1 参见洛朗·让皮埃尔：《流亡人思想的结构：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形成》；文森·德巴恩：《关于〈原始社会的对外政策〉》（« À propos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ne société primitive” »），《民族》（*Ethnies*）第 33—34 期，2009 年冬，第 132—138 页。

2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原始社会的权利理论》（« La théorie du pouvoir dans une société primitive »），载《现代政治原则》（*Les Doctrines politiques modernes*），纽约：布伦塔诺之家出版社（Brentano's），1947 年，第 51 页。参见《忧郁的热带》，第 317—318 页。

3 同上。

在《南美印第安部落的战争与贸易》（1943）一文中，人类学家认为，战争和贸易这两项活动存在关联，不能分开理解。有时战争也会爆发，但南比克瓦拉各部落之间发生冲突后，一般以交换礼物作为解决方式。因此，当战火蔓延全球，无人能够幸免，列维-斯特劳斯却“从早年的文献中对战争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战争不仅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战争不一定是群体关系出现裂痕以及群体危机的迹象；相反，是确保机构运转的正常手段。当然，战争使各个部落在心理和肢体上相互对抗。但与此同时，战争在它们之间建立了纽带，让它们能够互相交换货物。交换也许并非自愿，但不可避免，互相扶持对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¹。在这些政治人类学文献中，列维-斯特劳斯是一名反霍布斯主义者。这是绝望之中的乐观主义吗？在二战中，他展示了“战争和权力关系中互惠互利这一社会关系的合理存在”²。

洛朗·让皮埃尔认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作品中对战争本身的淡化和对交流活动的赞誉也是流亡心理造成的。法国人在美国，他主动成为两种国家文化的摆渡人。他意识到祖国遭受了掠夺和苦难，却并不能亲身体会。在认识和知识之间的遥远距离需要依赖历史想象才能减少几分，尤其是在欧洲犹太人遭受压迫的认识和未被掌握的这段知识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然而，人类学家声称自己缺乏历史想象力。因此，如果不是10年后《忧郁的热带》中出版的未曾公开的图片，以及波西（Bosch）式的“心理跟踪”（波西生动地描述了亚洲人口过剩和尸横遍野的景象），我们不能马上认识事发经过并有所体会。³

处于当下又远离当下。列维-斯特劳斯已经非常熟悉与“当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南美印第安部落的战争与贸易》（« Guerre et commerce chez les Indiens de l'Amérique du Sud »），《复兴》第1卷，1943年，第1、2分册，第124页。

2 洛朗·让皮埃尔：《流亡人思想的结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形成》，第66页。

3 维克多·斯托维斯基，《人类学研究作为救赎：列维-斯特劳斯的世界观》，从70页起；《忧郁的热带》，第132—140页。

下”的这种分裂。当他徘徊在被称为塞尔陶(sertão)的荒芜地区，寻找基本的生活形态时，他想到了肖邦。回到法国后，因战争的缘故，他被征召入伍，然而，心却留在了巴西。因此，流亡的状态与他的心理状态关系紧密，他流亡的状态有时被描述为“双重缺席”¹（他既不在祖国，也不在流亡国）。他在纽约四周飞来飞去，采摘美国花朵——野生花朵和温室花朵（图书馆、大学）——上的花粉，酿制自己的蜂蜜。但是，他在纽约的生活绝非与世隔绝。就像所有流亡者一样，抵达纽约时，他也“悲伤不已”²，不断为亲朋好友的命运忧心，他因流亡而痛苦，饱受折磨。1944年6月6日，盟军的支援抵达战场，他又回到了法国，回到了当下：“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在格林威治村的单人公寓，如往常一样醒了过来。小收音机已经打开，我正在收听新闻。我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内容，起初，有些摸不着头脑。渐渐地，我明白了过来，并抽泣了起来。”³

他应该回法国吗？应该留在美国吗？身处纽约的所有法国流亡者的心中都有了这个疑问。德尼·德·鲁日蒙说：“我们应该回去吗？有人告诉我莫里阿克(Mauriac)这样问：‘我们应该离开吗？’（他认为法国年轻人会回答不，他们不该回法国）；贝尔纳诺斯(Bernanos)大喊：‘离开，地球辽阔！’他们还告诉我，其他人抗议这场辩论是反爱国主义或反共产主义的，我不记得具体是反哪一个。巴黎的来信告诉了我所有这一切，还提醒我，我最好还是回去，否则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欧洲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法国的真实情况。我可以这样回应：应该是你们走出来，否则无

1 参见阿布代拉马列克·萨亚德(Abdelmalek Sayad)：《双重缺失：从移出者的幻象到移入者的苦难》(*La Double Absence. Des illusions de l'émigré aux souffrances de l'immigré*)，巴黎：瑟伊出版社，1999年。

2 《回忆似水》，第581页：“我们惊魂未定，仍然有些不适，但主要是感到震惊。流亡、停战、灾难性的后果和战争造成的无数个悲剧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脸上挂着1940年该有的警惕和不安，我们还为那些被抛在身后的亲友感到担忧，同时，渴望找回失去的幻觉。我们人人都有不幸的往事。”

3 《亦近，亦远》，第68页。

法掌握整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毕竟，法国人只有 4000 万，而地球却有约 30 亿居民。”¹ 是否返回故土的疑问发展为更加尖锐的民族认同问题。² 对列维 - 斯特劳斯而言，尽管他渴望返回，也不听美国这边的劝告，但这两个选择很快就被第三个选择所取代：1944 年冬天，为了决定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命运，他回巴黎待了几个月，然后，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命的文化参赞，再次来到纽约。换句话说，列维 - 斯特劳斯来往于两地。他承担着摆渡人的责任，具体而言，他是大西洋两岸的摆渡人。在他的流亡岁月及以后的岁月中，他不断地努力来回摆渡。

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社会科学处协调员罗杰·F·埃文斯（Roger F. Evans）坦白，他在纽约那些年的经历与流亡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布勒东）形成鲜明对比。事实证明，他的工作特别富有成效。他不断脱胎换骨，他的学术习惯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他分析问题的视角变得广阔，他的理论和书目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更不用说他的外表以及他的穿衣风格。他曾长期穿着纽约风格的衬衫。他彬彬有礼的举止，被认为非常法式，而他的穿衣风格则给他贴上了美式效率、民主精神和简约风格的标签。克洛德·L·斯特劳斯，美国人……他对美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心存感激：“过去几个月，在法国，我开始意识到我接受的援助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能够享受人身安全与精神上的安定，而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更重要的是，这四年来，除了努力维持生计和继续抗争，我还与美国的学者建立了联系，融入了美国的学术生活，成为美国图书馆的常客，最终取得了经

1 德尼·德·鲁日蒙：《回程日记》，1946 年 1 月，载《日记（1926—1946）》，第 581 页。

2 参见伊曼纽尔·卢瓦耶：第十章《从纽约到巴黎（纽约）：结束流亡》，载《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

济上和学术上的成果，因此，这是生活充实、成果丰硕的四年。”¹

1945年，列维－斯特劳斯已发表了几篇文章，此外，他的第一部大作进展顺利。他本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交叉培养”（*fertilisation croisée*）的最佳成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决定以全新设计的“法美文化合作”²来偿还他欠美国的人情债。他落脚于第五大街上的一幢大宅子，希望以法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成为这一项目勤勤恳恳的奠基人。

1 1945年5月29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罗杰·F·埃文斯（Roger F. Evans）的信。参见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档案系列编号200，档案盒编号52，档案袋编号610。“我们能够享受人身安全与精神上的安定，而那些留在欧洲的人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更重要的是，这四年来，除了努力维持生计和继续抗争，我还与美国的学者建立了联系，融入了美国的学术生活，成为美国图书馆的常客，最终取得了经济上和学术上的成果，因此，这是生活充实、成果丰硕的四年。”

2 同上：“我敢肯定，基金会的慷慨捐助不会白费，它已经为法美两国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未来，这一合作关系将会硕果累累。我相信，所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的幸运儿必将全力以赴，致力于法美文化交流事业。”

11 结构主义在美国

过去三年，从精神上讲，我收获了很多，但我可能要花一辈子才能完成我为自己设计的规划。我所希望的是，生活允许我这样继续前进。

1944 年 11 月 15 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父母的信

为了偿还两笔债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决定在纽约继续待上 2 年，1945—1947 年秋，他留在了美国。这两笔债务分别是：他欠美国的恩情：战争期间，美国为他提供了庇护，让他能够取得现有的成绩；他欠祖国的恩情：在自由法国和一群学者（包括许多流亡美国的学者）的努力下，他的国家获得了拯救，并浴火重生，这些学者现在负责开展新的文化外交。多亏了三位理想主义火枪手——亨利·洛吉耶、亨利·塞里格和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身为纽约法国大使馆的新任文化参赞，有能力重塑法美文化交流的格局，并加大双方互利互惠的力度。

作为非全职的文化参赞，他过着一种精神分裂的生活。一方面 是社交活动和源源不断的组织工作，为了开展新的文化业务，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他博士主要论文的手稿，他需要进行高强度的思考和写作，这需要花上另一番功夫，性质完全不同。尽管他坚持认为，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他的研究具有革命性，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应当感谢他的前辈们。这等于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进行检视。¹ 这

1 参见弗朗索瓦·埃朗：《亲属关系研究的重要人物》。弗朗索瓦·埃朗发现并分析了马塞尔·葛兰言及其学术作品对列维-斯特劳斯“隐秘”的启示。参见第 10 章《列维-斯特劳斯读葛兰言：隐秘的启示》。

项主要研究于1947年3月完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以1930年代人类学的范式为起点，一步步展开了节奏不快但勇往直前的旅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既是孤军作战的成果，也是他接触美国文化人类学产生的结果，与这个动荡、具有悲剧色彩但让它诞生的时代保持着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1945年之后，我们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助力，就能够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艺术和科学将成为推动新的国际主义落地的杠杆。在被称为二战后的短暂时期，上述计划似乎正在酝酿。在巴黎和纽约，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成立。它的创造者是痴迷于艺术的学者们，他们也与列维－斯特劳斯建立了职业关系或者社会关系。他们都渴望建立国际关系的新秩序¹，都是“文艺复兴者”²。建立国际研究实验室、组织国家之间大大小小的展览、促进学术交流、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共享创新成果：这些所有努力试图修复战争造成的破坏，并提出了普遍主义。人类学家近距离或远距离地参与了这些行动。例如，他从美国带回来一本书，其中涉及有关世界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立志于重塑人类学这门学科，为人类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础。这些新的发展视野既保护了现代性，又可以防止过去那些危险的转变再度发生。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仍然在纽约，但现在搬到了上东区。他放弃了自己在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换来了与他的新伴侣——以及不久后便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的家庭生活。

1 关于这一话题，参见《关于〈原始社会的对外政策〉》，第132—138页。

2 这是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于2012年6月19日接受作者的访谈时对亨利·洛吉耶形容。

远观法国解放

欧洲土地上无声的折磨：痛苦、喜悦和颤抖

列维-斯特劳斯以及许多流亡者虽远在美国，但也感受到登陆之日和随后巴黎获得解放的激动情绪。他们感到一丝愧疚，并且，由于朋友和家人长时间杳无音讯，愧疚的程度只增不减。1944年10月，他仍然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他知道，塞文山脉内的小镇勒维冈和瓦勒罗盖已于9月1日获得解放。后者是他的父母躲藏的地方（至少他这么认为）。他听说他的朋友热内·库坦（René Courtin）被要求担任一个重要职务，热内·库坦在法国德龙（Drôme）的家宅曾为列维-斯特劳斯提供了庇护，当时，列维-斯特劳斯隐姓埋名¹，化身为鲁斯-索尼尔（Luce-Saunier）²。获得要职是一件好事。他试图让自己放心，不仅努力寻找证据，还自言自语，展开了一种单向的对话模式。但面对“上千个疑问”³带给他的折磨，他承认自己已无法承受：“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离开坎卡拉了吗？为什么？”⁴与近亲重新取得联系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但在被美国军队解放的地区，这一过程要容易一些。因为美国军队能将信函带到美国。截至10月11日，他仍然一无所获：

“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军队的前进敲响了流亡的丧钟。无论如何，他都渴望回到法国（他承认对法国当下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中保存了克洛德父母的假证件，它们可以证明列维-斯特劳斯一家曾隐姓埋名。在伪造假身份的过程中，他们将真实姓名的首字母保留了下来。这也理所应当，因为，他们将过上隐秘的生活，与过去的日子彻底告别，希望身份特征以某种形式继承延续下去的欲望十分强烈。

2 热内·库坦是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的同事，1940年，两人在蒙彼利埃再次会面。他也是拒绝向维希政府效忠的众多教师中的一人，因此，被撤了职。他参加抵抗运动，是1944年8月20日巴黎抵抗政府（Gouvernement insurrectionnel de Paris）的成员。法国解放后，他参与创立了《世界报》，是其创办人之一。

3 1944年10月2日给父母的信。这一引文以及下面几条引文均来自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寄出的信。这些信的日期介于1944年10月2日至1947年8月21日，收件人是他的父母。这部分家书由莫尼克·列维-斯特劳斯个人保管。

4 同上。

并再次意识到自己是位于纽约的外国人。1944年11月15日，他收到了经葡萄牙中转来到美国的信，得知“这么多人失踪，那么多不幸的悲剧”，他一言不发，变得“忧心忡忡”。他对历史产生了深刻的理解，恐惧也进一步加深。

11月30日，他终于收到了父母的电报，结束了不确定带来的磨难。然而，他却没有皮埃尔·德雷福斯或罗斯－玛丽·乌尔默（Rose-Marie Ullmo）的消息；马塞尔·莫斯也杳无音讯，10月2日，列维－斯特劳斯给莫斯写了一封冗长的问候信，从信上看，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莫斯久病缠身，病痛已经困扰着“他旧时的师长”多年。¹ 利维医生亲自为列维－斯特劳斯送信，信中抒发了自己流亡过程中的情绪：“没有必要分享过去几个月我们所有人都有的感受：这是一种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磨难的混合物，但你们身在大洋的另一侧，文字只能苍白地描述你们的亲身感受。”² 列维－斯特劳斯传达了他的美国同事对莫斯本人及其工作的喜爱和钦佩之情，也试图形容自己是如何逃脱灾难的：他怀揣救赎的心态勤奋治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努力赢得了一些思想上的战利品。这封信给人的印象是，他觉得自己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战争期间，他居住在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幸福的人”：“这三年里，为了替自己辩护，我孜孜不倦地工作，希望以绵薄之力，推动欧洲早日实现思想和科学的复兴。因此，我努力工作，我认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完成了一本有关南比克瓦拉部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书；我还开始了另一项写书的计划，但研究的视野将更加开阔，内容也将更加丰富，目前该计划进展顺利。”他表示，第二个计划的成果将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且已完成了

1 那时，莫斯一直待在巴黎，但已经几乎意识不清。参见《跋：战争岁月与战后岁月》（«Épilogue: les années de guerre et d'après-guerre»），载马塞尔·福尼耶（Marcel Fournier）：《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4年。

2 1944年10月2日的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81，“书信”主题档案。下面几条引文也出自同一封信。

1/3, 该研究“与您的领域有所不同, 但对您的想法进行了拓展”。然后, 他解释说, 他曾试图完成“亲属关系体系的典型化和婚姻制度的系统化”。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人类学中“亲属关系”“联盟”这两个经典的研究主题时, 以两种方式评估了他的作品提供的附加价值: 它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参考书目十分丰富(“虽然还不是很详尽”), 研究方法具有独创性, 他提出了大量经验材料的组织方式。两者在根本上都与他的流亡状况有关: 一方面, 美国图书馆资料丰富; 另一方面, 他与 1930 年代法国人类学知识模型之间保持了距离, 法国模型以博物馆、收藏的物件和“师长的建议”为基础。列维-斯特劳斯当然不是这样说的。他表示自己即将访问巴黎, “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莫斯], 并可以向他寻求建议, 在[他]写书的过程中, [他]十分需要莫斯的建议”。然而, 在博士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诞生过程中, 他的认识论之所以能够除旧迎新, “结构主义”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够形成, 也许是因为他摒弃了欧洲的学术框架, 接触了其他学科的范式(结构语音学)以及新的研究材料(北美印第安人的文献资料), 融入了新的研究环境(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社会环境(超现实主义)。列维-斯特劳斯进行总结时, 因写下“这样一封以自我为中心”的信而向他致歉, 并再次强调, 十分期待不久后在巴黎与之相聚。1944 年 6 月起, 他取代亚历山大·科伊雷, 成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秘书长, 他将返回巴黎, 解决这所学校的未来发展问题。

1944—1945 年冬, 巴黎

没有多少流亡者希望在此时机返回法国。但是, 列维-斯特劳斯的巴黎之行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战争还未结束, 他得到了随同美国海军护卫队一同行动的许可, 1944 年 12 月, 护卫队将

他带到了英格兰，然后“乘坐美国卡车”¹，途经狄普佩，最终抵达法国巴黎。这趟旅程历时三周。

1944年10月23日，罗斯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法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身处美国的流亡群体在重建法美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亨利·博内（Henri Bonnet）曾是流亡者之一，也曾任高等研究自由学院担任教职，现在，被任命为法国驻美大使。此外，曾流亡于加拿大的亨利·洛吉耶将他所有的精力投入法国海外事务局（Service des oeuvres françaises à l'étranger, SOFE）的变革中。这一机构将被调整为对外文化关系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extérieures, DGRC），法国外交部下设的一个具有行政和预算自主权的全新机构。根据法令，1945年4月13日，对外文化关系总局正式成立。²流亡的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对洛吉耶来说，法国只能依靠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传播影响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列维－斯特劳斯特一样，洛吉耶也曾学习过美国的思考方式，思考问题时具有国际视野，他心里清楚，法国在大国排名中的地位已然下跌。因此，文化外交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它与戴高乐将军对法国流亡群体造成的思想上的影响力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3年10月30日，在阿尔及尔（Algiers），当戴高乐发表纪念法语联盟60周年的演说时，他向高等研究自由学院表示致敬。³1944年的新法国仍然处于战火之中，文化外交及其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都是相当重要的。

1944年春，美国司法部强制要求高等研究自由学院遵守《外

1 《亦近，亦远》，第69页。

2 参见尚塔尔·莫雷尔（Chantal Morelle）、皮埃尔·雅克布（Pierre Jakob）：《亨利·洛吉耶：超越国界之人》（*Henri Laugier, un esprit sans frontière*），“LGDJ丛书”，布鲁塞尔：布吕朗出版社（Bruylant），1997年。

3 戴高乐：《戴高乐演讲录》，第335页：“某天，当历史学家远离我们身陷的乱局，认为这些几乎使法国万劫不复的悲剧事件不会重演，他会发现抵抗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抵抗，我们要紧紧依靠在两座堡垒上，绝不退让。一是‘剑刃’，二是法国思想。”后来，在演讲中，他致敬“纽约的高等研究院，它是绝望风暴最强烈之时法国人完成的伟大作品”。

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理由是，学院中的许多教师都参与了自由法国的政治活动。此后，校园里处处可见激烈的辩论。这项美国法律提出的要求将这所高等学府内部的矛盾揭露了出来。这是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性质造成的矛盾：它既是一家知识生产的机构，因此，二战后仍有可能融入美国的学术体系；同时，如我们所知，它也是一个因战争而生、为战争而生的具有党派倾向的政治机构，其宗旨是为戴高乐将军集结力量。

一部分人认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精神价值和政治价值大于其科研和教学功能，此外，这种政治与学术兼容的机构形式在和平时期也无法继续发展下去。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也这样认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来到巴黎，希望确定这所学校未来的道路。一些人希望留在这家逐渐美国化的机构中，另一些人认为它的生命已经结束，它的使命已经完成，因此建议解散学校，而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第三条出路。他建议将学校与另一个更大规模的机构合并，但教职人员应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一些老师将返回法国），学校的功能也将有所改变。吸收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机构是“美国文化服务中心”（*Centre d'action culturelle en Amérique*），又名“法国欧美基金会”（*French European-American Foundation*），它将主导并负责法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列维-斯特劳斯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这个高等研究自由学院问题的进阶版解决方案，他希望得到对方的全面支持，而不仅仅是经费上的支持¹。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整个机构可以分为四个部门：人类关系（社会科学、公民社会代表、协会、市政机关等）、人与环境（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应用科学）、社区生活（思想表达、思想传播、电影、

1 1944年11月13日给约翰·马歇尔的信。参见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档案系列编号200，档案盒编号52，档案袋编号609—610。

广播、新闻、出版等），以及由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变化而来的法美联合高等教育中心。该中心“不再以一般的学生作为服务对象，而是向广大知识分子以及经过认证的专家开放，向他们展示一种高质量的法语教学‘样本’，同时，既不提供实质性的课程，也没有考试要求”¹。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待了几个月，一直停留至1945年5月。像往常一样，他轻描淡写地谈论自己扮演的角色，调侃他在巴黎的斡旋不值一提。在他的记忆中，那年冬天是在“文化关系处（Direction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度过的，文化关系处搬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拜伦勋爵街上的一家旅馆中，这家旅馆陈旧得很”²。在那里，他负责为希望造访美国的人们提供帮助。除了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还有“当时的著名女歌唱家珍妮·米修（Jeanne Micheau），她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香水味道浓郁，用绳子牵引着两只大狗”³。梅洛－庞蒂还教他什么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试图打破笛卡尔和康德的传统，重新构建一套伟大的哲学学说”⁴。他将自己描绘成潦倒的法国政府的某个角落中没有姓名的小职员。实际上，他全程参与了新政府的重建，其间，见证了新移民的到来。新移民的到来给了他重新思考、发现以及平衡法国海外文化影响力的契机。从1945年1月起，新文化关系处的负责人亨利·洛吉耶先后任命了14名文化参赞。他们中包括多名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老师。在美国，亨利·塞里格自1943年9月以来一直服务于他的岗位。他是一位有些名声的考古学家，专业领域是古代叙利亚。他不仅具有艺术欣赏能力，而且是一名谨慎但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是一

1 《有关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报告》（« Rapport sur l'avenir de l'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 »），未注明时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3—214。

2 《亦近，亦远》，第 69 页。

3 同上书，第 70 页。

4 同上。

位难得的人物，拥有洛吉耶那般的品格，不仅与艺术家们相交，还结识了科学家、政治家。¹他热忱地希望能够继续在黎巴嫩开展研究，因此，辞去了工作，与其挚友列维－斯特劳斯告别。1945年12月，他将其职位交给了列维－斯特劳斯。后来，他在黎巴嫩贝鲁特（Berutt）成立了法国近东考古研究院（到1967年，他一直担任院长一职）。两人曾一同出现于1945年美国媒体刊登的一张照片中，当时，他们正在纽约参加一场以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主题的展览的开幕式。照片中，两人亲密无间但又互相敬重。²在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前途问题上，初具文化参赞风范的列维－斯特劳斯呼吁美国基金会的联系人采纳其建议，像是一名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学术政策的创意型企业家。1945年5月，当他回到美国时，他还未被正式任命为文化参赞，只是临时接手这份工作。

巴黎的这几个月时间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具有多重意义。他再次见到了家人：他的祖母“非常活泼开朗”³，他还见到了他的阿姨们、朋友们以及迪娜。迪娜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让他松了一口气。为何要离婚？重返巴黎也让他能够与罗斯－玛丽·乌尔默有了相聚的机会。战争爆发前，他就与罗斯－玛丽发生了婚外情。⁴后来，他向父母解释称，他无法想象失去了她该如何生活：“在战争的四年间，尽管发生过一些迷人的意外插曲，但我逐渐意识到我对罗斯－玛丽的关心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我一直在等待返回法国的机会，好让我确认这些感情的真伪。至少我没有感到一丝失望，反而感到十分满足。现在，我很难忍受没有她

1 他还是女演员德菲因·塞里格（Delphine Seyrig）的父亲。德菲因·塞里格小时候就和列维－斯特劳斯打过照面。参见《亦近，亦远》，第71页。

2 1944年11月15日，克洛·列维－斯特劳斯给父母的信，信里谈到了塞里格：“我很喜欢这位朋友，十分欣赏他。”随信还附上了照片。

3 1945年1月24日给父母的信，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179。

4 参见本书第9章。

的生活。我选择了她，这可能让其他人十分惊讶，但这便是我的决定。我从未厌倦她的陪伴，我开始了解她的勇敢、幽默、温柔和慷慨，这些都是她的优秀品质。她总是开开心心的，容易满足，不仅打心底里乐于助人，也十分有耐心。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充满纯真和孩子气的人，这让我倍感自在。最后，在我这个年纪，人们已经学会不信任自己的情感，然而，我们的感情以及对彼此的依恋居然经受住了相隔两地的痛苦以及其他考验，在我看来，这就是没有找错对象的明确信号。”¹

为什么列维 - 斯特劳斯选择她会如此令人惊讶？首先，列维 - 斯特劳斯的父母非常熟悉罗斯 - 玛丽，因为她的姐妹嫁入了德雷福斯家，是皮埃尔·德雷福斯的亲人，并且像他们一样，拥有阿尔萨斯犹太人血统，她还与他们同属一个巴黎的大家族。虽然列维 - 斯特劳斯在巴黎的亲戚网络十分庞杂，这个家族基本上避免了旁逸斜出。列维 - 斯特劳斯做出与罗斯 - 玛丽·乌尔默相伴的决定时，他已远离法国 10 年，正准备启程返乡。罗斯 - 玛丽的父亲爱德华·乌尔默（Édouard Ullmo）在 1870 年后离开了阿尔萨斯。他并没有搬到法国首都，而是选择了与表兄弟，即皮埃尔·德雷福斯的父亲，去萨尔瓦多碰碰运气。他们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以及一家萨尔瓦多当地的银行（宣教银行）。他们发了大财后回到了巴黎。因此，罗斯 - 玛丽在大资本家家庭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无忧无虑。但犹太人家庭非常注重礼节、习俗、互助，有时还有代替育儿的传统。作为皮埃尔·德雷福斯童年的伙伴，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也常常出现在罗斯 - 玛丽的面前，于是，三人相伴长大。1940 年，幸福的生活告一段落。当时，罗斯 - 玛丽已经嫁给了让 - 皮埃尔·卡恩（Jean-Pierre Kahn），当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流浪生活来临之前，她还必须面对家庭变故带来的切肤之痛：她的丈夫将她交给她的一个姐妹后便

¹ 1945 年 12 月 3 日给父母的信。

弃她而去。这给她造成了双重伤害。尽管如此，她的好性格并没有因这些磨难而发生太多变化。1944 年春天，她与列维－斯特劳斯团聚。这些年，她与皮埃尔·德雷福斯和他的妻子劳雷特（Laurette）一起，过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劳雷特是自己的姐妹，而她的父亲则躲在蒙特卡洛（Monte-Carlo）的一家旅馆里，余生都未曾离开一步。她仍然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也是她的朋友所认识的——那个迷人、乐观、有点孩子气且无忧无虑的女子。她喜欢出门寻找消遣，希望弥补人生低谷时失去的欢乐时光。她当然算不得知识分子，但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与她结合的理由十分简单：她与迪娜·德雷福斯完全不同。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他的密友也无法参透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¹

二战结束后，巴黎的供热不足，食物也不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只能基于“这里或那里听到的描述”²，想象人们曾经经历的事情，远远地感到不安。这几个月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一一细数三年内战争的压迫和人性的丑恶，从精神上快速追踪这些危险时刻，尤其是要追踪他的父母经历过的一桩桩坏事。他去查看了拉瓦锡街 22 号的公寓，他的父母在战争开始时搬入此处。他发现里面住着一个女人，明知屋子的所有权人仍然在世，她也无意离开。列维－斯特劳斯趁还未离开坎卡布拉，决定提起法律诉讼，驱逐侵权人。当时，权利遭受侵害的许多犹太人都采取了同一手段。又一次，战争及其余波给了他一击，尽管时间上有所延迟。他的父母已一无所有。他们的公寓已被掏空。因此，他请父母起草一份家具清单，以便提出赔偿申请。这份清单让我们可

1 感谢洛朗·列维－斯特劳斯向我提供这些细节。皮埃尔·德雷福斯的女儿西尔维·德雷福斯－阿瑟欧（Sylvie Dreyfus-Asséo）透露，“（德雷福斯）一家人都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家里人并不看好两人这种亲上加亲的结合：一边，罗斯－玛丽来自乌尔默家族，乌尔默家族与德雷福斯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另一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皮埃尔·德雷福斯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因此，算是半个德雷福斯家族成员。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每次从国外返回巴黎时，他都会去法让德里路（rue de la Faisanderie）找皮埃尔·德雷福斯。2011 年 10 月 6 日，西尔维·德雷福斯－阿瑟欧接受了作者的访谈。

2 1945 年 1 月 24 日给父母的信。

以一窥资产阶级室内的摆设。其中包括累积下来的家族财富以及中国工艺品（上了漆的托盘）：萨克森的瓷器、一副立体镜、百代留声机与一批唱片、160本硬装或软装书（其中许多是第一版）、两幅夏洛－德尔维耶（Caro-Delvaile）的现代绘画作品、两条印度旧羊绒披肩、一个塞夫勒产的瓷器花瓶、一个悬挂着的铜制凿式烛台、约30幅雷蒙·列维－斯特劳斯的油画和色粉画作品，以及一本邮票集。这些东西一件都没有剩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童年回忆也随之而去。直到1961年，犹太联合社会基金会（Fonds social juif unifié）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取的法律行动有了回报，已经失去丈夫的爱玛·列维－斯特劳斯收到了20140法郎，作为德国发起战争的补偿金。¹

巴黎之行的几个月带给他丰富的情感经历和深刻的历史感悟。这与此刻列维－斯特劳斯向往的生活完全不同。相对远离战争的纽约岁月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在此期间逐步形成，还因为在此期间，民族学家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对学术生活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收获了哲学和政治生活都没能给他的满足感：“过去三年，从精神上讲，我收获了很多，但我可能要花一辈子才能完成我为自己设计的规划。我所希望的是，生活允许我这样继续前进。我感到非常满足，你可能会发现我已经取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某种平衡。”²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坚定信念和学术作品即将完成的坚定信心既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从塞尔陶灌木丛里的斗争中赢来的，而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美洲文献阅读室中慢慢累积而成的。他坚持来图书馆学习，日复一

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卡库，编号NAF 28150，档案盒编号212：《德国的掠夺和战后的赔偿》（«*Spoliations allemandes et indemnités de restitution*»）。多家国际犹太人组织与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达成协议，最终形成了1957年7月19日法令，法令勒令西德对1942年起遭受动产损害的受害人进行赔偿。这一赔偿行动被称为“M行动”。有关细节请参考让－马尔·德雷福斯（Jean-Marc Dreyfus）和萨拉·让布格（Sarah Gensburger）：《巴黎的劳动营：奥斯特里茨、利维坦、巴萨诺（1943年7月—1944年8月）》（*Des camps dans Paris. Austerlitz, Levitan, Bassano. Juillet 1943-août 1944*），巴黎：法亚尔出版社，2003年。
2 1944年11月15日给父母的信。

日，持续了几年。

改革人类学

他表示要穷尽一生之力完成一个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诞生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正在形成。其理论框架野心勃勃，但其政治意图也同样突出。在人类学中诞生的结构主义是跨越大西洋流亡经历的思想产物，其普遍性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心中的期盼。但这首先是列维－斯特劳成功从美国人类学汲取经验的表现。

与美国人类学学科的相遇

1941—1944年，列维－斯特劳每天早晨都会去纽约公共图书馆，风雨无阻。一开始，他沉浸在美国数量庞大的北美印第安人文献、丰富的人类学著作、重要的丛书、探险者与传教士的叙述中。他没有选择纽约公共图书馆宽敞的大型阅览室，而选择在今天已不复存在的美洲资料阅览室开展研究。这间阅览室格局较小，摆了十二三张桌子。阅览室的风格类似于19世纪学者的书房，虽然是封闭的空间，但仍能感受到风的流动。尽管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学术型图书馆受到了列维－斯特劳同事们的青睐，但他更加偏爱这间阅览室。这间阅览室向所有人开放，因其旧时代的风格而独具魅力，不仅如此，它还为常常造访的读者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它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馆藏，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开放式书架上还有条不紊地排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学术出版物，它们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列维－斯特劳被书墙隔绝于外部世界，从当下转移到其他地方。他读书，手不释卷。大约一个世纪前，另一个流亡者——卡尔·马克思也埋头于一家

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后者去的是大英图书馆。¹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完美地说明，流亡者离不开图书馆，当代理论的诞生少不了沉迷于阅读的流亡者。瓦尔特·本雅明和其他许多人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

图书馆取代了野外探险。此后，列维－斯特劳斯便与探险彻底绝缘。图书馆与博物馆产生了竞争关系，图书馆是他获取民族学知识（原始社会的运作规则）的场所，他还在图书馆掌握了重要的人类学知识（其中还包括了整个人类生存的法则）。正是由于战争还未结束，而他正流亡美国，列维－斯特劳斯确定了可以用于人类学研究的素材的种类，同时也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分辨”“了解”“排序”“分类”（这些是描述这门学科研究过程的隐喻）。如果他身处其他地方，这样的共鸣就不会发生。后来，他说道：“如果战争没有爆发，我可能会继续下一场田野考察。命运将我带到了美国，在美国，由于缺乏管道，同时，国际形势也不乐观，我没办法开展任何形式的考察活动，但我完全可以研究理论问题。我判断，在理论研究这一方面，前途无量。我还发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但由于资料杂乱无章，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始研究或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发掘这些文献的意义似乎迫在眉睫。”²

与美国人类学学科的相遇不只发生在图书馆这个拥有魔力的空间。它是个人社交的结果，从广义上讲，是列维－斯特劳斯融入美国学术界的成功经历造成的。他迅速、积极地采取了亲近的政策，与人类学界的所有主要人物变得十分亲密。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曾经分别邀请[他]一同就餐，以便批评对手的不足。这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段趣闻。因为他们两人彼此

1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136页。

2 《亦近，亦远》，第66页。

憎恶”¹。我们知道，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和罗伯特·路威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人在加利福尼亚任教，但列维-斯特劳斯会在他们频繁造访纽约时与他们会面，并且一次也不会错过。玛格丽特·米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位都在指导博士研究生，而这些博士生又生产出促进美国学术发展的文字作品。当时，法国人类学研究的规模已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在美国，该学科的根基已十分稳固，其研究主题十分多元，学科本身已发展出多个分支；众多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也支撑着人类学的发展。乔治·古维奇活跃于社会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也在学术领域拥有极高的生产力，他在《美国人类学家》、《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纽约科学院年报》（*Transactions of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上分别发表了文章。²在朱利安·海恩斯·斯图尔德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主编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中，列维-斯特劳斯也参与了编撰工作。《南美印第安人手册》是《美洲印第安人手册》的南美版本，后者是弗朗兹·博厄斯在1907—1910年编撰完成的。他与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梅特罗是瑞士籍民族学家，年纪稍长他一些，自193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定居美国。1939年，在离开巴西的前夕，列维-斯特劳斯在圣多斯与梅特罗相识。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梅特罗也与超现实主义者十分亲近，但交往的时间要长得多。梅特罗与乔治·巴塔耶自儿时起便成为朋友。他的情绪起伏不定，有一些性格上的障碍，但他是一位出色的野外考察者，成为多个地区的专家。他不仅对大洋洲（复

1 《亦近，亦远》，第60页。

2 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的一些论文：《原始部落酋长的社会与心理研究》（“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hieftainship”），《纽约科学院年报》（*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第7卷，1944年，第16—32页；《互惠与等级制度》（“Reciprocity and Hierarchy”），《美国人类学家》第46期，1944年；《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L'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词：纽约语言学圈主办期刊》（*Word, Journal of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第1卷，第2期，1945年8月，第1—21页。

活节岛）、安第斯山脉、阿根廷的查科十分了解，后来，还通过对伏都教（巫毒教）的深入研究，掌握了海地的融合主义。他的部分经历与列维－斯特劳斯相似：流亡美国、从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获得了国际视野、维持了三段婚姻关系。然而，年轻人的成就逐渐超过了年长者，年长者未曾在理论层面抱有野心，而年轻的一方却野心勃勃。但列维－斯特劳斯仍常常需要梅特罗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储备。两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直到1963年，梅特罗自杀身亡，切断了两人的联系。列维－斯特劳斯把友人的整个私人生活看作“为自杀而进行的漫长的准备工作”¹。这种说法令人不解，但当我们阅读梅特罗的日记和探险笔记本时，这一说辞背后的条理便逐渐清晰起来。日记和探险笔记本以最生动的方式告诉我们民族学家的症结所在：他虽访问了一个又一个原始社会，但始终将自己作为一个格格不入的陌生人；他还猛烈地抨击自己所处的现代社会；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喘息或和解的希望。²不论是在旅行日记中，还是在纽约与巴黎的社交生活中，焦虑、孤独和沮丧总是徘徊不散。

一位完全有别于两者的人物在美国人类学界独领风骚。他是弗朗兹·博厄斯。弗朗兹·博厄斯游历四方，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是19世纪的学术泰斗之一，后人难以望其项背。”³他深耕民族志研究这一领域，不仅对学术研究抱有浓厚的好奇心，还为自己设立了不止一个研究方向。但它们都以“文化”概念为核心，并否定各种形式的进化论。例如，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志、考古学、神话学、民俗学。“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陌生。他的研究工作覆盖了人类学的所有领域。他代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的发家史。”⁴

1 《亦近，亦远》，第56页。

2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一部分的笔记被收录于《旅程（一）：旅行笔记与旅行日记》，巴黎：帕约出版社，1978年。

3 《亦近，亦远》，第56页。

4 同上。

博厄斯是德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移民美国，却终身操着一口浓浓的德国口音，也不忘对他的祖国保持忠诚，尽管这种忠诚也常常发生动摇。1880年代，他开始对巴芬岛上的因纽特人开展田野考察，之后，转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还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类学研究的杰出专家。列维-斯特劳斯欣赏博厄斯出色的经验研究、渊博的学识和颇有成效的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是美国人类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经验。他还赞赏博厄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民主精神，作为纳粹人类学的反对者，他在1940年发表了反对种族主义理论的严谨论述，痛斥其宣扬德国力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做法。在他看来，“文化”形成了一个整体，将一个既定社会中所有的社会现象组织了起来，并且否定了种族的生物学定义。在开展移民人口的研究时，他观察并测量了他们的身体变化，对“种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¹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产生了严格的文化相对论，博厄斯经常通过他的一个夸夸特（Kwakiutl）线人的故事来说明文化相对论的合理性：博厄斯将这名夸夸特人带到纽约，后者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对这座城市的手工艺品做出了反应；定期出现在时代广场上的以矮人和大胡子女士为主角的怪异表演让他着迷，但他完全忽视了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地铁和烟雾。²列维-斯特劳斯曾与雅各布森从纽约市出发，中途经过哈德逊市，来到格兰特伍德，拜访了博厄斯的家。“他的餐厅里摆放着一尊夸夸特部落印第安人的胸部雕塑，这是他自己精雕细琢并且精心绘制的作品。他的其他大部分作品也以夸夸特部落印第安人为主题。我很欣赏这件作品，并唐突地认为，与能够创造出这种杰作的印第安人一同生活一定是一次独特的

1 《移民后代生理形态的变化》（«Changes in the Bodily Form of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美国人类学家》第14卷第3期，1912年7—9月。这些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17821名移民后代。

2 帕特里克·威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室里的诗人》，第133页。

经历。他冷淡地回答如下：‘他们和一般的印第安人没有两样。’我想，他的文化相对论并不意味着他将建立各国人民价值观的等级制度。”¹最后，博厄斯的作品中打动列维－斯特劳斯的还包括第三个要素——他对语言的重视。博厄斯会讲几种印第安人语言，1911年，他优先指出了语言现象的无意识特征，“无意识”说明了语言现象是研究社会现象的重要角度。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人类学家，尽管没有任何正式的指导老师，却建立了几段师徒关系：先是与莫斯，后与博厄斯。194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俱乐部，博厄斯突然去世的一幕象征性地说明了列维－斯特劳斯与博厄斯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值冬季，天气非常冷。博厄斯戴着一顶旧皮帽来到俱乐部，这顶旧皮帽可以追溯到60年前他对爱斯基摩人进行的田野考察。除了他的女儿杨波尔斯基（Yampolski）太太，哥伦比亚的几位同事也在场，这些同事都曾是他的学生。其中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拉尔夫·林顿。博厄斯情绪高昂。在谈话中，他猛地把自己从桌边推开，向后倒下。我坐在他的旁边，弯下腰将他扶了起来。利维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军医，他试图进行救治但徒劳无功。博厄斯死了。”²与互相仇视的师兄妹（本尼迪克特和林顿）和博厄斯的长子（克鲁伯）截然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将自己比喻为博厄斯的合法继承人。他为这位大师的丰富藏书寻找落脚处时，也将这种孝顺父母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遵照博厄斯的遗愿，他以提供资助作为交换，让巴黎的人类博物馆接收了博厄斯的遗物。³作为莫斯和博厄斯的弟子，他兼顾了两个不同的传

1 《亦近，亦远》，第57页。

2 同上书，第58页。

3 参见1943年1月4日给保罗·利维的信：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心图书馆保罗·利维资料库“列维－斯特劳斯与利维之间的书信”主题档案（2AP1C）。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告知莫斯，人类博物馆想要买下博厄斯个人的美洲研究文献资料（博厄斯与保罗·利维的交情匪浅），他的孩子们十分在意人类博物馆的请求。于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开始募集资金（8000美金），他首先找上《美术杂志》的主编乔治·威尔登斯坦（Georges Wildenstein）。洛吉耶也帮他筹集钱款。但最后，双方并没有成交。

统，跨越了两大洲。他认为，从每段经历中汲取精华并发现新大陆是他的使命。

结构的诞生：新事物如何诞生？

列维－斯特劳斯的笔下，结构一词最先出现于致保罗·利维的一封信中，它的出现也十分突然。写作这一行为成为一段“微历史”，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追踪新事物诞生的方式”¹，发现认识论上的革命。通过文字涂改的痕迹，我们几乎目睹了突破的过程以及犹豫和懊悔的心理活动。作为微历史，它使我们陷入了科学史的经典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一项范式的转变？

1943年2月10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告知他的准博士论文导师保罗·利维，他“突然间产生了灵感”，开始写一本以“乱伦禁忌”为主题的书：“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研究课题，因为它需要在完成亲属关系体系的分析后才能展开；我担心研究的成果很难发表。不过，我认为，我对一个老问题提出了相当新颖的观点，并给出了新的术语。”²老问题、新观点、新术语：这正是人们对他的这项研究工作的定义。亲属关系体系是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对象，刘易斯·摩根（Lewis Morgan）、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马塞尔·葛兰言等人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婚姻规则和亲缘规则已有大量数据积累，这些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似乎遵循着一个几乎普遍适用的规则，没有任何理论对此进行概括综合。因此，这个主题完全不是新鲜事物，相关书籍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但是，人类学对亲缘关系的研究将和政治人类学和美学研究的文献——后者较为冷僻——一同成为结构主义假说的主要素材。因为列维－斯特劳

1 弗朗索瓦·埃朗：《前言》，载《亲属关系研究的重要人物》，第13页。

2 1943年2月10日给保罗·利维的信：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心图书馆保罗·利维资料库“列维－斯特劳斯与利维之间的书信”主题档案（2 APIC）。随后多处引文也出自两人的书信。

斯清楚，他可以借鉴从世界各地收集起来的大量文献和信息，其丰富性能够满足他思考问题的需求，也与他想要建立的理论模型十分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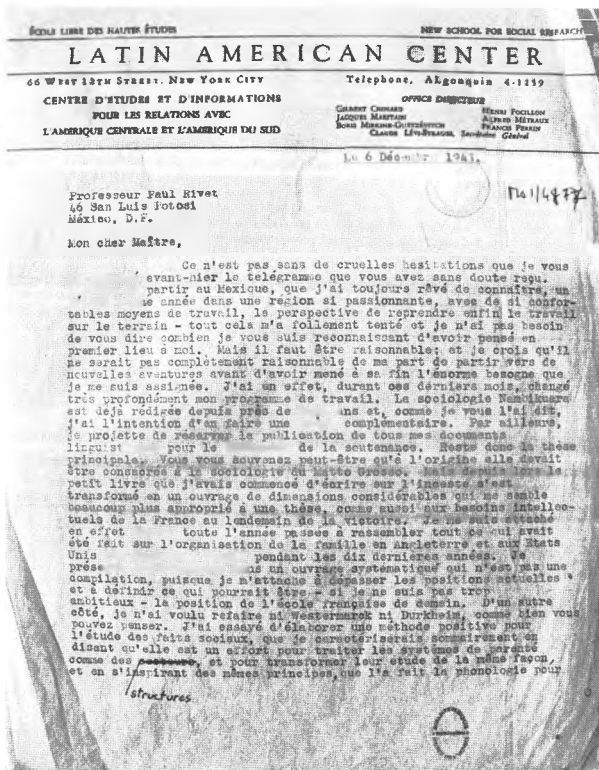
1943年12月6日，列维－斯特劳斯写信给他“亲爱的老师”。1941年，利维离开了法国，前往哥伦比亚，然后去了墨西哥。列维－斯特劳斯向他解释自己的研究计划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辅助论文把重点放在南比克瓦拉部落的社会组织方式上，他的主要论文则被全部推翻：“您可能还记得，我最初以马托格罗索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它的主题。但是后来，我开始投入那本关于乱伦的书的写作中，结果，从精简的短篇变为长篇大论，我认为，这个内容更适合作为博士论文，也更适合法国解放后学术发展的需要。[……]我试图建立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有效方法，粗略地讲，我试图将亲属关系的每个体系视为一个部分[结构]，并以相同的方式调整每个体系内部的研究。就像音系学对语言学的作用，我也采用一样的原理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我正尝试形成一套‘亲属关系形式的系统分析’。”¹

结构一词从何而来？²从某些角度看，这个概念曾出现在索绪尔的作品里。《普通语言学课程》（1916）虽然未使用这个术语，但已将语言视为一个系统，并提出，研究语言系统时，应将其视为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物质。自1920年代，某些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已明确提出了该术语，但这主要是受到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影响。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结构音系学一说始于1928年罗曼·雅各布森、塞尔吉·卡尔斯维斯基（Serge Karcewski）和尼古拉斯·特罗伯茨科伊（Nicolas Troubetzkoi）

1 1943年12月6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保罗·利维的信。

2 参见乔治·朗特里－劳拉：《人类知识中的历史与结构》（« Histoire et structure dans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第22年，第4期，1967年，第792—828页。

共同撰写的论文¹：一门语言的不同发音组成了一个结构，只有通过它们的对立和不同而建立相互关系，才能确定它们各自的意义。1940年代，“结构”的概念仍“悬而未决”，但它仍然是语言学的基础。²



1943年12月6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给保罗·利维写信。删改后出现了“结构”一词

1 《关于俄语音位演变与其他斯拉夫语系语言的不同》（《Remarques sur l'évolution phonologique du russe comparée à celle des autres langues slaves》），1928年荷兰奈梅亨国际语言学家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linguistes）会议论文，载《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研究成果》（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布拉格，1929年。

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后来这样说：“令我震惊的是，在战争年代，尽管我们被迫处于某种孤立状态，多位民族学家分别发现了结构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这一巧合表明，为了解决前人留下的问题，结构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参见《结构人类学》，第359页。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还提到美国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默多克于1949年出版了《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一书，同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多亏了结构音系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雅各布森，列维 - 斯特劳斯特才了解了它的存在。列维 - 斯特劳斯特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证明，在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的主题中引入结构一词和结构音系学模型是合理的。文中指出，音位（语言学）和亲属关系的术语（民族学）十分类似：“像音位一样，亲属称呼是意义的要素；像音位一样，只有将它们集成到一个系统中，它们才能获得意义。就像‘语音体系’一样，‘亲属关系体系’是由大脑在无意识的思想层面构建起来的。最后，在世界偏远的角落和完全不同的社会中，亲属关系的形式、婚姻规则、某些类型的亲戚之间抱有的固有态度以及其他现象反复出现，它们让我们相信，就亲属关系的问题或者语言学而言，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由普遍但隐含的法则造成的结果。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亲属关系的现象与语言现象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两者都遵循另一种现实存在的秩序。”¹ 因此，他希望借用一种“形式类似（内容并不类似）的方法”——一种音系学的方法。故而，亲属关系的体系是有待解读的一门语言，只有解读完成之后，我们才能理解婚姻、出生、血缘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情感要素背后无意识中产生的法则。²

回顾起来，我们可以从这种稀松平常但又带来变革的涂改行为中了解很多细节。他通过涂改，用“结构”（structures）一词代替“部分”（secteurs），从而为结构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它反映出，列维 - 斯特劳斯特在人类学领域设计了一个具有更高的理论目标的研究项目。其目标是寻求真正的科学性以及——按照列维 - 斯特劳斯的观点——提出一个能够简化和解释众多令人费

1 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 L'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 »）。《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入了该文，参见第 41 页。

2 关于这一段的内容，请参见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入门》（*Claude Lévi-Strauss, une introduction*），口袋书出版社，2005 年，从第 70 页起。

解的亲属关系的统一原则。¹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注意到列维-斯特劳斯的这一野心。他在日记中坦承，他曾上门拜访过列维-斯特劳斯，两人就民族学的现状进行了讨论：“他希望回归哲学，回归整体概念。”²结构主义将给研究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留下一个持久的烙印，将它作为一个神秘的子学科，并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和图形形式——亲属关系图——作为其基本特征。但结构主义还将超越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因此，它将以更广泛的科学性、技术性和有效性为基础，以一种兼顾全局的视角重新建立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更加符合硬科学的规范。

结构主义和战争时期的流亡：人类学创新背后的政治诉求

列维-斯特劳斯的“逻辑论”（*traité de logique*）是在战争结束时产生，并在此激烈的政治化背景下实现的。利维是自由法国的重要人物之一，那时正准备搬到阿尔及尔。在结构主义意识觉醒之后的多次通信中，列维-斯特劳斯表达了自己的感觉。他发现，他正在为自己和国家创造某种坚固而新颖的东西：“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创作一本‘伟大的书’，虽然这种感觉可能只是错觉（但在过程中犯的误差是可以被原谅的）。如果我能把它带回获得解放的法国，它将为年轻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奠定一个全新的学术基础，使他们能够与外国学者们拥有相同的起跑线。他们不仅会发现近年来其他国家的学术发展情况，说不定还会发现其他更多东西。”³这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因投入科研创造而产生的傲慢与狂妄吗？透过他对信仰的反复强调，我们应该明白，他的学术研究野心勃勃，并且希望进行学术创新。他“毫不掩饰地

1 《真正的科学分析应当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并且言简意赅》（« Une analyse véritablement scientifique doit être réelle, simplificatrice et explicative »），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第43页。

2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旅程（一）：旅行笔记与旅行日记》，1947年3月13日，第171页。

3 1943年12月16日，列维-斯特劳斯给保罗·利维的信。

谈论其理论取向”，还表现出“大胆的哲学思维”¹。他认为，法国失去了其他竞争力后，应当以科研学术作为其发展方向。列维-斯特劳斯特在这一问题上丝毫不抱幻想，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的倾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民族自豪感受到威胁时萌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因此，结构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向一场推迟发生的知识战争的献礼。流亡的学者们将后备箱中的行李带回法国，希望能够提高祖国在参考文献、文献储备和认知上的水平，弥补它在战争期间荒废掉的时间，让它迎头赶上。以《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数学形式化、图表化的趋势和逻辑上的严谨性——为代表的第二代结构主义者虽表现出了激进的科学主义，但这也属于建立一门学科科学性的一种尝试。人类学曾被迫为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服务，两者都对体质人类学十分推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年代，“种族”这一范式深深融入对人类的研究之中，同时，深深植入人类多样性的阐述文本之中。因此，即便是利维和博厄斯这样的左翼人类学家，也难以打破这个框架。²1930年代后期，利维创立了《种族与种族主义》（*Races et Racisme*）期刊，把它作为逐步普及思想的论坛，并强调体质类型的不稳定性、互相融合的悠久历史和种族范畴的不明确性。博厄斯也曾在这期刊上发表了文章。但是，“使用与种族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武器来打击种族主义，他们没有挑战这场辩论背后的概念问题，他们基于相同的阐述框架表达自己的主张，并没有提出打破种族概念框架的全新的概念”³。提出完全不同的概念正是结构主义的创新：它不

1 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写的序。1947年3月9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特给保罗·利维写信，将序的手稿也寄给了对方。这些表述反映了他眼中社会学（广义的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参见卡罗尔·雷诺-帕里戈特（Carole Reynaud-Paligot）：《殖民共和国：种族范式与共和国意识形态》（*La République raciale. Paradigme racial et idéologie républicain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年；《1930年代法国的种族、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Races, racisme et antiracisme dans la France des années 1930*），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关于这一段的更多内容，参见克利斯提那·罗利埃尔：《保罗·利维：学术与政治》，第511页。

是利用“文化”来否定“种族”，而是利用“结构”来否定“内容”，因此，改变了反射的坐标。它将任何地方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乱伦的禁忌——定义为普遍的规则，从而重新确立了普遍性的存在。乱伦的禁忌既不是“基础”也不是“起源”，而是人类互相交往的普遍规则，这样的普遍规则还包容了人类交往过程中的无限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一人完成了两件事：一方面，建构了自己的逻辑论；另一方面，明确了民族学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些诉求因战争的爆发变得更加紧迫。

因此，在1943—1944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提纲中，他明确了“战后世界中原始民族的地位”这一教学主题，提出了6个问题：“第一，‘原始文化’的定义以及‘原始或落后民族’的当前分布；第二，‘原始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如何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自然法的概念；第三，殖民统治的延续对现代文明而言是否必要？殖民主义的各种政治意涵和殖民地经济剥削的不同方式；第四，多层经济体制下‘原始社会’和‘落后社会’的现状、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和非殖民统治下的国家；第五，殖民统治和非殖民统治下的文化接触问题：消失与协作、同化的形式、合作与对抗；第六，多种文化并存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文化的普遍化还是区域主义？”¹我们注意到，他对殖民主义严肃质疑，或者，至少认为存在质疑其合法性的必要。当时，抵抗势力中，无论是自由法国的追随者还是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的活跃者，都没有人如此深刻地讨论这一问题。与政治思想的其他领域一样，纽约知识分子们是对殖民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先锋，他们就殖民体系的生存和保护问题提出了疑问。这一问题就这样突然成为热门话题。²

1 “高等研究自由学院”主题档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213—214。

2 参见《从巴黎到纽约：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流亡（1940—1947）》。尤其是第7章《每日要务》，这一章分析了有关流亡的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结构主义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间，向西流亡的意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1年，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是以民族志学者（人类学家）的身份登上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也没有准备去研究一个正在消亡的民族。当时，他和他的亲友们才是那个将被消灭的部落。同样，在马提尼克岛，白人流亡者根据殖民地秩序的规则得到了友善的对待，而历史的逆转让这些规则也被应用到他们身上。这样的环境使安德烈·布勒东和艾梅·塞泽尔之间建立了友谊，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贱民”。¹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谈到结构主义的诞生时强调了灾难这种历史环境的作用：“结构是在威胁发生的时刻灵光一闪而产生的，那一刻，危险即将来临，迫使我们目光聚焦于一块石头上，这块石头将成为某种规则的基石，它承载了其本身的可能性和脆弱性。[……]这是一段历史发生错位的时期，当我们被驱逐出战争现场时，这种对结构主义萌生的热情发展为对实验的狂热追求和对图解的广泛应用。”² 这里的“历史”的错位是指欧洲内战以及欧洲内战对一部分人类及其文化之花的系统性破坏。

当列维－斯特劳斯得知法国抵抗运动分支机构人类博物馆被解散，以及1942年2月12日，在蒙瓦雷里安堡垒（Mont Valérien），鲍里斯·维尔德（Boris Vildé）和阿纳托尔·列维茨基（Anatole Lewitsky）被处决，列维－斯特劳斯深刻了解其代表的重要意义。³ 几个月后，1942年7月，这则可怕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列维－斯特劳斯立即想到了利维，他以众人的名义向他发送了一封表达安慰的电报。他年迈的老师陷入了身处哥伦比亚带来的孤

1 参见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马松：《迷人岛马提尼克》。

2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点丛书”，巴黎：瑟伊出版社，1967年，第13—14页。洛朗·让皮埃尔又进行了引用：《流亡思想的形成》，第60页。

3 伊夫娜·奥东（Yvonne Oddon）与阿尼艾斯·翁贝尔（Agnès Humbert）虽然也被逮捕，但与热梅娜·蒂丽翁（Germaine Tillion）一样免于死刑。三人被送往集中营，然后全部成功逃离了集中营。

单感和无限的历史罪恶感之中，失去了生气。¹ 最终，在 1942 年 8 月 17 日，“心如乱麻”的列维－斯特劳斯试图为利维注入一些力量和勇气。他想将利维从愧疚中拯救出来，向他展望未来：“那么多一直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中，您也是其中之一，我甚至想说您是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唯一的人，因为您仍然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的人又将会处于什么状态呢？因此，出于一个无法推脱的理由，亲爱的老师，您必须停止这场您自己制造的可怕的道德危机，停止折磨自己：您不属于自己，您属于我们，您属于明天的法国。即便不是这样，您难道不知道，因为您的这种英雄气度，我们将怎样责备您吗？这种气度让您面临万分惊险的境遇，一种我们的同志曾经历过的危险境遇，然而，这完全不会增加他们生存的机会。[……] 这远不是一个让人愧疚的理由。它怎么可能造成愧疚呢？相反，在我看来，它应该将您从极大的悲痛中脱离出来，让您在面对巨大的灾难性事件时，仍然可以镇定地放手。因为，面对这些事件，人是渺小的。但我在这里说‘放手’是不对的，‘放手’仅适用于我自己。您也知道，我们的朋友将会发起复仇。”列维－斯特劳斯曾为在纽约举行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展览写过一段话，他也将之添在电报中：“在巴黎，有一所了不起的科研机构，从本质上讲，它致力于与种族主义及其谎言作斗争。它是人类博物馆。它的馆长保罗·利维教授不仅是巴黎市议员，还是第一位全心全意献身于反法西斯斗争的法国知识分子。它的副馆长雅克·苏斯戴尔一早就加入了自由法国的军队。

1 保罗·利维“掩护”人类博物馆部分工作人员开展抵抗活动，但自己并未过多参与。事实上，作为公众人物，他被密切监视，因此，没有什么个人隐私可言。他感到十分忧心，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于是，1941 年 2 月，离开了法国。他心如死灰，只能让博物馆和同事们听天由命。一年后，第一批抓捕行动开始。关于这段历史的更多细节，参见克利斯提那·罗利埃尔：《保罗·利维：学术与政治》；朱利安·布朗：《抵抗运动的开始：人类博物馆的抵抗（1940—1941）》，“21 世纪文库”，巴黎：瑟伊出版社，2010 年；安娜·侯让辉（Anne Hogenhuis）：《抵抗运动中的学者：鲍里斯·维尔德与人类博物馆网络》（*Des savants dans la Résistance. Boris Vildé et le réseau du musée de l'Homme*），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9 年。

他们的同事们只专注于一项任务：展示人类智慧创造的无数、多样的成果。德国人成功复了仇。德国人将利维的同事们关押了几个月之后，最终将他们一一杀害。因为，他的同事们以他为榜样，无视巴黎被攻占的事实，仍然坚持开放博物馆。他们是鲍里斯·维尔德、阿纳托尔·列维茨基、皮埃尔·瓦尔特（Pierre Walter）、朱尔斯·安德里厄（Jules Andrieu）、雷内·塞纳沙尔（René Sénchal）、莱昂-莫里斯·诺德曼（Léon-Maurice Nordmann）和乔治·伊希尔（Georges Ithier）。¹ 数以百万计的卑微的人类通过他们的奋斗而被人铭记、受人尊敬，他们将惩罚真正的野蛮人。”²

正是这一确切的时刻，这种悲剧的“历史性”，矛盾地构成了人类学结构主义可能成立的条件：“实际上，人们可以认为，民族学只有在分权发生的那一刻才能诞生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那一刻，欧洲文化发生错位，形而上学及其众多概念的历史也随之发生了错位，它们被迫离开自己的轨道，同时被迫不再将自己视为标准文化。这个时刻是哲学或科学话语的时刻，但这并不是第一位的。这个时刻还是政治、经济和技术话语的时刻。”³ 因此，结构主义也是学术抗争的一种形式，它相当于面对濒临灭绝的原始社会时如梦如幻的忧郁症。“结构”让原始社会重新成为人类的一部分，让人类重新恢复其整体中包容的多元性。⁴ 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新视野的发现，以及被纳粹主义驱逐出欧洲并处于流亡状态的西方学术界，都使这一跨大西洋的新事物、思想的结

1 1942年2月23日，两人在蒙瓦雷里安堡垒（Mont Valérien）被杀害。

2 1942年8月17日给保罗·利维的信。

3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414页。

4 结构主义并非要以族群的文化形态来区分经验世界的多元现象，这是人们常常会有误解，但这其实是形式主义的主张。弗雷德里克·凯克认为，结构主义发现了“不同事物中的不变量，即区分事物不同之处的规则”。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入门》，第41页。后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做出了明确解释，与人类学一样，结构人类学的确切研究对象是“不同之处”（les écarts différentiels）：结构人类学不仅要研究具体的社会现象，还要研究不同社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参见第15章序，《结构人类学》，第1卷，第358页。

晶——结构人类学——有了意义。

1943 年底，研究的进展十分顺利：他已选出 1500 篇文献，其中包括论文和书籍，并且已经分析了其中 1200 篇。列维 - 斯特劳斯计划再用 3 个月进行阅读，然后用一年进行论文写作。有关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前途问题的烦琐工作让他的研究进度受到了阻碍，1944 年，他一直忙于处理高等研究自由学院的事务。这就是列维 - 斯特劳斯于 1945 年 5 月以文化参赞的身份返回纽约的原因之一。他一边执行外交任务，一边开展学术工作。

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的

新生活开始

1945 年的夏季和秋季，某种不确定因素产生了。工作上，列维 - 斯特劳斯履行着文化参赞的职能，却无法享有一间办公室。他的主要任务是装修（花费了 6 万美金）第五大道上的豪宅，这是法国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买下的不动产。洛吉耶雄心勃勃的国际文化政策让他做出一项决定：1945 年，这座宅子最终被分配给文化服务处，领事馆则被迁至其他地方。¹ 列维 - 斯特劳斯聘请了夏洛宫（Palais de Chaillot）的建筑师雅克·卡尔卢（Jacques Carlu），他也流亡到了纽约。雅克·卡尔卢为自己能接到这份设计师和室内装饰师的工作而感到高兴。他的论文手稿——《我已经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²——和第五大道这座建筑是他生活和工作中的两大焦点。当时的来往书信中，他常常使用建筑的隐喻，这也反映出上述事实确凿无疑。历史上曾有一大批法国

1 《亦近，亦远》，第 71 页：“战争前夕，法国已经在第五大道买下了一栋漂亮的大宅子，这是由一位美国银行家依照罗马宫殿的格局出资建造的。当时的纽约市长极度厌恶维希政府，不允许法方代表进入这栋房子。当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政权，他才将房子归还给法方。”这位纽约市长名为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

2 1945 年 9 月 8 日给父母的信，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档案库，编号 NAF 28150，档案盒编号 179。

建筑师生活在纽约，他们聚集于此，为的是学习美国的新技术，认识新材料。大约在那个时候，列维 - 斯特劳斯特和塞里格一同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勒·柯布西耶的展览。在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他手拿香烟，面对陈列的模型，陷入了深思。他也许将自己想象成了社会科学的勒·柯布西耶……¹

实际上，这份新的工作与他刚刚展露出来的学术上的抱负产生了矛盾，但这是他精打细算做出的抉择。他这样向父母解释：

“我犹豫了一阵，然后有了决定。我最大的愿望是，在流亡多年后，仍可以返回法国。这一点你们十分清楚。然而，不是每一个机会都能让我动心。而利维不见得帮得上忙，在重新回到巴黎之前，我可能必须在外省的大学忍耐好几年。因此，纽约的这个职位十分关键，它意味着我可以获得一个分量很重的职业身份。两到三年内，如果表现出色，我还能够轻松换来巴黎的一官半职。”这个机遇将给他带来方便，也让他继续远离家乡，忍受分离之苦。时间长短仍是一个问题，另外，论文手稿还未完成：“最后，我接受了这项工作，只是情绪有些低落，一方面是因为我将延长在美国逗留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得不暂时或至少适当地搁下科研工作，好将时间用来从事行政管理。”²他认为，这是他不能错过的机遇。它虽与 1934 年 10 月乔治·杜马的来电性质截然不同，但同样对列维 - 斯特劳斯特大有裨益。

1946 年 1 月 1 日，他在法国大使馆的信笺上写下“文化参赞”的头衔，从此，正式上任。他搬进了一片狼藉的豪宅里，这里将是他未来的居所。1946 年春，翻修作业在混乱中结束。“每个施工团队都毁掉了前人的成果。”³但最后，他很钟意上东区这个响亮的地址——中央公园对面，第五大道 934 号：“如果它位于苏

1 他将照片剪了下来，塞进 1945 年 9 月 23 日的信里。

2 1945 年 12 月 3 日的信。

3 1946 年 2 月 24 日的信。

榭林荫大道（Boulevard de Suchet），那么，第五大道就相当于维利耶尔大道（Avenue de Villiers）。布洛涅森林那一侧非常幽静，非常时髦，非常漂亮，但无趣得很。”¹

他有了新的住址、新的工作和一位新婚妻子。这段婚姻是他履行新职务所需的标配，也是一段认真并且牢固的感情关系结下的硕果。想要娶一个妻子、一个法国妻子的愿望，也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唐璜式的生活方式：“寄出下一封信时，我很可能成为已婚男士。老实说，我真的十分期待。不久前，我与欧洲最古老、最高贵的贵族人家的女儿有过一段关系，它让我对单身生活感到厌倦和抗拒。”²刚到纽约的罗斯-玛丽·乌尔默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于4月16日迈入婚姻殿堂。此前，两人经过了复杂的交涉，分别与前任断了关系。婚礼表现为一种“友善的美国风格”，新婚夫妇补充道：“仪式肯定花了整整5分钟！”³一个月后，一场盛大的招待宴成功举办。它让人感觉，人类学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文化参赞的私人公寓还迎来了大约一百位宾客，迎接他们的是小烤箱和女佣。这些法国贵宾中拥有各种各样的身份：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兼总领事亚历山大·帕罗迪（Alexandre Parodi）、以夏加尔和雅克·利普希茨（Jacques Lipschitz）为代表的艺术家、美国学者与作家、美国黑人舞蹈家让·卡苏（Jean Cassou）。他们直到凌晨两点才散场离去。⁴

宅子里每间公寓的家具都由列维-斯特劳斯自己一手置办（以低价置办）。纽约的公开拍卖品异常丰富，他十分陶醉其中。这些拍卖品采购自欧洲各地，其原产国和真正的价值都不得而知。结果，“有时，它们以高昂的价格售出，有时几乎分文未取——

1 1945年12月3日的信。

2 1946年3月24日的信。

3 1946年4月17日的信。

4 1946年5月30日的信。

价格的浮动让人难以理解”¹。在这种随机的定价机制下，他得以购置“非常漂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其暗色调和简朴的设计符合列维 - 斯特劳斯采购家具的一贯标准”：一张大桌子、几张椅子、一个箱子、一个衣橱、一个餐具柜。这些家具都是大尺寸，来自富裕的美国家庭。这些美国人家道中落，处理了家中笨重的家具。还有一张书桌极有可能是西班牙殖民时期传承下来的，桌腿上刻有宗教融合的图案。此外，卡尔德（Calder）还送了他们一个非常精美、优雅的“活动装置”，它“悬挂在公寓的天花板上，与原始社会的收藏品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很好地融为一体”²。这种非常特别的室内风格为他的生活确立了基调，让他围着这三类东西打转：现代艺术（卡尔德）、原始社会的物品和实木家具。它将不朽的历史——旧殖民帝国时期和人文主义运动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16 世纪）——与脆弱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列维 - 斯特劳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些历史时期，被它们深深影响，但他从中超脱了出来，将它们变得空灵、轻盈。这种动态的平衡也反映在亲属关系的结构中。在博士研究的过程中，他既要求自己专心应付一个对象，又要求绝对的互惠互利，还拼命地想要解除互相矛盾的框架造成的限制，就像是卡尔德发明的活动装置，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一具身体，两种生活”

夫妇两人在第五大道 934 号安定了下来。罗斯 - 玛丽·乌尔默并不是只身前来纽约，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 8 岁、一个 10 岁。列维 - 斯特劳斯欣然接纳了他们，让他们“幸福而平静”地成长。公寓十分宽敞，最重要的是，他的办公室位于公寓的楼下，完全

1 1945 年 11 月 14 日的信。

2 1946 年 5 月 30 日的信。

独立于公寓。然而，他无意承担他们的经济责任，并要求他的岳父“做点什么，好让两个孩子能够完全独立生活，不为生活所需而犯愁”¹。这似乎完全不是问题，因为他的岳父岳母颇具经济实力。列维-斯特劳斯现在过上了非常不错的生活，他的开支预算中还包括每月寄给父母的一笔钱。他一再表示，希望父母接受这份补贴，别再为了糊口而出去找活干：“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你们去求利维或我的其他朋友介绍工作。我不希望他们以为，我在纽约担任要职，却不照看你们。”²

最初的几个月是争分夺秒的竞赛：“我忙到焦头烂额，为了应付有关奖学金申请、教师交流或学生交流、系列讲座的安排、书籍寄送、法国人在美国举办展览或者美国人在法国举办展览等琐事，我需要将通知、报告和电报送往巴黎。下午，我还要应付相继来到我的办公室，为了向我咨询这些问题的人。我希望找到一种比目前更为积极和高效的方式来开展业务，但我不仅缺少人手，同时，也不确定1946年的预算会不会削减（可能由于货币贬值而收紧）。雪上加霜的是，一些重要的客人来访，占用了我的大量时间：萨特、勒·柯布西耶马上就到，加缪等人也在来的路上。”他一边抽时间写文章³和博士论文，一边完成公务要求的烦琐任务。这些任务有时很有趣，但常常让人感到头疼（因为缺少打字员，事情推进得不够快，而打字员是办公室业务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甚至常常让人打不起兴致。社交活动是他工作

1 1945年12月3日的信。

2 1945年12月3日的信。

3 这里指的是《法国社会学》（« La sociologie française »）。文章收录于：乔治·古维奇（Georges Gurvitch）、威尔伯特·E. 莫尔（Wilbert E. Moore）主编：《社会学研究的全球视角》（*La Sociologie dans le monde*），第1册《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Les Grands Problèmes sociologiques*），第2册《各国的社会学研究》（*Les Études sociologiques dans différents pays*），“当代哲学文库”，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7年。列维-斯特劳斯这篇向莫斯致敬的论文是第2册的第一篇（第513—545页）。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第二篇论文是对美国生活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最后发表于期刊《精神》（*Esprit*）。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幸福的技术》（« La technique du bonheur »），《精神》第127期，1946年11月，第643—652页。这一期谈论的话题是美国。

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对此感到厌烦和疲惫：“午餐和晚餐一个接着一个，总的来说，无聊得要命。与大人物们的会面真的让人大失所望。即使是与让 - 保罗·萨特或斯特拉文斯基见面，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斯特拉文斯基就像一个吹毛求疵、谨慎小心的俄罗斯老太太。”¹斯特拉文斯基曾是他年轻时候的偶像之一……

新上任的文化参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业务主管。作为第一位文化参赞（和平时期的第一位文化参赞），他以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为荣。因此，尽管他一直抱怨日不暇给，这可能是真情感，但显然，他也享受着这段短暂的忙碌时光。当他参加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音乐会或欣赏特里斯坦（Tristan）的电影作品时，或者当他为一位发明了新的彩色玻璃技术的法国艺术家举办展览时，他对艺术的热爱被再度唤醒。他的日子充满了相遇，相遇有时意味着新的发现，也可能带来失望：“不久后，我将和一家国际古董商见面，它想将它在阿拉斯加买下的整间博物馆卖给人类博物馆；然后，我将旁观一个黑人芭蕾舞团的排练，我正为其张罗法国巡回演出。我还有音乐会、展览和会议等一堆琐事需要解决，谁知道还会有其他事情呢？……我经常怀念之前的悠闲和平静，但人总要多经历一些才好。”²这最后一句话就好像在说，潜意识中，他认为必须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和足够激昂的情绪才能了结余生，必须不断体验新鲜事物才能最终迈入学术生活。

渐渐地，他开始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妥妥当当，不必整日为文化服务处奔波，因此，为自己的计划腾出了时间。每天早上，他都会下楼去办公室，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30分，一直待在办公室，然后，回家吃午饭；从下午2点开始，他在自己的书桌前撰写博士论文，直到下午5点30分；最后，5点30分之后，

1 1946年2月24日的信。

2 1946年3月10日的信。

他与秘书通话并签署信件。“一具身体，两种生活”的模式奏效了，这“当然属于一种微妙的平衡”¹。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工作节奏。他一边投入科学研究和学术写作，一边主持（科研）管理工作。担任文化参赞期间，这种平衡很可能已经明确地倾向于行政管理。1946年春，亨利·洛吉耶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试图提拔自己的晚辈，但最终没有成功。内心深处，列维-斯特劳斯如释重负。他很难拒绝洛吉耶，如果接受，他可能会获得一份高级国际公务员的工作，一份斯特法纳·黑塞尔（Stéphane Hessel）那样的工作。黑塞尔的妻子维蒂亚（Vitia）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的密友。

1947年春，两个生命的诞生

1947年3月初，两份沉重的打字机手稿新鲜出炉，摆在文化参赞的书桌上。每份手稿差不多有300—350页，1200条脚注和80张图表。它们的总标题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上下两册的标题分别为“特殊规则”“一般规则”。他写信给利维：“我想马上向您宣布两则好消息，我和罗斯-玛丽的孩子从现在起的一周里都可能会出生，只是罗斯-玛丽抗拒生产。我等不及看到孩子的降生，同样，我也等不及向您宣布，两周前，我的书已经完全写完了。”² 婴儿迟迟不肯降生，在过去的两年中，《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面世也像这样，一再被推迟，就好像每走一步，这本书自己便有了新的进展、新的疑点和新的变化。终于，1947年3月16日，儿子洛朗（Laurent）出生，几天前，写作行为已迎来了尾声。由于孩子的父亲被突然逐出医院的病房，他对现场的情况不甚了解。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然后，旁人给他三十秒钟，让他看了眼孩子，便又叫他走开：“说到孩子，

¹ 1947年1月22日的信。

² 1947年3月9日给保罗·利维的信。

今天早上，我觉得他真的难看极了，到了四点钟，变得没那么丑了，但还是不中看。他出生时重 4.1 公斤，居然与我惊人地相似。因为他看起来像我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根本没有我出生那时的样子。”¹两个星期后，修改论文的第二册时，他向自己的后代讽刺地瞥了一眼：“我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可以获得一个好看的灵魂，但他现在则完全没有。”²1947 年 4 月 15 日，洛朗接受了割礼，与他的父亲一样。渐渐地，列维－斯特劳斯变得调皮了起来，他的温柔中仍带着一丝嘲讽：“我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能接受他了，我好像把他当作了另一种‘猴子’，虽然可能不如真正的猴子有趣，但只要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我发出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跟着我的声音，他试着牙牙学语，但是没有成功——这是我们之间的主要互动。”³结构语言学特别关注语言的习得，这是科学研究需要攻克的奥秘和需要应对的挑战……⁴毫无疑问，列维－斯特劳斯非常认真地聆听儿子最初的胡言乱语，像曾经对待从巴西带回的猴子卢辛达那样，他也宠爱自己的孩子，用奶瓶给他喂奶，还替他更换新的尿布。在他成为父亲的过程中，他从两种模式中获得了启发。每一种模式他都拥有亲身经历，每一种模式都让他表现得更加柔情似水：一边是他自己的父亲，一个严肃但不仰仗威权的人；另一边是南比克瓦拉部落的父亲角色，他指出，他们从肢体上展现了对孩子们的关爱。从这两者（他还在罗斯－玛丽上一段婚姻的孩子们面前扮演着有点距离感但十分亲昵的继父角色）出发，他找到了自己的为父之道。⁵

1 1947 年 3 月 17 日的电报。

2 1947 年 4 月 1 日的信。

3 1947 年 5 月 7 日的信。

4 罗曼·雅各布森：《儿童语言与失语症》（*Langage enfantin et aphasie*），巴黎：午夜出版社，1969 年。这是 1941 年原版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的法语译本。

5 1947 年 1 月 22 日，他表示在一个电动工具的帮助下，已经将罗斯－玛丽两个孩子的小船修缮完毕。这个工具有多个钻头和转轴，让未来的修理匠沉迷其中。

法国对美国的新文化政策

我们发现，自由法国内部的知识分子积极推动了法国海外文化政策的调整 and 改变。亨利·洛吉耶与 1946 年起继任洛吉耶这一职位的路易·若克斯（Louis Joxe）否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吹捧上流社会的风气，主张专业化和民主化，并投入科研活动、职业活动、学术交流以及奖学金资助等全新的工作中，把这一政策落实为行动。从战争结束到“马歇尔计划”对外宣布（1947 年 6 月）之间的这一时期，时机相当成熟，科学和艺术被看作重建国家间对话机制的主要手段。参议员富布赖特（1946）的奖学金项目在服务美国国内的同时，为法国在美国实施这些新的文化政策提供了便利。

虽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一名“兼职”的文化参赞，但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积极落实改革行动，让一项得到他认同的公共政策——这一项公共政策背后的基本理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能够显得合理、统一。他当然不是一名普通职员。他在任期内留下的种种痕迹表明，他可能是一位伟大的管理者（尽管也许有点缺乏耐心）。开设法语讲座的政策反映了列维-斯特劳斯想要推广的活动的类型。法语联盟的传统模式是邀请一位大作家向一群说法语的美国老太太讲经说道，而他认为，在这一领域，应当打破这一传统模式。塞里格早已指出，法语联盟有些跟不上时代。法语联盟在美国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仍然是贝当的支持者，因此，对自由法国派来的新面孔并不友好。¹然而，法语联盟历史悠久，社会根基稳固，还拥有图书馆服务（包

1 纽约法语联盟的负责人皮埃尔·卡迪尔（Pierre Cartier）是一个坚定的贝当派人士。这解释了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常常不肯出席皮埃尔·卡迪尔主办的活动。而列维-斯特劳斯还因为缺席而被责难。参见 1947 年 4 月 30 日贝努维尔将军（général de Bénouville）给驻美大使博内（Bonnet）的信：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1945—1970），多项事务（œuvres diverses），文化交流（échanges culturels，1945—1959），多项事务（œuvres diverses，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 55（0.236.2）。信上说，文化参赞“自认为可以拒绝出席我在纽约的演讲活动”。

括各省的图书馆），仍然不容小视。因此，文化服务处考虑创建一个单独的服务部门来负责组织美国的所有法语讲座：“我补充一点，法语联盟已经无法继续提供与过去相同的服务。文化交流不再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特权，它还必须向新的圈子开放，尤其是向学术界开放。”¹ 列维 - 斯特劳斯特提议，将法语结盟、永久法国委员会（France Forever committees）²、大学的法语系和“法国之家”（Maisons françaises）合并为一个单位，以节省资源和最大程度地扩大影响力。某些时候，他十分坚持自己选择演讲人的标准。他倾向于选择更年轻、更抗压、不急于获得称赞并且能说英语的对象，能说英语尤其重要。他始终十分在意工作效率，因此，建议充分利用每位演讲者的来访（演讲者的差旅费用由法方支付）。他还希望这些讲座不只是扎根于文化交流频繁的东海岸地区，也要渗透到西部和中西部的小镇，同时，强调了这样做的好处。他取得了多项成绩：由法美联合学术委员会主办的阿尔贝·加缪和作家“韦科尔”（Vercors）的讲座座无虚席。他冷漠地见证了存在主义掀起热潮，并不沉迷于此。在他看来，这一成功“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传统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们的讲座必须向广大民众开放，并且活用学术资源。昨天，我们宣布启动的系列讲座正是应用这种学术策略的结果”³。对结果不甚满意时，他只会如实记录。例如，吉尔伯特夫人的演讲主题“巴黎、巴黎的艺术家、巴黎的地理标志和我”吸引了很多听众前来。

1 1946年6月18日，由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编写的报告《美国讲座的组织》（共3页）：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多项事务（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55。

2 永久法国（France Forever）是二战期间于美国成立的一个协会。永久法国的足迹逐步遍及全美，目的在于拥护戴高乐的政策。罗斯福政府下的美国长期对自由法国政权并不友好，因此，永久法国的游说取得了一定成效。参见戴高乐美国纽约代表团总代表拉乌尔·阿格隆（Raoul Aglion）的作品：《戴高乐与罗斯福：美国的自由法国运动》（*De Gaulle et Roosevelt. La France libre aux États-Unis*），巴黎：普隆出版社，1984年；朱利安·G. 赫斯菲尔德（Julian G. Hartsfield），《美国与法国》（*America and the French Nation*），教堂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1946年3月30日的电报，参见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1945—1970），多项事务，文化交流（1945—1959），多项事务（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55（0.236.2）。

列维-斯特劳斯的评论是：“吉尔伯特夫人的才华显然不足。我不得不承认，她的演讲仍然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当我们试着与女性俱乐部（women's club）和省级协会联系时，不能忽略美国的具体情况。”¹

根据简化程序的思路，这一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考虑在美国创立“法语书籍中心”（Centre du livre français）。该中心将充分利用美国的图书发行网络，协调和主管法语书籍的销售。他推荐使用一种技术手段——[发送给大学、法国教授和学术团体的]目标邮件列表——寻找此前几乎没有交集的特定目标读者。当时，由于价格过高以及纸张供应不足，法语书籍几乎一本也卖不出去。²好在文化服务处保持了其传统的业务。例如，帮助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在美国组织大型艺术展览和巡回演出。但这项业务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作为法兰西喜剧院来美演出的交换，列维-斯特劳斯建议将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的舞蹈团带到巴黎。他确实对新的编舞艺术产生了兴趣，这种编舞艺术对他来说似乎“代表了今天美国土地上一种特别活跃、新颖的艺术活动”³。

列维-斯特劳斯很喜欢回忆担任文化服务处主管期间的苦涩记忆：“我有一些点子，但一个也没有实现。首先，我想要在巴黎策划一场以早期美国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但是美国国务院不情不愿，认为这会有损美国的形象。其次，我想要采购一些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fic Northwest）原住民的艺术品，卖家希望以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几幅画作为交换。但是这一次，法国相关部门，特别是主管博物馆业务的乔治·萨莱（Georges Salles）提出了反对

1 1947年4月11日的信，参见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1945—1970），多项事务，文化交流（1945—1959），多项事务（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57。

2 奇妙的是，50年后（1991年），继承了这一传统的纽约法国书籍办事处（Bureau français du livre）成立，机构的名字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动。

3 1946年6月3日的信，参见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1945—1970），多项事务，文化交流（1945—1959），多项事务（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58。

意见。”¹即使这些计划以失败告终，人们也能从中察觉到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法国现代艺术的重要作品换取几乎没有人认可的原住民艺术品。随着响应新文化政策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遍布世界各地的文化参赞的岗位构成了一个网络），这项新文化政策仍在想办法让自己与之前的方法（其本质是语言学的方法——通过法语联盟，让法语教学成为法国文化实力的象征）保持距离。它与借助重大事件来扩大影响力的传统政策更加彻底地划清了界限。

二战后法国文化外交的参与者们——包括主要人物列维 - 斯特劳斯特——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战争中溃败的不仅是法国在国外的声望一落千丈，从根本上讲，还包括法国作为文学艺术高地和文化大国这一身份的瓦解。他们也知道，眼下，普遍主义已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互惠互利。二战后，担任文化参赞期间，他负责了许多业务。这些业务都以专业上的跨界（学者、医生、建筑师、企业家等）为理想模型，但这是法国人现在必须学习接纳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另一项干预措施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列维 - 斯特劳斯特希望法国必须放下特权，参与国际社会知识和文化的发展：他要求詹姆斯·海德奖（James Hyde Prize）向外国作者开放。詹姆斯·海德奖表彰的是研究法美两国关系史或19世纪法国历史的著作，但此前，从未表彰过外国作者。

同样，他竭力避免在介绍法国艺术时容易出现的浮夸言辞，否定一切自我满足的口吻。他认为这样的谈吐不仅荒谬、过时，而且适得其反。“我认为，健康的文化交流政策不仅要赢得外国朋友们的赞美和钦佩，还要给予他们发挥的余地。向他们双手奉上那些常常听起来过犹不及的定论，会制造冲突，造成与目标完全相反的效果。[……]主张绘画是一种法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或者断定法国当代文学世界第一，这样并不能获得我们的受众的认

1 2000年6月2日，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特向作者叙述了这段过往。

可。”¹ 法兰西共和国曾将对殖民地执行“教化的使命”作为一项正式的殖民政策，对待其他国家——尤其是南美国家——的文化时，也抱有同样的心态。因此，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最适合站出来挑战这一“教化的使命”²。1940年，法国战役惨败，终结了法国自诩为救世主的旧时代。

二战后，新一代世界级文豪成长起来。法国文学界恢复了往日的荣光，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时，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加缪、韦科尔和马尔罗（Malraux）取代了乔治·杜哈曼（Georges Duhamel）、莫洛亚（Maurois）和纪德（Gide）。作为文化参赞，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热情地接待来自法国文学界的新星，一丝不敢怠慢。他们和他几乎同龄，在沦陷后的法国成长起来，然后，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对法国沦陷后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这样，纽约见证了许多重要人物之间相知相识的过程，这些际遇是20世纪知识生活和艺术生活的缩影。1945年1月，布勒东（已经居住在纽约）和萨特在纽约相识，如果两人的相识意味着超现实主义正在衰亡，蒸蒸日上的存在主义将取而代之，那么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的碰面则预示着存在主义也将衰落，结构主义将成为1960年代的主流。当时，列维-斯特劳斯还未出名，萨特已走向事业巅峰。

同时，1947年余下的时间，列维-斯特劳斯不得不为下一份工作而奔波。现在，他渴望返回法国。他敦促路易·若克斯尽快

1 1947年1月17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电讯《法国对美国的文化政策》。参见外交部档案，文化关系（1945—1970），多项事务，文化交流（1945—1959），多项事务（1945—1947），美国，档案盒编号55（0.236.1）。后被洛朗·让皮埃尔引用：《法国对美国的文化政策（1940—1947）》，第116页。

2 爱丽丝·康克林（Alice Conklin）：《教化任务：法国和西非的共和主义帝国观念（1895—1930）》（*Mission to civilize. 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 1895-193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近期的文献：《人类博物馆里：法国的种族、人类学和帝国问题（1850—1950）》（*In the Museum of Man: Race, Anthropology and Empire in France, 1850-1950*），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3年。

找到他的继任者，但寻找人选的过程耗时数月。¹他还想为他返回法国一事做一些铺垫，但逐渐意识到最初的计划有点天真。事实证明，要在巴黎“抢占”一个教职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列维 - 斯特劳斯在国外逗留了大约 10 年。他仍然默默无闻，而法国学术界在二战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是这段历史的局外人，此外，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对他来说十分陌生。他获得了讲师一职²，因此，将在巴黎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未见东风。重返法国已势在必行，就算跋山涉水：“好几次，我不得不在返回法国或是留在美国这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但这些选择与我对美国深深的感恩之情没有任何联系。我在美国接受了很多帮助，这几乎拯救了我的性命，几年来，我有过研究和工作经历，那里的学术氛围和工作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现在的我。但是，我深刻地知道，我属于旧大陆。”³

1 最后，热内·德·梅西埃尔（René de Messières）于 1947 年秋拿下了这个职位，并一直工作至 1952 年。

2 1947 年 6 月 25 日给父母的家书里，他向父母宣布此事。

3 《忧郁的热带》，第 83 页。

列维 - 斯特劳斯与鸟



“此鸟应属于寒鸦，它把他的肩膀当作落脚之处……”画家阿尼塔·阿尔贝斯是列维 - 斯特劳斯的朋友，1979 年，在利涅罗勒为他拍摄了这一幕。

童年



① 家族发源地安格维莱(阿尔萨斯)的彩色明信片：明信片上包括安格维莱的天主教堂、新教教堂和犹太教堂。

② 伊萨克·斯特劳斯，克洛德的外曾祖父、音乐家和剧院的舞会总监。除了小提琴，他与妻子、五个女儿和被称为“施瑞博尔伯伯”(oncle Schreiber)的兄长一同生活。照片拍摄于1858年的维希。他是这座温泉之城音乐会的指挥，也是这座城市振兴事业的推动者。

③ 蕾雅·斯特劳斯的人像照。她是伊萨克·斯特劳斯的五个女儿之一，后嫁给古斯塔夫·列维，成为克洛德的祖母。卒年1932年，时近百岁。

④ 伊萨克·斯特劳斯，“舞曲音乐的贝朗热”。



⑤ 古斯塔夫·列维，弗洛尔·莫西和伊萨克·列维的儿子，雷蒙的父亲，克洛德的祖父。他因股市失利，于1890年，英年早逝。

⑥ 雷蒙·列维-斯特劳斯与身着水兵服的儿子克洛德。拍摄于1915年的巴黎。

⑦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淘气的孩子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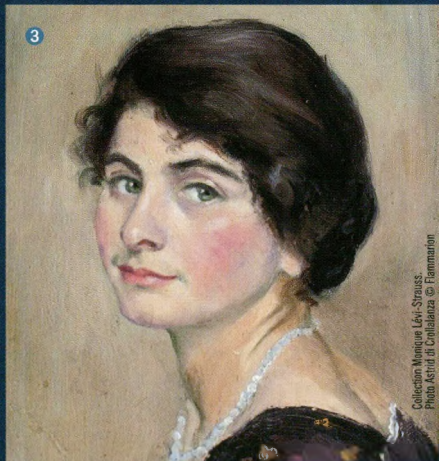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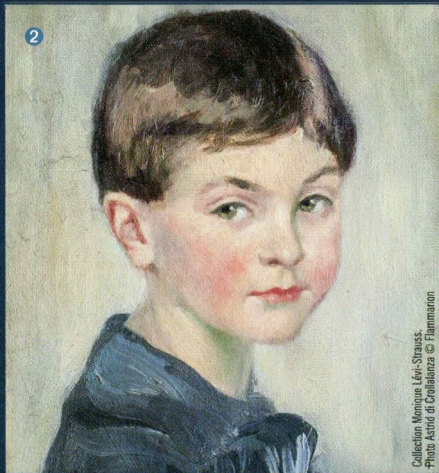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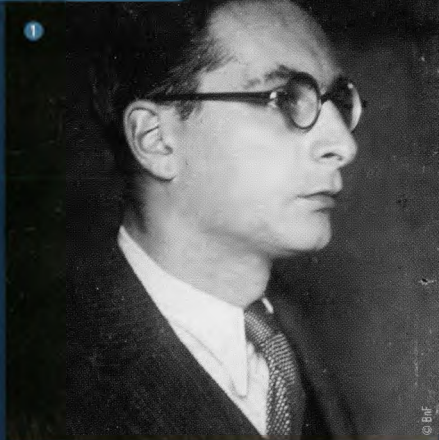
⑧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表情严肃的孩子形象。

⑨ 油画《机械木马上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由其父创作于1912年。雷蒙·列维-斯特劳斯荒废了生意，只沉迷于艺术。



Collection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Photo: Agence d'Orléans © Fammaron

年轻的列维 - 斯特劳斯



① 年轻时期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拍摄于1920年代末的普森路。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还散发着社会主义运动人士的气质。

② 雷蒙·列维-斯特劳斯于1913年完成的油画，画中人物为其子克洛德。

③ 雷蒙·列维-斯特劳斯于1913年完成的油画，画中人物为妻子爱玛，克洛德的母亲。

Collection Monique Lévi-Strauss.
Photo Astor di Collianza © Flammarion

Collection Monique Lévi-Strauss.
Photo Astor di Collianza © Flammarion



④ 图为步兵一五八团列维-斯特劳斯所在连的合照。拍摄日期为1931年12月。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正在斯特拉斯堡的斯蒂恩（Stirn）兵营服役。他将同一分队的战友圈了出来，自己则位于最后一排右六。照片第一排摆有“望远镜、37毫米步兵炮、斯托克斯式战壕迫击炮、电话机、无线电广播设备和光学仪器”（照片随信寄给了他的父母，日期为1932年1月7日）。

⑤ 这是位于塞文山脉（瓦勒罗盖市镇）坎卡布拉的房子，克洛德的父母自1920年代末起获得了房子的所有权，房子原被用作养蚕场。直到1964年，克洛德每年都会来此度过夏天。





① 狂欢节的某日，列维-斯特劳斯特斯拍下了圣约翰大道的一景。照片背景中映出了他遇到的第一幢美式“摩天大楼”马蒂内利大厦（Predio Martinelli）。圣保罗是巴西的芝加哥，是南大陆的一座城市。他热爱这座城市的野性。

②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特斯夫妇位于辛西纳托·布拉加路（Cincinato Braga）上的宅子。汽车正停在宅子门口。两位年轻的老师逃离外省高中后，这里成为他们的安乐窝。“远行意味着流浪他乡，失去原有的光环。这有好也有坏。”但这宅子给了他们温暖。

③ 1935年，雷蒙·列维-斯特劳斯特斯在圣保罗。

④ 克洛德与迪娜身处圣保罗，照片中，夫妻两人正与音乐相伴。在巴西，迪娜不仅与民族学为伴，更是克洛德的妻子。1939年，她与两者彻底诀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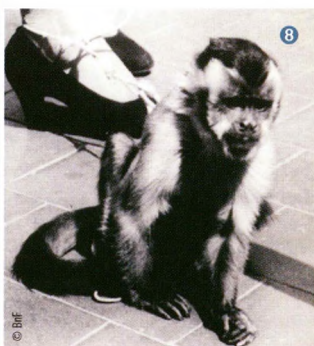


⑤ 这是爱玛·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的母亲，她的怀中抱着一只波斯猫。屋子里还养了不少其他动物。

⑥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坐在圣保罗家中的书桌前。

⑦ 照片拍摄于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的花园。位于照片正中的是博物馆馆长赫洛伊莎·阿尔贝托·托雷斯，她是巴西民族学研究的幕后推动者。列维-斯特劳斯端坐于她的左侧。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在她的最左侧。位于列维-斯特劳斯与路易斯·德·卡斯特罗·法利亚中间的是年轻的美国民族学家露丝·兰德斯（Ruth Landes）。赫洛伊莎右边的是另外三位民族学家：查尔斯·韦格利、雷蒙多·洛佩斯（Raimundo Lopes）和埃德森·卡内罗（Edson Carneiro）。

⑧ 在圣保罗，夫妇两人与一只母猴子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喂她喝奶，像关爱婴儿一样照顾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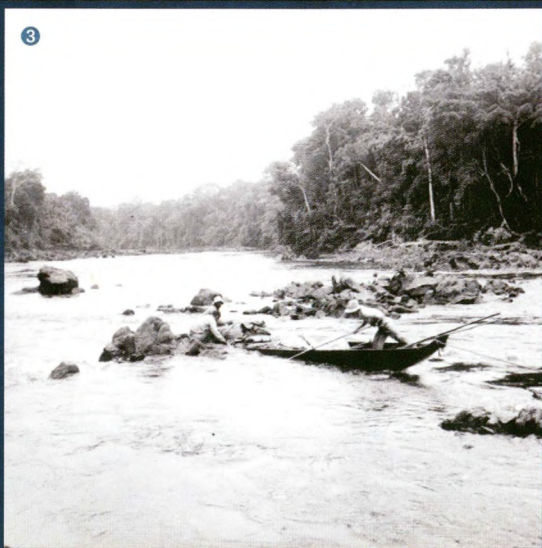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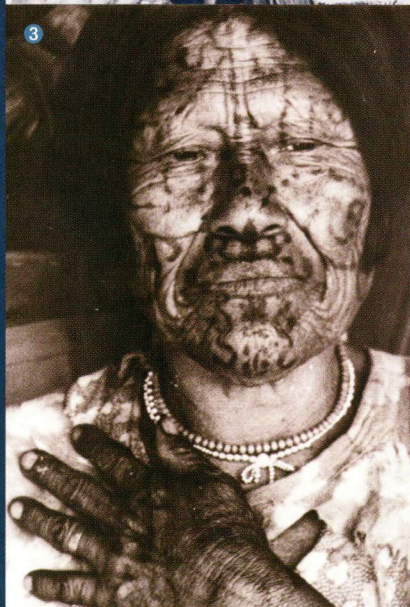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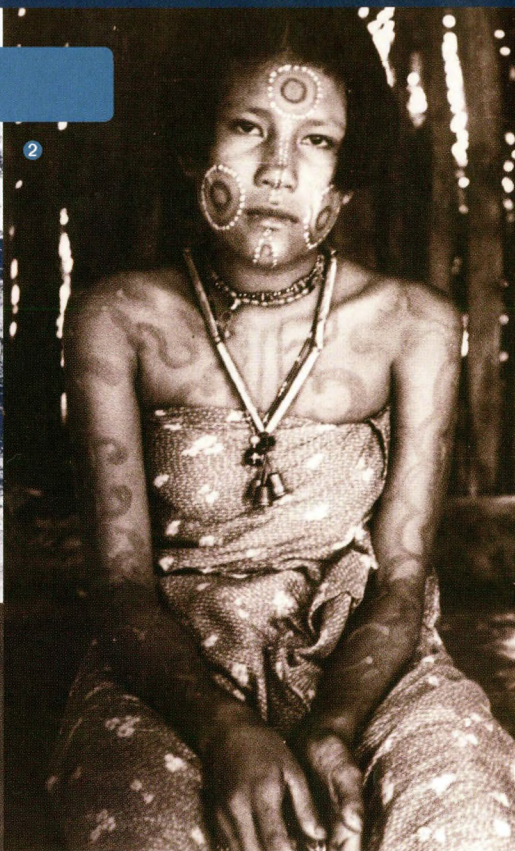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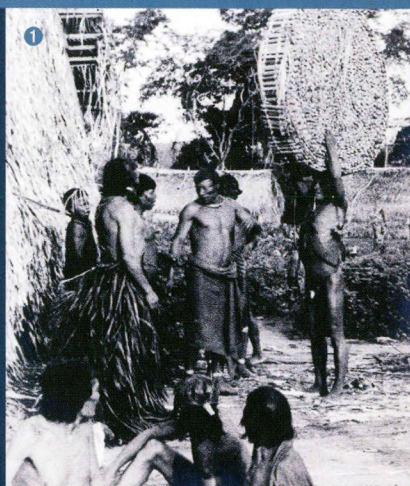
① 走出圣保罗的第一次考察。列维-斯特劳士在皮埃尔·蒙贝的陪同下，骑马探索巴拉那州北部的温带大森林。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成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第一人。

②③④ 第二次民族志考察深入巴西中部，需要沉重的后勤装备：赶骡子的人、牛和一辆卡车。每当蹚水过河，他们就需要停下来，往车上装东西或者从车上卸东西。当他们换乘独木舟后，沿着皮门塔布埃努河顺流而下，卡车就被抛至身后。

⑤ 图为帕帕盖欧河 (rio Papagaio) 的瀑布。帕帕盖欧河的河水清澈，民族学家正是在帕帕盖欧河的河岸遇见了第一批南比克瓦拉人。



第一次考察：卡杜维奥人和博罗罗人
(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



②③ 年轻的女子和年长的妇人均属于卡杜维奥部落。她们脸上绘有“花纹，虽不对称，但精致的几何图形不断重复出现”。这些图案是以竹片刀为工具、以美洲格尼帕果（jenipapo）的汁水为墨水绘制完成的。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正是被以此为代表的未知事物吸引而展开了民族学研究。

①④ “五颜六色”指的是，博罗罗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仪式，尤其是殡葬仪式。仪式的丰富性让民族学家大为吃惊。他们还观看了马力朵之舞（Marid'do）的表演。马力朵之舞指的是藤柳编织而成的圆盘，舞者将它像王冠一样戴在头上。克洛德和迪娜将这个仪式拍摄了下来。

5



6



第二次考察：南比克瓦拉部落
(1938年6月至1939年1月)

⑤ 一名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一丝不挂，席地而睡。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以照片的形式将之记录下来，并收录进《忧郁的热带》。照片正好体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困苦生活和他在书中描述的“人类的柔情”。

7



⑥⑦⑧ 编织术是口头文化中典型的手工艺技术，也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最后一本书《看、听、读》中表示敬意的一种高尚艺术。刀耕火种的过程中，南比克瓦拉妇女背着大篮子，里面只装了为数不多的工具。这些大篮子是功能显著的工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它们代表了自然与文化之间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8



1



① 帕帕盖欧河沿岸，民族学家在乌提利提安营扎寨，与南比克瓦拉人一同生活。

② 列维-斯特劳斯的猴子卢辛达正爬上他的肩膀。

③ 一位南比克瓦拉部落弓箭手正在拉弓。

④ 民族学家的装备：头盔、皮靴、工作服和挂在肩膀上珍贵的徕卡相机。

⑤ 这是列维-斯特劳斯考察笔记本的一部分：乐谱手稿、表达色彩的词汇列表、动物词汇、编织图案的草图、手绳游戏的手绘图、猴子 Zog Zog 的素描图和词汇卡。这些笔记本虽“保存得很糟糕”，但它们不仅是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精髓，也是民族学家返乡后用来反思的素材，缺一不可。

2



4



3



© Luis de Castro Faria, Document © Bf
© Luis de Castro Faria, Document © Bf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The Rose Tree" on three staves. The first staff is for the vocal part, starting with a treble clef,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and 2/4 time signature. It contains measures 7 and 8, with the word "chorus" written below. The second staff is for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also in treble clef, 2/4 time, with the word "chorus" written below. The third staff is for the first piano part, in bass clef, 2/4 time, with the word "1 piano" written to the left.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lined paper with blue ink.

9  chante pour la 1^{re} partie de l'école

1) kaine keni'agatu sahi kaine hekinaki i'au
2) kaine ke uatsanine e'ze kaine

lignes: direction, en file, de $O \rightarrow E$, face N , des S (conventionnel)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a 2/4 time signature, showing a sequence of eighth notes and rests across a staff.

un peu peu temps, j. sur t. fort, d. sur temps facile, avec les dans
à croire, mais qui x bonne à rendre q. à côté de lit, et en av. d'.

[illegible]

Hand-drawn illustrations of various animals and plants, likely from a field sketchbook. The drawings include:

- A small bird-like creature at the top left.
- A large, light-colored bear or sloth-like animal at the top center.
- A pig-like animal on the left.
- A plant with a large, round, spiky fruit in the center.
- A small, dark, cone-shaped object (possibly a seed or fruit) on the left.
- A large, dark, rounded object (possibly a seed or fruit) in the center.
- A large, dark, rounded object (possibly a seed or fruit) on the right.
- A small, dark, rounded object (possibly a seed or fruit) at the bottom left.
- A long, thin, snake-like creature at the bottom left.
- A lizard-like creature at the bottom center.
- A large, spotted animal (possibly a deer or antelope) at the bottom right.

Each drawing is accompanied by a label in a non-Latin script, likely a local language. The label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handwritten style.

le bain prend
chaque fois
1 seul élément
de l'armature

[illegible]



纽约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1941—1944)

① 1943 年，纽约“去达巴翰舞厅”餐厅的晚宴上聚集了一批流亡中的艺术家朋友。战争期间，列维·斯特劳斯常常与他们相聚。从左到右，站着的分别是伯纳德·莱斯 (Bernard Reis)、艾琳·弗朗西斯与埃斯特万·弗朗西斯 (Irene et Esteban Frances)、卡拉斯夫人 (Madame Calas)、阿希尔·戈尔基 (Arshile Gorky)、恩里科·多纳蒂 (Enrico Donati)、尼科·卡拉斯 (Nico Calas)；坐着的分别是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诺谷诗·戈尔基 (Nogouche Gorky)、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基斯勒夫人 (Madame Kiesler)、莱斯夫人 (Madame Reis)、埃莉萨·布勒东 (Elisa Breton)、帕特里西亚·玛塔 (Patricia Matta)、弗雷德里克·基斯勒 (Frederick Kiesler)、尼娜·勒贝勒 (Nina Lebel)、玛塔 (Matta)、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American Institute of France
Document © B&F

列维-斯特劳斯，纽约的文化参赞
(1945—1947)

1



2

3



© Blackstone Studios INC. Document © B&F

①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F. 拉塞尔 (William F. Russell)、费城美术馆馆长菲斯克·金博尔 (Fiske Kimbal)，以及位于他左手边的《艺术杂志》(La Gazette des beaux-arts) 主编乔治·威尔登斯坦 (Georges Wildenstein) 交谈。

② 罗斯-玛丽·乌尔默，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二任妻子 (1946)，以及1947年3月出生于纽约的洛朗·雅克明·列维-斯特劳斯 (Laurent Jacquemin Lévi-Strauss)。

③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身着浅色西装。1946年，他刚刚成为驻美 (纽约) 的文化参赞。

学者、作家、美学家
忧郁的形象

现代人类学之父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

不仅改变了人类学
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

这本屡获殊荣的传记讲述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冒险家的故事。不同于我们常看到的老态龙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照片,或是他在亚马孙河流域邈邈不堪、饱受文化冲击的样子,伊曼纽埃尔·卢瓦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世故、富有魅力、英俊潇洒的列维-斯特劳斯,他那令人难忘的声音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和进步的意义。与其说她把列维-斯特劳斯描绘成一位现代人,不如说她把他描绘成一位伟大而不安的同代人。

上架建议:传记·人类学

ISBN 978-7-5520-4370-9



定价: 168.00 元 (全两卷)